

親歷“蘇維埃革命”

——大別山蘇區革命者講述自己的革命史

編 校：黃文治

出版發行：柯捷出版社紐約

© Cozy Publishing House, New York 2015

電 話：(718) 592-9782

書店網址：www.cozygraphics.com/cozy_book_store.htm

電子郵件：publisher@cozygraphics.com

Printed in New York USA

2015年3月第一版

本作品受國際版權公約保護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違者必究
ISBN 978-1-59343-177-8 \$ 30.00



【銅鐘叢書】

親歷蘇維埃革命

黃文治 編校

柯捷出版社
紐約

【銅鐘叢書】

親歷“蘇維埃革命”

——大別山蘇區革命者講述自己的革命史

黃文治 編校

柯捷出版社

Cozy Publishing House, New York

親歷蘇維埃革命

——大別山蘇區革命者講述自己的革命史

黃文治 編校



【銅鐘叢書】

亲历“苏维埃革命”

——大别山苏区革命者讲述自己的革命史

编 校：黄文治

出版发行：柯捷出版社纽约

© Cozy Publishing House. New York 2015

电 话：（718）592-9782

书店网址：www.cozygraphics.com/cozy_book_store.htm

电子邮件：publisher@cozygraphics.com

Printed in New York U. S. A.

2015年3月第一版

本作品受国际版权公约保护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违者必究

ISBN 978-1-59343-177-8 \$ 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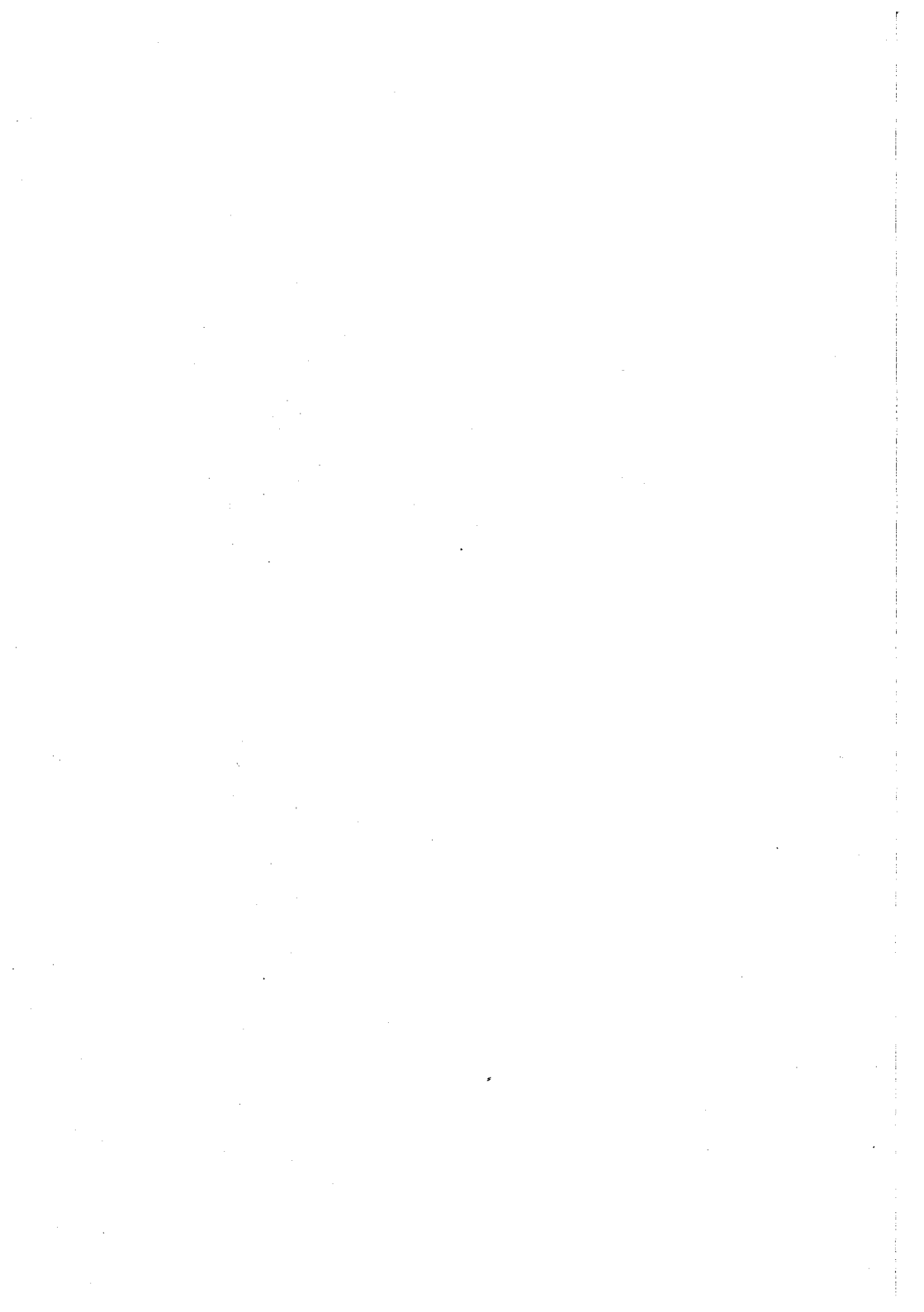
编校者简介

黄文治，男，安徽池州人，1980年农历八月初八生（9月16日）。历史学博士，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师。博士师从著名历史及政治学家萧功秦教授。从研以来，奉行“把握历史主脉、多读书、多读理论、多读材料、多做口述史、多写读书笔记、有问题意识、有新发现”的核心治学原则。

本科就读于山西大学，获得历史学、汉语言文学双学位；硕士就读于安徽大学，主攻中国近现代史，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博士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主攻中国近现代史，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主研领域：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与转型，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政治社会学及历史社会学等。

迄今为止已经在《开放时代》、《学术界》、《甘肃社会科学》、《北方论丛》、香港《二十一世纪》等刊物及爱思想网、共识网等网站上发表学术论文及文章数篇，颇引起学界重视。





毛泽东与张国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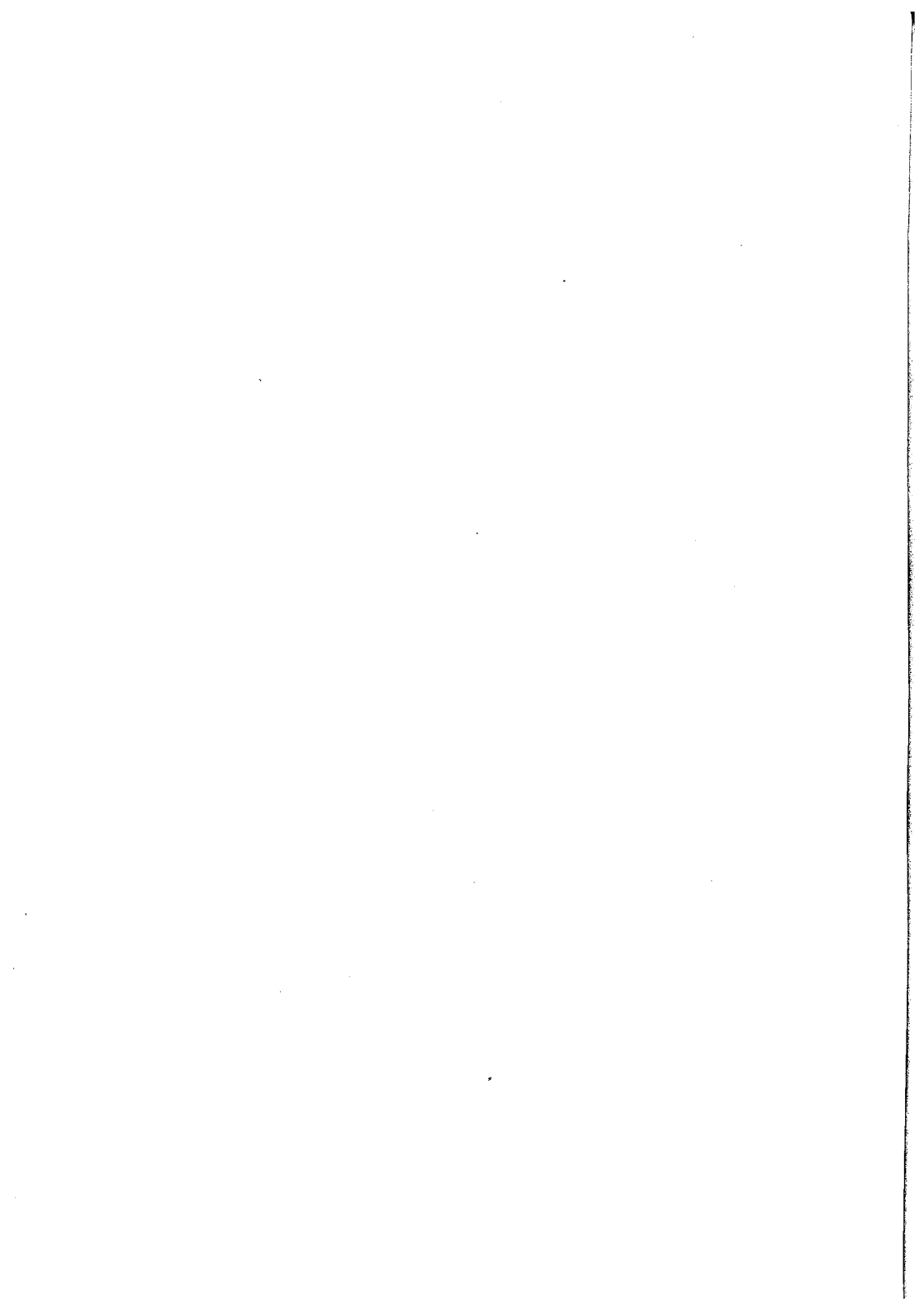
简要说明

任何历史研究的推展都是以史料的调查及解读为基础的。本集编校者曾以《鄂豫皖苏区道路：一个民众动员的实践研究（1920-1932）》为题从事几年的博士论文课题研究。该项博士论文课题是一项革命社会学视野下的“实证主义”研究，因此对文献史料的依赖性就极强。编校者几年来多次到大别山原革命老区做田野调查，去过安徽省档案馆、安徽省图书馆、安徽大学图书馆、安徽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六安市党史办、金寨县党史办、湖北省档案馆、湖北省党史办、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武汉大学图书馆、麻城市档案馆、麻城市党史办、红安县档案馆、红安县党史办等相关单位调访资料，从三省档案馆、党史办及地方档案馆、党史办、博物馆、口述老人那里收集到不少包括未刊档案资料、史料汇编、谱牒资料、人物传记、杂忆文集、地方县志、地方文史、革命歌谣、报刊、口述历史及谈话录等方面资料（尤其是民间资料）。这些资料多且庞杂，不少非常有价值。

这些口述历史及谈话录基本都是笔者此博士论文课题研究过程中寻访资料的副产品，凸显了大别山苏区史各个纵横切面。编校者这里搜集的二十余篇成集，都是事关大别山苏区史整体构架的，除了个别错别字及确定讹误的地方作了改动之外，基本都是原样呈现给学术研究者及普通读者，希望对推进、丰满学界中共革命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黄文治

2014年12月12日书于翡翠湖畔



目 录

- 1 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1927年冬至1930年春
- 32 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1930年春至1932年秋
- 64 郑位三同志全七次谈话录
- 117 郑位三同志在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工作干部会上的报告之一
- 121 黄安县初期革命斗争情况
——郑位三同志给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写人员的报告记录
- 143 徐向前同志谈话记录——鄂豫皖三省党史调查情况
- 150 徐向前同志谈话记录
- 163 访问徐立清部长谈话记录——谈豫南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
- 171 访问戴季英老人
- 176 戴季英同志的谈话
- 182 戴季英的回忆
- 203 陈再道同志谈黄麻起义前后革命历史斗争情况
- 208 程启光同志的十次谈话
- 223 程启光回忆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从木兰山到清水塘
- 227 肖永正同志讲述革命斗争史
- 237 郭述申回忆麻城惨案委员会成立之经过及其活动

- 241 郭述申同志谈有关鄂豫皖根据地的一些情况
- 246 郭述申谈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情况
- 249 郭述申同志对 1934 年 9 月鄂豫皖省委第四次常委扩大会《对郭述申同志决议》有关情况回忆
- 252 郭述申同志谈话记录
- 257 郭述申有关皖西北苏区革命斗争史料的回忆（一）
- 260 郭述申有关皖西北苏区革命斗争史料的回忆（二）
- 262 郭述申同志谈话纪要
- 264 郭述申同志谈话记录
- 268 郭述申同志谈话纪要
- 271 陈明义关于 1931 年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的回忆和看法
- 277 丁武选关于鄂豫皖苏区的四份口述材料
- 284 袁克服等同志回忆鄂豫皖苏区 1930、31 年一些左的政策
- 290 宋侃夫口述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
- 330 访朱蕴山同志笔录

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

1927年冬至1930年春

时间：1944年7月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报告：郑位三、戴季英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

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革命运动史上付出了很大代价，亦积累了不少的各种各样的经验，在目前学习党史路线中回忆其胜利失败成功错误是有现实意义的。

党在鄂豫皖区活动与发展，苏区红军斗争情况。许多同志要我详细讲，我因所知有限及没有研究，只从总的方面去概述，作初次发言，供参考。

一、共产党在鄂豫皖产生与活动

当时环境与革命发生

在辛亥革命，在五四、二七革命，广东国民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的产生等影响下与一些学生知识分子在鄂豫皖内地反帝反封建宣传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进步刊物书籍的流传，新文化运动的启发，更刺激着鄂豫皖社会内部阶级的民族的矛盾激化更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言论与要求发生更多，人民迫切希望革命，在各界在城市乡村常常可耳闻目见这些情况。

当时鄂豫皖人民生活环境是处在封建军阀连年战争（直奉鲁豫皖的战争），租课税债捐奇速加重（公债券，大加一，月月红，当青苗），百

物涨价（谷子由两串至十串一石），日用品高贵，洋货剧烈的倾注农村，自然经济降低（农业、手工业），年岁歉收，饥荒频起（旱灾连年），土匪强盗不断发生，瘟疫流行（发人瘟），广大农民急转直下的破产，无衣无食，与豪绅地主斗争纠葛问题时时发生（租案、债案、人命案……），豪绅地主与军阀官僚勾结争相扩张统治，操纵行政，收买土地，群众觉悟提高，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使得社会制度动荡，表现着没落景气与新生的现象，这种社会规律与客观环境正在准备着共产党与革命在鄂豫皖发生和发展。

黄麻共产党产生与活动，革命的兴起

1924年底至1925年，鄂豫皖区的黄安麻城几个先进青年学生参加共产党，如徐希烈、董贤钰、王秀松、余文治、戴季伦、蔡济璜、王宏文等。他们是在董必武、肖楚女的关系和思想影响下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学说。自他们加入后遂在黄麻扩大党的影响，宣传世界革命，宣传共产主义，并在黄麻内地发展共产党与青年团的组织。

1925年五卅运动，党利用暑期回乡里学生宣传号召群众举行反帝反封建军阀运动，罢课罢市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办乡村平民夜校，化装演讲，散发传单，动员群众救国家救自己，这把共产党与无产阶级影响更深入与刺激群众，同时出版“黄麻青年”刊物，指示青年与工农大众的道路，抨击反动政治，转载革命消息，号召新文化运动，又成立黄安青年协进会，团结进步青年学生到党的周围，同时在党领导下组织国民党。

……到农村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推翻压迫阶级，改变民不聊生的黑暗政治，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取消捐税，减轻租债，实行国人革命，拥护苏联拥护共产党，工农联合……是党当时的口号与在群众行动中的纲领，他们时常公开谈论要把这旧社会“造暴”（即造乱之意）。1925年冬成立黄安、麻城的共产党与青年团特支。同年冬，主张夺取黄安麻城教育局，于是从清算教育经费发动斗争。当时黄麻教育局长是王楚材、余敬芳为代表的旧势力的，这斗争到1926年春即实现了。以刘任舟为黄安教育局长，王宏文为麻城教育局长，党利用教育系统发展与活动，是黄麻革命一个好的成就。

发动群众首先注视打倒有权威的豪绅地主首领，如吴惠存、李介人、

程瑞麟、王芝廷等。在1926年（北伐军进到湖北时），党领导群众举行反豪绅地主的斗争，打死最有才能的吴惠存，这事件对统治阶级对广大群众是霹雷般的震动，鼓动了广大群众与又促起地主反动派的挣扎活动。继续逼迫黄安县政府逮捕李介人等12个大地主豪绅于1926年腊月公审枪毙，这仍然鼓动了广大群众，与促起豪绅地主反动派的挣扎活动，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和扩大。当时对于反豪绅地主的斗争策略是：首先对付有权威的而容易发动群众，同时有“擒贼先擒王”的作用。豪绅地主反动派在黄安曾欺骗群众组织的红枪会，反对革命（西砦会事件）。

1926年9、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时，黄麻党团员学生如徐希烈、戴季伦、王文焕、蔡济璜、戴克敏、刘象民（均湖北第一师范）、曹学楷（中华大学）、王秀松、王健、刘建安、汪奠川、桂步蟾、徐子清、李培文（武汉中学）、余文治（启黄中学）、王文魁、戴季英（第六中学）、刘文蔚、王树声、徐其书、吴焕先（麻城农业学校）等，在党指示下，进行组织各地工农会，发动群众，以工农会代替乡村政权。推翻旧统治，发展党团。此时期黄麻（的革命运动）在全国革命胜利形势影响下蓬勃发展着。

“革命是拥有多么伟大的开明教育与组织的力量，革命数月总比政治停滞十年光阴所教育公民，有时要迅速而完满”——列宁。

反河南豪绅地主统治的红枪会，广大农民战争

在1926年河南之光山、罗山豪绅地主在“防匪防党”口号下组织红枪会反对革命，防守边境，不准黄麻革命影响河南，致引起广大群众反对，发展成为从卡房至福田河数百里的革命农民武装战争。这战争完全是群众性的，在党领导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这战争相互残杀破坏很厉害，表现农民战争原始情形，表现农民的破坏性，这广大群众战争给黄麻共产党以武装群众和群众武装斗争的兴趣与经验；这战争表现群众反豪绅地主斗争的坚持性，到1928年春，光山、罗山红枪会瓦解，才使这战争形势变动了。这战争中党对于农民的弱点认识与克服不够，领导力仍不强，军事上亦无经验。

大革命时代的工作概况

黄安党在大革命时期，完全取得了党部的工农会的领导权，支配了全县政治，农会实际成为乡村政权，群众组织普遍，工农会威权提得很高，

纪律较好，农民事归农会办，工人事归工会办，民主决议。减租减息，取消苛杂，没收大地主土地财产与公产，八小时工作与增加工资，优待童工，解放妇女，审判土劣都实行着。教育的改造与建立，党亦很注意，建立小学一千余所，学生五万余人，平民夜校普遍设立。当成立农民自卫军武装，党亦完全取得了领导权。汪精卫在武汉分家时曾骂“赤色的黄安，小莫斯科的黄梅”。黄梅在大革命失败后，被豪绅地主反动势力反攻致完全失败了，黄安在大革命时共产党登上了全县政治舞台。麻城则在其西北乡工作较深入，建立了基础。

黄安县委于1927年春成立，余文治、徐希烈、戴季伦、郑位三等。麻城亦成立，有蔡济璜、王宏文、刘文蔚等。

河南之商城与安徽之六安在大革命时有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其工作发展则次于黄麻。这两地后来成为豫东南皖西北革命中心基础。黄麻成为鄂东北中心基础。

这一时期党在鄂豫皖的经验主要有：

1. 共产党必须真正面向群众，真正站在群众利益与真正群众运动基础上，才能发展自己。
 2. 在统一战线中取得领导权，才能发展自己。
 3. 知识分子学生与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真正为工农群众服务，才能发展自己。
 4. 有干部人才，才能发展自己。
- 反之，则党在黄麻当时是不能发展的，可以想见。

二、大革命失败后时黄麻情况

武汉国共分家与黄麻党团内分化

武汉国共分家，国民党全面反革命政策压迫解散工农会，停止工农运动，解除工农革命的武装，屠杀共产党的白色恐怖环境下，黄麻形势起了基本变动，黄麻党团内部开始了动摇与分化，大部分消极退却与妥协，一部分同志仍继续原地工作，主张继续革命，继续巩固工农运动，发展组织，联合左派，把持党部，把持农民自卫军武装，逮捕正在回来与正在抬

头的豪绅地主反动分子，反对妥协叛变动摇。

分化与工作到 10 月，只剩下一小部分所谓活动分子在原地工作，照党的主张继续革命，如曹学楷、徐朋人、戴季伦、戴克敏、王志仁、陈定侯、汪奠川、戴季英、程昭续、郑大开、吴焕先、阮德巨、熊殿勋、高建斗、郑友梅、戴雪舫、江竹溪、詹学道、蔡济璜、刘文蔚、王树声、桂步蟾、徐其虚、徐子清等。

（桂步蟾：武汉军分校学生，参加广州暴动，在海陆丰红军第四师任过连党代表，后与向前一块又回到鄂东，任第四队党代表，在反徐源泉、夏斗寅“会剿”时，于铁寨岗作战中牺牲。）

“八七”会议后的九月暴动

由于黄麻党在领导上的动摇与分化，“八七”会议后九月暴动计划未实现。这因为党在领导机关没有坚决采取将刚刚发动起来的斗争扩大与继续革命的进攻，没有提出土地革命的纲领，并且领导机关解体了。9 月暴动计划未完成，豪绅地主反动派积极活动，企图摧毁党与革命，这是一个斗争的关键。

而一部分党团同志仍是继续坚持工作，继续执行党的主张，巩固工农运动，反对豪绅地主国民党，把持农民自卫武装不听政府命令，扩大农民义勇队武装，发展组织，逮捕豪绅地主反动分子，计划以黄麻北部为继续革命，“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当时党提出这样号召）的大本营，以黄安七里坪为活动中心，依靠群众力量，因无领导机关，日常过问党团县委者为曹学楷、戴季英等（七里坪）。

这一时期党在黄麻经验主要是：

1. 在失败中党采取了革命的主张，坚持与继续革命，对付失败中的事变，保持了革命，保持了党。

2. 以黄麻北部为革命大本营，领导群众，把握武装，打击正在活动的一大批豪绅地主反动派，提高了群众阶级斗争勇气，这争取了失败中的出路，替以后暴动准备条件。

3. 幼嫩的党与同志只要有适合于主客观情况的主张，完全可能发展党与革命，而经验知识的缺乏则又影响党与革命，经验知识亦只有在工作现实过程中去增长，在错误中去体会。

4.不怕失败与打击，只怕对党对革命前途没有信念，只怕不敢为，信念与敢为，即全是简单的形态，也有意义。

三、黄麻秋收暴动

中共中央与省委指令

中共少共中央派符向一、刘镇一两代表与吴光浩、潘忠汝两军事干部于旧历十月初到黄安七里坪，带来中央指令黄麻仍要组织秋收暴动，配合两湖秋暴。10月10日左右，召集黄麻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地点在七里坪文昌宫第二高级小学。

会议讨论认为黄麻举行暴动是可能的，只有暴动才能打开黄麻革命局面，把革命继续与进一步向前发展，配合两湖秋暴是当前紧急任务。由于客观条件成熟与同志们在思想行动上原来有斗争准备，经一天多的会议，完全接受了党的指令，后来称这次会议为“暴动会议”。

暴动会议的具体决定

大致决定了巩固工农运动，发展组织，改造黄麻党团，把握自卫军（人枪共百余）为主力，并加紧训练，以黄安之潘家河、阮家店、箭厂河、程卜畈等地义勇队和麻城之乘马岗、顺河集的农民为主要依靠，加紧反豪绅地主，没收财产，加强义勇队办事处的工作，动员第二高小的学生到农村去。党团机关设七里坪，仍为曹学楷、戴季英等负责，中央代表留七里坪，麻城工作归黄安领导，计划打成一片，暴动日期再定。

第二次暴动会议

10月20日后又在原地召集会议，讨论认为已准备好，遂决定暴动攻占黄安县城，消灭国民党保安队，扩大自己武装，后来称这次会议为“第二次暴动会议”。

暴动的行动情况

10月25日夜九时行动，鸡鸣时开始打城，拂晓攻入，消灭敌人武装，占领县政府。动员起的群众约20万，配合自卫军攻城的武装群众约两万，行动总指挥为吴光浩，副指挥刘镇一，率领群众的为曹学楷、戴季英、吴焕

先，口令是“暴动，夺取县城”。攻击时的枪声、炸弹爆炸声、上枪声和群众的嘶杀声打“呵火”一起交织了，呈现翻天覆地势不可遏的群众革命暴力，河山被人群耸动了似的。人们在这斗争中尝试、学习、寻味。

暴动是群众的、是革命的严重进攻，是革命者进步的阶梯，是被压迫阶级的崛起，是敌人最可怕的起义。

吴光浩，黄陂三合店人，黄陂中学与黄埔学生，北伐时攻武昌城有功升营长，蒋介石曾注意他有才能，准备升团长，后发觉为共产党，其得逮捕消息跑走。

黄安农民政府的成立与纲领

当攻占黄安县后本是说成立革命委员会，又说切合农民暴动意义，遂称为“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

纲领内容大致为：实行土地革命，工农武装起来推翻豪绅地主统治，建立工农政权，实行民主自由，改善劳苦群众生活，实行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保护商业贸易，保护中小商人，拥护苏联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占中国，打倒国民党蒋介石。这在当时农民政府布告与到处行动口号中（都能体现）。

组织与工作情况

黄安县委组织为王志仁、戴克敏、戴季伦、曹学楷、汪奠川、潘忠汝、吴光浩、戴季英、詹道曾、田开寿（工人）、程绍续（农民）等（党团合为一个县委）。

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共约 240 支枪，潘忠汝、吴光浩为总、副指挥，戴克敏为党代表。

黄安农民义勇队有四万人，戴季英、吴焕先、郑友梅分三个区域指挥（七、紫、城）。麻城农民武装为徐其虚、王树声、桂步蟾（原文如此。本文前“二”中介绍桂步蟾参加 1927 年 12 月 11 日广州暴动和任红四师连党代表，他何时到广州待查）等指挥（乘、顺）。

暴动胜利后，工作中心是武装群众。11月初（旧历）在黄安城、七里坪、长冲、麻城、顺河集各地举行“武装检阅大会”，同时为“讨伐蒋介石大会”。

军事上采取首先打击北面光山豪绅地主反动集团，防止鄂豫两省将

来夹攻，而进到陈德祖，望风而逃，未能实现计划。其次是打击西面黄陂土匪，与东面福田河的红枪会，这都是为了保卫暴动区在孔庙总指挥部军事会议上的决定。因短的时间内与经验上的缺乏，未能消除这各方敌人。

思想认识错误与正确

在种种情况之下，当时不暴动是没有更好办法，不举行暴动是没有出路的。暴动思想与方针是对的，而思想认识上有主观主义错误，缺乏经验。以为大革命失败而中国革命发展形势仍存在，两湖暴动可以取得两湖的占据成为再次掀起大革命的大本营；以为贺叶军到两广，其力量不比广东 1925 年代小，可以占据两广或广东，成为再次掀起大革命的大本营亦可能。两湖两广胜利可以逼使蒋介石偏安于南京或东南，两湖两广党的影响与群众基础均利于我们扩大革命势力，黄麻如在两湖两广胜利下是有保障的。这是不懂形势的主观主义错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另一方面也曾认为国共分家后国民党是全局性的反动，蒋介石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占绝对优势，两湖两广革命恐不能如我们意的胜利，但我们在黄麻当时情况亦只有暴动才能继续革命，不然不能长久下去的。暴动后反革命来压迫必不可免，而总可想办法斗争，革命，总不致完全垮台，对于前途困难波折的认识是有，但不清楚，也不很顾虑。从暴动中替革命找出路这是对的。

这些是当时党在黄麻同志中的思想认识概况，中央省委除八七会议决定外，也没有详细具体指示。

党在黄麻暴动中的政策问题

党的基本政策是能站在劳苦群众的利益（方面），领导群众顽强地反地主阶级斗争中得到果实（经济的、政治的）。这样方能争取与团结和发动广大群众，不然，是不可能的。又由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存在“非无产”，反映了农民报复主义的错误，对于豪绅地主反动派不知运用可能争取的政策，与对于豪绅地主反动派的打杀惩罚有一些过左的错误，如提“杀尽豪绅地主反动派”的口号。

群众情绪

暴动胜利，群众革命情绪澎湃，到处赶制武器、军装、红带、火药，到处听着“拥护共产党”、“是黑脚杆子的天下了”、“穷人伸腰了”、

“什么时候打武汉……”，每个乡村市镇，日夜都在紧张的开会、工作，到处可看到男女老少喜形于色、熙来攘往。

国民党进攻与农民政府失败

11月14、15两日，在河口击溃了黄陂土匪进攻（豪绅地主勾结的），16日夜，驻在宋埠的国民党十二军任应岐教导师向黄安农民政府进攻。（工农革命军）正因打土匪回来疲劳休息之际，起而守城应战。还以为是土匪来犯，原对于任应岐估计不足，当时侦察工作不够，军事上缺乏经验，疏忽的错误。愈战愈烈，弹药殆尽了，敌硬攻北门而入，激烈巷战一阵，严重伤亡不能支持，残兵败将数十人跃城墙而出。群众武装奔援于城外与敌战，亦有伤亡。县委书记王志仁、总指挥潘忠汝牺牲。农民政府仅存在了21天。

失败，是惨败状况。我们退集七里坪，敌人迅速从河南、湖北包围进攻，情况严重，有不消灭我们不止之势，农民义勇队被打得散乱，我们党与政府及工农革命军共数十人枪在黄麻北部游击仍不能立足，遂在木城寨下商讨，决定新方针——保持这一点力量，出境游击为上策，待机卷土重来。于是经香灯山脱离原地出境到黄陂之木兰山。

党在黄麻革命这一时期经验主要有：

1.共产党的任务方针同群众（的要求）结合，才成功了这暴动胜利，这即是“党的主张被群众接受才发生物质力量”。

2.暴动后，积极为群众谋利益与武装群众，摧毁反动统治势力，深入党的影响，这奠下了以后第二次暴动基础。

3.发挥与组织了干部党员群众的创造，锻炼培植干部，反对妥协退却，保障了党的领导。

4.客观反动势力比我们占绝对优势，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在当时已过去，黄麻是处于失败形势中，以及缺乏经验和失败准备，致遭更大损失。

5.坚持到最后，为着继续革命与对革命前途展望和信念，保持活力出境与敢于进境，这在当时是有意义的决定。

6.工作上有某些盲动主义的错误（八七会议精神）和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在接受与保障党的领导，为革命找出路是对的。

四、木兰山的游击战争与工农革命军第七军

到达木兰山后的情况

腊月初六到木兰山。共 72 人，42 支步枪，九架盒子枪，两支小手枪。第三日决定改番号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这是红十一军的前身，吴光浩为军长，戴克敏为党代表。出布告宣布本军主张如前，号召黄陂群众起来推翻豪绅地主国民党的统治，同时扬言“……我们这是打前站的，大队数万人还在黄麻……”群众表示相信，豪绅地主反动派也将信将疑，而这扬言，实际是内心申诉我们力量大小的苦衷，这即是“……革命钟敲江海寺，英雄败困木兰山……”的赠言。

第七军在领导上是一委员会，由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戴季英、汪奠川五人组成。部队编成三个分队，一切均报告中央与省委批准（中央郭亮、贺昌谈话指示）。

木兰山有宽宏庙宇，有百多个和尚，地形好，居黄陂城北，山脉下人烟稠密，物产好，文化发达，站在山之祈嗣鼎上，在日光下，可遥遥望见武汉大江兴波作浪。

1928 年 1 月国民党报载“……黄麻共祸大股肃清，残余窜黄陂木兰山观音沟，称工农第七军，谣言惑众……”

中央指示我们在腊月 25 日夜攻横店车站，切断京汉铁路，配合该日夜汉口暴动，知横店驻敌一团或一营，认为不能冒险，遂改于该日大破坏长轩岭电话交通与打罗家岗反动地主武装集团，号召黄陂群众暴动。25 日夜曾在木兰山观望汉口的行动，以后得知，汉口暴动未成。

罗家岗的行动

旧历年夜，攻下了罗家岗，缴敌枪十九支，号召了黄陂万余群众进行没收斗争。罗家岗的行动，使党在黄陂扩大了影响，群众更认识工农第七军是解放劳苦群众的军队。这行动震撼武汉黄陂与影响了黄麻，黄麻群众说：“又发了……”作有歌谣：“……木兰山上共产党，红帜高挂在天空……”。反动派说：“没有好多人”、“蜂螫有毒……”。

中共省委指示

1928年1月初，因木兰山形势渐形紧张，报告省委与请示，省委指示大意是如能回返黄麻活动即返回去，如不能则由你们自己看情形决定，不要被敌人消灭。在黄陂活动得很好，以后还是这样干，省委现在无人可派。同时在省委处得知广暴与全国各地暴动失败。

在木兰山讨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与革命处于低落失败，而革命条件不可消灭并在增加，愈压迫群众愈要革命，共产党杀不完，地方大，敌人空子多，政治形势总在变化，社会总在向前进化，谁也不能阻止住革命存在与发展，敌人虽力量比我们大，到处压迫我们，但巴掌打跳蚤是容易落空的，我们照党的主张自己多想办法奋斗，总有一天可搞个名堂出来。木兰山如不能立足，到黄冈去游击，现在还不能返黄麻；为恐被敌围困于木兰山，决定到山下准备应付环境。

敌人进攻木兰山与到黄冈大崎山

5月15日（应为1月26日），敌一团来打，我们脱出包围，敌追击未逞。翌日与又翌日敌仍来包围，我们同样脱离。群众对我们好，地形条件好，熟习情形，敌人有弱点错误，领导上机断与大家一致，敌人总不能消灭我们。但情况告诉了黄陂不可久留，应相机而作，遂决定到黄冈游击，一日夜超越了黄麻两县的南境，到黄冈大崎山。

大崎山地区亦好，对我们游击有利，文化发达不如黄陂。在大崎山时，由于主观客观种种原因，告诉了要苦心踏实的准备，谨慎细心，估计敌人不久又要来打的。

敌人进攻大崎山与到罗田游击

一天清早，夏斗寅部约两营人打来了，我们利用地形崎岖道路摆脱了敌人，敌占据大崎山。于是决定到罗田，有意从罗田再向麻城东北部游击。依靠着崇山峻岭，向东游击，沿途有很好地形田园村落。

到罗田三里畈，除想立足游击一时外，并计划联系上下巴河，因巴河条件好，准备为可能游击的地区，到三里畈发动群众，没收方本仁的亲戚（的财产），破坏电报电话局，驱逐了少数民团，召集民众宣传我们主张。

敌人进攻罗田与到黄冈回龙山

罗田夏凤池部打来了，打了一仗，形势不利，遂决定再到黄冈回龙山。到黄冈回龙山与决定再到木兰山

艰忍的走难走的崎岖道路，到达黄冈回龙山，的确是从来未受过的疲劳饥饿，到此七十余人共吃一升米两个南瓜的稀饭，聊以充饥。备战备跑患难与艰苦。

回龙山地区好，而地形不大好，少森林借作活动的隐蔽，并接近三家店柳子港，讨论后认为不宜在此久留，不能等敌人来打再走。

认为黄冈罗田不容许我们游击，黄、麻现不可返，还是在黄陂、孝感与接连黄安这几县活动可能好些，时间上可能有办法拖久些，于是决定再到木兰山。

游击战争中的生活与决定生存发展的条件

党在鄂东这几县游击战争中，感觉到最苦的是每处不能久停，如环境准许时仍进行党与群众工作，支部小组有活动，调查事项亦经常进行，注意时间和能对敌警觉，对同志爱护，而对同志缺点不多批评是不对的，领导有讨论与计划准备对付困难，生活还是不够健全的，工作行动有缺点错误，同志们没有发生动摇悲观，对前途抱希望。

由于数月以来日夜的游击战争与各地辗转觉得游击战争要八会——会跑（跑路与跑脱敌人）、会打（不打无益之仗）、会散（散开）、会集（集合）、会进（进攻）、会退（退走）、会知（知敌）、会疑（疑惑敌人反动派），这是当时闲谈“要八会”，是环境与实际生活中产生主观直觉而没有能在思想上成文。

1928年冬中央指示说（中央巡视员曹壮夫来）：“失败后的方针与方向是对的，努力完成了党的使命，游击战争很好，大有成绩……”

我们应认识是由于革命客观条件给其联系，党给其主张，群众给其援助，这是三个决定其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否则，是不可想象的。

再到木兰山与改变策略

离回龙山，出三店，渡紫潭河，绕太平桥，插过黄安南境，到达木兰山旧地，这即是“……共产党夜渡紫潭河，红七军雪战大崎山……”。

到木兰山地区不多日，又得知敌人要进一步地计划来消灭我们，于是在陈秀冲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改变策略，为保存现有力量与便于发展，决定埋藏长枪，以短枪化装便服，分成数小队，积极扩大武装，争取红枪会仁义会群众，加强地方工作，军部兼为黄陂县委。

为适合便衣队的游击战争，在战术上决定：昼伏夜动、远袭近止、声东击西、绕南进北。只有这几句成文的简单的术语，以后在实际中运用着。

此后，为向黄麻北部行动的准备而采取先出黄麻南部，王树声等向麻城南部白果出击，汪奠川等同志向黄安南部杨子山出击，江竹清等向长江北岸游击，戴道普、徐其虚分向黄、麻北部秘密侦察，军部在黄陂木兰山地区。

解决了白果与杨子山民团，缴枪二十余支，打死黄安公安局长曹屠夫（因杀群众多，群众称为曹屠夫），交通要道辟壤乡村时可出没，敌人难以捉摸、跟踪，打破了敌人消灭企图。数十人联系着群众，分布几县活动，工作形势有进展（党与群众工作及军事胜利），觉得比以前舒服，党的影响扩大，反动派惶恐不安与跑反。所到之处贴标语作为宣传主张。主要优点是明确的党的主张，较好的群众纪律，联系与号召群众起来革命，而错误是有些军事冒险及烧了几处大反动派的房子与游击主义。

党在这一时期经验主要有：

1.保存力量与争取发展的方针是适合于敌我形势的，在党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中没有被敌人消灭反而打击了敌人，在困难中没有堕落妥协反而加油奋斗挣扎，党在那种种情况里，的确是煞费了苦心，这对于共产党有意义，只有共产党才能如此。

2.共产党、党员干部、群众、武装，如能结合在一起，即令是一支枪，即令是一个党员，也能有把握的活动发展，但必须要有信心。

3.在失败中不灰心，不意志颓废，创造锻炼，测验党员的品性气节，修养革命事业责任心，比平时更重要。“共产党的前面，普通困难是存在的，即特别困难也能打破”。——毛泽东

4.照当时党在木兰山的知识经验，只能做到那样，不能过高要求，如果有政治上更强领导，其成就必然更强，缺乏强的领导是党在木兰山的弱点。

5.革命的客观条件，党的主张，群众的援助，这是决定在木兰山存在与发展的可能。共产党在木兰山对于黄、麻与鄂豫皖革命有“承先启后”的意义。“饮水思源”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观点。

6.回忆那些光荣牺牲的同志，精明强干，胜利失败中不骄不卑，威武不能屈，跟党走前进，没有打算个人富贵，在这一方面是很好的共产党员，

照他们当时社会条件是容易如许多人找到个人富贵的，但没有如此。

五、黄麻第二次暴动与红十一军成立， 商城、六安暴动至鄂豫边区成立

第二次暴动的决定与暴动

蒋、桂战争起后，黄、麻形势有新变动，驻敌退走，豪绅地主怕我们返回而有惊慌，群众情绪有变动，我们认为卷土重来，再发暴动时机已成熟。陈秀冲会议决定“返黄麻再组织暴动”、“以原暴动区为基础”、“用游击战争方式号召群众”、“首先消灭反动民团和大打反动分子”、“不打城市”、“建立党团组织”、“寻找避难的同志”、“宣传地主国民党罪恶”、“实行土地革命，土地归农民，宣传我们再不退走”……。

清明之夜（1928年）向黄麻北部进袭，解决了檀树岗，袁英河、乘马区等地反动民团，群众在残酷压迫下更积累与激起了阶级斗争的烈火，相继暴动了起来，先后参加的群众约二十万以上。

在行动中，党与群众都有报复主义和烧杀政策的错误（烧了一些大反动分子的房子与敌人要点），妨碍了影响，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豪绅地主反动派用许多办法反扑，都失败了，于是，我们占着斗争优势，行动日益发展。

清水塘会议

五月清水塘会议庆祝胜利，计划扩大与发展胜利，将部队改编为三个中队，每中队有一定地区，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建立工作基础，准备与地主国民党更激烈的斗争。主观上仍存在不少困难，如干部少，武装不足，找不着中央关系。……

这会议又决定以黄、麻、光的木城寨、光裕山、羚羊山、摩云山、乘马岗这五个山脉为立足根据地（即大别山），作为活动依托，而当时根据地思想是简单的，不成理论的。

改编后两日，长冲敌人进攻，在河南北垵之战，击溃敌人一营和一民团，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影响更扩大。

“党员游击返黄安……”，——当时民间歌谣。

尹家嘴会议与决定

7月在尹家嘴(开)军部会议,认为斗争发展进步,工作需要进一步布置:组织赤卫军、少先队的群众武装,并成立精干赤卫队作为核心,建立各地党团组织设立指导机关,一般群众组织统一为农委会,再过渡到正式成立苏维埃;第七军改编为红军第十一军。……

以曹学楷为光山南区委(准备成立县委)书记兼红枪会副指挥;尹良太(原红枪会的)为光山红枪会总指挥并为光山农委主席,石生财为光山东区区委书记,向商城联系,徐朋人为光山西区区委书记,以戴季英为黄麻党团合组的县委书记兼黄安武装总指挥(后专担任黄安),程昭续为黄安农委会主席,王宏学为麻城农委会主席兼麻城武装总指挥,以郑新民为罗南工委书记兼罗山红枪会总指挥,调戴季伦开辟白区城市工作,为黄陂县委书记,焦复兴为黄陂革委会主席(黄陂后称革委会),以辜志新为孝感汪洋店工委书记,吴行忠为黄冈特支书记(李家集)。

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改编为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吴光浩为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为党代表,王树声、江竹青、徐其虚、廖荣坤、吴先筹、王奠川、詹学道、詹才芳等分任队长党代表,红军主力本身数量还小而精干坚强。对于党团发展注意质量,斗争不坚决的不可入党团,富农入党团需经县委批准,支部有一定生活与群众工作,提出“一切同志为支部,一切工作为支部”,但支部工作有烦琐的情形发生。

扩大武装,除向敌人缴得外,并设法自制武器,设兵工厂于陈家冲,制造“拐子枪”(使用步枪子弹的),并向外买枪,在黄安黄陂南部设立购买枪支的地方。

普遍实行五抗(抗租、课、税、债、捐)与没收地主反动土地财产。会议后,即照党的这些决定实行。

尹家嘴会议有较进一步建立根据地的工作方针之收获,而缺乏对于许多政策问题的研究。

成立鄂东特委

相继即成立鄂东特委,因工作之需要促成的。中共鄂东特委为徐朋人、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戴季伦、焦复兴、戴季英、辜志新、徐其虚、王树声、余泽涵、詹才芳、熊邦山、丁茂富等组成,徐朋人为书记(徐

在这一般人中较老练些)。同时成立少共鄂东特委以戴季英暂兼书记,后为张心炳任少共特委书记(张在1930年派往鄂西参加鄂西省委)。

主张上的争论问题

在成立鄂东特委扩大会上,余泽涵提出特委应设在白区,便利加强白区城市工作,机关应设在城市,根据地应建立在陂安南部,不宜保守在北部,土地问题在南方不属主要,因商人多,群众不要土地,主要着重于发展组织,先有了组织则才好办事,这些意见均被反对。天明时敌人把这会议冲散了。

土地问题

在1928年8月时节是已到收谷子时节,根据群众情绪,决定“谁种的田归谁收去”,这主要为适合佃农要求,这一年的秋收就这样解决了。同时在松树岗会议决定土地分配主张,是豪绅地主反动派的土地财产,照人口分给贫农雇农,自耕农不分土地进去也不拿出来,富农的好土地也没收,小地主不反动的分以坏土地,但无所有权。虽然有这决定,但由于游击战争与敌人时来进攻,环境不稳定,农民经常在行动中,这影响土地实施分配与只部分地方进行了分配之。到1929年,方以村为单位成立土地委员会进行分配,中心区在1929年秋季大致分配完了,冬季又重新调查分配。

分土地中,为阶级划分为(土地)好坏为界限为附产(山林、竹园、池塘、菜园、稻场、油子树、厕所……),农民有很多争执和意见。农民在分配土地时,注意所有权,要我们给他“凭据”;也有的打埋伏,为着得到好与多一些。在分配完结的公布会议上,男女老幼特别到得整齐,聚精会神的听公布的报告,穷人们的亲戚互相恭贺,“得到了好水田……”。没有土地的果实,是不能发动群众的。

破坏旧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习惯,建设新的社会,是很繁难的,比如一个村庄的土地重新建设也是很简单的,没有群众的知识与力量就无法下手,没有群众的力量则社会制度不可能改造,学生知识,是还不如“种田佬”。

红军问题

红军干部必须是坚决的党、团员,战士成分不要土匪流氓分子,经

济公开，对贪污有严格纪律；官兵生活同样严守群众纪律，服从命令，接受党的领导，英勇牺牲，不开小差；爱护武器，爱护伤病员；但游击主义的习气存在，个别打骂现象亦有，战术教育与整理军事经验不够注意。

十八军某团之第十一连同情分子温排长率领士兵打死连长晔变投共产党，此兵变对于党与红军的助力很有意义，这就是“莫打鼓儿莫打罗，听我唱个兵变歌……”。

红军和赤卫队是积极作战，有计划的解决了云雾山、高桥河、姚家集等八个民团，这对反动势力是个严重打击，并表现红军英勇与机动，这些胜利对苏区发展很有意义。

政策上的问题

当时党在领导上坚决采取反地主阶级土地革命的政策以及对这政策的运用上，基本上是正确的，不然，则不可能争取广大农民群众继续革命，不能对付反革命的进攻，不能发展党与红军，更不能在失败中存在。

反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是当时鄂豫皖广大群众的情绪，党坚决的执行这政策，以及其它适合群众情绪的政策，于是能与群众结合而创立了中国革命的一部分鄂豫皖革命。

“不懂群众情绪不是马列主义”——毛主席去年某次报告中言，我们在工作中亦曾违反过群众情绪，脱离群众而招致了错误的损失。

在任何工作任何时候要防止不注意群众情绪不解决群众情绪脱离群众的倾向，这是最有害的。

从木兰山陈秀冲会议（返黄麻之会议）至清水塘至尹家嘴会议，红十一军成立与鄂东特委成立，这一时期是第二次暴动的时期，客观形势有利，党在这一时期总政策是创造以黄麻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以后亦提出“稳定这根据地”的斗争任务，当时称稳定即巩固之意，在工作与行动上围绕着这总政策的。

在政策上有缺点与原则上的错误，主要如在彻底消灭地主反动派的斗争中，将经济上的摧毁、政治上的斗争、武装上的战争和肉体上的消灭并重，这是错误的，在这过左偏向上即放弃了对于有些小反动分子争取的可能（如油榨坑问题）。

在争取分化工作上，对红枪会、仁义会做得较好，除福田河、黄土

冈、八里垅外。其余一般的瓦解了（为）豪绅地主（利用的）这种集团，对于地主绅士的阵线如争取朱芑洲，孤立了陈德祖的吴文瀚，争取了郭小五爷，孤立郭道畅，争取了江席亭，孤立了袁永足，但对于这政策认识不够与放弃了很多可能争取的机会，是错误的。

阶级斗争的激烈与残酷

黄麻在第二次暴动后，阶级斗争情况很激烈残酷，豪绅地主国民党的反革命，也确实很厉害，如捕去的党员和革命群众用油烧死，如在李家河一次用机枪打死九十三个农民，如彻底烧毁干部的家室与屠杀其亲属……，党坚定的站在广大群众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前线与把握着这斗争的激烈性残酷性而领导与组织展开了斗争，这是完全对的，否则一定要失败。

不懂阶级不懂群众，也必然不能懂得斗争的激烈性与残酷性，也不能站在斗争的前线指挥群众斗争，但如没有完备的正确政策也必然要发生在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

游击战争情况

从第二次暴动后，党领导广大群众卷入游击战争，实行了“以游击战争组织暴动”。游击战争情况是很多的，其大致是——经常敌人打进去又退走，我们打进去又退回，或争取立足而不退回，敌人东来我西去与敌人兜圈子，敌人深沟高垒、坚壁清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我们则在其野外活动，孤立与打击他的出发地，尤注意打击远出的单个敌人（单独部队），逼使敌人怕出阵地，并在夜间袭击敌人阵地的前沿，……消灭敌人哨棚，阻截敌人交通，……敌人不出来则引诱他，敌人不动则骚动他，敌人分进合击，我们找空子钻出去，如钻不出去则分散再集中，敌人从大道挺进，我们则从小道与没有路的地方周旋迂回，后来敌人找小道分进，我们则从小道出来，敌人有包围某山脉某地带的清乡动向，我们则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锅盆碗盏猪牛鸡羊，向另山脉另地带安全地方行动，在数十里外，布置一层层的赤卫军、赤卫队警戒与打击之，红军主力则相机作战，田园、村庄、山林、河流、民情、道路对于我们很熟习，而敌人则生疏，敌人追击时如不能反击，则“溜鸡跑兔”，溜之大吉，敌人开差，我们则缴尾子，打乱他的行李挑子，纠缠他的掩护部队，敌人夜宿，我们则在其周围或一方打断续的冷枪，照着敌人门窗灯火光瞄准打，照着他的手电光

打，敌人薄弱与空虚的地方，我们大肆活动，有时动员全县于某日夜把敌人电线电杆一齐砍掉，一齐张贴新标语宣言，一齐向敌人驻地佯攻，造成敌人严重不安……。这样进行游击战与构成相当广大活跃的“游击火线”。群众创造了许多游击经验，产生了许多游击战的军事家，愈打愈进步，武装组织亦愈打愈扩大。

敌人不断失败与地区缩小和退出驻点，我们不断胜利与地区扩大和建立据点，1929年旧历正月十九，敌人大举包围柴山堡完全失败了，战争中敌我形势日趋改变。

群众创造的歌曲

群众中自己创造了很多歌曲，如：

十二月歌：“正月是新年，穷人真可怜，衣衫褴褛无衣换。二月是花朝，富人真正好，珍馐美味，白炭火烤，……十二月梅花开，红旗飘起来，工农专政，无产独裁”。是贫农曾海洲作的，曾在上海党的“红旗报”上登载过。

雇农歌：清早起来好凉风，肩托犁耙进田冲，一脚踏着茅柘茨，怨来怨去打长工，豪绅地主真可恨，压迫穷人个个穷，幸而有了共产党，一心一意救工农”。

妇女歌：“正月里想思艳阳儿天，百草萌芽遍地鲜，柳如烟，我即革命常常在外边。妆台无心上，菱花懒照颜，奴郎、夫君，你本是革命人，不灭敌人不要回还。

黄安农民政府周年纪念

黄安农民政府第一周年纪念日，是群众很注意的日子，党写了“一年来黄安农民暴动概况”以资纪念，在黄安县委刊物“群众”发表。群众喜欢共产党反映他们斗争的真实情况，叫多散发。

找着中央关系

1928年1月后至10月这时期，找不着上级党的关系，在渴望中央指示与派人来领导的情况下，派石健民到武汉去找，找到了省委派何玉琳来巡视，同时中央也派代表曹壮父来巡视，曹腊月到，带来六次大会决议，在郭家庄开会由曹传达。

六次大会决议是有缺陷错误的，而当时对鄂豫皖苏维埃运动土地革

命斗争、游击战争有帮助作用。

留曹、何在鄂豫皖领导，而（他们）均要回去，此时期徐宝珊从中央到孝感，经孝感县委来参加特委，同时与信阳潢川白区党亦发生了关系，倪志亮从信阳来参加红军工作，1929年与安徽寿州白区党亦发生了关系。

商城与六安暴动

1929年3月28日商城举行了暴动，这暴动是商城党领导群众与民团起义（南溪、丁家埠），产生了红十一军三十二师，这暴动局面和力量比黄麻小，而意义与行动则同样。商城党员干部、群众是很好的，因其领导人中有个别流氓不正派分子，打死党代表，反对党领导，企图变成个人势力，但终于被克服了。暴动后，土地革命继续深入扩大，创造了党红军苏区，成为鄂豫皖之豫东南中心根据地，是鄂豫皖革命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

相继的是六安暴动（独山），同样是六安党领导下的群众与民团起义，局面力量不大，而意义行动与黄麻商城同样。暴动后，深入扩大了土地革命，创造了红十一军三十三师与党和苏区，成为皖西北中心根据地，同是鄂豫皖革命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在鄂豫皖之黄麻、商城、六安领导的暴动，是广大群众反对反革命的阶级战争，继承中国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传统，破坏了当时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白色统治，在中国的中部掀起土地革命浪潮，对于全国革命有重大意义。

历史的成果

黄麻、商城、六安这三个地方是鄂豫皖红军与今天八路军新四军之一的三个源泉。残酷内战到抗战。这三个地方及鄂豫皖区域仍在原来影响上发展了党与群众组织（两万党员），并称六安、霍邱为模范。

而在领导路线上的错误，与特务活动于1940年春即全部与大部垮台，被李品仙肃清鄂豫皖内部共产党的“肃清内部”和“扫荡团”大破坏了，许多共产党员红军家属被逮捕监禁屠杀活埋，干部们全体向江北新四军跑反“撤退”，想起这些阶级仇恨，是不可能容忍的，鬼魅魍魉应给以肃清，党纪之所不容。

路线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

抗战后中国党首先遭到全面破坏的地方是鄂豫皖区，主要原因是主观错误——领导路线错误，错误路线认识是在1939年2月六中全会后党在立煌扩大会议健全而具体的成就了，原来安徽工委的路线也是错的，听说立煌扩大会议决定了“广西派廖政权是进步的政权，这为大别山形式基本特点……帮助五路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共同领导……”这样方针与总任务，很明显是机会主义投降路线，并与新四军领导上的机会主义在江北完全结合一致、在干部路线上也是很多错误，如高级领导机关区党委委员□□□卷款逃亡重庆。周维干部科长特务逮捕，陈昭锦青年科长叛徒，汪胜文1938年在陕公当学生时因问题而未解决组织问题……，下层干部对杨德华之流很信用，但干部中有很多好的。

吴光浩牺牲与徐向前到鄂豫皖

1929年4月，军长吴光浩牺牲于罗田，王奠川牺牲于汪家祠，徐其虚牺牲于商城，他们是有功的优秀党员。

1929年夏，中央派徐向前到鄂豫皖，代理吴光浩职，当时环境是徐源泉、夏斗寅的“会剿”，从鄂豫两面夹攻，而在党与群众红军团结一致的力量以及徐向前的指挥下，党的领导下，经数月战争，打破了这次“会剿”，徐、夏均退却。红军在积极扩张行动与机动下，突向杨平口、花园消灭郭汝栋、钱大钧（二十军与教导师）两个团，占领云梦，战争与苏区的形势均有发展，红军本身团结、整理、训练、扩大有进步。徐向前继吴光浩帮助党在鄂豫皖建设红军工作上和指挥战争的扩大上起了作用，在党与群众培养下形成徐向前的名字。后党派李荣桂为红军政治委员（李荣桂到一师任政治委员为1930年4月），原政治委员戴克敏为团政委。

鄂豫边区的形成

1928、1929两年，党在鄂豫皖的群众武装与游击战争有较好的发展，（地方）武装建立与扩大（黄麻已有二十多万群众武装），苏区红军发展，党团组织建立与扩大，干部大批产生，土地革命深入与政权的建立，统治阶级削弱。

在地域上发展和联系的有十三个县——黄安、麻城、光山、罗山、黄陂、孝感、黄冈、商城、六安、霍邱、霍山、固始、英山。党团员黄安

六千人，麻城三千多人，光山二千多人，商城、六安、黄陂发展亦较好，各县均有各级组织与机关，这两年党在鄂豫皖的奋斗中付了很大代价与建立了基础。当然还是不健全与发展不够。

因鄂豫边局面已形成，中央指示成立鄂豫边区领导（特委）与成立“鄂豫边区”。1929年冬月举行这边区八县代表大会，地点在胡子石，开十余天，产生边区特委，这是鄂豫皖历史上第一个代表大会。

边区党代表大会决议起草委员会

决议草案有“政治形势与任务”（陈荫林），内容大致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危机与边区发展形势，反帝反封建巩固扩大苏区发展红军与游击战争的任务。“组织问题”（徐朋人），内容大致是巩固与发展边区党，提高领导作用，加强党铁的纪律，创造更多干部，统一边区领导，反对地方观念。“农民土地问题”（郑位三），调查与深入分配土地，巩固贫农已得利益。“武装问题”（戴季英），大致是有系统整编与扩大赤少队，各区设赤卫军团部（每区一团），少先队大队部（每区一大队），加强党的领导，充实武器，建立操场活动，加强军训。轮流调遣打游击，配合红军行动，动员参加红军，赤卫军中另成立支部，与地方支部分开。“红军问题”（徐向前），大致是加强工农红军中党的领导作用，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扩大红军主力，责成地方党多送党团员干部到红军，积极作战，提高战术，严守群众纪律，废除肉刑，经济公开，官兵待遇一致等。“城市工作”（徐宝珊），大致是建立苏区周围白区与城市秘密工作，首先建立平汉路路工中的工作，派人到白区播种，特委办秘密工作训练班，每期一月。“土匪枪会问题”（雷绍全），大致是争取群众，孤立首领，打击最反动的集团，打入进去发展党。“青年团问题”（张心炳），以青工小组少年先锋队、农村小学为团的工作中心。还有工会问题、妇女运动问题、大会告边区党员书。

大会主席团——徐朋人、徐宝珊、曹学楷、郑新民、戴季英、雷绍全、李梯云、陈定侯、王宏学等。

边区特委除以前鄂东特委个别改掉外，再增补了一些，郑新民、李梯云、张德山、郑位三等。

大会决议均经信阳特委送中央。

继续举行边区青年团代表大会，地点黄谷畈，特委决定戴季英帮助这次大会的举行。

鄂豫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

同年腊月即举行鄂豫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开了7天，地点在细吴家。先已在春夏季正式成立了黄安、麻城、光山等县苏维埃。

宣传运动周后，即进行选举代表运动，由群众普选，每50公民选1代表，各县又集合这些代表选举出席大会的代表。

这次大会的议程——土地问题、武装问题、扩红拥红问题、苏维埃组织问题、文化教育问题、婚姻问题、救济问题……各种问题均有决定，一条条的方式写成，并印发于群众中。

有告边区群众书、告全国同胞书、告红军书、慰问红军家属书、慰问伤兵代表团。

开大会这几天，各县举行群众大会“庆祝鄂豫边区成立”，很热闹。

这大会主席团——曹学楷、徐向前、郑行瑞、李梯云、王宏学、郑新民、戴季英、焦复兴、李思六、闵丹桂（女）、魏祖圣等。

大会党团书记吴焕先。

产生边区革命委员会（中央指示成立边区革委会），选举曹学楷、徐向前、郑行瑞、吴焕先、戴季伦、李梯云、魏祖圣、戴季英、王宏学、尹良太、郑新民等为委员，曹学楷主席，徐向前军委主席，吴焕先土委主席，戴季伦文委主席，郑行瑞财委主席，李梯云内务主席，魏祖圣裁委主席。

这些人选与分工，均是先由特委决定。

这几个大会结束了，边区成立，不很详细的总结了两年来的工作、斗争经历，决定了今后的大政方针与一些具体事项。

边区局面是数百万群众数年斗争得到的，许多曲折的斗争和当时的发展趋势，表现了群众力量如吐不完的蛛丝一样。

党内思想与作风问题

“他们从来没有葬送革命的机会主义思想和行动”，这可认为是党在鄂豫皖那几年领导上的基本特点。因此，党能以无产阶级的坚持性斗争性创造性，发动了广大群众（实行）土地革命，从群众中建立起党政军红军，由于在斗争中产生的党，而有真诚朴实、刻苦踏实、不空洞少条文、

注意群众问题、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

但党内亦仍存在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如地方工作上在某些工作某些地方有保守本位主义的狭隘错误，在人力物力和工作进行中打埋伏与只注意作自己范围的计划打算，忽视整体抵触组织。如地方与红军，红军与游击队，游击队与赤卫军亦有发生为人力物力工作上行动上注意自己的范围之本位主义。如工作中的经验主义，狭隘于经验中认识问题，亦发生缺点和错误。如党内思想斗争和思想教育上的自由主义，重视同志好的方面不抓紧对缺点错误的批评，在纪律上有惩办主义。如军事问题上有单纯游击主义习惯，在部分的问题上发生。斗争中有单纯阶级观点致影响于政策上的错误……。

半殖民地半封建广大农民小资产阶级是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特点中，产生了广大小资产阶级的人要革命、要加入共产党，跟随着无产阶级，这又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上的特点，而同时反映了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到党内来成为优点中的弱点，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破坏与改造小资产阶级的属性，是很重要的。

党在鄂豫皖这一时期的经验主要有：

1.利用时机与条件，领导了第二次暴动以至商城、六安的暴动，这些暴动的方针与计划是对的，所以成功了。有木兰山时代的失败与退却，并准备卷土重来的思想，所以才有第二次暴动进攻胜利。

2.第二次暴动有坚决不退与建立根据地的中心方针，故未退而建立了根据地。这是由第一次暴动，与木兰山时代的经验，当时客观形势与革命条件产生了党的主张与促成了这主张的实现和进步。

3.党武装群众结合，依靠了群众，依靠了阶级，不然，数十支枪是很容易在敌人反扑下被消灭的。“党与武装结合，天下无敌”——毛泽东。

4.在斗争中建立起广大群众武装与发展了游击战争，群众武装斗争与游击战争是适合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当时并不能清楚懂得这特点）。

5.在斗争中培植干部人才，信任与器重干部，发扬了干部的创造，团结了干部，“培养干部如园丁培植果树一样”——斯大林，而对于干部教育与缺点的克服则（注意）不够。

6.党内阶级教育，面向群众教育，武装军事战争教育，这几种在鄂豫

皖是有收获的，最大缺陷是理论教育不够。

如 1928 年冬在南胡家党训班的课程有“什么是共产党与共产主义”、“斗争与暴动”、“游击战争”、“群众武装组织和领导”、“怎样分土地”，没有专讲理论的课题，这影响理论水平的提高。

7.革命的阶级，要能真正实行革命的群众运动，才能提高群众积极性创造性，才能使广大农民走到无产阶级领导下面来，革命的群众运动主要标志是严厉的打击与推翻（旧）统治，“对敌人宽容，就是对自己寻死”。

8.小资产阶级的人，改变与提升到无产阶级地位，经过胜利失败的身心折磨，经过炮火战争，经过在真正群众中生活，经过党内外斗争，是极重大的条件。

9.革命历史是群众斗争的结晶，是群众的，是群众所重视，与现实有密切关系。鄂豫皖后来发生有违背历史情形，抗战后亦发生有这种情形。

鄂豫皖特区成立

鄂豫边区成立后不久，中央指示成立鄂豫皖特区，将六安中心县委合并来。中央巡视员曹大骏到，于 1930 年 2 月在箭厂河召集各县联席会议，曹做了报告和各种报告与讨论，共开了 3 天会议，没有各种草案决议。

关于发展问题，曹指示“苏区来波纹式的发展”，会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波纹式已不适合当时发展的形势与要求，已过去了，最后仍服从了曹的指示。对于“红军直属中央，与地方党发生横的关系”，有认为工作行动配合不便，而中央已决定，这会议解决办法是，以后红军与地方开联席会议协商红军与地方配合问题。关于红军行动是“巩固扩大苏区任务下集中向外发展与作战”，关于“扩大与供给红军”，由地方党政府负责，这些，是这次各县联席会议中心问题，会议因只有 3 天，时间上未能讨论许多问题。

鄂豫皖特委书记以原特委书记徐朋人暂代理，因中央已决定派郭述申来任书记，郭 3 月到，特委委员除补加熊受暄、姜镜堂（中央来）和周纯全，甘元景（本地）等外，原有的大致未变动，而徐朋人出席四中全会后，特委日常工作常委里除周纯全外，无本地人，这时特委领导上与下层联系是缺点，注意不够，影响工作。

红军改编

当时（1930年2月）红军骨干力量已形成，地方武装正在扩大，群众武装有数十万赤少队。在箭厂河改编红十一军为第一军，中央派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为政委兼前委书记，熊受暄为军政治部主任，徐向前为副军长兼参谋长，刘英为一师长，李荣桂为政委（中央来），周维炯为二师长，张德山为政委（原来本地），王培吾为二师政治部主任（中央来），肖方为三师长（原来本地），姜镜堂为政委兼六安中心县委书记（中央来），以后王树声为总预备队指挥，曹学楷为政委，这样组成了红军第一军。行动由红军自己主持，地方可以提供意见。

红十五军到鄂豫皖

1930年秋，蔡申熙率红十五军从大（冶）阳（新）地区突围，经过很多艰苦行动到鄂豫皖，约两千余人，同一军合流。

红一军改编为红四军与领导组织

1930年冬中央决定改编为红军第四军，派邝继勋来任军长，余笃山来任政委，同时派曾中生来任特委书记与军委主席，郭述申为宣传部长，郑行瑞为军委副主席，甘元景为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周纯全为保卫局长与总工会委员长，钱文华（中央来）为少共书记。

1930年在发展形势上，加强与改组自己力量是很需要的。正需要大进一步大提高一步，而在工作政策上仍未搞好，并发生一些问题。

一些政策上的问题

在干部问题上，由于不了解下情、工作环境，不了解干部，以致不能很好组织干部，干部经常被调动，县区委在3、4个月内被变换的很多，信用干部不够，提拔使用没有掌握住才、德、资的普通原则，尤其不注意干部斗争和群众诸关系，对干部有爱恶之分与机械了解提拔工农，干部生长反应更快，而确实不如前那样快。加强布尔什维克化，加强无产阶级领导，口号提得高这是需要与重要的。而实际加强上仍极不够。“开斗争会”的风气逐渐发展，当头一棍的斗争方式有发展，由缺乏正确斗争原则和态度，致许多同志缩手缩脚怕犯错误，思想斗争教育往往注意小事与片面孤立看问题，工农干部与知识干部，开始有隔离对立的某种情况，训练干部的学校训练班均未设立，对于干部私人问题完全不管，这些在当时对干部团结、发扬进步上是有影响的。

在工作问题上，对每个时期中心工作和每个县区中心工作，缺乏具体明确适时的指示和指导（有时也有），一般工作决定很多，时常向下层发通告与堆积，对其实现情况如何是缺乏很好注意，使得下层同志感到工作难做，“不管做不做得通。做下去再说……”，下层同志这种愿做的精神仍好。

在党与红军的关系上，有许多事互不相知的情形，这关系较前是疏远些，红军劳苦功高也有部分的逐渐表现，地方党与政府勤务公差很多，对扩大与爱护红军很在意。

在红军行动与战争上，红军本身整训是有进步，党与群众拥护下日益扩大，红军也经常集中行动取得了战争胜利，扩大战果，消灭岳维峻与活捉岳维峻，而却有单纯军事行动与军事胜利倾向发生，如南下武穴的行动，除企图取得军事胜利与扩大政治影响外，别无意义。当时应联合广大群众武装进行内线作战，建设苏区，这是很需要也有很好顺利条件。

在城市与乡村问题上，打城市的倾向与兴趣有发展，为扩大与巩固苏区是有应打的城市，而仍应重视抓紧对广大乡村开辟和帮助组织武装群众建立乡村政权，进一步经营已有根据地，充实对根据地的巩固工作，但在认识上是模糊不清与不一致，实际工作上不够，说“已有基础了马虎一点不要紧”，这是偏向，放松了巩固阵地。

在游击战争上，游击战争继续发展着，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是有，而指挥和计划群众武装行动与游击队的动作及加强群众武装等，均发生过“左”、“右”倾的情形，有不懂军事的情形，掌握各地群众武装和游击部队特性与情绪是不够的，也不注意，并在立三路线时对群众武装问题已有破坏，由于群众武装多和强包藏了，不见发生大问题。

赤白区关系上，没有注意解决，有的多是靠军事胜利与军事压力打破之。

党的发展上，党应发展的更快更好，而到1930年还只三万党员，扩大到三百万人口的苏区领土，这比例是不够的，1930年后一律开除富农是不对的。

领导方式上，官僚命令主义有发展，民主作风不够，联系群众，反映下层实际情形较慢，又由于主观宗派的做法，而影响于反映认识情形上发生偏差或完全不相符，工作指示上有教条公式，空洞抽象的调口，特委

机关称“报馆”，县区委机关称“工会”是“党是秘密的”教条错误。

在这些问题上表现有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对于当前在思想上的检讨与对于过去的检讨均是极不够。

宗派主义的问题

鄂豫皖在地区之间，红军与地方之间，中心区域与非中心区域之间，一般工作与经常关系虽无彼此之分，在某种问题上亦有宗派主义，如各个区域重视自己的创造经验与工作作风不注意学习别地，如同志与部分之间生熟之分，如在中心区看惯了而看不起非中心区，不愿去工作，如红军看不起游击队，对游击队照顾不够，地方游击队不甚乐听红军指挥，如几个地区产生的红军之不统一问题（三十二师），但均能在党领导下纠正和进步，没有发生过什么大问题（除三十二师开始时的问题）。至于本地与外来之间。政治组织上是能接受与服从外来同志的领导，是热烈欢迎与分让重要工作，可以说从党派来的同志不管是中央指定了工作或待分配工作的，没有一人不居于县以上和团以上的各级领导地位，党在原地同志没有发生过争领导地位的事，而对外来同志讲了一大堆空洞抽象的工作指示，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不能切实领导与布置指挥斗争与斗争中的动摇犹豫松懈，是发生有看不惯或看不起的宗派主义错误，认为是“孙悟空走路”、“驾空走”、“脚不沾地……”表现有某些问题上信心不足与不够尊重的错误，但并不严重也并不是对每个外来的同志都是如此。自从1930年后，外来同志较多，从各个地区各个系统中去看，则是外来不尊重本地、不尊重地方，党的宗派主义的情况发生多些，钦差大臣反历史的错误是有的。

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

1931年中央派张国焘到鄂豫皖成立。中央分局领导，在机会主义的国焘路线错误下，对鄂豫皖是发展了坏的影响，在党与红军群众基础上虽然打了些胜仗，但全部工作趋势（党政、军民的建设）是走下风，统治式的领导提高，对党与群众的命令主义发展，党内生活减弱，严重违反错误发生，干部政策错误，单纯军事观点与军阀作风的提倡。

此时红军已有数万人，改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在党与群众土地革命基础上，其指挥员具备了高度英勇的特点与军事指挥上高度机动的战术，

如花园、二郎店、黄安城、红十二、陡山坡、苏家埠，大小悟嘴山之例。由于机会主义错误路线致党政军民工作均发生错误与减弱，以致反四次“围剿”战争的失败，对中国革命有巨大影响。

中央分局的人员，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周纯全、郭述申、徐宝珊、王平章、蔡申熙、高敬亭、曾中生、方英等。

鄂豫皖省委的人员，沈泽民、徐宝珊、郭述申、成仿吾、甘元景、周纯全、高敬亭、□志明、庞人镜、魏祖圣、郑行瑞、余笃山、甘济时、姜镜堂、吴保才、康荣生、王建南、梅光荣、长元海、张德山、朱淑芳、袁克服等。

各特委人员：豫东南区方英、皖西北区王平章、鄂东北区徐宝珊（最后成立）。

在张国焘负主要责任的错误领导下，改造各级领导组织，原来坚持斗争创造的领导同志一个也没有被吸收参加，“……连一个也不参加领导”（新集代表大会后群众的言论），只分配一些不起领导作用的杂工作。而同志仍是执行党的任务，照常为党奋斗，诚挚展望党与革命胜利的前途。

成立红二十五军

四方面军离开后，党在鄂豫皖重新创立主力红军二十五军与重新组织鄂豫皖省委。1932年腊月在家家店扩大会议决定，同时决议反对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开公布之，而省委在领导路线上仍重复了机会主义错误，这由于党的路线错误与省委自己错误所使然。因此，仍然坚决执行了巩固恢复苏区的错误战略方针，具体政策上也不少错误，这使得苏区红军在两条道路生死决战之下受到最后损失。

党和红二十五军以及后来在皖成立的红二十八军（发展较小），在依靠群众力量基础之上，在敌人一百个团兵力包围中（五次“围剿”），独立坚强英勇的作战，至中央派人来帮助领导才离开鄂豫皖区。在牵制敌人、配合全国接受党的领导、坚持了在失败中两年斗争，这一方面是成功的，但还不够英勇，二十八军前后期领导上有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经验主义错误思想及后期有较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与宗派主义思想。

鄂豫皖的后期领导主要成员——

省委人员：沈泽民、徐宝珊、王平章、郭述申、成仿吾、吴焕先、

戴季英、郑位三、高敬亭、徐海东。（泽民死后则为徐宝珊任省委书记，最后为程子华任省委书记。）

特委人员：鄂东北区郑位三，皖西北区郭述申，豫东南区高敬亭。

红军：吴焕先，戴季英，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前后）。

游击司令：鄂豫地区戴季英，皖西地区刘德利（兼红二十八军长）。

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

3年游击战争在依靠群众力量基础上成就了，而原来本质不好的高敬亭，则又发展了典型山大王军国主义的反党行为，与国焘是一样错误和危险。这影响了三年游击战争和群众及红二十八军的进步，在抗战初期应有的收获。党领导这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从坚定的原则上团结教育了党员群众。争取这部队到党领导下来。巩固和扩大独立支持着共产党与武装在江北局面（共产党新四军企图在江北发展，争取与五路军并列一一五路军防共训令），第四支队除高敬亭等极少数反党外，其余都有很好的革命本质。

1939年在军部机会主义错误下，公开停止和缩小江北新四军的发展，如“xx同志收到你的报告与面向程同志……无为□江可退给国民党免引起摩擦不利于我们，各游击队都应编入游击纵队集中开赴皖东行动，关于游击队的发展应注意不妨碍我党我军政治影响为原则，你对于创造江北根据地的意见以嫌过早……现无干部可派一切由xxx同志来领导与解决，要求于延安通电的密码xxx同志处由……”这是xxx同志到江北时介绍信的主要内容。

江北支队当时已发展有七千六百人，和新创立的一个江北游击队与几个游击队（三千多人）共一万一千余人，向安徽省政府要求米贴时，说只报告一万人，多了人家害怕，似乎是有一万人还不敢报告的意思，当时发展形势有利并已有很多发展的门径和发展的基础，如果不停止发展有发展方向和方针，如果不禁止提出根据地，如果不是“精兵主义”如果不是“江北应向江南学习与学习江南统一战线的模范”，如果不造成不经常状况，则很有可能争取发展与壮大江北的共产党军，这没有完成1938年1月毛泽东同志告示“……壮大江北共产党军，发展一支力量，搞一个立脚地方……”的光明任务。至1939年底刘少奇去纠正后有较好的发展，

但好时机已过去，苏皖反共军夹攻到来，鄂豫皖内地党已开始了垮台。

新四军在领导上机会主义投降错误的确是严重的，比如军部在立煌与五路军和安徽省政府的谈判六条：一、不得宣传共产主义；二、不得越境擅自行动照指定地区作战；三、不得收缴民枪；四、尊重政府行政系统；五、民运工作得与政府协商和向政府报告登记备案方为合法；六、不得派粮筹饷。这在安徽各级政府与五路军和民众中公布了。“如果照这样办那只有死”“为着减少摩擦，应付他……”这由于机会主义路线所致，鄂豫皖在历史上遗留的残余武装，几乎全灭了。不过，优良传统仍是存在的。

张国焘，高敬亭是同样错误，反党。把军队当成个人，军权高于党权的军国主义，他们政治委员不是代表党而是代表个人。

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非常大，这是中国革命应注意的特点，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同盟军，而农民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是不成的，农民勇敢忠实，吃苦耐劳。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是农民，故其弱点亦多有反映到党内来。农民封建迷信在阶级斗争中不难打破，如鄂豫皖农民的家族观念，封建迷信，礼教等观念，在苏维埃运动中改变的很快。

干部经验，鄂豫皖的干部最好接近群众，这是由于从群众中产生出来的，任何地方干部只要从群众斗争中生长必然如此，群众斗争中的干部是好的，宝贵的，党在鄂豫皖创造干部是有成绩而理论教育做的不太够。

高敬亭反党反中央是在和平谈判时成熟的，这是四支队一个重大历史关键。经过了很周折困难而后克服了高敬亭的国焘路线，即反高不成则四支队在高敬亭把持下，的确可能被国民党收买拉拢完全变成山大王队伍当土匪，如高敬亭政治动摇和土匪主义发展与国民党的勾引已是事实，而党终于胜利了。争取争取团结扩大了第四支队是成功的。

大家要努力学习整理经验，努力奋斗，全党团结在天才领袖毛泽东同志周围，向布尔塞维克胜利前进！

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

1930年春至1932年秋

时间：1945年

报告：徐向前、倪志亮

校订：黄文治

几句说明：这个材料，是鄂豫皖苏区红军发展史上的一部分，也是轰轰烈烈的英勇斗争最主要的一部分。它是和戴季英同志写的那个材料（从1927年冬黄麻农民武装起义至1930年春）相衔接的。按其历史发展顺序来划分，戴季英同志写的那部分为第一时期，而这个材料，是从1930年3月红一军成立起，经同年底红一军与红十五军会合改编为红四军，至1931年4月中央分局成立以前，为第二时期。从分局成立后，经同年11月初改为红四方面军，直至1932年9月下旬红军主力脱离根据地以前，为第三时期。此外附有西征经过概况。

它的内容：只是关于建军发展和战迹经过情形，而对地方党与政权政策方面，很少涉及，这还有待其他同志负责编写。至于这个材料所起的作用，只能说是对于当时斗争经过的史迹简略介绍，和帮助直接参加这一斗争的同志们回忆。希阅后提供意见，以期达到对这个材料充实、修正之愿望。

倪志亮

一九四五年

第二时期鄂豫皖苏维埃运动与红军发展壮大的时期

一、鄂豫皖特委及红一军军部的成立

1930年春，中央派郭述申同志任鄂豫皖边区特委书记，改组原鄂豫边区特委，将六安中心县委亦划归鄂豫皖特委领导。派许继慎为红一军军长，曹大骏为政治委员，熊受暄为政治部主任。郭、许、曹等于2(4)月间到达鄂东北后，即宣布了中央的意旨，决定改组鄂豫边区特委为鄂豫皖特委。特委由郭述申、何玉琳、王平章、徐朋人等人组成，郭述申任书记。委员补充了许继慎、曹大骏、姜镜堂（中央派来的）、周纯全、甘元景（本地干部）5人外，原鄂豫边特委委员参加特委的有：徐朋人、徐宝珊、王平章、钱文华、戴季伦、戴季英、吴焕先、詹才芳、郑新民、雷绍全、王宏学、王树声、徐向前、李梯云、王秀松。

成立鄂豫皖特委的同时，在箭厂河宣布改编红十一军为红一军，前委和一军军部亦于是时正式成立。军长许继慎，政委曹大骏。原红三十一师改为红一师，红三十二师改为红二师，原红三十三师改为红三师。原红三十一师师长徐向前。政委戴克敏、参谋长刘英。原红三十二师师长漆德伟、政委王培吾、副师长周维炯、参谋长漆海峰、政治部主任漆××。此时红三十一师在鄂东北游击，三十二师亦由豫南来箭厂河迎接军部，红一军军部成立后统一军事上的指挥，使以后一、二、三师在行动上更带有组织性与计划性。

同时中央决定，红一军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与地方党委在组织上是横的平行关系，军队的行动方针由红一军前委（书记曹大骏）决定。这样一来，客观上造成军队脱离当地党的统一领导，形成党与军队的对立与引起磨擦，使党的工作与军队的行动发生了不密切的现象，助长了单纯军事观点的发展。这一时期，正是立三路线在鄂豫皖贯彻执行的时候。

当时中央派朱瑞同志来传达1930年5月红军会议的精神与决定，于8月底到军部，9月初到特委。同时长江局派聂鸿钧同志来特委传达实行武装暴动、会师武汉的指示。当时特委即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的口号，并组织行动委员会，取消了团与工会的组织，取消了各地的游击队，成立

红色补充军总指挥部，以王树声任司令，曹学楷任政委，把各县区游击队都集中起来，扩大正规红军，而实际取消了各地的游击战争，在苏区的巩固与发展上，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二、军部率二师在皖西的行动

军部成立后，即拨红一师之手枪队与十一队编成直属队，此时红一师与二师协同进攻宣化店之驻敌岳维峻部，因敌固守顽抗未下，红二师即随军部到皖西与红三师会合，在皖西开展游击战争，攻下了霍山、金家寨、流波（石+童）、英山县城，消灭了潘善斋旅及鲍刚各地民团，扩大了苏区与红军，发动了广大群众的斗争，奠定了皖西苏区发展的初步基础。但在建军政策上是有错误的，如对王家桥暴动的首领毛正初，因系青红帮的头子，便认为是投机与反革命，逮捕后枪毙，并把毛组织的部队解散，分编于红三师内，引起当地群众的不满与怀疑（这一节材料不详细，因我没参加过——徐向前）。

三、红一师在鄂东北的游击

1930年上半年的客观有利形势是蒋、冯、闫在中原的军阀大混战。过去进攻苏区的军队都调走参加军阀的内战，同时平汉路上国民党后方交通线的掩护亦很薄弱，蒋介石对付鄂东北红一师的兵力只有从四川调来的郭汝栋之二十军，其装备寡劣，战斗力亦不强。这一客观有利的形势大大便于苏区与红军的扩展。红一师在这一有利的客观形势下，于6月间袭占杨家寨车站，消灭守敌郭汝栋部两个连，并争取数十名俘虏兵参加了红军。我四队队长陈先圣同志这时牺牲。

此时后方预备军亦调来前方，扩编红一师为3个支队，12个大队，红一师得到充实。同月，郭汝栋部之一个团由平汉线向杨平口我一师进犯，被我军予以痛击而消灭之。这是红一师成立以来之第一大胜仗。此战又争取了数百名俘虏兵参加红军。红一师获此胜利后，遂改编第一支队为第一团（缺第三营），第三支队为第三团（缺第三营）。第二支队因南部农民反水开回后方，继袭广水车站，占其外围阵地。我第三团副团长高汉楚同志这时牺牲。

黄安南部因立三路线的执行，犯了过左的反对富农的错误，出现了特务队捉人罚款违犯纪律的行为，加上地主、土豪劣绅的挑拨，农民纷纷

反水反对我们，使八里区西与寨会及二程区大部工作坍台，红枪会、绿枪会等反共凶焰猖獗。红一师在特委指示下，移师南部给反动会门以武装镇压，打击其凶焰，恢复了一部分地区的工作。但因当时党的政策的过“左”，工作还是没有很好地恢复起来。

7月间，红一师再移向平汉路游击，先袭占祁家湾车站，再袭占花园车站，消灭钱大钧教导师第五团全部。当红一师进袭花园时，孝感县委魏祖圣同志号召沿铁路线群众，一夜破坏铁路数十里，并袭占卫家店车站，配合红军作战，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战斗的胜利，红一师首次缴获迫击炮五门，重机关枪八挺，长短枪八百余支。红一师在装备上开始有了炮与自动火力，提高了战斗力。利用俘虏兵来教我军使用迫击炮与重机关枪，并培养改造其中好的分子，成为以后的机炮干部。红一师在平汉路屡次取得胜利后，声势日益壮大，武汉亦为之震惊。花园获胜后，红一师即撤回小河溪扩编，新成立了独立混成团。由于红军不断胜利的推动与影响，苏区群众斗争情绪更为高涨，孝感苏区亦日渐巩固。当时党对扩大红军工作的动员用了很大的注意力，如檀树岗成立红军扩兵报名处，苏区青年如潮水般地向报名处涌进。地方游击队、赤卫军不断的以一部编入红军，而党马上又组织成新的游击队，以坚持地方工作，保持边区并与反动派斗争。因此红一师迅速地扩大起来，由以前两个团（四个营）遂即扩充为三个团（八个营）。部队在小河溪休息、扩编数日后，再越平汉线袭占云梦县城，该地民团闻风先逃，部队入城后，即实行了开仓分粮及没收地主资本家的商店，分给群众，发动了群众斗争，停三日即返回铁路以东之小河溪。

因我红一军在鄂豫皖边区的积极行动和不断胜利，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更加恐慌，加之蒋、冯、闫军阀混战已经结束，国民党遂对鄂豫皖苏区红军开始了第一次“围剿”。红一师移驻小河溪时，戴民权师之一个旅即向我军进攻。我军因距铁路太近不便作战，遂退回四姑墩，敌人亦跟踪前来。此时因敌已深入苏区，遂迎击该敌并击溃之，消灭其一个营。敌乘夜向西逃遁。

四、红一军的会合，平汉沿线及豫南地区的游击活动

当红一师击溃进攻四姑墩之敌时，军部率二、三师由皖西西移到达四姑墩，红一、二、三师遂又会合，次日即追击西窜之敌，进抵黄柴畈。

此时彭启彪旅又分三路向我军进犯，我军制敌机先，先消灭其进抵小河溪之一个团，其余两个团向西南不战而窜。红一军击溃彭启彪敌后，再出平汉线进袭广水车站，因动作不一致未下，稍行休整后，前委即决定向河南行动，进袭信阳县城，只占领车站，因城坚故未攻之，遂移师豫南之陡沟，把该地民团数百全部消灭，在陡沟休息数日中，因部队日益扩大与干部的不断伤亡，军部遂成立教导队，培养一批中下级干部，组成正阳、汝南游击队，约200人，由地方党领导，留在正、汝活动。队长金××同志（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后在商光之间作战牺牲。

此时因红军远离苏区，而当地又无群众工作基础，遂经息县渡淮河以一师进袭潢川，城高壕深未下。后移屯十里铺，以二、三师袭击光山，一举占领之，并消灭守城之敌数百。继而一师击溃新蔡增援之敌。部队因不断地转移与作战，故占光山后，遂进行休息与整顿，并举行了全军党团活动分子第一次大会，部队进行了重新改编。因二、三师人枪都少，缩编为第二师。原三师副师长肖芳，调皖西任独立师师长。三师番号暂时取消，以一师一部编入二师，并抽各团之一部互相对调，实行了混编。此时徐向前对军部作战指挥上常有意见，遂以中央决定的名义调徐到军部工作。

（许、曹因中央以前决定过徐任副军长）。刘英为一师师长，李荣桂仍任政委。孙永康为第二师师长，王培吾为政委。

部队实行混编后，在统一作风、交换经验、打破地方宗派观念上是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在组织上、人事处置上仍有严重的错误。如拆散一师的用意，仍包含有打破一师的原来组织、便于军部更好统率之意（其实不必这样）。撤二师师长漆德伟的职，送上海中央分配工作，是因漆德伟工作魄力不大，对部队感情密切等；其实漆德伟是二师的创造者，在二师中很有威信，缺点是有的，应当帮助其改正，而不应撤职送上海。枪毙二师参谋长漆海峰的处置，更是过分的。漆海峰吸鸦片，在二师专权，在工作中确有很大错误，但漆海峰在创造二师中亦出了许多力，不应因这些错误把他枪毙。因为这些过火的处置，当时在部队中的影响是很不好的。

在光山整编后，遂进袭罗山城，消灭守城之敌一团，并占领罗山。在攻占光、罗两城后，成立了光、罗两县的革命委员会，进行了开仓分粮、

发动群众斗争。部队屯驻了约一星期后，因夏斗寅师在南部向苏区进犯，占领姚家集等地，形势吃紧，特委书记郭述申同志亲到罗山调一军南下，打击“围剿”之敌。红一军遂即移师南下。当时光、罗地区群众斗争虽初期发动起来了，但红军对当地游击队的发展，并未予以很好帮助与组织，当红军离开后，地方党政既未在群众中生根，又没有游击队的武装掩护来进行活动，不能立足，遂即烟消云散。红一军这次在豫南的行动，在单纯的军事作战上说来是打了一些胜仗，攻下光、罗县城，消灭一些敌人（约三团之众），夺获了不少武器，但在扩大苏区、发动游击战争、培植游击队上来说，是没有注意的。当时红一军是充分地执行了立三路线和“攻打城市”的口号，对巩固发展苏区、发展游击队、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斗争的思想是没有明确的认识的。

五、红一军在黄安黄陂麻城的行动

当红一军在豫南行动时，敌人夏斗寅部又向苏区南部进犯。红一军遂移师鄂东北苏区迎击进攻之敌。于11月到达河口后，以二师先进攻占我姚家集之敌夏师七十五团，激战终日，我因伤亡甚众，遂行撤退。是役三团政委江竹溪、营政委郑植璜牺牲。继而以一师夜袭黄安城之敌郭汝栋部，亦因敌凭城顽抗未下。姚家集之敌，被我军予以打击后，亦乘夜向黄陂逃走，遂收复该地。姚家集、黄安城之战，因攻坚未下伤亡又大，乃转师东进麻城苏区。此时麻城县委坚决要求红军攻下料棚敌据点，否则地方工作不易开展。红军因硬攻姚家集、黄安城之教训，不能再强攻坚固据点，拒绝了打料棚的要求，遂引起双方争论不休。最后红一军于夏敌之补充团进抵谢店立足未稳之际，以急行军举一二师主力猛攻该敌，将其歼灭后，始巩固了群众的斗争情绪，稳定了麻城的形势。此时天气已逐渐寒冷，红军棉衣也无法补充，前委遂决定向东南行动。到达潘家塘后，以急行军夜袭新洲，一举攻入城内，消灭了守城之郭汝栋部一个旅，夺取了大批武器，缴获了大批物资，发动了群众斗争。后来，徐源泉部有复进新洲之势，我军得悉后，遂即向东转移，到达但店。

此时，曾中生到达鄂豫皖苏区。（派人）来红一军传达三中全会的精神。红一军遂在但店停留了三天，召开了全军第二次活动分子大会，传达了三中全会的决议后，即向北转进，占领罗田县城，续行北上，进到商

南苏区与独立师会合。

六、鄂豫皖特委的改组

1930年11月间，中央派曾中生到鄂豫皖苏区，指定曾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到达后，始统一了党与军的领导，特委进行了改组，并传达了三中全会的决议。（详情不悉，须另找材料）。

七、红一军皖西的行动

红一军到达豫南之丁家埠后，稍事休整，即首先向盘据金家寨之敌进攻，把金家寨之敌陈调元一个营及民团千余消灭。收复金家寨后，次日即向东追进，击溃守鹅毛岭之敌一营。再东进占领苏家埠。越日围攻六安城未下，一师师长刘英负伤，遂即解六安之围，以一师一部南移袭击霍山城又未下，遂退回麻埠。二师移住石佛店、叶家集一带恢复群众工作。

红一军进到豫南攻下金家寨，围攻六安城、霍山城后，皖西反动派大力震惊，陈调元乃急派其四十六师及警备一旅向红一军进攻，维持其对安徽之统治。当我军移驻麻埠、石佛店后，敌四十六师之陈旅及警一旅即分由六安、苏家埠、霍山三路向我军进犯。我红一师先歼灭其中路一个团于香火岭，活捉其柏团长（当我军包围其团部时，柏某的作战命令还未写完即被俘）猛追到独山，缴获陈旅之电台一部，星夜又返回麻埠迎击南路之敌警一旅。此路之敌进攻到麻埠街与后方留守部队对战中星夜向东逃窜，我一师追之未及而返。当红一师消灭中路之陈旅柏团时，我二师亦击溃北路向石佛店进犯之敌。此役共歼敌三个团，击溃敌三个团，为红军作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敌陈调元之向皖西苏区与围攻红一军计划，不到二日完全被我粉碎了。

红一军获此胜利后，又大大扩充独立师，加强与保护苏区的力量。因这一军事上的胜利不仅恢复了原有的苏区，而且大大向东发展了新的苏区，鼓舞了群众斗争的情绪。当陈调元部向皖西红一军围攻时，豫南之吉鸿昌部为配合陈部作战向豫南苏区进犯。红一军又移师豫南将吉部进占二道河一旅完全击溃，并缴获了山炮一门。

此时中央派卞继勋、余笃三到鄂豫皖苏区，改组红一军为红四军，红一军奉命后，遂移驻福田河。

八、红一军与红十五军的会合及改编为红四军

1930年12月，中央任邝继勋为红四军军长，余笃三为政治委员，并决定改红一军的番号为红四军，部队由鄂豫皖特委直接领导。邝、余等到鄂东北后，传达了中央的决定，鄂豫皖特委执行了这一指示。

先是红十五军在广济、黄梅、宿松、太湖边区苏区，在敌人“围剿”中失败后，于1930年11月底退到豫南苏区牛食畈休息月余，进攻金家寨之敌未下，遂移到鄂东北，又进攻河口之敌未下。

此时邝、余已到鄂北率领十五军移住商城长竹园与红一军会师，邝、余宣布中央决定后，红一军与十五军即移住福田河进行改编。红一军与十五军番号取消，改名为红四军，邝继勋为军长，余笃三为政治委员，徐向前为参谋长。红一军改为红四军，一师改为十师，蔡申熙为师长、刘英为副师长、陈奇为政委。

红二师改为十一师，许继慎为师长、周维炯为副师长、庞永俊为政委。红十五军缩编为两个团，一为二十九团编入十师，一为三十二团编入十一师。此时红四军共辖红十师、十一师、独立师（师长肖方，政委吴荆赤，共两个团，在皖西行动）三个师，八个团，另有军委会警卫团共九个团，共约万余人，各县有游击队、独立营与独立团等约万余人。

九、磨角楼和新集战斗

红四军军部成立后，于1930年底进攻麻城属磨角楼之驻敌夏斗寅部四个连，激战一日未下，因敌援兵增到，乃集中力量打敌援兵，经三日激战，援敌溃逃，磨角楼遂被我军攻克。是时适七里坪之驻敌撤退，军部遂决定把十一师西移七里坪，十一师之三十二团、十师二十八团移光山南区开辟工作，以十师之三十团围攻光山南区之反动中心新集据点。经数日之准备，进行了坑道作业，乘爆炸摧毁城墙开一缺口后，三十团之一部乘势攻入，消灭了反动民团数百，反动首领都被擒获，无一生逃。新集攻下后，遂打通商、光苏区的联系，巩固与开辟光山南区大块地区的工作。红十师、十一师主力，再西出平汉铁路行动。我三十三团奔袭占领柳林、李家店两车站，消灭袁英部之一营，并击溃援敌两个团，继占领柳林车站，毙袁敌十二旅长侯某。

十、粉碎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

因红四军和平汉线上的胜利活动截断了敌人的交通，威胁了豫南重

镇信阳，2月初（即1931年阴历正月十五日），国民党派三十四师岳维峻部向我军进犯，被我军侦知后，即进击该敌于双桥镇，将敌四个团大部消灭，并活捉了岳维峻。是役除其他缴获外，并缴获枪六千余枝，山炮四门。蔡申熙同志负伤，刘英升任十师师长。红四军获此胜利后，遂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与红军的第一次“围剿”。

（注：在消灭岳维峻战役中，因红四军缴获了大批武器，遂把黄安、麻城、罗山、光山各独立营扩编为独立团，加强其在当地的游击活动。）

十一、粉碎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红四军消灭岳维峻后，国民党再组织对鄂豫皖的第二次“围剿”。3月间陈调元部五十七师及警备第二旅又向皖西苏区进犯，占领麻埠、独山，红四军主力遂即东进，向进犯苏区之敌进攻，在独山一战后，击溃敌之主力，敌即向东逃窜。

当军部向东行动时，留徐向前指挥二十八团围攻大山寨。此时豫南之吉鸿昌部及黄安之葛云龙师分别向新集七里坪进犯，我二十八团、三十团解大山寨之围后，即集中二十八团、三十团、警卫团及黄、光、罗三个独立团截击该敌于檀树岗，经一日夜激战，光山南下之敌西窜，七里坪与黄安北上之敌会合后即向罗山退去。我红四军于是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十二、六安兵变

当红四军主力在皖西击溃陈调元之二次“围剿”后，陈军内部军心极为动摇。此时驻六安之四十六师之两个营，在营长魏孟贤（共产党员）率领及地方党协助下，举行兵变，把两个营带到皖西苏区，编为独立师之第三团，魏任团长，仍在皖西行动。该独立师经扩编后，改称教导师（第三团）。

（注：皖西麻埠之战与商城二道河及双桥镇之战是否都包括在反一次“围剿”战中（徐老批语）“粉碎第二次“围剿”后，红四军主力遂移驻商、潢、光边境地区开展地方工作，并以一部进驻商南之新区，驱走民团反动头子顾敬之，拟开辟新区工作，打通“商光路线”，使鄂豫皖苏区连成一片，但因红军停驻未久即移走，而新区并未予以严重注意用大力开辟，故红军走后，顾敬之又行返回，使鄂东北与豫南苏区联系仍被其割断。）

十三、这一时期经验教训

红一军自成立以来及改编为红四军以后，在这一时期中红军转战于

鄂豫皖三省，行动于平汉线上，采取了积极作战的进攻战的方针。利用蒋、冯、闫军阀大混战的客观有利条件，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第二次“围剿”，肃清了苏区内地的反动据点，消灭了敌人大量的力量，夺获了大批武器，扩大了红军，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扩大了游击队，补充了游击队的装备，扩大与巩固了苏区，打下了鄂豫皖苏维埃运动的坚实基础。同时，鄂豫皖党的领导机关经过立三路线与三中全会后，改变组织，而红军亦在这种精神下进行了改组。的确在这一年期间，有其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一番，总结起来，概略提出如下几点意见：

1. 客观的有利形势与积极的进攻战术

鄂豫皖边区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壮大与发展的历史，明确的可以证明，如果说黄安农民政府暴动失败后，当时具体情况主要是保存力量以待时机，那么在蒋、桂，蒋、冯、闫军阀混战爆发后，党就应该利用这一有利形势，采取积极的进攻战术以发展苏区与红军。事实上在这一有利的客观形势下，党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红一军才能由开始一千几百人的力量而发展到一万余人，一直到粉碎一、二次“围剿”后，红四军又发展到二万余人。苏区由数县而扩大到十余县，红军由小的游击队而壮大成为装备较好的正规军，提高了战斗力。这一经验证明，革命的发展不仅须有主观的努力，而且须有客观的有利条件，而客观的有利条件又必须通过主观的努力才能发生作用。在战略指导上红军的方针应该是积极的主动的进攻方针，而不应该是消极防守的方针。红军在其军事行动上、作战指挥上应当积极主动地寻找敌人的弱点，造成敌人的失误而消灭敌人。

2. 在建军问题上，自红一军军部成立以后，使鄂豫皖边区的红军更好的建立了统一的指挥机关，实现了统一领导与指挥，进行了军队整编，打破了地方观念倾向，建立了各种比较正规的制度，加强了政治教育，提高了战斗力，巩固了红军，这一些都是有很大成绩的。然而其缺点亦严重的存在着，例如红一军与十五军会合后，改编为红四军时，把红十五军的番号取消了，没有估计到红十五军有其自己的发展历史，应当保存其番号。有许多军事干部与领导都是从旧军队来的，某些旧军队的作风在部队中有严重的影响。有时对党的领导与政治工作的绝对重要性强调不够。同时军事干部与政治干部的合作协调不够，有时互争权利造成磨擦。对本地的

干部尊重与提拔不够。

3.军队与党委的对立（立三路线以后）

因为中央决定红一军直接归中央军委指挥，这样更助长了军队对地方党组织的独立，遂破坏了过去党委的统一领导。在军队方面，多偏重于从单纯的军事观点出发来决定军事行动方向，对苏区的巩固与发展有计划的行动是注意不够的。地方党的工作与红军军事力量的配合是不密切的，军队干部在立三路线的“打城市”口号的影响下，常远远脱离根据地而单独行动。对于苏区的发展，应持巩固的、有阵地的向外发展的观念是模糊的，不认识的，因而常常引起地方党委对军队的不满。而地方党却固于地方情况，多强调巩固根据地，对外积极进攻的认识不够，而偏重于保守与不估计红军的力量与装备，主张硬攻敌人的坚固据点，“啃硬骨头”，使红军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因此在战略方针上党与军队常常争论不休，结果弄得大家不欢而散，毫无结果。这固然是由于同志们那时的经验不多，理论水平太低，同时中央的决定也是助长这一不良倾向的一个主要原因。

4.主力红军对地方游击队的建立与发展注意不够

立三路线在鄂豫皖苏区执行的结果，成立了预备军，集中了地方游击队以后，又编入了主力红军，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游击战争，使某些苏区的边区不但不能向外发展，反而日益缩小。当鄂豫皖特委成立宣布立三路线的这一决定时，当时郑位三同志提出反对，但未被采纳，以后红一军在豫南的行动中未注意游击队的发展与建立，所以红军所到之处仅等于一趟武装示威游行，而不能生根。红军到后，发动群众轰轰烈烈起来斗争；待红军走后，遂即烟消云散。甚至如黄安南部苏区农民反水后，纷纷成立红枪会反对苏维埃政权。这固然是由于当时反富农过“左”政策所致。同时，那些地区没有游击队的活动也是原因之一。

5.那时中央的委派制度

那时中央对鄂豫皖苏区，曾派过几次人。这些人一来就高高在上，作领导负责人，不重视本地干部的提拔。这些领导干部到苏区红军后，既与当地群众没有什么联系，又不了解与熟悉当地的情形。同时在一年内，党与红军来二次人后，必须进行一次改组与改编。而在党的改组中，在干部政策上，只注意提拔那些形式是工农出身的干部，把原来有斗争经验的

老干部放在一边。这一委派制度与不正确的形式主义干部政策，结果引起了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某些不团结现象，在工作上确实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在这一时期，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虽然已发生某些隔阂，但基本上还是团结的。

在战术上，逐渐由小部队的游击战术而走向了较大兵团的袭击战与运动战，并部分的进行了强袭坚固城市的战斗。其中有一部分是取得了胜利的，但也碰过一些钉子，如打潢川、黄安城、硬攻姚家集等战斗。扩大红军工作。地方党对扩大红军是积极的，大批青年与地方游击队、赤卫军扩编到红军，使红军迅速的壮大起来。地方游击队虽一批批的编到红军去了，但地方党又马上组织起新的游击队保卫边区，积极活动，破坏敌人的交通，截夺敌人的物资、信件，给敌人造成莫大的困难。因为地方工作的基础不平衡，所以这一游击战争的发展也不平衡。

第三时期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成立， 反四次“围剿”的失败和红四方面军退出苏区

一、鄂豫皖中央分局及鄂豫皖省委、省苏的成立

1931年4、5月间，中央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后，即宣布了中央的决定，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与省委、省苏。中央分局的委员，除中央决定的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舒传贤等8人外，又补充了郭述申、周纯全、高敬亭3人，另有候补委员15人。

而后，召开了鄂豫皖党的代表大会，产生了省委。沈泽民为省委书记，徐宝珊、郭述申、成仿吾、甘元景、周纯全、高敬亭、惠志明、庞永俊、魏祖圣、郑行瑞、余笃三、甘济时、姜镜堂、吴保才、康永生、王建南、梅光荣、张德山、袁克服、朱淑芳、闵丹桂、钱文华、陈昌浩、张国焘、王平章、卫复兴、费子民、刘淇、曹大骏、方英、曾中生等为省委委员。红四军的整编。分局决定以曾中生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原红四军政治委员余笃三（因在莫斯科是反对支部局的，据我回忆认为余是右派）撤职。由黄安、罗山两独立团及警卫团组成红十三师，徐向前任师长，陈奇任政

治委员。把皖西教导师改为十二师，许继慎任师长并兼皖西特委军分会主席，周维炯任十一师师长。

这时红四军的主力已有四个师，共约二万数千人：地方武装约一万余人，共约四万人。继而成立彭杨学校（以革命烈士彭湃、杨殷的名字命名）于丁家湾，蔡申熙任校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教育主任。

六月间，红四军进攻黄安桃花驻敌肖之楚之四十四师一个团，并击溃该敌援桃花之一旅于障山，遂攻下桃花开展桃花区的工作。再北进迎击光山驻敌李抱冰之五十三师之进攻，于泼皮河击溃之，巩固了光山中部的苏区。

二、红四军的南下与鸡鸣河会议

7月间，分局决定调徐向前任红四军军长，邝继勋调任十三师师长。此时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为配合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分局决定红四军主力南下英、蕲、广地区行动，而后出潜山、太湖、攻安庆，留红二十九团、三十二团保卫中心苏区。军部在流波（石+童）召开了全军干部大会，进行了动员工作，指出了注意事项，部队即向南进军。八月一日攻下英山县城，守城之陈调元部张汉全团，除逃跑数十人外全被我军消灭。越数日，以十二师留英山，并向东南活动。军部率十、十一两师不战而夺取蕲水城，再折而向东南消灭王光宗旅于曹家河。此时陈调元部某旅由太湖经弥陀寺企图夺回英山，十二师乃击溃之于弥陀寺，消灭其一部，英山遂得以巩固。十、十一师又不战而占领广济，以一团进胁黄梅。此时徐源泉之四十八师与四十一师各一旅进袭我军后路，占洗马畈。军部得此讯后，遂率十、十一师由南北上进攻该敌，十二师亦由东向西配合作战，将该敌击溃于洗马畈，消灭其大部，一部于夜间南逃。四军领导同志原来就不同意分局的东进安庆的计划，鉴于红四军的在潺暑行军，连续作战后，已疲劳不堪，遂放弃东进计划，乃率部移住鸡鸣河休整。九月接到中央分局命令，令红四军立即北上移回老苏区，军部不同意分局的决定，乃召集了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议，这就是所谓鸡鸣河会议。会议上大多数认为红四军南下中已取得了伟大胜利，应开展英、蕲、广、黄等地区工作，恢复原黄梅、广济苏区，并在长江北岸积极活动，牵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的三次反“围剿”，以减轻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压力。而鄂豫皖老苏区在目前国民党的新“围剿”尚未到来，

且给养很困难，红四军不应北上，仍应在现地活动。在会议上，只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吴焕先同志提出。分局既下令调红四军北返，应执行命令，在组织上不应违反分局的命令。但占极少数，未被通过，并将会议的情形报告分局。当时军部在组织上确有反抗分局命令的现象。对分局的命令如有不同意见，可以由军部向分局提出，不应召集支书、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对执行分局命令的讨论，这在军事组织上是不允许的。但当时军部所提出的战略方针，我觉得虽在今天，仍有重新估价的必要。按当时的情况说来，把红四军调返老苏区的方针是否妥当？还值得考虑。这只是在单纯的从当时的战略方针上的研究来说的。当然，当时另外的主要原因是，分局认为红四军不北上有被反革命搞坍的危险，所以才坚决调红四军北返，军部在当时是不知道这一点的。

三、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治委员与大肃反的开始

红四军军部向分局提出不同意北返的意见后，中央分局派陈昌浩前来，携带鄂豫皖军委（张国焘任主席）命令，宣布撤曾中生的职，由陈昌浩接任四军政治委员。为什么分局坚决调红四军北返并派陈昌浩来担任政治委员呢？因为军委在新集逮捕了李荣桂（原一师政委）、潘皈佛（原一师参谋主任现二十八团团长）的老婆以及其他（详情记不清）一批反革命后，供出红四军中的反革命企图举行兵变，把军部徐、曾杀害，把部队拖走投降国民党。当打下英山时，也发现了国民党特务四川人曾扩情，派其弟携带蒋介石的条件与委任令来找许继慎，委许为国民党十四军军长，发饷二十万，并把部队拖到黄冈一带改编。又说在英山活捉的敌三团长张汉全，亦被许等放走等……总之，分局认为当时反革命在红四军中有很大的阴谋。陈昌浩接任政治委员后，红四军遂北返到麻埠，由陈主持先逮捕了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傅丁超等数人，当夜即严刑拷打追问，没有得到什么口供与材料。部队随即北上进攻固始之乌龙集，消灭了戴民权一个团。再围攻郭落滩之敌，后移住武庙集，又大逮捕了一批人，严刑拷打，再进袭仁和集之敌曾万钟十二师之一团，乘敌白天撤退之际，予以猛击而消灭之，并击溃由潢川出援之敌一旅。再进逼商城北和风桥之敌，攻下其十二师，并击溃固始来援之敌，进逼商城，围攻数日未下。遂移班竹园，逮捕了三十团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三十五团团团长王明、三十六团团团长

魏孟贤等（记不清了），再经余子店逮捕了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锦[镜]堂等。这时开始在军师政治部内亦大批逮人，这时一面捕人，一面作战，一面行军，部队遂移白雀园，后即进行了大肃反。

四、白雀园的大肃反及其所造成的恶果

红四军移白雀园后，张国焘亦由新集亲来白雀园主持肃反。在大批逮捕人之前，先进行各师的混编。各师、各团、各营，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推其用意是为防止在大肃反中部队发生异动。分局、省委并组织了巡视团（名称记不清），分派到各师帮助进行肃反工作。在这一主观主义的逼供信的肃反中，红四军的各级干部除少数幸免者外，几乎都一网打尽了。以前逮人还在上级，这时捕人已深入下层了。在这一大肃反中，逮捕了的师级干部有许继慎、周维炯、肖方、熊受暄、姜锦[镜]堂、王培吾等……；团级干部有高建斗、封俊、王明、魏孟贤、吴荆赤、王沛浑、任难、苏竞舒、潘皈佛、范陀、李锦文（十师政委）、陈奇、黄明（三十三团团长，红十五军的创造者）、袁皋甫（三十三团政委）、王昌先（团长）、江子英（团政委）、程绍山（团长）。总之，主力四个师共十二团的干部中，今天只剩下屈指可数者倪志亮、王树声二人，其他都被捕杀了。据程世才个人的回忆，在肃反过程中，三十团换过三次团长，政委、主任也换过二三次，营长教导员、副营长也换过三次，连长、排长、班长、前后也都换过二三次，有的换过四次。这大批撤换的各级干部，都是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名义逮捕了。有的送到后方保卫局，有的就在前方枪毙或用石头打死。如三十团在大肃反中被残杀的班以上干部，估计共约有五百人上下。其他各团，并不少于三十团，这些被逮捕的各级干部，除少数几个放出未杀，或仍回军队工作外，一般的都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杀害了。又如，据徐深吉同志回忆，在六安独立团的肃反中，有一次班长以上的干部一律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了，这一次一下子就捕了二百余人。这说明在地方武装中肃反逮人杀人也是很厉害的，究竟有多少人，当时是只有很少人知道的。

在苏维埃政权、党的各级机关、工会组织和群众中，逮人杀人的现象也和在军队内一样。例如罗山群众领袖郑新民，麻城群众领袖王宏学、县委书记雷绍全，孝感县委委员刘纪元，过去特委书记徐朋人，黄安农民

政府主席曹学楷，鄂东革命军党代表戴克敏，红三十一师政治部主任陈定候，黄安党的发起者王秀松、戴季伦，商城县委书记李梯云及皖西道委书记方英。红军的一批创造者，被杀的很多。至于群众中逮杀的人更多。由这一教条宗派主观主义者所进行的大肃反的结果，使当时苏维埃运动与红四军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这是一段骇人听闻的悲惨的历史！真令人不能卒书。

这一大肃反的结果，红军中有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几乎被杀完了，鄂豫皖苏区与红军的创造者几乎被杀完了，外来的党的知识分子军政干部被杀的已差不多了，六安兵暴的领导者也捕杀了。这一肃反的危害，不仅仅是逮杀了大批大批的军政党群的领导人，而且在党内、苏维埃政权内、军队内与地方群众中，也造成了极端严重的赤色恐怖。幸免的同志终日惴惴不安，不知死之何时将至。由于这一大肃反，使红四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知识分子有军事学识、有战斗经验、勇敢而又机智的大批干部被肃掉后，使红四军在军事理论上与作战指挥上大大的削弱了，部队中的文化程度也一落千丈，使部队中还造成了极端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的恶劣倾向，几乎使红军变为一支愚蠢的军队。在北方上仙居区的农民，因肃反的恐怖也暴动起来了，公开的反对苏维埃（实际是反对保卫局），其他各地群众亦惶惶不安，不知明天会有什么不测的事变会到来似的。

这次肃反产生极大恶果的原因，固然在思想方法上是主观主义在作怪，逼供信的方法在作怪，而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联系到当时教条主义者钦差大臣满天飞。把肃反与宗派主义结合起来，以完成其排斥异己的目的。否则的话，为什么一面教条宗派主义者在捕大杀，而另一方面红军还在不断的打胜仗呢？为什么这些干部明明知道今天虽然没事了，但还不知明天是不是会把自己当做改组派而捕去，甚至明明知道，逮捕后是一定要杀头的情况下，而没有一个动摇逃跑呢？！在不断的一批一批的捕杀的情况下，哪有这么多的反革命而甘心俯首就戮呢？说来真是荒天下之大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丝毫没有使教条宗派者的一点点反省与注意，说来也真是奇怪的事，令人百思莫解其因。

同时，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利用了当地干部“左”的倾向与对反革命仇恨入骨的情绪，在思想上俘虏了这些同志，如当时张国焘所喊的“打

破敌人的内外夹攻，肃清敌人在党政军内隐藏的内奸”等号召。在肃反扩大化造成赤色恐怖后，一面使许多同志明知不对亦不敢反抗，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有个别同志以“左”的行动来表示自己的积极，以期取得张国焘的信任。由于这一肃反的结果，把许许多多苏维埃红军的创造者、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与敌人血战中久经考验过的干部，竟以反革命的罪名——改组派、AB团、第三党——而肃掉了，使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的骨干含冤地下久而莫伸，其惨痛直令人不能卒书，其罪恶也令人难以笔墨形容。

五、红二十五军的成立

在白雀园进行大肃反时，一面大批大批捕杀，一面分局决定成立红二十五军，以邝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原十二师改为七十三师，在白雀园大肃反后，由邝带往皖西行动，原十三师改为十二师。此时，十师师长倪志亮、政委甘元景；十一师师长王树声、政委甘济时；十二师师长陈赓、政委刘淇；七十三师师长刘英、政委吴焕先。

六、泼皮河会议

在白雀园大肃反后，部队即移到光山之新集地区，在泼皮河召集了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由张国焘主持对曾中生进行了关于其反对执行分局命令的斗争。鸡鸣河会议反对分局的命令，在组织上是错误的；但在战略方针上存在着的分歧意见、则应考虑，而泼皮河会议却未予以检讨，结果只在组织上作出对曾中生的结论，而在思想上并未解决问题。

七、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成立及围攻黄安之战斗

1931年11月7日，分局在七里坪宣布成立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刘士奇为政治部主任。总指挥部成立后遂即进军黄安，围攻黄安县城，当时仍是一面继续肃反，一面进行围攻战斗。最后一战击溃麻城来援之敌张印相部于障山，黄安城内之赵冠英知外援已断，始率其亲信数十人乘夜脱围向西逃窜。陈昌浩率一个连急追捕获之。计前后共经过四十三天围攻战，始将六十九师全部消灭于黄安。黄安农民政府失败以后，成为敌人进攻苏区之坚固据点之黄安始获解放，这一胜利更加激发了黄安南部群众的斗争情绪，开拓并巩固了黄安的苏维埃政权。黄安独立团亦因群众踊跃参军遂扩编成独立第一师。师长曾中生，政委焦

复兴。

围攻黄安的特点、使红军的战术又获得了围攻据点，打击援兵的经验，这一经验直到粉碎三次“围剿”中都发挥了极大作用。

八、红四军豫南的战斗

我军攻下黄安后，遂即北上到豫南行动，1932年2月，先击溃北亚港驻敌十二师之一部。2月2日在商潢路上之杜付店，我军集中了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四个师的力量，将进犯我之敌第二师、十二师、七十五师、七十六师全部击溃，歼灭敌约一个旅之众，溃敌退入潢川城死守不出。久驻商城数攻未下之敌五十八师陈耀汉部，在我军胜利威胁下闻风星夜弃城南逃麻城，我军不战而收复商城。是役后，七十三师仍返回皖西行动。红四军向东北进，围攻固始城，因城坚未下，十二师及十师之一团迅速北进占三河尖淮河要点。消灭了戴民权师一个营，没收了盐卡的食盐分发群众。因1931年大水后，遍地歉收，群众生活很艰苦，在我军号召下成千成万的群众纷纷起来袭击地主、围寨，进行抢食斗争。此时我军本可大大吸收当地灾民参加红军，发动游击战争，但在政策上不相信平原地区可以发动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对白区群众采取不信任态度，不敢吸收他们加入红军，只是将缴获的少数枪枝在当地武装了一部分游击队。结果红军南返后，游击队遂亦随后跟着跑到红军里来，而群众运动亦随被镇压与消沉下去了。

九、苏家埠五十四天的围攻战斗

因固始城坚未下，自行解围，留十二师在商、潢地区活动，协助当地党开展地方工作，因陈调元部四十六师又进占皖西苏区之苏家埠与青山店，总指挥部为粉碎皖西之敌的进攻，开展皖西工作，遂率十、十一两个师再出皖西，到独山后与七十三师会合。先以七十三师进击青山店之敌，肃清外围阵地，将敌四十六师之一团主力压缩于青山店内。敌据守工事不出，遂以七十三师一部围困之。当我进击青山店之敌时，主力即向苏家埠之敌前进，而苏家埠之敌亦因青山店被围前来增援，我主力遂在苏家埠以东将敌主力击溃，敌遂遁入苏家埠固守不出。我十师又将苏家埠围困之。次日六安之敌一个团来援，又被我十一师击溃于韩摆渡。敌一部退守韩摆渡不出，我十一师一部又将韩摆渡之敌围困起来。再击溃霍山援青

山店之敌警备一旅后，青山店之敌乘夜逃遁苏家埠，继而又击溃六安援苏家埠之敌陈培根困于马家湾。

最后我主力于威家桥击溃第三军与五十七师之援敌，并活捉其总指挥厉式鼎。苏家埠、韩摆渡固守之敌，知其最后援兵也被打垮，解围无望，始接受我军最后通牒，无条件投降。是役共计历时四十八天始结束，共击溃与消灭陈调元之范熙绩四十六师，岳盛喧五十四师及警备第一二旅，与王均之第三军七师与十二师，约三万之众。俘敌旅长三人，团长十余人，俘虏一万八千余人。缴获山炮四门，迫击炮数十门，轻重机关枪百七十余挺，长短枪万余支。此为鄂豫皖苏区红军最大之胜利。苏家埠之战结束后，红四军追敌东进至金家桥，威胁合肥。七十三师乘胜北出袭占正阳关，不战而占领霍邱城，乃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在红军节节胜利情况下，皖西苏区遂向北与东大大扩大，群众斗争亦空前高涨，地方游击队亦得到大批武器与弹药，二十五军亦以六安、霍山两县独立团为基础扩编成七十四师、七十五师。霍山独立团亦成立。

十、彻底粉碎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之后

在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后，鄂豫皖分局与省委的领导者们因胜利冲昏了头脑。并未具体估计敌我力量及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还会到来，在粉碎三次“围剿”后的形势估计上，遂作出了“偏师”的错误结论，认为中国革命——苏维埃运动的主要敌人已不是国民党，而国民党的反革命力量已不是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才是主要的敌人，因之中国以后革命进程中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在这种错误估计下，遂忽视反四次“围剿”的具体准备工作，只迷醉于自己的胜利，而忽视了以后的困难。这一现象在第四次“围剿”未到来时的工作中，是可以清楚的看出来的。

十一、红军在豫南的战斗

红军主力在与皖西之敌作战时，豫南潢、光之敌张钫部向豫南苏区进扰，麻城驻敌亦向苏区进犯，以图牵制我军。我军于粉碎皖西之敌后，于六月间即将红四军主力与七十三师西移（七十四、七十五师留皖西活动）。先扫清潢商边界之敌，攻下葡萄集、仁和集、柳树店，歼灭张钫七十六师之两个旅，并活捉其五十七师副师长李亚光、旅长李云龙。再西进击溃光

山驻敌新二十师部子举部，城郊残敌退入城内固守，我军置之不顾，再西进出平汉线。我十二师占领鸡公山，捉了洋人数人，乃移师西返。此时沈泽民赶来前方，分局遂召集会议讨论以后军事行动。徐、陈提出意见，因红军连续作战甚久，部队疲劳异常，既未得到休息，亦未得到整训，且此时已届暑天，行动不便，提议红军驻屯于光、罗苏区、白区边界地区，一面可以使部队进行整训休息，一面可以就食于白区，且可以开辟易本应的统治最反动之地区工作。沈泽民同志极力主张红军应乘胜利余威南下攻打麻城，开拓南部工作，分局最后决定同意沈泽民红军南下围攻麻城的计划。

十二、南下围攻麻城的战斗

红四军七十三师遂执行命令移师南下，先击灭张印相部骑龙铺一带某旅，并活捉其旅长霍某，扫清外围敌据点，始围攻麻城，并击溃由黄冈方面来援之三十一师一部，进占仓子埠，再围困中馆驿之敌。

十三、反四次“围剿”的经过及其失败

当鄂豫皖红军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后，皖西、豫南苏区大大开展，盘据安徽之军阀陈调元大部被我军消灭，第三军亦被我军击溃，损失甚大，统治阶级大为恐慌。国民党军阀乃开始布置对鄂豫皖苏区红军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进驻武汉，亲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调兵遣将积极布置新的“围剿”。西路以卫立煌纵队所辖十师、十四师、八十三师、八十九师集结于花园地区。陈继承纵队所辖第二师、三师、八十师集结于广水地区。由豫罗山南下者为马鸿逵之十五路军。在豫之光、潢、商者为张坊之二十路军、陈耀汉之五十八师及部子举残部。固始为戴民权四十四师，向豫南苏区进逼。在皖西的敌军为徐庭瑶之第四师，李延年之第九师，王均之七师、十二师，唐云山之独立三十三旅，胡宗南之一师及梁冠英之三十二师。宋世科旅占领霍邱后，向六安苏区进逼。在英山、罗田方向，为上官云相之四十七师、五十四师，进占了英山、罗田。张印相军之三十师、三十一师、三十三师一部在麻城与我对战，一部位于黄冈、黄陂一线。夏斗寅之十三师、肖之楚之四十四师，俞济时之八十八师，位于黄陂、孝感作总预备。其进“剿”部队之重点为平汉线之卫、陈纵队及皖西徐庭瑶纵队。敌人兵力一部为我军已击溃之敌，一部为蒋之嫡系新调来的主力，总共兵力约计四十万左右。

当我红军主力围攻麻城时，皖西之敌徐庭瑶先进占我霍邱城，我霍邱独立团与敌激战数日，因指挥上的错误，致为敌全部消灭。因此分局撤了卞继勋二十五军军长职务，以蔡申熙同志代其工作，王平章任二十五军政委。后以七十四、七十五师及地方武装与敌激战于霍邱城以南地区，终以众寡不敌以及舒、霍之敌进逼六、霍苏区，乃退集麻埠、独山地区与敌对峙。

平汉线之敌卫立煌纵队于八月初由花园向河口突进，占河口后继而向黄安进犯。陈继承纵队由广水突向七里坪进犯。我军于河口失陷告急后，始解麻城之围，星夜向西移动迎击敌人，当十二师赶到黄安之下徐家时，即与卫立煌纵队遭遇，将其先头八十三师击溃。我河口独立团亦自动向敌后路袭击。十二师与敌激战终日，虽有缴获，但伤亡亦大，战局遂成相持。黄安独立师与敌八十九师、汤恩伯部对战于冯寿二以南地区。我十、十一、七十三师，因急于战斗，天热行军，故落伍者甚多，部队又甚疲惫。其一部加入十二师右翼，黄昏前举行进攻，未收效果，乃星夜撤到七里坪。次日即与陈继承纵队接触，将其第二师击溃。敌以正面不易攻击，向光山南部转移兵力，图袭新集我军后路。我军主力亦星夜移至胡山寨地区，与敌对战又成相持局势，战斗不易解决，而南部敌人又向北进逼，遂乃移师于皖西，欲消灭徐庭瑶部。到麻埠后，又因地形险阻，敌人凭借工事不动，而西路之敌亦东进追击。此时红军主力乃南下燕子河东西界岭，主力经英、罗之石桥铺，消灭姚杞芳团陂据点之敌骑兵营。在主力过英山后，中央分局致信郭述申、刘士奇等，说明中央分局决定组织鄂、皖工作委员会，以郭任书记，刘士奇、徐海东可参加。当时工委以七十九团英霍独立团及霍邱独立营组织红二十七军（东路军），在皖西行动，再向西转至黄安以西河口。当到达河口时，敌第一师一部向我堵截，被我击溃。黄安方向之敌夏斗寅部、肖之楚部亦堵击我军与我对战于冯寿二以西地区。是役蔡申熙同志负伤牺牲，红军乃退黄柴畈停留一日，即在黄柴畈召集了分局的会议。当时参加人有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徐宝珊、王平章、徐向前、吴焕先（有些人记不清，但人数不多）。张国焘在会议上认为，反四次“围剿”是失败了，敌人的力量大大超过我们，我军经过各次战斗未能完成击溃敌人之任务，已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苏区主要地点已全被敌人占领，红军大兵力回旋已无余地，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只有跳到敌人包围圈

外才能保存力量，红军主力在苏区再进行战斗是无希望的等。当时陈昌浩、徐向前是赞成主力红军离开苏区，跳到敌人包围圈外活动的。

沈泽民认为，反四次“围剿”未能击退敌人，我已处于被动地位。敌人已深入苏区，但红军不应脱离苏区，应分散游击，仍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以待时机。这一意见占少数，且因张国焘的决心，故最后决定红军主力过平汉线以西地区活动，当时另一争论问题为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兵力问题。陈昌浩主张把二十五军之两个师都带走，只留七十五师于苏区。王平章（二十五军政委）主张把七十四、七十五两师都留下，只带七十三师走。最后决定总指挥部除率红四军十、十一、十二三个师外，另有七十三师与少共国际团一同行动。

分局并决定沈泽民（原为省委书记）仍留苏区坚持工作。在黄柴畈仓促慌张的情况下，遂决定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待机打回根据地。

但后因情况的变化，红四方面军被迫西征、进行了长途战略转移。

十四、反四次“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

因中央分局在领导上“左”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偏师”估计，因对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必然会再来估计不足，以致在思想上、精神上解除了粉碎四次“围剿”的武装。当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到来后，开始在军事上又没有打过一个漂亮仗，以击退敌人，以致以后处处处于被动。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使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苏区，进入长征，使鄂豫皖苏区遭受到国民党军阀的极大摧残，造成鄂豫皖苏区与红军运动史上最惨痛的失败。这一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在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后，因胜利冲昏了头脑，不正确地估计敌我力量，认为苏维埃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与帝国主义直接的武装斗争，国民党已颓于坍台。以后反苏维埃运动的斗争只不过是“偏师”的作用。在这一错误估计下，其结果必然在政治上，思想上放松了反四次“围剿”的准备工作，因此在军事的准备上、群众的动员上，都没有完成应有的准备。当时省委虽提出了动员三万人参军运动，与动员三万石粮食的口号，但这一口号仅仅是口号，实际上是没有完成的。在群众中、军队中，甚至在党内、在党的领导机关，如分局与省委内，只看到了粉碎三次“围剿”的胜

利景象，而没看到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会必然到来，并且必然还会更加惨酷。因为苏维埃与红军的更大胜利，必然会更促成国民党反革命的拼死反攻。只要还有一口气，他们是不会放下他们的反革命的武器不来与我们作斗争的。这是机会主义在“左”的方面的表现；另一方面，是中央分局在领导上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如认为鄂豫皖苏区处于平汉、陇海、津浦与长江之间，是四面受敌之地，对国民党的威胁最大，敌人交通方便，而我们的发展与巩固是不容易的。这种思想充分证明他们对鄂豫皖苏区与红军的发展与巩固是悲观的，是失望的。这种理论在反四次“围剿”军事受挫后得到发展，因此逃跑退却、张惶失措并不是偶然的。这一“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是造成反四次“围剿”失败的主要根源。

在战略方针上也是错误的。因为中央分局当时认为，国民党在反苏维埃运动斗争中已成为“偏师”，对我们不能成为严重的对抗者了，没有反对的力量了，在战略方针上只有红军的进攻了，因之形成了当时的“不停止的进攻论”或“无限制的进攻论”的战略指导方针，不在粉碎三次“围剿”后与四次“围剿”尚未到来之前，争取时间整训部队补充缺额，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使红军取得休息补充的时间，而是西出平汉线，后再连续南下围攻麻城，一直不停的进攻下去，当向前、昌浩提出红军连战半载，应予以休息整训的意见时，分局、省委予以否决，致使主力红军经常不是走、便是打，而应当的与可能的休息整训被忽视了。当敌人调兵遣将布置四次“围剿”时，我们明明知道蒋介石亲自出马，四次“围剿”将到来，但红军还是死死围攻麻城，“啃骨头”。只知道围攻黄安与苏家埠胜利的味道，而不分析现在围麻城的具体情况与过去的不同。当我们还在屯兵坚城之下久攻未克时，而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已从平汉线突进到苏区的中心地区了。以致后来数战不利、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并粉碎敌人的一路后，被迫西征，在战略的指导上也是有根源的。

同时在战术上也是很笨的，没有大兵团作战经验，只知在正面与敌人死拼，而不知在内线作战的情况下机动灵活的集中自己兵力于适当的时间与地形上，乘敌之隙与疲惫之际击破歼灭其一路，以粉碎其“围剿”。在军事上积极布置游击战争，扩大地方武装，加紧侦察探明敌人的企图等。反“围剿”的一切必须配合的工作都没有严重的注意，直到敌人深入

苏区，才解麻城之围，昼夜兼程溽暑行军赶往增援，以十二师三团之兵力对抗敌人约二十团之众，致遭敌各个击破而不能解决战争。在战术上完全处于被动，敌来我挡，而没有机动灵活利用自己的各种有利条件，造成敌人不利条件后，乘敌之隙予以坚决的歼灭打击。数战不利后不再设法改变形势，而只是束手无策、退却逃跑，遂造成反四次“围剿”的失败惨局，使主力红军退出苏区。

时还应指出的是，自四中全会后，钦差大臣满天飞，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到鄂豫皖苏区后成立了鄂豫皖分局与省委，排挤了当地的一些老干部。他们采取主观主义的逼供信的方法进行大肃反，捕杀红军中优秀的有战斗经验的大批干部，这一方面在军事指挥上、战斗上，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在红军干部中由于对肃反的恐惧也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情绪。比如，反四次“围剿”已经开始，还在逮捕人。如逮捕徐向前的老婆，收集徐向前的反革命材料，这怎能不造成红军中干部的恐惧呢？又比如，因肃反造成了仙居区农民的暴动，捕杀了大批的地方党、政、民兵干部，造成了地方上的恐怖情绪和苏区群众对苏维埃的怀疑与不信任。如农民们说，为什么现在的负责人都是从外边来的呢？对军队的消极，如敌人打到河口一直进逼黄安外围，黄安县府与军队还不知道；如果是过去，群众对革命积极负责，早已自动来报告了。这怎能不影响到地方上的工作呢？的确，大肃反时，在红军和地方上党的政民中捕杀了不少优秀干部，造成了恐怖情绪，损伤了自己的元气。这也是反四次“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

四次“围剿”是否能粉碎呢？抑或是必然要失败呢？这一历史的问题，以现在的眼光看，我认为是可以粉碎的，只要我们的领导机关当时不犯上述那些严重的错误，而又能正确的应用我们有利的条件，如地形熟悉、群众拥护、情况明了、部队素质好等；而敌人质量差，内部有矛盾（如麻城守敌是西北军旧部），动作不协同，地形生疏，群众不拥护，情况不明，外线作战等。在客观上利用敌人的不利条件，并造成敌人不利条件，在主观上利用我们的有利条件，并创造有利条件，反四次“围剿”的胜利是可能争取到的。但是争取胜利的唯一条件是建筑在领导路线正确之上。如路线方针是错误了的话，其他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过去张国焘始终不

愿并反对总结反四次“围剿”的经验教训，因为民主的、客观的来检讨这些问题，会揭发出当时领导上的许多错误与缺点。但是，只有认真地总结反四次“围剿”的经验教训，才能真正教育干部，提高工作能力，才能在失败的教训中有所收获。

徐向前、倪志亮附注：以上我们只写了在军事问题上的一些材料与意见，至于当时党的政权和群众团体的一切工作概况，因为我们经常在前方参加作战，很少到后方参加会议，且当时分局、省委、特委的一切决议与会议记录，现在又无一点材料可作参考，故多未提到。即使在军事问题上，亦只凭记忆所及，写得很不完整。但这些历史材料是真实的材料，而不是臆断。当然有些问题是从今天的政治水准与经验来看的，以当时的政治水准与经验来说，是不能明确的分析这些问题的，并把它提到原则的高度。所以，这些材料只能作为参考，而尚不能当作鄂豫皖苏维埃与红军斗争的全面历史。

红四方面军西征概况及其经验教训

一、在脱离根据地前当时一般概况

四姑墩待命出发西征时的兵力如下：

第十师（3个团）师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主任傅钟，参谋长吴展。

第十一师（3个团）师长倪志亮，政委李先念，主任周光坦（缺）。

第十二师（3个团）师长邝继勋，政委甘元景，代主任韩继祖，副师长何畏。

第七十三师（3个团）师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特，主任张琴秋。

少共国际团团长陈友寿，政委缺。

以上共计13个团，连总部直属各单位，共约二万人，枪枝占总人数四分之三，弹药相当充足。

黄柴畈会议后，次日傍晚，红军主力四个师集结于黄安西境四姑墩附近待命出动。然而这一严重的战略退却行动，除几个主要首脑领导人清楚外，其余不仅团以下各级军政干部无从知道，就是师级军政干部也是坐在闷

葫芦里。因此在部队里只有单纯军事上出动的准备（检查伤病员，去掉笨重东西等）、并无政治上的动员。这种领导作风，在当时看起来，为了保守军事行动的秘密是应该的，而事实上是取消党内应有的民主，是个人独裁。

部队集结完毕，已是黄昏七时许。全军分成左右纵队向西北出动，时值九月下旬。在此残秋深夜，每个指战员都只穿一身破旧单衣，但部队在行军中，不仅保持着严肃的军纪，而且有高度的战斗士气。是夜行军通宵，行程八十余里。次晨左纵队经夏店到达边界岭以西地区，右纵队经毛家集、汪洋店到达二郎畝附近，企图对敌隐蔽，拟在当晚左右两纵队由原地出发，经广水以南卫家店以北之段通过平汉线。是夜 12 时，全军以紧张神速的动作，均按预定计划越过铁路。

部队由四姑墩出发后，经过沿途各乡苏政府机关，而工作人员都向部队要求发枪打游击，当时群众斗争情绪之高昂，由此可见。可是部队只将零星的空枪发了一些，而不是有计划的来武装群众；相反，在后方保存的大批枪枝都全部毁掉。这种对革命犯罪的行为，充分证明不相信群众。

二、西征途中几次战斗经过

（1）右纵队遭敌袭击。我右纵队越过平汉线后，七十三师之一部，遭敌第十师尾击。当时激战约 3 小时，该敌被我击退，敌我均微有伤亡，惟我大行李失掉一部，又失电台一架，但敌畏我力量强大，不敢尾追。全军越平汉线后，在陈家巷（平汉路西 50 里）两路合并一路，越过损水，是夜 12 时到洛阳店宿营。次日继续西进，经贯庄店、厚坡进入随县地区，至新店子。沿途看见红二军的标语，询问当地老百姓得悉红二军在两三日前提经此南下。当时在随县西海陶家巷子，我后卫十二师击退敌三十四旅罗启疆部。部队到鲍家店歇兵一日，在该地召集师以上干部商讨我军南下，去与红二军会合。张国焘意见，若与红二军会合，大兵团行动笨重，加以湖北大水灾，粮食困难。当时决定到鄂豫边境原红九军地区歇脚。

（2）敌人尾追我军在新集之战斗。我军进到枣阳南之新集，与敌第一、第十、第八十三、第四十四各师及罗启疆之三十四旅激战一日后，我十一、十二两师伤亡甚大，未能彻底击溃敌人而解决战斗。至黄昏前，敌五十一师范石生部亦由西南方向我进逼，与我七十三师之一部激战。在战斗更加严重的情况下，张国焘拟向西南方渡过丰乐河，进入襄河以东地区

活动，当时该方已被敌人堵截，于是入夜后又改向西北行动，此次激战当中，我军牺牲三十二团团团长林维权、三十三团团团长吴云山，而二十九团团团长李隆兴、三十五团团团长高召先、三十二团团团长刘良善、三十二团政委程世才均负伤。全军总计伤亡指战员五百余名，惟敌之伤亡尚倍于我。

在该战斗中，我军缴获敌之轻重机枪与自动步枪三十余挺，步枪七百余枝，子弹百余箱，俘敌一百余人。当时为了便于行动起见，随将缴获之步机枪及我军减员之空枪计约千支全部破坏。我军负重伤之指战员，全部安置于该地居民家中，并每人发休养费十余元，而营以上干部尽随部队带走，由于此次伤亡过重，遂将少共国际团分拨各师填补空额。

(3) 土桥堡冲破敌人堵截。自新集战后，经一夜行军，次日上午进到枣阳西南（约五六十里）之土桥堡时，突然发现敌六十五师刘茂恩部、已先我占领该堡，堵截我军于此，我先头师冒敌人大炮、机枪火网之下，仍继续向西北方突进，占领该地一带村庄而掩护全军通过。此刻西方又发现敌一团向我攻击，与我七十三师接战，午后三时左右，在襄花公路上我警戒部队（三十一团）又与增援土桥堡之敌一个团接战。同时我军在疲劳不堪之情况下，一举反攻击退两路之敌，并消灭其大部。此时，土桥堡寨内之敌则陷于孤立无援。入夜后，我军继续向西北行动，是役我军伤亡指战员二百余人，我十师师长王宏坤负伤。

自新集、土桥堡所经沿途，原系红九军活动地区。因该地新遭国民党摧残，群众对我军竟有恐慌现象，未能供给敌情以至向导，使红军进入该地区后，对敌情不明，故在新集、土桥堡两次与敌激战，事先均毫无准备。

为了摆脱敌人起见，于是夜 12 时许，我军由该地越襄花公路经七房岗向西北方无目的地前进，经新野、邓县之间直趋浙川以南。徒涉丹江，沿滔水上游，经财神庙进抵南化塘。此段行程十日，约七百余里。该段地区，旱灾连年，土匪遍地。当地殷实富户，畏匪骚扰，避居城内；穷苦农民，为衣食所迫，多逃避他乡觅食。以至沿途农村庐舍多成废墟，田园大半荒芜，甚至渐、邓之间，竟有数十里人烟断绝。此间季候正值初冬（阳历十月中旬），我军在这段行军中，每晚宿营部队粮食征集甚感极大之困难，对铺草与燃料亦发生许多忧虑。全军指战员处此饥寒交迫情况下，部队之巩固仍然如故。否则，就不能打垮敌之尾追与堵截。但是由于连续日

夜兼程行军未得休息之故，连队中战士因病掉队自属难免，但逃跑之现象仍未发生。由此可见当时部队内部巩固坚实之情况。

(4) 南化塘停留三日。南化塘位于郧西县东北境内。为鄂豫陕三省毗连地区。部队自脱离苏区后，时日约近三周，行程约近二千里。由于无计划、无目的行动，兼之越平汉线西行抵枣阳原红九军活动地区，原想歇脚又遭敌之尾追与堵截，虽在两次激战中将敌击败，但由于情势严重未能使自己立脚，迫使自己依然将部队向西拖跑，对敌情难以明了，致仍处于被动地位。

到达南化塘后，获悉敌胡宗南部已到郧西，而刘茂恩、肖之楚两师又跟踪追来，该敌先头已与我十一师接触，随乃继向西进。由于上述之敌情，由于陕南龙驹寨敌人兵力薄弱，我军准备北折出陕南龙驹寨。但顾虑到该地山大人稀，大兵团长期屯留，唯恐粮食供给不易，因此决心直趋漫川关。

(5) 漫川关的战斗经过。十一月初，原拟取漫川关入汉中，部队进到漫川关以东时，始获悉陕西军一部已到漫川关防我北进。胡宗南师亦取道郧西经上津图占漫川关。当时与我遭遇漫川关以东。而刘茂恩、肖之楚两部亦由我军进路跟踪追来。并企图截断我军在漫川关以东北进竹林关之小路。并与我三十四团激战终日，我伤亡甚大，终以指战员英勇作战支持了当时危局。我军处于小岭险峻之谷地，遭敌前后夹攻，此时张国焘竟束手无策，惟全军指战员依然表现出坚毅的战斗精神，表示要坚决打破敌人围歼我军之计划。故于是夜决定部队向北唯一的一条通道突围。黄昏后十时许，全军在敌人步枪机枪火网封锁下，经羊肠小路之夜壶岭向北运动，是夜我先头一部抢占竹林关要隘，而进入商县以西杨家斜附近休息一日。

原拟由商县以西取道凤凰嘴进入汉中之柞水、镇安地区，我军进至凤凰嘴以东地区时，而胡宗南师已先由山阳占凤凰嘴，阻我西进，于是我军仍折而向北，经曹家坪分两路。一路出汤峪，一路出库峪（汤峪是右纵队七十三师、十师、库峪是左纵队十一、十二师，总部随右纵队）穿秦岭。我左右两纵队经此两谷道，沿途经过之地区，山势险峻，地瘠人稀，致使部队行军宿营都感极大困难，尤以粮食征集，在极端严重情况下，仍然照顾穷苦农民利益，用钱购买，由于上述情形，使部队行动陷于迟滞，左纵队先头闯过秦岭后，迳至西安南五十里引驾回，向西安警戒，以掩护全军

安全通过，是日全军进入关中平原。次晨我七十三师，迳至西安以西四十里五渠，歼敌杨虎城部特务团两营，当晚即在该地区宿营。是夜大雪通宵，次日全军左依终南山麓继向西进，抢占子午镇前进据点。

(6) 进入关中地区后的几次战斗。我军进入关中平原威胁西安，杨虎城乃派兵堵截。我军一战于引驾回，再战于五渠，三战于子午镇，以上三次战斗，敌人均被击败。我军进至鄂县南彷徨镇时，分为前后两梯队。前梯队先行后，敌刘茂恩、肖之楚、杨虎城部由东北两面向我逼近。敌胡宗南师独立旅又突由彷徨镇以西截断我后梯队西进去路，并形成对我后梯队东、北、西三面包围形势，而南路又系秦岭，攀登不易。前梯队即派三十二团折回，与后梯队一部夹击敌之独立旅，击溃之，唯我十师代师长曹光南同志牺牲，全军仍得安全西进。此役我三十二团团长沙玉清同志有大功。

12月3日抵马公镇，由整屋南之新口子再越秦岭，行约七日至小河口。此时，部队内部有一些干部对西征行动表示怀疑与不满，所谓“究竟到哪里去？”成为当时人们的见面话，所以在入新口子前，三十三团第六连两排人由该连长带跑。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王振华等同志，对张国焘相互议论。当时张国焘为了缓和不满情绪，遂召集几个师级干部会议，在会议上并未具体解释行动方针。后来，上述诸人被张国焘以“肃反”为名而谋害了。

新口子至小河口之谷路，系由关中进入汉中以东地区之孔道，而小河口为进入汉中咽喉。敌因该路沿途居民稀少。未敢经此路尾迫，但由于敌之情报联络，而汉中驻敌三十八师一个旅（两个团）先扼住出口，以期封锁我军于谷内，陷我于绝境。12月10日我军终能胜利的冲出谷口，将该敌全部击溃。是日乃进入汉中平原地区，当晚赶到神仙村宿营，神仙村南距城固、洋县约五六十里，该两县只有少数民团驻守。汉中驻敌三十八师及敌一师已出北栈道而未抵汉中，而肖之楚、刘茂恩两师已抵安康地区。全军在神仙村休息一天后，于11日夜渡至汉水南岸，进至尚元观。

(7) 尚元观会议。根据上述各方敌情尚不吃紧，乃决定在尚元观休息三日。并举行全军党团活动分子大会。在这一会议上仅只检讨在行动中部队减员数目及群众纪律，至于脱离根据地的原因及今后行动方针却毫无提到。

当时认为部队急需得到短期休息恢复疲劳，是时已入严冬，冬衣急待解决，故拟在汉水流域南岸，以西乡、石泉、紫阳、安康等县创立根据地。该地面临汉水、背靠巴山，而在地形上有利于我，惟因年景欠收，兼之敌情日趋严重，遂未下定决心（据现在回忆，主要还是害怕敌人）。此时正值田、刘军阀混战方酣之际，我军遂决定乘隙越巴山进入川东北地区。故部队自尚元观开动，经孙家坪抵沙河坎，休息一日，继而进至钟家沟、峡口一带，筹备粮食与调查翻越巴山路线。根据当地居民指导，自钟家沟沿龙池，白阳关到达两河口，计行程214里，该路为陕南入川大道。惟因连年土匪抢劫，不仅使来往客商绝迹，同时沿途居民亦隐匿无余。根据该路上述情况，我军遂派二一七团先遣侦察。该团经一日半兼程行军，翻越巴山，进抵两河口。该团到达该地后，即将敌二十九军驻防部队一营驱逐，我先遣团屯驻于该地。

两河口为巴水之源，西距通江县城约200里，该地为川陕交通要隘，亦为大巴山脉主要市镇之一。我先遣团占据该地后，全军携带三日干粮自钟家沟复继跟进。此段山脉为巴山肴岭，拔海三千余尺。部队正值翻越山岭途中，风雪交加，全军深入万山云雾之中：同时所经道路之两侧，既无村庄又无店铺，丛棘乱石满布遍地。惟路旁只存几处废墟遗迹，借以识别路径。当时指战员依旧是破旧单衣，赤脚草鞋跋涉雪山之中。但我军在行军途中，歌唱与说笑之声震荡着凄凉阴霾之群山，使部队不感行军之苦。这种愉快的情绪，是由于二周来全军涉过汉水后摆脱敌人尾追与堵截，和在尚元观、钟家沟两度休息并获得饱暖的生活所致。部队经3日行程抵两河口，为了征集粮食及宿营起见，全军进到长坪与苦草坝一带屯驻。我十二师遂于12月25日将通江县城驻敌两营驱逐。该城即为我先头师占领。

红四方面军入川后，据计全军人员约一万五千人，西征已历时三个月，行程三千余里。一再越秦岭，涉汉水，翻巴山，路经二百余里荒无人烟的地区，冷馁交集，困难万状。途中，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几次与敌接战，且战且走。经过新集、漫川关两次恶战，伤亡甚大。在几次战斗中。虽然胜利的将敌人击败，但在整个军事行动上，还是挨打的架子，没有摆脱被动局面。由脱离苏区时之二万人，西征中共损失五千人，约占25%。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苏区后之长征，至此即告结束。

三、西征的经验教训

(1) 政治上的动员解释十分不够，甚至可说完全被忽视了。

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绝大部分是鄂豫皖的农民，是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土生、土长地发展起来的。在脱离苏区的时候，是张惶失措的退却逃跑，在思想政治上未能作必要的准备，在既脱离苏区越过平汉线踏入西征的长途以后，又不利用时机作必要的动员与解释，因之，在战士中、在一部分干部中失败与思家的情绪及“究竟到哪里去？”的问题，就必然地产生了。这种情绪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无关重要的、尤其是在长征中且战且走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应特别加以注意与克服。但在以张国焘为首的领导下。当时并未及时地进行必要的解说说服工作。以致有些人由失望悲观而动摇。如三十三团某连长在关中时，带两排人乘夜逃跑。这种现象虽不是普遍的，但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对于这一工作抓得不够，甚至是完全忽视，所以使部队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这一教训应当引起注意，并引以为戒。

(2) 西征的行动是无计划、无目的的。

因为西征是张惶失措的退却，所以在原定外线作战计划未能实现后，为强敌所迫，在行动上没有一定的计划和一定的目的，在军事行动上没有想尽一切办法争取主动，而是随打随走，无目的地乱窜。如枣阳新集战斗时，原拟由丰乐河渡汉水到鄂西，因范石生师的截击而改向西北行动。原拟由商县出汉中到凤凰嘴，因被胡宗南师所阻又入关中，到汉中南才被迫转入川北。

(3) 没利用间隙检讨总结反四次“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

为什么脱离苏区？过平汉线后究竟往哪里去？为什么几次改变行动的方向？这一切问题都是当时许多高级干部以及中下级干部很关心的问题。既不总结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又不及时解释行动方向的改变，以致许多干部由不满而愤慨，甚至想去中央告状（如王振华等）。当时部队中是有很多意见的，而张国焘不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展开争论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压制不同意见来控制部队，甚至对抱不同意见的同志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使之不敢说话。有人提出要把反四次“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而张国焘竟置之不理。究竟为什么使反四次“围剿”失败了呢？究竟为什么要退出苏区呢？当时如能很好地进行总结。我

想对红四方面军的一切干部都会有深刻的教育的，无论如何对以后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反四次“围剿”的英勇斗争不致因失败而白流了血。同时，当时党内是没有民主生活的，张国焘借口军事行动须集中、须保守秘密，而把领导权集中于个人。唯恐因检讨过去的经验教训会影响自己的领导威信，所以形成了当时党内的一种畸形生活。

(4) 部队在长征过程中，在张国焘的领导上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在红四方面军整个部队说来，因它是在土地革命中生长起来，是经过长期与国民党残酷斗争的锻炼，所以它在长征中边走边打，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和疲劳不堪的情况下，仍能战胜敌人的追堵，克服了种种困难而最后进入川东北，重新创立根据地。这种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英勇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夸耀的。

红四方面军主力脱离苏区进行长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但红四方面军长征中克服了困难，战胜了敌人，最后终于依靠保存的有生力量，结束了被动局面。变失败为胜利，重新创建川北苏区，在这一点上来讲，它本身是有伟大意义的，我们应予以足够的估计，而不应抹杀其意义。

倪志亮同志注：西征这段材料，主要是向前同志的意见。我写了一些材料加入里面，但未经他来看。现将这段材料印出来，供参加过这次行动的同志参阅后便于回忆，以期尔后座谈时提供意见。

郑位三同志全七次谈话录

调访：湖北省委党史调查组

成员：倪忠文等

录入：黄文治、邹荣

校订：黄文治、辛向阳

郑位三同志谈话记录（第一次）

（记录稿未经位老审阅）

1958年11月23日

鄂豫皖三省党史调查人员关于调查情况简略汇报（略）

位老：关于这一部分材料（指张国焘肃反路线的具体材料——整理记录者注）可以单独整理，采取秘密的办法，不要把那个材料放出去，否则那是进行反宣传的好材料。

这是一个繁重的工作，搞解放前的历史比搞现在解放后的历史困难的多，因为它缺少文字的东西。过去只有中央苏区文字的东西多一些，而战争时期把一些文字的东西毁坏了。在战争中为了保持秘密，口头的东西多，文字的东西少。再有就是为了保持秘密，自己也毁坏了一些。还有一些东西被敌人破坏了。所以，无论哪个国家，遇到这样的时期搞历史比平静的时候搞历史要困难的多。因为平静的时候有许多文字的东西。

搞鄂豫皖的历史又比中央苏区难的多，因为：

第一，原来的东西保存下来的比中央苏区的少的多。中央苏区比较平静的时候少，但是鄂豫皖的又比中央苏区的少；

第二，中央苏区的工作很多是毛主席亲手总结的。鄂豫皖的工作有

的没有总结，有的有总结，但也不完全；

第三，鄂豫皖肃反厉害，存在的干部比中央苏区的少的多，参加革命暴动的人，现在是寥寥无几，数的出来的几个；

还有湘鄂西和鄂豫皖知识分子干部少，工农干部多。中央苏区无论如何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干部，人人会作文章。湘鄂西有贺老总，过去文章作的也不太好。工农干部多，所以困难大极了；

再就是肃反以前的一些老人死了，而作为乡苏维埃，区苏维埃工作的同志，了解的东西又少的很，上面很多事情他们都不知道。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主要的东西大概是依靠我们少数人来回忆。最困难的是湘鄂西。我们鄂豫皖还剩下几个人，大约在十人以上，而那里连十个人也没有。而且我们多多少少有几个知识分子。他们那里简直就没有知识分子。

搞历史是搞过去的事情，不讲现在，也不讲未来。在这一点上来讲，搞历史比搞未来的事情容易一些，因为它是过去的总结。未来的事情是要搞共产主义，这个要有预见，这一点就不容易搞。在这一点上来说，搞历史容易一点。但是，搞历史也有难处，像旧中国的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究竟哪里作为分界，到现在还有争论。再说一个小题目，就是对岳飞的估价，正确的在什么地方，错误的在什么地方，也不容易讲。可见历史不容易搞。苏联过去的东西有很多还没有搞清楚。搞历史也有它的难处。过去中国旧社会叫做历史有三长——才、学、识。“识”字代表经验。所以说这是不容易的。这两年来总是有人来访问，我们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也觉得不容易。鄂豫皖地区的我们这些老人，解放之后没有借各种机会整理一些东西，使你们工作起来有些麻烦。现在希望你们多吃一些工作。不然将来这些老人死了就没有办法了。

凭人的记忆，有些东西是不大可靠的。参加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现在还在的人有两个：一个是董老，一个是武汉大学的李老。这两位都是有学问的人。但是两个人对第二次党代大会的说法不完全一样。这些人是不会乱说的，可见记忆是不准确的，多年的事情记不大准确。参加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人很多，毛主席是以候补代表参加的，大革命的时候在汉口开的。但是，在延安写党史时，很多东西依靠记忆弄不清楚了。就说我自己，

有的人写信来问我：鄂豫皖的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围剿什么时候开始的，怎么样划分法？我就回答不出来。我苦了几天，怎么办呢？我从两方面考虑抽出来一个大概的材料。一方面考虑我自己的行动，回想第一年是在哪里过年的，第二年是在哪里过年。因为过年印象深一些。又回想过年前、后是在哪里作战的。这样安排之后，时间就有秩序了，不会颠倒了。然后又跟中央苏区一至四次围剿，根据毛主席书本上的时间再对照一下。这样我记起一个大概的时间。当然还不完全准确。可见这个事情非常费力。前半个月徐向前同志来谈了一下。他说：“你想的怎么样？我几次想分鄂豫皖的二和三次围剿，但是很难分”。还有，外面的材料，国民党的材料也可以看一些。关于井冈山的情况，毛主席跟美国记者史诺谈话时说了一个大体的情况。但是，最近我们看了写蒋介石的“金陵春梦”，那上面的时间比我们过去搞的准确。因为毛主席是依靠记忆，而人家是有报纸，有材料根据的。

这是我的经验，用来帮助启发你们。因为现在我们主要依靠记忆，但是我们的记忆有很多是不可靠的。

再说一下鄂豫皖三省的差别。

首先一个问题是死的人多，活的人少。湖北地区的几个老人还在，安徽、河南就没有了。所以，安徽、河南这两省更需要合作，单独搞是搞不出来的。你们组织协作，这样很好。

再把三省的基本情况和现在活着的人介绍一下，你们好搞工作，不然你们去找什么人呢？

湖北工作主要起于红安、麻城。这里工作的老同志还有几个。我自己是一个，因为大革命时期我就在红安做县委书记。我当时就在那里，我又是本地人。我开始就在那里工作，比起别的同志，我离开那里时间又短一些。因为：（一）我撤走的晚一些；（二）抗日战争一开始，我首先到了鄂豫皖；（三）抗日战争期间，我离开那里的时间最短。王树声同志是我当时的一个老战友。在湖北参加斗争的还有武汉的陈再道，还有徐海东、周纯全、倪志亮、徐向前。其余还有一些初期作为战士的，后来提拔起来的同志。这些同志也有四十多岁了。这是湖北方面的情况。

再说安徽，安徽就差多了，这是吃肃反的亏。特别是金家寨一带，

这个地方原来也是上层知识分子干部多的地方，县委、区委里面的知识分子干部多的很，但是肃反的时候杀掉了。按照百分比来看，安徽、河南在肃反中死的干部多一些，湖北剩下来的多一些。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湖北的斗争强一些，在群众面前这些人他不容易杀，杀了之后群众怀疑更大。而河南、安徽的斗争历史差一些，所以张国焘杀的大胆些，并不是那些人比河南的强一些。所以，和群众的联系有很大的关系。

再谈安徽剩下来的人，有一个老头子叫着张三铁匠，现在省政府养着他。这个同志最老，但是他不认识字，过去他只能看图章的颜色、大小，但是不认识上面的字。他最老，安徽没有暴动以前他就在那里工作，但是人太糊涂，一点事情都说不出来。其次是军委后勤部部长洪学智和徐立清，这些人比较老一些，目前也将近五十岁。那个时候暴动距离现在已有三十年了，那时他们还是一个小干部，开始一、二年的事情他们知道的还不多。只有张三铁匠知道的事情多，但是他说不出来，理解力太差。

补充一下，湖北还有郭述申，但是前一、二年的事他不知道，以后的事他可能知道一些，他是那里的道委书记。

关于安徽的情况我是说的皖西北，但实际上商城南部是主要的。另外，六安也出了一些干部，红军三十三师的姜镜堂就是六安的，但也被肃反杀掉了。还有安徽的英山（英山归湖北管是以后的事情）开始也是比较重要的地方，出了一些干部。开始安徽是一个重要的地方，但实际上是商城南部，六安是比较其次。开始安徽商城南部叫着三十二师，以后才有三十三师（以六安为主）。

再说河南。固始党的情况我不了解，不和我们发生关系，接触较少。此外是潢川、光山、信阳、罗山这几个县长期和我们发生关系。因此，我脑子里只知道每一个时期固始的工作都很好，但是党的历史和人物我接触的少。潢川干部有两次暴动失败了，再加上肃反，所以现在剩下的主要干部就是一个苏井观。那时，张国焘首先把这些干部调去受训，我也上过课。以后肃反时杀掉了，所以这里的老人不多。苏井观（卫生部副部长）也参加了一些斗争，但是他一参加就是搞医院，对全面情况不了解。

再就是光山自己独立搞了两次暴动。这两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干部损失不大，所以会合我们县发展红军、游击队时，他们还帮助一些老干部。

开始建立光山县委的时候，第一次、第二次的县委书记都是老干部（名字记不清了），以后这些同志也在肃反时被杀了。现在剩下来的这些同志，那是以后参加工作的，有的是从下面提拔上来的，他们参加县委负责工作时，已经是四次、五次围剿以后的事情了，前一段的事他们了解的就很少。

罗山开始暴动以前的党，由郑新民负责。罗山也独立暴动过。我们游击队很少的时候，就依靠他们的帮助。那时敌人的武装也少，有一次我们一下就搞了五六万块钱。这个钱除了给红军之外，罗山也买了一些枪。这个暴动是在红军配合下进行的。但是同样，这些干部也在肃反时被杀掉了。现在的何耀榜、韩先楚是这里的干部，但是这些干部是在四次围剿时才提拔起来的。四次围剿以前的老人不多了。罗山的老干部我们更熟悉，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长一些。罗山的干部我最熟，六安干部其次，光山的干部更差一些，固始我就知道了。说起来罗山干部比光山多。光山有一个有名的干部，但是没有在那里工作，这就是邓颖超同志，她是那里的人，但是没有在那里工作。罗山在四次围剿后起来的干部数量大，程世才也是罗山的。

再就是信阳特委是长期受中央领导的秘密机关，和我们发生关系很多。我自己到信阳去过，但是那里肃反一个也没有剩下来。信阳的干部目前找一个中将、少将都没有，寥寥几个人。光山、罗山后起的人多，信阳后起的人都少。

这样谈一下就给你们找到一个线索。

关于这个工作怎么作，提一点意见。然后你们回去再交换一下意见。

上次湖北有人来谈的时候我提了一个意见。首先我讲到三省要合作，不然搞不好。

你们的第一步工作是3个省来一些干部在北京至少住3个月。

第一，把鄂豫皖所有的文件仔细读一遍。存下来的一些文件、电报主要是存在北京。这些东西看了之后，才能够心中有数。

第二，找我们这些老头子大体上谈一下轮廓。主要依靠徐向前同志，我算一个，还有王树声、周纯全。北京还有这样几个老同志。

第三，把中央苏区和别的苏区的材料参考一下，看他们的历史是怎么写的。我们的情况虽然不同，但都是在苏区工作，这个性质是相同的。

这个工作一定要搞，因为中央苏区有些工作是毛主席总结的。

在北京住上几个月做这三方面的工作，然后就可以起草一个鄂豫皖大事记。以历史，以时间为线索，那一年有几件什么大事，把这个摆开。再就是我们这些老头子对大事记提出来一些意见。你们的工作无论怎么样的做法，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大事记。不做这个工作，全部问题不好解决。这是一个主要的环节。

这个大事记要在北京写，不能够在别处写，别的地方解决不了。在北京搞两、三个月，有了大事记后，再怎么办呢？再去访问一般老干部。把主要的人名搞出来一个表。红军和苏区主要参加过的那些干部，要广泛的访问一下。有了大事记后，就拿给他们看一下，这样他们也才好说话，没有这个大事记，他们就不好说话，组织材料也不好组织。有了大事记后，到组织部搞一个名单，派一些人到全国各地，拿着大事记去访问。

有了大事记和访问老干部的材料后，把下面的干部训练一下，看这两个材料怎么样，然后再广泛的下乡，去访问一些乡间的老革命，这样作用就大一些。然后再回来分工，好好的座谈、研究几个月，再起草一个大概的东西出来。有了这个东西再来北京找我们这些老头子，我们也帮助提一些意见，鉴定一下这些材料的价值是真，是假，是意义大，还是意义小，就要去粗取精。再就是拿什么观点来看这些问题。

你们3个省这个工作要有一个共同的领导组织，只是由省委领导这个工作搞不好。

你们来了之后，把北京所有的材料都看了、研究了之后，再来跟我们谈，那样就可以提出很多问题。

再就是要找那些自首分子。比如红安在我前面的一个县委书记、县组织部长，这些人在武汉教书，他们很可以说一些事情。比如，过去潢川的一个干部，现在在济南教书，他也了解潢川的历史。还有“星火燎原”中写的周维炯的材料，这是一个自首分子写的。这些自首分子了解很多东西，特别是初期的东西他们知道的很多。

所以，我的意见是第一步搞大事记，其余的做法是费力多，而成绩少。这个大事记要在北京搞。我们这些老头子都在北京休养，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们一下。

鄂豫皖最吃亏的是：（一）肃反错误的厉害；（二）我们和徐向前同志说，那是一个好地方，但是领导方面没有一个毛主席，这个地方领导差。但是，鄂豫皖有特殊光荣的东西，较之其他几个苏区有它特别放光彩的东西。（一）军队中的老干部，全国算鄂豫皖最多。从中将起，大将、上将不多，但中将、大校、上校这一级干部多的很，比中央苏区多几倍。徐立清同志说：在军委总政治部看到一个表，上面鄂豫皖地区师级干部在全国占70%。还有一个材料可以证明一点：红军改编成为八路军，新四军时有三万多人，有一万多是鄂豫皖的。这个秘密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鄂豫皖处的环境没有办法，部队里大胆提拔工农干部。在长征的时候，中央苏区里没有工农干部作师级干部的，在鄂豫皖就有很多工农干部作高级干部。所以，目前由中央苏区来的干部大将、上将多，但中将、少将是鄂豫皖的多。中央苏区从长征时算，有哪一个工农出身的？就是谭震林是工农出身。在鄂豫皖在长征的时候有很多工农干部是军长、军政治委员。因为那里知识分子少。徐海东就是这样的干部提拔起来的。这就是干部政策的关系。我上面说的那些名字，大都是工农分子。这是一个优点。

其次，鄂豫皖地区始终没有断过党的武装，从大革命前夜直到解放战争胜利没有断过红军老底子。

在一点是斗争规模之大，仅次于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最盛时有十万多红军，鄂豫皖在最盛的时候有六万红军，有二百九十万人口。苏家埠之战役即缴获两万步枪，机关枪一百挺，抓团长三十多个。这是中央苏区所没有过的。

还有一个特点：鄂豫皖群众发动的好，斗争坚决。徐向前同志说：全国的老根据地他都走过，但是群众最好的要算鄂豫皖，几十年一直坚持斗争。在敌人搜山时，亲生父母把自己的孩子闷死的都有。这是斗争尖锐的表现。你们把很多材料找出来之后，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不和别的苏区比，我们和中央苏区比较。中央苏区开始在井冈山的时候，是毛主席带九百多人，总司令带三千人，将近四千人这样一个力量。毛主席带的九百人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六个县的农民自卫军。总司令带着五个县的农民自卫军。毛主席带的另外的三分之一是武汉警备团。总司令的自卫军不到一千人，多数是南昌暴动失败后的军队，是这样一个基

础。因此，中央苏区开始发展的时候，有农民自卫军和革命军出身的占多数，这是本钱。鄂豫皖的老底子，开始就是搞农民运动搞起来的，没有兵，开始只有几十条枪，不敢走远了打游击。几十只枪和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依靠本地农民参加了红军，才敢出去打游击。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红军和群众联系的非常密切。这就影响着鄂豫皖群众斗争的坚决。他们都是本地人，红军战士老百姓都认识。毛主席和总司令带的军队，有很多不是本地出身的，到了苏区农民不大认识。所以，在这里哪怕领导上是错误的，中央苏区的领导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一点上强一些，这是客观。

今天就谈这些。你们讨论一下，请示一下省委，然后我们再谈一下。你们和其他同志谈话的时候，可以把我的意见简单告诉一下。你们回到省委后分头汇报一下，带两个速记来。因为我们这些老头子说话顺口溜出来很多东西，可以记录下来。

问：湘鄂西的情况最不好办。

位老：因为湘鄂西有两次叛变，为首的人叛变了，这样的损失很大。鄂豫皖是当地农民斗争出来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战士开小差的很少。这是一个特点。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错误，就是不知道利用俘虏的重要，就是只相信当地农民。但这里也有一个好处，就是非常纯洁。

关于肃反我举一个例子：光山的保卫局长问案子，跟着一个秘书。一个晚上问 32 个人，可见多么草率。到了 12 点之后，这个局长睡着了，就是那个秘书在问。第二天早上起来，局长把秘书的记录看了一下，就决定杀了 16 个。这样怎么能不搞错呢？鄂豫皖肃反还有这样的情况：在行军的时候把人交给保卫队，就说前面走的几个要杀死。行军的时候，队伍经常走乱了，只说把前面几个杀掉，这怎么不杀错呢？

问：我们在秘书局找的材料要不要送来？

位老：你们手头要用的东西不忙送来，如果有多余的可以送来。你们第一步把大事记搞出来。没有大事记不好办。

位老谈话记录（第二次）

（未经本人审阅）

1958 年 12 月 15 日

鄂豫皖三省党史调查人员汇报：

三个省的同志都回去汇报了一下，省委都非常重视位老的指示。接着汇报了最近一段时期在北京收集文字材料的情况，今后工作大致安排，并请示怎样编写大事记等问题（具体内容略）。

位老：你们做得很好。做这样的事情非常不容易，将来还会遇到很多困难。你们在大跃进后搞这样的工作不要害怕，放大胆子搞。

学问，我上一次就讲过：过去中国讲编历史要有三长——才、学、识，要有才，有党简史，有见识。再拿苏联编写革命历史来说，革命成功后十八年斯大林领导写联共简史时，中间推翻了几十个本子，“二十”大之后又要修改，目前新的还没有编出来，可见这是难事情。

编全党的大事记最初不好加观点，要加观点必须毛主席亲自指导作结论。这就说明这个工作不容易的。

我想了一下，这个大事记将来搞成功恐怕和计划委员会的几本帐一样，要搞三次才行。第一次的大事记详细一些好，因此要有很多材料，数量也多，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经过调查、研究，把原来的删掉一些。最后第三步才能定稿。如果不是经过三步的话，恐怕无论如何要经过两步。第一步必须多，不怕杂乱。

再一个具体的办法——我再提一个意见就是要进行采访。进行采访，有时去一次得到的结果不多，但有时可以碰上很有价值的材料。你们现在人很多了，不要单纯停留在看文件上，马上开始采访，只要有时间，能够谈问题的人，你们尽量去采访。只要在鄂豫皖工作过的现在在北京的人都去采访，因为采访的人多，地方住得又分散，费的时间很多，我主张早一些采访，并且把采访采的材料打印出来，使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都可以早一些看到，以便配合看文件。

再一个问题就是把全国性的历史材料，以大革命北伐到武汉到鄂豫皖解放为止，一切有关全国与鄂豫皖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变化的材料，都搜集起来，在北京买的买，借的借。写历史不能单纯看鄂豫皖的材料，要时时刻刻和全国的形势对照。这些材料别人不看不要紧，你们干这个工作的非看不可。

再就是到军委去要一些材料。这两年军委用了很大的力量搞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是很有价值的。

这几个方面的材料非要不可。

我想起一个有价值的材料：陈毅副总理在抗日战争作统战工作时，遇到国民党火烧长沙的一个人。这个人说：“你们共产党杀许继慎是我们用了一个小小的计策”。这个事情是国民党派了一个姓李的拿着蒋介石的信，盖着蒋介石的章子来找许继慎，结果张国焘中了敌人计，把这封信当作通敌的信来处理。我没有看到这封信，听说这封信在大会上到处念给人听。这显然是敌人的反间计。这一类事情什么记载都没有，但这是可靠的材料。

今天搞历史，还有一些民主人士在，无论研究那方面的历史，可以搞很多好的材料。

这是我提的几个意思。在这几个意思中，特别强调要同时进行采访，把采访和你们收集文字材料配合起来，一定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另外，要去采访很多人，这些意见可以修改。

再就是关于写不写观点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二元论，即写观点，又不写观点。

你们现在写历史要以时间为线索，从北伐军到武汉起，一月一月，一天一天的写，比如北伐军到武汉后，当时鄂豫皖是怎样的情况。革命活动数黄、麻最早。当时的黄安、麻城都是单独工作，暴动时黄、麻才合并，安徽迟一年。以一个时期较难写，材料太少了。

这一部分开始就单写，以后工作配合了，就配合起来写。你们除看三十万字的大本子外，主要参考我和王树声同志在“星火燎原”一书上发表的文章。无论文章写的怎么样简单，但那些是可靠的材料。另外安徽方面的文章，有写周维炯在民团的情况。你们把这些文章作为开始阶段的主要材料。把三十万字的大本子作一个线索。

徐向前、倪志亮同志的材料时间排的很好，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缺口我们要补一下，就是徐向前同志的材料是从红一军成立写起的，我和王树声同志的文章是写到柴山堡时期为止。一个写到1928年上半年为止，一个是从1929年红一军成立时写起的，这中间差了半年。因为有一个时期

徐向前同志不在那里，所以把起点推迟了一些，其中有些东西他没有写。今年我和王树声同志凑了一下，主要的东西写了，发表在“星火燎原”上。另外，还有倪志亮写的一篇文章叫着“三战三捷”。倪志亮的“三战三捷”可以和我跟王树声的文章联系起来补充半年，可以起大作用。虽然可以起大作用，但是在“三战三捷”以前柴山堡之后，这里面还有一段时间，还需要徐向前、倪志亮，我们在一起回忆一下。从柴山堡到“三战三捷”是没有文字东西的。这三个文章作为重点材料，但是还需要我们口头上补充一点。你们找时间，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大家都谈一下，这样把第一步先补充起来，你们可以作参考。内容虽少，但是没有缺口了，年年月月都有东西写上，把这些半年的空就补上了。补充第一段的时候，我要和向前同志见一次面，谈一次，补充一些意见，让他讲的圆满一些。总而言之，第一年的文字材料太少了，只是依靠少数几个同志的回忆。到二九年成立了红一军之后反而容易一些，因为那个时候中央派干部来了，保存了一些文字的东西。

在我写的文章里，暗示着我的观点。在观点方面介绍一些材料便于你们研究。以后，关于观点的问题我详细的和你们谈几次。

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工作的同志不容易了解苏区红军发展的原因。因为以后的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观点问题，过去没有很好的解决，到北京后特别是这两年才解决的。我讲了几次，大家还同意我的意见。比如，拿湖北黄、麻来说，为什么大革命时期那里能搞起红军来，而别的地方搞起来，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几十年来大家交谈过，但是没有得出适当的结论。这两年我在养病，才前后研究了一下。北伐军到武汉后，那时湖北有5、60个县，发展起来的三个地区有10多个县。为什么有的没有发展起来呢？开始我们没有搞起来，以后武汉省政府发出了动员令，各个县一样都要接到动员令；而为什么有的搞起来了，有的没有搞起来呢？这是一个观点问题。很多老同志说我们那里农民苦，受地主压迫厉害。这个不是原因，如是这个原因，六安那个地方很富，为什么能搞起革命来，黄、麻地区群众生活并不很苦，革命却搞起来了。所以这个原因不对，与事实不符。那么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中国封建势力分三层：上层、中层和下层，分成县以上的封建势力和县以下的封建势力，从秦始皇

的时候分起，县里面不能自己立账用款要上面批准，县里面自己不能搞财政。所以，县以上是上面的封建势力，县以下是地主阶级当家，决定XX当县长是当地地主的意志，上面政府决定不了。所以，北伐军一到武汉成立革命省政府，把上层政权打掉了，下层没有动，有些县发动农民又差，而红军又都是农民组织起来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要发动农民。发动农民是共产党的功劳，还要有别的条件。一个重要的条件是革命知识分子多，农民就容易发动。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发动农民起了两个重要作用：一个作用是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而知识分子又能站在农民方面革命，这就分化了地主的势力。地主阶级有各种各样的势力，只有他的子弟参加革命，有3、40个地主的子弟参加革命，就容易打垮地主，农民也是容易动起来，有了武器，农民的胆子就大了，这是发动农民的重要条件，再就是知识分子起革命桥梁作用。

我的第一篇文章就说明了这个观点。鄂豫皖三省的情况要拿这个原因来解释。商城和六安两个地方是知识分子多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容易发动。详细的观点将来再和你们谈几次。

第二点，我们讲到柴山堡时代跟中央苏区井冈山和其它苏区有不同，这是第二个大问题。朱总司令、毛主席上井冈山，在毛主席的材料里说有四千人，总司令带三千多，毛主席带的九百多。毛主席带的九百多人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武汉警卫团的队伍。武汉有两个警卫团，一个是湖北省政府的，一个是武汉政府的，这两个团完全是我们共产党掌握的。罗荣桓同志就是这里面的人，董老作政府委员。九百人中的另一部分是湖南各县农民自卫军；再一部分是工人纠察队，武汉的、湖南的都有。总司令带的三千多人是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南昌起义剩下的人；一部分是湖南南部农民自卫军。井冈山这个地方是毛主席选择的，以后总司令、彭德怀同志也去了，在江西全省打游击影响很大，农民容易参加。他们化的本钱大，是采取大革命的方式发展起来的，能够作战。我们的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只有十多条枪不能到处游击。当时只有两个苏区。其它的苏区像我们。我们主要靠黄、麻两县农民积极分子。这些人先是跑反，到了柴山堡后，大家都要求参加军队，有一千多人，但是没有枪，以后慢慢的才有了枪。这些人都是对敌人斗争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我的材

料里就写到这些人。

比起中央苏区，我们有一长一弱：弱点就是不能打大游击，广泛的发动农民群众；长处就是以后组织了四、五千骨干积极分子，这些同志成分好，土生土长，熟悉当地情况，到柴山堡后，才扩大游击，学习中央红军的方式。有了这一批人，然后部队才发展起来。这是说明中央苏区和我们的情况不同，这也就是观点。

第一阶段你们要注意这些问题。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农民不能像工人那样作很多秘密工作，农民就是要有武装力量，他有了依靠才有信心，此外的都不行。

今天把这两点说一下，便于你们收集材料。说别的原因都不行。黄、麻搞农民自卫军，搞农民协会，打土豪劣绅，经过很多的斗争打下了这个基础。周维炯他们在商城就没搞农民协会，安徽也没有搞农民协会。而为什么河南、六安也搞起来了呢？原因和我们讲的道理相同，就是革命知识分子，最后把民团的武装搞过来，这样就大搞起来了，所以，革命知识分子多了，是迅速发动农民的一个重要条件，农民容易迅速行动组织和下面干部谈话时，都说共产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好，当然是好，但是没有这两条，就什么也不行，不能起大作用。六安要搞起来的时候也没有减租减息，就是民团起来杀土豪劣绅，就这样起来了。这就是两条：革命知识分子多，再搞一些武装。他的武器和我们的不同，他是民团的。

写开始的历史时，这些东西很重要。所以，和别人谈起来的时候，合乎这些东西的材料就要重视，否则无论他怎么强调，而实际离开这个东西仍然搞不起来。几十年来都交谈过这些问题，我们没有搞出来，这两年才有时间从头到尾想一下。

鄂豫皖三省是1929年合一的，1928年中央派曹壮父到我们那里去巡视工作。那时候我们只有几十条枪。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的文件是他带去的。他巡视之后，回到中央建议要统一领导。那时中央在上海。中央不同意，中央回一封信说：“三省的政治情况不同，湖北有大革命的影响，河南是冯玉祥搞的时间长一些，三个省的政治情况不同，不宜合一。”当时我们愿意合，但是中央不同意。以后立三路线下来，马上要搞一省数省胜利，这样才合一。

问：安徽的党组织是否从湖北发展过去的？

位老：不是的。安徽也好，河南也好，都是从商城南部发展起来的。商城共有7个区，南部有河乐二区，周维炯就是在这里领导民团暴动起来的。六安同志也参加了。安徽受黄麻影响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大革命时有秘密党，有人和黄、麻经常通交通；再一个是黄麻派了两个干部去，一个叫徐子清，一个叫徐其虚。徐子清是大革命时期麻城县农民协会副委员长，他住在屯家堡附近，能说会道，离河乐区不远，在没有暴动以前他就去了。徐其虚也是麻城人，有作战经验，他是正暴动时去的。他们去后，周维炯暴动成功了。又过几个月周维炯把两徐杀了（徐其虚是党代表）用别的名义，说这些人搞女人、贪污等等。他们自己也没有政治委员，只有依靠上级，后来六安派了一个姓戴的，去作政治委员，去了2、3个月后又杀了。杀了3个政治委员。所以我们那里都搞怕了。1929年冬，他们第一次打商城，郭述申到那里去视察工作，还带了四个干部去工作。那时候的干部政策也不对，派了一个苏联留学生——刘英任师长，以后牺牲了。信阳特派一个姓孔的去任县委书记，一共5个人到商城，住了一天，周维炯等又要杀他们，商城和六安的28个人晚上开了秘密会，说郭述申是老好人，主要是信阳特委不好，是改组派，准备要杀他们。在白区工作一胡子同志，会后向郭述申告密，晚上五人偷了三支驳壳枪跑掉了，这才免了被杀。后来，中央要我们合并，我们不愿意合并，中央要我们说服，又要鄂豫皖派人去。后来王平章（湖北人）同志去了。王平章同志的作风好，在那里住了20多天，开了几个会，周维炯等人开始就承认错误，要求处分。以后组织上根据情况分别给了一些处分，没有开除党籍，但是有留党察看的。王平章来了之后，把情况报告给中央，中央写信批判了这种错误，并指出改正是对的，以后就合并了。所以，安徽、商城是独立自长起来的，鄂东是起了一些作用。合并之后，军队就统一了。以后我们杀了漆海峰是对的。当时漆任三十二师参谋长，是个太上皇，在军队里他说的话要算；在师部吃鸦片，搞女人，发号施令。部队到京汉线才把他逮捕杀了，撤了漆德伟职调到中央苏区，当大团团团长，小师师长，以后牺牲了。

位老谈话记录（第三次）

（未经本人审阅）

1959年1月8日

这次拜访位老的，有湖北二人，河南一人，安徽未参加，湖北的同志汇报了湖北地区调查工作进展情况及安徽不参加编写鄂豫皖党史的意见，并继上次谈话请位老指示。

位老：先谈安徽的问题，最近宣教动态登载了一段报导，说中央苏区、湖北、河南等地都在搞革命史。这个报导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写的，目的是引起大家重视。这个事，先说组织办法，要中宣部下个决心。你们向中宣部请示一下，三个省合作好，还是分头干好？安徽给你们的信，附给中宣部看一下，由中宣部决定。

事实上，安徽不参加不行，也搞不好。过去和现在很少中心人物，各省分开来搞是搞不好的，看来三个省要算湖北的条件强些，所以安徽应该参加的，在乡下调查了许多材料，也无法着手，无法处理。如果中宣部决定维持这种做法，那就更好，不维持，请安徽派少数人参加也好，免得将后对他们的困难太多，这样对他们是有利的。三个省谁个做头子，也请示中宣部。

湖北花了很大的力量搞但要把任务明确。真正解决问题的，乡下调查是次要的，北京的搞的是主要的。上层没有掌握不行，下面能知道的很少，对全面的更是莫名其妙，整个鄂豫皖的历史，不是拼起来的。下面调查的片面、局部，但有它要紧的地方，在湖北要把这两个任务互相联系起来。湖北各县所调查的材料，可编写各县的革命史，不管系统不系统，但材料却还丰富，超过一县的材料，可不负责。你们再由他们所编写的材料当中提炼，取若干材料。一个是“小土群”，一个是“大洋群”，不能混合，混合了便搞乱了。把这个任务分清后，将后工作效率会大些。

再来谈我要说的：

1928年年底以前，有共产党起到28年年底，根据王树声同志和我的文章（皆登载在“星火燎原”上），以此为核心，有关材料加进去，这一

时期的大事就可搞清的。

1929年2月，我们受了一次包围，受了些损失，有些干部被俘。

3月28日（或27日），商城暴动。

4月，重要领导人吴光浩同志牺牲。

夏末秋初，徐向前同志到。

仲夏，徐夏“围剿”，第一次“围剿”，是秋收的时候。

阴历冬月，胡子石会议（第一次八县党代会）

腊月，细屋家工农兵会议。（这两次会都是在柴山堡时期）。

1929年旧历末，中央派一代表曹壮父来。

2月，中央派曹大骏到箭厂河开了会议。曹后当政治委员。

3月，郭述申同志来当特委书记。

4月，前特委书记徐朋人去上海参加六届四中全会。

大约也是4月，许继慎同志到，成立红一军。

冬月（阴历11月）曾中生到，任分会主席，特委书记，不几天，旷继勋到，任军长。

过个把月，蔡申熙带红十五军到（或是：蔡到，成立十五军。记录不清）

从四月成立红一军，到11月成立红四军，中间的时间是半年光景。

以后的大事情就多了，我还没有整理。四军成立后，事情就大了。

1931年5月初，接连开了几个大会。大约是5月4日，张国焘到。成立了中央分局。初是曾中生为角，即1930年11月到1931年上半年张到，这中间又相隔半年。领导就大变化。这以后的情况，知识分子还有些存在。如：陈昌浩、陈赓、傅钟、张琴秋、宋侃夫，都是张来之后的知识分子，这些同志比工农干部知道得多。（问：陈昌浩可不可去访问？）可以访问，有好多东西要问他一下。

再就是徐向前、倪志亮和戴季英写的材料，徐、倪的材料，是倪执笔，重要事情徐出主意。我认为作初步用，好得很。他们按作战的次序排列的很好。它能帮助记忆。是编写大事记的重要依据。这本比戴的写的好一些。但是，一开始就要请你们记住，戴的材料写至1929年12月，徐、倪是从1930年春许继慎到写起的。这中间有个空空。（戴的体裁简单，

便于口头讲的)。这个空空的时间内，红军出窠——从基本老根据地向京汉路出发。从胡子石会议起出击平汉路，军事行动上是个大变化。这一段由徐、倪补充。胡子石会议到红一军成立，原材料差一点空子，但这个空子很重要，红军第一次出发新区，发展很大，这个情况很有意义。他俩补充后，我把地方的再补充些。你们抓紧些倪志亮同志，徐向前同志身体不好，找倪志亮是好办法，他记得多，身体好，对这个事也有兴趣。

此外，四方面军西征后的情况，以后再谈。

二十五军史抄一个可以，但不可采用。

补充几句：从胡子石会议到红一军成立，原材料接不起来，差一点空子，很重要，军队初出发新地区，意义重大，发展很大。这一段时期，目前主要靠徐、倪补充，地方的我再补充。我的、王树声的和徐向前、倪志亮的材料，这就是基本上有了线索，但不完全不丰富，空的地方找机会补充一下。

再谈，文字材料太少，死的人又太多，记不清的怎么办？到处如此，再过些时也会如此。只有少数文字，多数记忆。文字的是好，太少；记忆人的少有毛病。这样一来特别要注意科学分析，材料不够，就得像考古学家那样，靠些材料进行分析，将后工作成功，少不了这一步。无论哪国的博物馆，只有零星的材料，其余经过科学家分析成一整体。最吃力的也就在此。

互相启发，互相证实，互相纠正。首先，一点文字的东西，与记忆互相启发、证实，又互相纠正。有的记忆比文字正确，有的文字能纠正记忆。因为看了文字之后，又多回忆起多些东西。因此，你们在中央抄东西，一起翻印，打它几十百份。这些材料给我、徐、倪等同志看。别人的记忆要把我看，我的要给徐向前等同志看，互相启发，也打印一下。把我的意见向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说一下，记忆的人不看材料不行。打印二十份太少了，三十几个人，都要给他们看一下。不会不同意的，如果说秘密，也过来好久了。

采访要开个名单出来，马上列一名单，以前的名单，范围太小了。访问时继续扩大。2、3个人去大连住个时期，郭述申同志，他也是重要人物。将来采访的有一百几十，主要的有二三十人。

党史与战史的区别和关系。中国特殊，不能像苏联那样，中国战史

是党史的主要内容。关于战史的材料，全部收过来。你去采访好多干部，他们说的实际上都是战史。俄国是工人运动很重要，我们以农民为主，搞武装斗争。实际上，战史的东西，开始时军事方面的都要，之后，单纯军事意义的可不要。高岗的军党论；苏维埃时代，说共产党是农民党，这两种说法是错误的，但这两种内容很重要。将来党史与战史的关系，从毛主席三大法宝这个思想来解决这个问题。武装斗争是一个革命的方法，阶级基础实际上是农民战争，三大法宝把农民当成重要群众基础，全部历史重要内容。从现在起，开始就要注意到。

采访材料，靠你会问。已经收集的材料，要着重研究一番。研究了之后再会问。

再说，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前两年是群众运动。两年以后关系于作战。前两年武装发展意义不大，主要是群众斗争，为主要动力，部队、党的力量以此为标准。当军队能缴一团的械，武装斗争意义就大了，群众运动的意义就不大了。

另外，对重要人的访，要作一番准备。我这个门要上百把次。不是这样多不行。有些干部几次便可以了。我们的精神不好，但这是债务，不还不行。

你们最近还要为地图做一番功夫。把地点搞熟来。外国做个博士论文要化一年多。你们的工夫比这大得多。红四方面军长征前有了线索，可初步搞出东西。你们上面力量小了。

最后再说一段。前两年，群众运动为主，无论观点与事实，都不易提。战争、打战，人皆知道，对错好评判，群众运动则不易有个标准。这一点，暂讲一段，那时摸索到的四位一体的政策。不是领导创造的而是与群众摸索出来的：一为游击战；二为昼伏夜动；三为两面政策；四为统战。从前靠群众发动起来的力量，自然是有好经验，才能搞得出这一套来。中国的群众运动，昼伏夜动，合乎农民要求，白天生产，又能免于正面斗争，得罪地主，不知是谁参加了。但是要有两面政策配合，我们的这个政策，老年的农民出来做两面派，夜晚打了仗后，白天老农民就去乡公所报告，经过两面派也要出一些钱，革命群众也暗中出一些，敌人也欢迎两面派。这非常重要，只管打，群众的情绪便打下去了，这样能麻痹反动派一

下。两面政策要统战来补充，要有绅士说话，否则老农民的两面派会揭穿的。合乎四位一体政策的，就做得好，否则不是“左”了就是“右”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就是不懂得这点。

这个工作能学习到好多东西，实际上我很多东西都是从鄂豫皖学到的。

位老谈话记录（第四次）

（未经本人审阅）

1959年4月于汉口德明饭店

我的意思座谈几次，让我先讲两次，首先讲重要时期的观点问题，你们搜集的材料关于观点问题很难有适当的東西。正确的当然有毛主席的著作，但著作是为指导当时工作用的，不是为搞历史作的。我谈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给你们参考还很有用。

举例说：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著作是不是正确呢？是正确的，但有一部分不完全正确，因为当时毛主席不是中央主要负责人，是地方负责人，受中央的指导，所以一部分不能完全正确。研究文件就要了解这一点。拿毛主席的三大法宝为例：在井冈山他领导的时期，武装斗争、党的生活是正确的。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正确的。但有一样，统一战线问题，不如毛主席的心愿，那时候没有执行统一战线。当时毛主席思想上是认为中国应该实行统一战线的，只是中央不主张，中央没有一套，他有一套，毛主席服从中央，受中央的限制。在井冈山可能做了若干统一战线工作，但不能宣布统一战线政策，统一战线政策是由中央决定的。

所以虽然有了毛主席的著作，找到了不少材料，但很多问题的观点仍要很好研究，花很大力量去研究，看问题要注意，写文章更要注意。

鄂豫皖苏区的问题，我拟了十多个题目。

第一，1927年大革命时期，为什么湖北的5、60个县中，只有十多个县创立了红军与苏区，其他3、40个县都没有创立红军和苏区，起原因何在？这是几十年没有文件可查考的。

在湖北有三个苏区：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开始只十多个县是

苏区，其他 3、40 个县都没有搞成苏区，主要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是分上、下两层势力，从秦始皇起身，县以上是上层势力，由中央派县长，县里的财政要向上报，县的武装也要受上面指挥，县以下直接受封建地主统治，是地主直接掌握的势力，下面乡公所、区公所等等，不管是什么名义，实质上受地主支配，封建势力既有上、下两层，革命就要有两层的做法。

大革命时，北伐军到武汉，中共中央到武汉，中央临时政府也在武汉，武汉成了临时首都。湖北 5、60 个县的县长都是革命政府委派的。上层势力我们接管了，上层封建势力搞倒了。60 多个县是一样的，但后来创造红军、苏区只有十多个县，其余四十多个县就没有创立，显然这个变化是在下层的不同，不在上层。下层能创造红军，有不能创造红军的。能创造红军与不能创造红军的主要一条，区别在于每个地区革命知识分子占全部知识分子的多数。红安是如此，阳新、大冶也如此。有了这个条件，红军才能创造得成，没有这个条件，红军就创造不成。这是什么道理？因为知识分子多数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知识分子很大数量参加了革命，就把地主、富农家庭分化了。这一分化对地主不利，地主孤立，容易打倒；这一分化农民就勇敢些。假若一个村有二十家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十家地主子弟参加了革命，就把地主分成了两种家庭，有儿女参加革命的家庭和没有儿女参加革命的家庭。这一分化，地主的秘密都知道了，农民看到很多地主子弟参加革命，胆子就大些、勇敢些。这是当时革命迅速搞起来，成与不成的主要关键。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愈多，剩下的地主就愈孤立，农民就愈胆大，这样革命就迅速得很，快得很。江西、湖南也是这样。

抗日和苏区后期为什么不同？条件变了，各地情况变了，全国情况变了，这时中国知识分子整个的分化。毛主席说：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分成两派，一派以胡适为代表，一派以共产主义者为代表。这一分化是从五四运动以后到大革命时期有几年的时间继续了这个分化。大革命时候是军阀专政，不是国民党专政，从思想、组织上控制知识分子，旧军阀不会搞这一套，旧军阀不如蒋介石，所以在大革命前夜，知识分子走哪条道路是相当自由，障碍不大，知识分子信仰马列主义的障碍不大，旧军阀还懂不到这一套，与后来的情况不同。当时看共产党的文件，知识分子到一起

谈马列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不困难，谈什么都可以，由于当时思想自由，革命知识分子很多。苏区后期与抗日时不同，国民党压力大，控制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的广泛发动只有那一段时期才有可能，后来就没有这个条件。第二，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对革命起桥梁作用，那时搞苏区和红军，知识分子起分化地主力量的作用比起桥梁作用还大。这是十多县有红军，其他四十多县没有红军的主要原因。

下去调查都有革命前夜知识分子下乡这一材料，应该重视，不简单，这一问题书上没有，也没有文章，是我们研究出来的，在北京老同志们交换意见都同意这一条，因为这是事实。

二、各地区党组织的创始和逐步的党的建设，以及党起领导作用在当时的特点，谈三个问题：

（一）党的创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过去农村没有党；

（二）党的建设，由不健全到健全；

（三）党的领导作用的特点，当时党在幼稚时期领导特点与今天不同。

全世界共产党都在大城市先产生，然后传播到农村去，全世界的共产党从城市产生传播到农村，有两样：一由工人传播到农村，资本主义国家多半如此，因为农村有工会组织；经济落后的国家多半由知识分子传到农村，不是工人传播到农村，中国、印度，过去的俄国都是这样。你们写苏区党史第一条就要写知识分子下乡，不然就没有革命种子，革命的种子是从城市来。后来到抗日不同了，那时是八路军、新四军散播的种子，是军队不是知识分子了。各地党的创立的总原因不外是这样。这样一说，你们就好写东西，知道哪些材料有价值。

那时的党，农村、红军、苏区的党的领导作用的特点与今天不同，用今天党的领导作用的特点去讲那时就错了，那时的革命运动是半自发性、半领导的，党员少、又幼稚，懂不到什么东西，我当时就是这样，比你们现在青年同志差得远。党在群众中的信仰威信没有如今高，群众对党不太认识，有人说共产党是穿红衣服的，就真有人相信，所以党完全起领导作用不可能，只能起一部分领导作用。民国16年秋收起义，就是几个党员干部商量一下，负责人商量一下，说干就干，没有书记作结论那一套，大家同意了那个人的意见就那样做。群众也不知道我们党内情况，不

知道哪个负县委的责，一切不像今日，都是非正规的，也没有文件指示，总而言之带半自发性，不完全是党领导的，如杀人是事情，今天中央有批准权，省委有批准权，县委权不大，区、乡不行。那时不同，支部党员做主，群众同意决定便杀，不请示可以，县委在附近也不一定找，这是常事。红安县开始的领导人曹学楷，有个人感情作用，思想同情一个绅士，这个绅士也装革命，是个干部，下面的人想杀这个绅士，曹学楷在的时候不敢杀，等他出去一顿饭的工夫就把这个绅士杀了，不算犯法，曹学楷回来，大家一笑了之，杀了就杀了。当时这样的事情相当多，决定打仗也不像现在，不一定要经过政委同意，指挥员决定，只要有几个人同意，一商量说打就打了。

党的领导作用在几个什么东西上呢？中央的政策，号召起大作用，谁都以此为根据，所有参加革命的群众都信仰中央政策、号召，认为照那样做就好，群众提意见也是根据中央政策，当时具体策略、具体计划、具体指示都是没有的，党员干部都不懂，群众也不懂，遇事只要党内几个人临时商量了就干，领导上没有策略指示，这种商量是党内党外合作的，例如打民团，应不应该打？如何打？这不必经过县委会讨论，只要几个党内党外负责同志商量好了，就去办。

党员干部的几个人作用大，组织作用小，容易造成个人信仰，只要那个人能力强些，群众有事就找他多些，有事找个人不一定找组织，成为一般习惯。党员参加了会议，知道党的总精神，根据这些精神来和群众商量。

当时党的干部都是入党个把月，几个月，至多是一、两年的，就是入党一、两年的也看不到什么文件，开多少会，也看不到什么书，因为当时中国翻译马列主义的书少得很，全国也没有几本，因此懂不了好多东西，经验少，懂得的东西少，党内同志在政策知识上与党外群众也高明不了多少。

苏区的党与一个省的不同，省是按县建立起来的，苏区是后来发展的，是斗争的结果。湖北三个苏区是三省的边界，不仅各省是各省建立的，各县也是各县建立的，苏区党后来才有，这给写历史引起很大的麻烦。党内没有正规生活，可是却生动活泼，完全为了斗争需要过党内生活，没有斗争需要就不开党的大会。

党也起领导作用，党的领导作用的特点与半自发性相联系的，今天是全面领导，有一套，所以用今天党的纪律组织观念了解那时党的领导就大错特错了，今天是错的在当时不一定错。

建党的过程，我们要树立这样一个观点，党员也好，群众也好，都是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这是中国党的基本特点，像英国、美国党就不同，他们有很长的和平时期，没有斗争。中国党建立前就有斗争，创立后一直都有斗争，中国党的建设是在斗争中建设的，党员和群众一样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英国党员老是有退党的，今年发展三千，退党的可能有二千五百，甚至有时退党比入党的还多，所以到现在也只有几万人，这一点在中国就没有这个现象，退党在中国是奇闻。中国党全党和每个党员是在斗争中建立的。究竟什么是党的建设和党员的锻炼呢？我认为主要有两条：一条要一年一年，一步一步觉悟逐渐提高，我们几十年的老党员是这样，到九十岁、一百岁也还要提高觉悟，二条是联系群众。最主要的是这两条，党员锻炼好一些的就是这二条提高强一些的，这是指的党的干部。

基层党组织就不同一些，基层党组织，支部的质量高低，党的组织广泛不广泛。各县、各乡是不是有空白地方，完全取决于群众斗争。质量和广泛这两点，在群众斗争好的，这二条就好；群众斗争不好的，这二条就不好。

党员的政治锻炼的比较成熟要什么样的时间？在中国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成熟的时间，首先有毛主席的理论标准，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说：知识分子锻炼得七、八、上十年，苏联党章规定党的监察委员会的委员要八年的党龄与毛主席的理论精神相符合。党的干部比较成熟真正质量好些，没有七、八、上十年不行，这是不会错几远的。中国的经验大致如此。红和专的问题，有人说专家七、八、上十年就行，红得像政治家起码要二十年，这一说法来历不明，我同意这个话，因为刚才说改造就得十年，再加提高当然要二十年，若做专家，在大学毕业后，七、八、上十年就可以了。建党主要是建人，要把人提高。

三、军队开辟地方工作的问题。

中国军队向来起工作队的作用，开辟地方工作，可以做耕种工作，这不是后来有的，向来就有。毛主席叫部队为工作队，抗日初毛主席说枪

杆子可以出政权，枪杆子可以出党……就是指的军队起工作队的作用。先介绍，毛主席领导中央红军从井冈山下来开辟地方工作的作用：主席和总司令从井冈山下来，把江西跑遍了，福建也跑了很大一部分，一年多跑近一百县。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这时打仗很少，至多只占二个月，其余大部分时间是开辟地方工作，起工作队的作用。中国农民革命除少数外，大多是军队扶持起来的，因为农民分散，不容易组织起来，要武装力量扶持，红军工作队一到无仗可打，就做群众工作，作宣传，打土豪，这样搞了几天就有地方青年参加红军，只要在一个地方多游几次，参加红军的人就多了，红军的家属就革起命来。把红军派回去作干部建立游击队，搞起革命工作，发展党，便开辟了地方工作。这是军队开辟地方工作的大体过程。江西、福建很多地区都是这样开辟出来的，是红军开辟出来的。

军队开辟地方工作的条件，湖北比江西、福建好，可惜湖北错过了时间，特别是民国十七年湖北的条件比江西好得多，江西不及湖北的群众斗争好。民国十六年，全国农民斗争是湖南第一，湖北第二，江西差得远。秋收起义号称两湖。民国十六年底，国共分家后，反动派当权，湖北革命势力受镇压，遭杀头，革命人民跑反，如果那时湖北有像江西那样大的红军，很多人不必跑反，都跟着革命了，这些跑反的同志都会起来跟反动派干，假若红军不在江西而在湖北游，那一年参加的红军，总会有万把人，因为当时湖北的革命群众正受打击，都愿参加红军，对这些人来讲就是归队，怎么不好呢？而江西的群众没有经过革命斗争，虽然队伍扩大了，但很多开小差的，头年参加红军一百，第二年只剩得2、30人。湖北三个苏区红军小，条件不够，可惜不能这样做，假若红军大些，17年游一下，有把握发展万把质量好的红军，如黄冈党员数量是很大的，却四散跑反，只是没有红军去，本县又没有红军，若红军经常2、3月去游击一回，这些同志都会到队伍中来。当时党员找红军找不到，红军找他们就容易，有民国十六年的革命基础，民国十七年红军假若在湖北游一趟，发展至少有一万人，那时发展万把人还了得！江西发展少些，但结果也不小。

当时江西红军苏区发展的形式与湖北不同，主席、总司令到井冈山是四千人，主席带九百人，总司令带三千多人，共四千人。主席是9月1号到井冈山的，900人分三个部分组成，一部分由武汉退出的是湖北省

政府的警卫团，是秘密的由共产党组织的，党员多，当时挂的是国共合作的招牌，当时警卫团有两个，失败后，警卫团散了，下面的同志都跟着毛主席。罗荣桓、谭政大将都是警卫团里的人，另一部分是安源武装工人，谭震林中将就是这里的，第三部分是湖南五个县的农民自卫军，由这三个部分组成。总司令的三千多人是二部分，一部分是南昌起义和广东起义剩下来的队伍，另一部分是湖南六县的农民自卫军，总司令从广东到湖南经过就组织了湘南六县的农民自卫军。这四千人到中央苏区起了工作队的作用，大大发展了江西地方工作，当然也打了一些仗。

湖北三个苏区开始都只百把、几十条枪的队伍，贺龙在洪湖只百把条枪，鄂豫皖、湘鄂赣也只有这些，这点枪游几个县就不可能，一个县的民团就能把你搞垮，无力量做工作队，所以把湖北的好机会错过了。如果把三个地方联合起来就可做点事，但地形隔得远，搞不起来。

黄麻在主观上也错过了点时间，搞迟了几个月，若早些出来游，作用也要大些。这些经验应好好总结，文件上找不到的，要我们老头子来谈。

江西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这样做，是正确的，湖北三地的作法在当时也并不错，因为力量小，枪太少。黄麻当时搞四个区：七里区、紫云区、顺河区、乘马区，这个地区搞得不好，把所有的群众都发动了，反动派不是打死就是逃跑，一个人夜里走路没有问题，我当时是县委，夜里走了几次没有关系，那里成了清一色，这四个区的工作做得好，是用集中一点的搞法，苏区只有一小块，不是大面积的搞法，不像江西头一两年有几十个县。

整个中国红军的发展，苏区的扩大是用三个主要方式：第一是红军作战的胜利结果，把几十万人口的地区由白区变为红区，这种作用最大；第二红军起工作队的作用；第三是边区工作的开展，苏区向外扩大，波浪式的发展，不外这三种。第一条是红军打仗，第二条是红军作为工作队，第三条作边界工作，一层一层向外推。第一条是主要的，第三条效果小得多。

写党史主要是写战史，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就是以大的战争时期来分的，写党史主要写政策、战略、政治工作，军队编制战史便可多写，党史绝不是写党员谱，主要是写作了些什么工作，有一些什么政策，主要表现为军队和战争，红军是头一位，群众工作是第二位。

苏区的成长大概要花多少时间？苏区、游击区、白区，当时是什么指标？成为苏区主要是农村中革命势力占绝对优势，反动势力占绝对劣势；游击区是革命优势还未形成，我们只占局部力量，我们的势力还不小，绝对优势没有形成。从开辟到成为苏区大约要两年时间。抗日根据地大约得四年的时间。解放后达到这种水平也得两年多的时间，解放后那个地区没有达到革命势力占绝对优势，那个地区的土改就是假的，一切运动也是假的；要形成革命优势得两年。这就证明消灭封建势力下层要费一番工夫，光上面打了胜仗还不行。这段很重要，对你们写历史很大帮助。

四、苏区的巩固工作和建设工作。苏区的生产怎样？生意如何做？物价如何？教育如何？做了些什么巩固工作？群众如何组织的？我看了几分材料，这次下面调查对这些问题都没有访问好，这一部分忽视了，这么多人调查没有搞好很可惜。苏区老年农民对这些材料都是记得的，写党史这些材料很重要，你们应该补充这些材料，为此，需要再下乡，我这方面没有什么材料，要你们提供。你们只看到苏区有货币、银行，都没有调查银行如何做工作，如何向群众宣传的。苏区作了些什么工作才巩固？作了些什么建设工作，关于这个问题，我几次想亲自采访，现在不行，等两年才能搞，你们应该决定再去补这个课。

五、再解释一个问题，苏区的“左”倾路线是什么东西？毛主席在延安领导整风，若那个时候也像延安那样开展整风的话，毛主席不仅不能领导，还要受处分。关于“左”倾路线，尽读文件，采访好多材料都不容易搞清楚，要靠老头子谈。“左”倾路线的表现：

（一）放弃了统一战线。毛主席说的讲团结又讲斗争，统一战线对象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当时我们假若不“左”倾，可以使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中立态度，那革命就便利多了，红军、苏区的物质条件就好多了。当时红军是宜小不宜大，大了养不活，没有工业用品。开始时几千人还好，后来发展成几万人就麻烦了，就是这个工业品的供应问题，工业品在大城市，皮带、行军毯子都在大城市，要使民族资本家的政治态度中立，红军就不怕大，要东西可以到城市买，使民族资本家政治中立，主要是起物质供应作用，苏区恰恰是缺少这些。几万红军该是需要多少东西！假若到处封锁哪里来？农村只出粮食，没有工业品，当时有些苏区就连铅也没有，

革命大战争就是缺乏工业品，体现工业品的社会基层就是民族资产阶级，要使他们政治态度中立，才能与他们打交道。所以红军只有长征，不长征就养不活。

（二）是战略战术“左”了，打败仗多，军事路线也“左”了。

（三）革命形势估错了，低潮估成高潮。

（四）没领导好抗日，当时说日本占满洲是为了进攻苏联，中央口号、武装拥护苏联，为什么不提反日保卫中国呢？

（五）肃反，党内生活也“左”了。

“左”倾路线表现主要是这些，其他的看书，民族资产阶级的的问题，书上没有，只有口头上讲。

位老谈话记录（第五次）

（未经本人审阅）

1959年4月7日于汉口德明饭店

接到那一天谈，有这样一个问题：苏区如不犯错误，能发展多大。首先估计，全国苏区的总阶段，如不犯错误，能有多大成绩。在总的一个阶段，10年内战当中，完全不犯错误，能做出一些什么成绩出来。最好与抗日时代比，八路军正规军有九十几万，人口九千多万，这是总成绩。显然红军不能达到如此。为什么？客观条件不如，抗日是个高潮，苏区是一个低潮，特别是城市。抗日时主观力量强多了，有毛主席的领导，党的经验多了，有大批成熟干部。因此从主客观说，无论如何成绩赶不上抗日，更不能达到全国胜利。有的说能达到全国胜利，那是乱说。抗日阶段又不犯错误，因此苏区时代两个九都是达不到的。苏区和红军阶段，最盛时全国达到三十二万多军队（包括地方武装游击队在内），后来垮了，苏区损失十分之九，是犯错误的结果，也有环境变坏的结果。

鄂豫皖苏区五百万人口，上十万红军，完全不犯错误是可能做到的，再大不可能。中央苏区最盛时三百六十万人口，军队十二万，鄂豫皖苏区最盛时二百九十万，军队六万（包括地方武装）。

所以，估计苏维埃阶段总成绩的时候，就应看到中国革命是长期的、

曲折的、艰苦的、不平衡的。一个革命高潮不能胜利，中国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国又大，要有几个革命高潮才能胜利。文件中关于这方面的观点是由错误的。

“八大”肯定中国革命的胜利得抗日的胜利才能胜利，没有抗日的胜利不能胜利。这是新的结论。连十月革命在内，没有大的国际性的战争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国际性的大战争，把人民精神动员起来，没有世界战争不能动员大多数。十月革命与第一次世界打战联系，群众发动起来革命才能大发展、才能胜利，没有此条件不容易。过去，特别是苏区“左”倾错误领导说：中国革命没有李立三路线马上能胜利，这是瞎说。

二、鄂豫皖反四次“围剿”的问题

鄂豫皖的反四次“围剿”，事实是暂时失败了，红四方面军长征，敌人占了大部分地区。现在回顾来总结一下历史，鄂豫皖反四次“围剿”是不是能胜利？

徐向前同志主持了几次讨论，认为完全可以胜利，因为犯错误，所以才失败。我跟他交换过两次意见，以后还要交换，这问题还要采访，以后做结论。中央也不能作结论，因为中央对这段情况不够了解。

我后来补充意见，认为：不犯错误反四次“围剿”可能胜利，但不犯错误也可能不胜，只是不犯错误受的损失可能小一些。总的说来，我的看法是胜利可能大一些，不能胜利的可能性小一些，要有这两个说法才好。当时反四次“围剿”可能胜利的条件有两点：（一）红四方面军战斗力非常强，勇猛得很，战斗力强得很，以后几年都没有赶上这种程度的战斗力。调查、访问会有这方面的材料，我们搞地方的感到，搞军队的同志更会具体深刻。（二）再一个是群众潜在能力很大，比中央苏区大，人口比中央苏区只少五、六十万。红军却只有六万人，比中央苏区红军少一半，这说明后备力量比中央苏区大。可以扩大新兵还很多。那时候，内部工作不是肃反犯错误，群众也可能在别的方面发挥作用，这是胜利的两个特别的优点，一个是部队的战斗力强，一个是群众的潜力大。如果用上，那时能胜利的。但即令不犯错误还有不胜的可能性存在，就如三次大战一样，三次大战的可能性不大，但三次大战的可能性还是有。不胜有可能。刚才说不胜的可能小一些，但还是有这个可能，不胜的可能有二个基本困

难和弱点：（一）鄂豫皖地区狭窄，有陇海铁路、京汉铁路，交通非常便利。照毛主席的理论：中国地区广大，有回旋余地。在这地区就不行了，大兵团作战不容易周转。黄安是苏区的重地，从汉口出兵到那里容易得很。要胜利要抢最初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不打胜仗。敌人就进去了，便困难了。只有趁半个月的时间迎头痛击，才能得胜。（二）当时粮食缺乏，敌人趁六、七月进攻，新谷还没有割，头年的粮食快吃完了，等着收新谷子，军队没有吃的。当时假若领导得正确，也难把这两个困难解决得好，这是不能胜利的原因。但是，这两个困难假若不犯错误，还是有办法能解决的，（1）粮食问题，可以动员群众节约粮食，几百万民众供几万军队的粮食，民众一天假若吃半斤粮，蛮可以供给。（2）地区狭窄的问题也可以解决的，半个月不胜，敌人进攻，如果群众各方面准备得好，转个小圈还可以打胜仗，但一犯错误，错误与困难结合当然就失败了。

当时犯错误影响了反四次“围剿”的不能胜利。究竟反四次“围剿”的失败，哪个错误最大？现在讨论起来还有不统一意见，我个人的看法，在许多错误中是肃反的错误大一些，是最大的一条。有些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在所有错误中，肃反故然是错误，但肃反促进了失败，不是最大的。为了对肃反的错误估计，肃反的错误对反四次“围剿”产生的坏影响，怎样来抽象的说明，我和一些同志费了好多时间研究。把我的研究结论告诉你们：（一）我们肃反打错了，但没有因为肃反影响群众的革命立场，群众没有因为肃反错误而改变革命立场的。革命还是革命的，不仅当时没有改变立场，现在访问还是没有改变立场，有些家属被肃反肃错了，就是把他当反动家属到现在也没有改变立场，这就考验出来群众的觉悟和革命的坚定性，这在全世界都有意义。（二）但这对群众有坏影响：一、对领导不信任，不是一般的不信任，是严重的不信任，华家河一带群众说：保卫局是地主、富农钻进去了，搞反革命，说领导人都好，就是不该肃反，是反革命进我们里面开搞反革命活动。二、革命积极性、干劲大大降低，各种工作都松劲，因为杀人太多，杀了一些自己人，所以群众干劲不大了。这三条的评价很要紧：（1）群众没有因为我们犯错误改变立场。（2）群众对领导严重的不信任，这是合理的。（3）干劲降低。杀人太多，群众垂头丧气，上面说群众潜力很大，这里是干劲降低。由于肃反

问题，把群众的潜力至少一半化为乌有，削弱了力量。有些地方连一半还不止，部队好一些，削弱不大，因为有组织性、纪律性的关系，主要是群众。群众力量有一半不算数了，这是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个错误就是中央局对于形势有“左”倾盲目的估计。因而对严重的“围剿”没有作足够的准备。这个斗争当时是全国空前的大斗争，没有准备，怎么不遭受失败呢？这次“围剿”从鄂豫皖开始，蒋介石亲自在武汉做总司令，调了几十万兵力，比中央苏区前三次“围剿”的兵力，规模更大。这个斗争领导机关是忽视的，如张国焘认为敌人的七个主力师，中央苏区可以搞掉它两个。鄂豫皖搞掉两个也不成问题，剩下三个“围剿”还算什么？沈泽民认为现在中国主要是打帝国主义，我们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不是主力，已成偏师了。毛主席写文章还用过这儿提的“偏师”的字眼。右倾盲动主义尽想好的，不想坏的，对战争没有准备或很少准备，怎么不失败呢？

当时的准备是扩大三万红军，三万担粮食，达到这两个三万没有问题，但实际准备相当的空，没有认真去做。肃反伤了群众的干劲也很难把这工作做好。当时敌人是有准备的，在几个月以前国民党在报上已经登了。因为他们要调动几十万兵力，这件事已是公开的秘密，但是我们没有准备。我们前几个月就应准备好，打仗要有上万的新兵及时补充，一编入连队就能打仗，这点鄂豫皖群众的潜力是做得到的，群众以前在地方上都有训练，与老兵配合就能打仗，但是没有这样去做。粮食虽困难也应该前几个月准备，是能准备好的，也没有准备。部队的整顿至少要一个月、两个月的工作。这个时间是有的，结果错过了。没有很好的准备是当时失败的原因。

已经有肃反的错误在先，没有准备的错误在后接着，这两个错误加起来这必然是失败。这是反四次“围剿”大问题，应该这样看它，我先谈谈这个大问题，便于你们访问。

三、红四方面军长征的问题

红四方面军长征，即是四次“围剿”没有冲破，根据地形势对我们不利，部队留在原地更削弱，所以长征是对的，是正确的。要错是反四次“围剿”的错，不是长征的错。既然失败了就应该长征，长征到川陕边是

好得很；人多、地形好、政治条件好是红军发展的地方。现在为红军整个长征的问题要提出个理论出来，中央认为：中国南方红军整个长征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不是错误，而是客观形势决定的。不是中国红军在南方领导不正确的结果，而是客观条件决定要长征，错误固然有，但并不是长征错了，这是中央口头说过的论点。当然，这个问题还不能写文章，但历史必须晓得这个问题。

南方几个苏区，免不了长征，长征的理论是一个什么基础？是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革命高潮，革命低潮等很多要谈谈，今天我不谈这些。今天谈与抗日必出两个重要条件：第一，当时农村根据地没有工业品，军队大了不能持久。几千人、几百人能持久，搞几年都可以。到几万人的军队无工业品就不能持久，要工业便少不了民族资产阶级，当时工业品是两个阶级有：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可以使他们中立。假若使他们中立，我们还能得到些工业品。苏区没有工业品，这一条限制苏区不能养很大的红军，红军大了没有工业品只好走，这就是要长征。这与抗日时的条件不同，抗日时各解放区什么工业品都能买到，中国工业品不仅能得到，香港、外国的工业品也能得到，有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第二，与抗日不同，没有广泛的革命高潮，只有局部的高潮，鄂豫皖只有两千万农民的地方是高潮，不像抗日时期是全国革命高潮，向外一层层大扩张，办不到。那时只有小块几个革命高潮，没有大块的革命高潮。这两个条件规定了红军迟早要走路，必然要长征。

但领导犯错误没有影响吗？有影响的，不犯错误长征红军保持的数量要大多了，到四川、陕北不是剩下三万红军，至少能保持十多万人。留下来的游击队，也大得多，好得多。由于领导犯错误，结果只有二、三万红军，太少了。三年游击战争我们主观力量就差些，这些犯错误的恶果。假若留下十万红军，抗日的条件就好了，三万红军与蒋介石谈判与十万红军谈判，条件就完全不同，军事力量大几倍嘛！这里我不仅是说了鄂豫皖，而且全国南方的红军都说了一下：

四、红四方面军长征后，以红二十五军为主在鄂豫皖斗争的两年。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斗争两年，真是艰苦奋斗，红四方面军长征把主力带走五分之四，红二十五军留下是五分之一，力量大大减弱，留下力

量正确的、应该留。

反“围剿”失败使原来苏区二百九十万人口缩到不满七十万人口，四方面军过铁路不几天工夫就只剩下七十万人口，剩下大山、山区地方，交通便利的地方敌人占去，物质条件困难，以前是大后方作战，这时候是小后方作战，蛮困难的局面。在困难的前提之下，今天来总结红二十五军二年任务，发生三个战略问题：（一）敌人力量大，我们力量小。大多数苏区被占领，任务是坚持斗争，假若恢复苏区是不可能的，敌人打不跑，能坚持多久？坚持到最后还是要长征的，这是个战略问题，因为恢复不了苏区，坚持的时间满了以后，仍然要长征。（二）苏区只剩下七十万人口，其余是广大的白区，作战不能死守苏区，要苏白区轮流作战，这个月在此，下个月在那，不然，环境便改变不了，老在苏区作战便要老打败仗。（三）既要游击战，也要运动战互相配合。

当时省委领导在这三个战略问题上只有一个自始至终是正确的。其他两个没有正确解决。正确的是游击战、游击战配合。坚持多久长征、解决得不正确，白区作战与苏区作战配合这问题解决得也不正确。这两个错了的，是怎样转过来的呢？到一年和一年半的时候，省委觉得要长征，不长征更削弱了。不好，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在经验中才摸索出来苏白区轮流作战问题，这个问题花了一年工夫才解决，徐海东有功劳，主要是他摸出来的。

一个问题花了一年半的时间，一个问题花了一年的时间，这个问题便考了领导，我当时是省委的重要委员。花这多时间的原因：（一）我们领导是土包子，理论不知如何使用，不晓得全国形势，不懂白区的情况和知识，没有全国领导水平，只懂自己的一块，迟到一年到年半吃了很多亏才解决，这真是水平低，怕到白区政治、经济领导不容易，这是水平和情况两种的限制。（二）地方主义、本位主义思想束缚了我们，总舍不得我这一点，留恋这一点，我是苏区人，我是苏区部队，我为苏区群众斗争。被保守思想束缚，所以没有解决这两个大战略问题。摸索了好久，化了很大的代价。这三个战略问题有两种原因：（一）土包子，对全国问题不大懂或懂得很少。（二）地方主义，留恋本地，本位思想束缚，开始有人反对长征的。

另一个重大错误是继续有肃反的错误。以往的错误只改了一半，虽然没有红四方面军那样严重，但仍有错误，如把73师整师的党解散，不承认它，重新登记，把麻城县，全县的党解散，重新登记。肃反错误给红二十五军起了很大的影响。但红二十五军确实作了长期艰苦的斗争，消灭了大量敌人，了不起！主力小、地方小、敌人长期包围、群众没有饭吃，红二十五军坚持两年的成绩很大：（1）为全国培养了一支优秀的战略部队，起了很大的战略作用。红二十五军到陕北与毛主席会合，毛主席到陕北一年多主要靠红二十五军，当时假若没有红二十五军，全国就差得远，那时大红军没有到陕北，毛主席带的部队只有五千二百人，连毛主席、刘少奇、朱总司令和周总理都包括在内。干部多，战士少，不能打什么仗，而且长征了十一个省之后，很疲劳。陕北游击队伍七千人，数量还大，但是游击队不能打大仗，牵制敌人一个团也牵制不了，所以打仗要靠红二十五军，当时打了几个好仗。没有红二十五军连中央警卫都困难。这时一年半的主力是红二十五军，其他的部队，象贺龙的部队都在外面，毛主席的队伍只五千二百人，有些老弱。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是起了战略作用，不然全国便要差好远！

（2）没有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两年的作战，三年游击战争就困难，就不能培养出大批游击队，没有红二十五军的艰苦奋斗，子弹、武器从哪里来？红二十五军作战，夺了敌人的子弹、武器，培养了、武装了游击队。

（3）红二十五军给敌人很大打击，长江一带消灭了张学良一整师；盘家河一仗消灭了马回子一个旅了，副旅长提了几个，给敌人很大打击。

这一段把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的两年功劳和主要错误、错误的主要原因说明了。

五、红二十八军的三年游击战争

红二十五军长征是正确的，只有鄂豫皖有，别的苏区没得，鄂豫皖长征两次，红二十五军是第二次长征，搞了两年才长征，留下三年游击战争是红二十八军。留下的环境比其它苏区都坏，其它苏区一次长征，大队伍走了，所以敌人也只有小力量清乡，鄂豫皖二次长征，敌人留的队伍也多，数全国第一位，国共合作谈判的时候，当时是我去谈的，卫立煌是“剿匪”司令，当时所有南方十几个区，其它区敌人力量都很弱，只有我们这个区

的力量最强，敌人留大力量对付我们，三年游击战争物质条件更苦，红二十五军在时就靠打粮过日子，红二十八军打粮都没力量了，变得这样苦！小后方不能存在，因敌人力量太大，只能把病号、小的、老的分散隐蔽在老百姓家里，群众普遍饿肚子，没有粮食，饿饭饿死了好多人，红二十八军不能做交通，敌人力量太强，是单纯游击战的局面。结果，南方十几个苏区，最后以鄂豫皖成绩最大，编新四军证明了这一点，鄂豫皖力量最强，整个新四军有四个支队，高敬亭第四支队就占了四分之一，其它十多个区只有三个支队。从实力老战士来说，以鄂豫皖老的多，其它新的多，老的少。

二十八军从斗争中摸索出来的政策非常好，主要是我总结出来的，工作是他们做的，我起名字叫四位一体的政策，这个好政策得到了好多胜利，即（1）游击战争。（2）昼伏夜动。群众夜里斗争，白天生产，不动，适合敌强我弱，又适合群众又斗争、又生产。（3）两面政策。与抗战一样，红二十八军游击时，国民党的乡公所、区公所所要粮、要米、要捐税，红二十八军找几个老实农民应付一下，多少缴一点，把一些人当两面派，遇到国民党来是“好百姓”，红军走后就对他（按：国民党）说：“红军来过，我们要送信给你们，但红军不准”，就应付过去了。（4）统一战线，开明绅士到乡、区公所说话，说是红军做的事，不与老百姓相干。因为是四位一体的政策，所以工作做得好，访问老同志说的内容不外是这些东西。再说红二十八军在大别山四十多县摆七十多个便衣队，靠四位一体政策做事，红二十八军主要是便衣队做群众工作，打仗少。

红二十八军大游击队作战也很强，特别强，特别是表现在一个班单独作战强，你们在调查、访问中有好多生动事迹。每一个班都有轻机枪，有的班有两挺机枪，有时守一个山头，假若地形好，一个班守一个山头，敌人来一旅打一天不打紧，因为有机枪。敌人估不透，作战力强，一般人不怕打掉，打掉了可以单独搞几天。另外，没有炮能打下碉堡，一天打几个碉堡，靠勇敢。化装成国民党军队，混到民团碉堡里去，胆子大，进碉堡，割掉电话线就搞下来了。到河南显了次本事，到潢川随县，这里水围子多，四围是水，靠几道桥水围子旁是茅屋。红二十八军练本领，一天打灭四十多个水围子，把一个石头，用棉絮一包，加上煤油、点火在水围子附近地方像丢手榴弹一样，丢上茅屋，一烧起来就胜利，所以部队战斗力很强。

红二十八军两方面的工作做得好，四位一体政策、作战都好，为什么从前不能这样呢？有三条重要原因：（1）先有红二十五军军事、政治上都给予了锻炼，帮助了二年。红二十五军作战、政治都好，家属都受敌人镇压，阶级仇恨深，政治锻炼好。（2）红四方面军长征，留有七、八年的老战士和肃反肃错了的老干部，至少有五年军龄，不是新战士，红二十五军没有动他们，肃反有好多营级干部、连级干部后来摘掉他们肃反的帽子，当作战士，这是别的苏区没有的，这是强得很的原因。（3）全国苏区的军官，算鄂豫皖苏区的将军多，现在全国统计，少将算鄂豫皖苏区最多，原因是干部政策，鄂豫皖大胆、勇敢的提拔农民是一贯如此。中央苏区没有工人出身的当军长，甚至没有师长，至多是团长，鄂豫皖不同，只要勇敢，就可提拔当高级干部，这对士兵的鼓舞很大，中央苏区不同，干部多是知识分子，鄂豫皖农民勇敢就可当干部，军长是农民，这是作战力强的原因。

原因是：（1）红二十五军帮助两年，（2）红四方面军留下老战士，（3）提拔勇敢农民当干部的干部政策。二十八军也有大错误，重要一条是继续肃反，与造成高敬亭的军阀主义恶果两条，肃反把许多很多好干部杀了，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由这个形势、环境造成高敬亭个人势力。后来发展反党、反中央，这样的军阀主义。这是红二十八军这一大段的历史。

我谈得不多，但两次谈的是文件上没有的，整理出来可以给别的部门看看。北京讲的没有这两次讲的重要。我的想法：把历史的重要观点和重大事件介绍，不仅对你们编大事记有用，对访问也有用，访问重要干部，把我谈的先给他们看一下，也会有些启发。

位老谈话记录（第六次）

（未经本人审阅）

1959年4月29日于汉口德明饭店

上次跟同志们讲了一下鄂豫皖苏区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今天专门谈三年游击战争的同志文化特别低，不光是活着的，连死的全没有知识分子，清一色的农民，连高小程度都没有，写历史就很困难。我虽然没有参

加，但前后的情况了解一些，可以提些意见。将后访问这段历史，只有武汉和华东两个地方的干部多一些，搞便衣队的在武汉，搞军队的在华东，如林维先同志，采访要着重这两个地方。

三年游击战争是么样的斗争呢？那是很艰苦的斗争，抗美援朝虽然艰苦，但是多数人参加，后面有胜利的大国家撑腰，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人数少。后面一点东西也没得，完全失败，一齐死掉容易得很。三年的时间不算长，苦日子确实不好过，解放后十年好过得很。三年游击战争我们是劣势，要解决这个问题，斗争却要坚强，又要巧妙，也就是说，即要有坚强的精神，但做法上却又要巧妙。南方各省的游击战争，都具有此，所以成绩很好。对敌人斗争坚强是主要的，但只有坚强，没有巧妙就难坚持，难发展，结果是壮烈牺牲。虽然敌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结果自己还是牺牲了。只有加巧妙才能不败，不牺牲，才能发展。中外历史上的革命斗争都要具备这两条，巧妙在军事术语上就叫机智嘛，南方游击战争有此条件的，成绩就好。整个南方游击战争是我们几十年中国革命斗争中政治上最深刻的斗争，规模虽然不大但斗争很深刻，是什么样的斗争呢？是全家一齐对敌人的斗争，是拼命的斗争。三年游击战争，地主要消灭农民全家才甘心，我们这边也一样，要消灭地主全家才甘心。这个斗争是对本地敌人的残酷斗争，是影响后代的，地主想不搞掉农民全家就莫想有后代，农民也想，不把地主全家搞掉，也莫想有后代，这种残酷的斗争是抗日战争不可比的，就是以前苏区大斗争也不可比的。这是全家一齐拼命的斗争，阶级斗争到此场合算是到了极点。

这里说一重要问题，中国的农民运动，在外国也一样，是以阶级仇恨为主，不是以政治觉悟为主。三年游击战争时，连领导干部在内，不晓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无产阶级专政怎么办，不懂这一套，是什么东西做主要的呢？是阶级仇恨做主要的，当然政治觉悟也有。抗日战争时农民运动是民族仇恨为主，政治觉悟在第二位。现在农民是社会主义政治觉悟放到第一位。那时不是阶级仇恨达到顶点，那些事如何做得出来！三年游击战争的军队政治上最坚强，人人坚强，现在几百万军队只有部分人坚强，不是人人坚强，那就是有阶级仇恨这个东西，抗美援朝也是人人坚强，是民族仇恨，斗争厉害得很，中国几十年阶级斗争，阶级仇恨提到最高度

是三年游击战争，其余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这个斗争不是创造了好大的部队，建立了好大的政权，但在人民中建立了共产党的威信。我们党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和三年游击战争两件事上建立的威信最大，在失败当中仍然坚强领导革命，群众晓得共产党不怕死。有的地方三年游击战争结果只剩几十条枪，但却在人民群众中建立了大的威信。所以政治工作，部队政治质量要好，就要在斗争中锻炼，政治质量锻炼好的是三年游击战争，大红军不及它，大红军哪来这样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全家一起拼个你死我活，坚强是这样造成的。抗日开始，内战结束改编是三万红军，不能说人人坚强。三年游击战争是人人坚强，大红军不及它。

再说三年游击战争的特点，除政治坚强外，还有军事坚强。政治坚强，军事坚强往往是一致的，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南方几省游击队伍，军事最坚强的是鄂豫皖地区。政治坚强各地都是一样，都是与本地地主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军事坚强数鄂豫皖第一名，下面说原因。军事坚强不经过久的锻炼，时间不长是搞不好的。世界上武装斗争，工人罢工搞不好就失败，不是政治上不行而是军事上不行。军事上不坚强便会壮烈牺牲，得不到结果的，所以要军事上坚强，军事上要有一套本领，鄂豫皖的条件好，有机会锻炼一套军事本领，别的地方差些，缺少这个条件，这个问题便简单介绍了南方各游击区艰苦奋斗的特点。

我要指出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有三大特长。第一，有几十个县的便衣队活动，又是武装斗争又是群众工作，规模大。第二，游击队主力部队战斗力强，打仗像老红军一样。第三，开辟白区的工作大，比其他兄弟部队大得多，访问时要注意这三大特长。

下面我再谈三个小题目，就是鄂豫皖地区三年游击战争，部队和干部所练出的好多特长，是与别的苏区不同。由于得到红二十五军的两年培养，这个作用大，别的苏区是一次长征只有鄂豫皖地区是两次长征。四方面军是很早长征的部队，大部队长征后留下红二十五军，又能打游击又能打主力战，搞了两年才长征。两批长征后才是三年游击战争，加起来是五年游击战争，也就是25军帮助搞了二年才长征，28军接25军手再搞游击战争。红25军两年对红28军作了培养工作，老大哥培养弟弟，别的苏区

没有这个条件。鄂豫皖地区有此条件得到老大哥的培养，所以有些东西显得强些。红 25 军的培养工作在四个问题上起了作用。

一、干部、战士对游击战争这一套工作都大致相当熟练了。别的苏区搞游击战争却像不大熟练的工人，而鄂豫皖为熟练的工人，有一套本领，当然熟练不完全是这两年培养的，后来又有增加。特别是军事上的培养，因为三年游击战争时，部队分散得很远，昼伏夜动，开会不成，一个星期的训练不行，单靠三年游击战争好多军事上的东西无法培养成。红 25 军是大部队，可消灭敌人整旅，能搞个把星期的训练，有交通联络，能发文件，这样能把军事上的能力提高。单纯的游击战争，像湘鄂赣便不行，不能有整个星期的训练，交通来往不便，交流经验困难。鄂豫皖 25 军就有这个条件。我举一个军事知识，别的部队能带些人独立军事行动，独立指挥的只有几十个人，最多一百人。鄂豫皖能这些事的是好几百人，好多排长可以了解地形、判断地形指挥作战，搜集粮食，宿营地点，能独立指挥。便衣队是人人指挥。因此小部队能对立活动。这个条件是红 25 军培养的。

二、第二个条件。到处游击战争都要联系群众。鄂豫皖地区的三年游击战争联系群众更好一些，规模更大一些。红 25 军就是这样干法的。联系群众要时间的，时间久了联系要强一些。再说 25 军能作大战，对群众的威信大，联系群众多，这一条也得了 25 军的力。

三、红 25 军不仅供给了广大游击队的武器和弹药，把新成立的便衣队、游击队武装起来，而且还培养了红 28 军能自己取得武器的本领。当时我们不愁武器缺，还嫌多了，缴来的机枪毁掉，子弹始终不缺，一缴就是缴敌人一个连、一个营，别的地方搞不了，所以武器、弹药困难，而鄂豫皖经常有。红 28 军这个本领也是 25 军培养成的，单靠 28 军不行。

四、第四条作用，红 25 军没有走时，就把白区工作开辟了，打开了一个门路，没有 25 军的打开门路，单靠后来搞白区工作便会小些卖力些。

所以三年游击战争的成绩比较强些，就是红 25 军培养了两年，起了四条作用。

红 25 军的两年，带来了四个好处，也带来了两条困难，这也是与别的苏区比较，一个是粮食、物质条件困难。敌人注意这个地区，掠夺破坏

厉害，百姓生活更苦，一个是斗争激烈，25军时斗争就激烈，由于敌人特别注意这个地区，敌人比别处多得多，卫立煌担任“剿匪总司令”，驻扎在六安，用很大的部队“围剿”我们。前面四条给28军带来帮助；后两条给他们带来困难。

下面再接着分析3年游击战争红28军处的环境。

首先，没有吃饭的来源，这个条件威胁了部队的生存。部队是人组成的，人总要吃饭。红28军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没有饭吃，三年游击战争开始便是没有吃的。由于红25军作了两年艰苦的斗争，敌人破坏很厉害，群众没有吃的。我是随25军一起走的，这时群众已饿死了好多人，你们访问过天台山，当时我在那里亲眼看到几十个饿骨尸，有床上睡的饿骨尸，椅子上坐着的饿骨尸，还有井边打水的饿骨尸，苏区内饿死好人很多，有名的红军围攻七里坪，万多人的部队吃草、吃菜，群众送的麦谷子用菜一合，用水桶挑去给部队吃，像猪吃的一样。当时我在后方负主要责任，情况了解，那时伤病员有点苋菜吃，那就是大优待，比现在汉口吃大酒席还好，好人吃苋菜是不可能的，我们部队在黄麻地区，当黄金树叶子一长出来便吃了。又一次我在檀树岗一家老百姓家里住，他们没吃的，却把糠头磨得细细的，做成粑优待我，真不好吃！三年游击战争开始时就是这样的状况，后来更严重。革命部队供给来源有三：依靠群众供给粮食，武装夺取粮食；再就是毛主席说的生产粮食，是和平时期生产粮食。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这三条都行不通，群众没有供给的，群众饿饭，没有武装夺粮，自己力量小，环境不太平，没有条件生产，因此困难到极点，严重威胁了部队的生存。后来的同志摸索出一条经验，比红25军走好得多，政治意义很大，就是要地主向红军交公粮，下地主的条子，要地主自动送粮，二百担租送来一百担，一百担租的送来五十担，不送就烧他的房子，杀他的人，送来的是守法安全无事。地主叫买安，生命财产就有保障。我们部队主要靠这一条养活。这一条是摸出来的政策，好得很！第一是用轻便的法子养活了部队，这一个政策导致了统一战线的大开展，培养了大批开明绅士，交了公粮我们红军去了，绝不侵犯。开始两回，绅士躲着不出来，只叫雇工、老人应付一下我们，后来看到红军讲信用，就大胆了，出来招呼我们，我们也信任他们，把病彩号安置在他们家里，通过他们探

听敌情，从缴公粮发展到统一战线，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也造就了莫大的政治成果，开辟了统一战线。我后来转回鄂豫皖地区，认为同志们摸索出来的这些经验是好极了。这个统一战线不是中央指示的，实质上是一样的，是从实际斗争中摸出来的。

再一问题是苏区的群众遭大灾难，斗争艰苦，群众斗争更加强和白区工作的大发展。你们有人访问过的，那个灾难确不小。董老常说小的红安县有十万人牺牲。民国十六年四十八万人，解放只有三十八万人。一个县损失十万人，整个鄂豫皖损失一百多万人。你们访问好多村庄损失80%，三百人口的村庄剩下五、六十人。大批死亡，有饿死的，有被敌人杀的，财产被抢得一塌糊涂。财产不说别的，连做饭的锅，走几个村庄没有一个整锅，锄头没有，牛更损失大，大别山常见几个农民代牛耕田，受的损失到现在还有痕迹看得到，由于党的领导，群众斗志强，始终坚持了斗争。

另一方面，白区形势有好转，变化有以下几点：（1）苏区的时候，白区边界敌军多，民团多，红军长征后，敌军没有那样多，民团减少了。

（2）整个白区国民党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比民国十六年还要厉害得多，实行保甲制度。这样一来引起群众起来斗争，是形势好转的根本条件。（3）是红军和苏区的影响。这几点是白区形势的好转，有大大发展的可能。当时开展白区工作不是这样分析形势的，没有这个水平，而是从实际中摸出来的。这也做得好，摸索为三年游击战争很重要的一个成功条件。

再一个问题是敌人势力很大，有民众守的碉堡，民团守的碉堡，军队守的碉堡，密得很，敌人驻点很多。再一点是军队没有后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是军队实行小后方，不能搞大后方，红25军有小后方，因为有军事力量。但三年游击战争鄂豫皖没有小后方，别的省也没有，伤员分散到群众家里隐蔽。所以没有后方的作战。武器弹药能自给是个好条件。现在是从政治形势来分析，说明我们部队很强，影响形势的问题，影响力量对比。而对我们有利。再一个整个便衣队部署到几十县，河南信阳以西、以北，安徽搞到望江、宿松、太湖。一起几十县，像下棋一样，一个队管一块，大部分是白区，小部分是原来的苏区，苏区只十多个县，而便衣队分布四十多个县。

分析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形势、特点有莫大的困难，但也有有利的条件。下面分析红 28 军本身。

先分析力量，28 军的力量是两个拳头，一个是便衣队，一个是 28 军大游击队。这也是当时的组织系统，一般党政军民的分法，这一套不适用。访问要注意这个特点。

28 军是游击队的主力，他们是怎么样活动、作战的？战斗力很强。我来分析一下和举两个战役。我没有参加是听到别的同志讲的。

部队常常以一个排一个班打阻击战，占了个好地形就可坚持，天亮打到天黑，敌人不敢攻，有时敌人是个把旅人不敢攻，这样的有好几回。为什么？我们一排人有好几挺轻机枪，子弹多，打起机枪来敌人不知道有多少力量，所以那时部队能单独行动。指挥人强，排长、副排长都会指挥，单独作战。在外面游击十多二十天不在乎。部队中很多是老战士老干部。两三人占一个山头便能独立的打起来。所以有很强的战斗力，再就是那时候碉堡多得很，没有炮是不好办的。但红 28 军打下很多碉堡，不光是民团的，也打下了国民党的，就是靠勇敢，化装成国民党的军队，大着胆照直进去，敌人估计不到他们是什么人，以为红军不敢这样。进了碉堡把电话机已掌握，械一缴就占了。就是这个法子打下的不在少数。这样的事当然要靠勇敢，那时候勇敢的不在少数。常常如此。豫南多水围子，四方面军，25 军打得不多，要炮打，怕耽误时间。到 28 军打不费力，用石头层棉絮用线一包，加煤油掷过去。水围子附近的茅屋便烧起来了，烧着一个便打下一个。有一天打下个 46 个。大红军要用好多炮才打得下来！这些战役都说明战斗力强。我是没有参加过，战役的情况举不出好多，只是听到些，你们访问参加过的人，他们可以说出好多东西来。

28 军战斗力为什么是这样强法？这一段请大家注意，我费了很长时间才分析出来。

第一，红 25 军那两年的培养和锻炼。

第二，五年中把群众联系好了，群众帮红军帮得好。部队怕掉队，怕彩病号有时有顾虑，才不敢打。28 军没有这个顾虑，彩病号放在群众家里。有群众、便衣队照管，不怕掉队。一个人掉队也能打，又有群众支援，能找到部队，所以群众培养好。

第三，四方面军走时留下了老战士、老干部，25军也留下了老战士老干部，28军的战士，有四、五年党龄的。因为肃反的原因，肃反没有杀的，就罚苦工、背米袋，做了两三个月后就当战士。他们过去是干部，有的曾当过团长，个别的像梁重学当过师长，这时带一班人，这样怎么战斗力不强？人虽少，但其中都是老干部、老战士，战斗锻炼多。

第四，鄂豫皖长期是提干部重勇敢，勇敢就提拔，不勇敢就不提拔。开始时就是农民当干部，当指挥员，影响到现在部队中这个地区出来的人当将军的多，当军、师长的数鄂豫皖的最多。这里的干部政策有两条：大胆提拔农民战士当指挥员，再就是谁勇敢谁当干部。当时有弱点也有争论，但对全国有好处培养了好多干部。中央苏区在江西、福建的时候，没有一个师长是工农，都是知识分子。鄂豫皖长征的时候，当军长的有好几个是农民，师长更不用说。知识分子指挥员究竟怕死一点，农民就比知识分子勇敢。鄂豫皖当师长的死得多，别的地方的死得少，就是这个原因。这样把部队的勇敢作风炼起来了。鄂豫皖农民当将军的多，一贯是如此。不光28军，25军、四方面军都是这样。

(1) 红25军两年的锻炼。

(2) 群众配合得好，培养得好。

(3) 四方面军、25军留下的老战士、老干部多。

(4) 干部政策是尚勇敢，大胆提拔农民。这四条是28军战斗力所以强的根本原因。

红28军的活动的办法，编制、变更，我不大了解便不谈，参加过的同志可以多提供材料。

再谈便衣队。首先，谈便衣队执行政策，前次讲的四位一体政策：1.游击战争；2.昼伏夜动；3.两面政策；4.统一战线。四方面配合起来好便衣队的活动。组织形式要靠实际参加的同志谈，我不多说。便衣队的作用大得很，成绩主要是靠便衣队做出来的。这样的干部武汉多些，华东少，他们在主力中搞得更多些，需要找一些同志大大补充这方面的材料。

肃反的问题，28军如不犯此错误，成绩要加个倍还多，留的干部也加个倍还多。肃反错误超过全国其它地方，别的地方有点点，但要好些。这个错误把许多成绩破坏了，人也少了！肃反在群众中的恶果，我简单重

复几句话，肃反的恶果，不管 25 军、28 军、四方面军都是这三条：

(1) 证明工农群众觉悟高。无论把他家的人杀了，但几十年直到现在革命立场不变。访问时便更能证明这一点。

(2) 就是因为肃反群众怀疑严重地不信任肃反领导人。你们在访问时，群众中便有这样的说法，地主富农钻到革命里面来故意杀人。

(3) 民众革命干劲。做工作的积极性大大降低。抗日时，我听农民说，不是肃反错了，早就打到北京去了。其实，当时北京不重要，但说明群众胜利信心大。乱杀了好多人，活着的也坐过保卫局。得这三条结论我很高兴。这是很多同志发表意见，我概括综合的。苏联也这样，斯大林晚年肃反也杀了好多人。群众不因为这改变革命立场，但却怀疑领导人，也符合这个结论。

肃反在鄂豫皖军队中没有好大影响。有人说，肃反有好处，越肃部队越强，其实是变态的现象，很多人打仗拼命宁可死在战场，而不愿死在保卫局的审判之下，所以比平时还勇敢，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在火线上找个死路，用战争去自杀。由于肃反部队纪律变强了，不敢掉队米袋不敢搞破了，枪上不敢搞土，怕怀疑是反革命，这种种都是变态心理，压力把纪律搞好了些，实际上恐慌得很，互相怀疑很厉害。这种缺点只是长期才能表现出来，不是短期可表现出来的。我眼看有三个女同志装文盲，一个是王明的妹妹读中学的。王明是金家寨的人。她始终不敢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怕肃反。其他两个女同志是高小毕业，读过初中的程度，也都装文盲。好多同志转党员关系的时候隐藏起来组织介绍信不交，这样可以不过组织生活。你们看肃反多恐怖，向前同志说，他的爱人被捕，就是企图从他爱人那里找他的材料。当时领导人是张国焘，连向前这样的高级领导同志都怀疑，你看党内、军队内彼此怀疑多恐惧多严重！

肃反的恶果，潜在的瓦解战斗力，党的作用和干部的损失该多大！中央苏区错误最小，因为有毛主席，但也有错误。

我这几天很想下了，来武汉不容易，想单为肃反问题作报告，说几个钟头，但精力不够，问题不容易得结论，解决这个问题得几年时间。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在肃反问题上，莫称英雄，这个问题没有英雄好汉。中国五六年五七年的肃反是最好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但能说没有一个

错？难保证，个别有错的，就是五七年也不能没有错的，是千分之一、二的错，过去的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错，延安肃反是百分之三十五的错。这个真称不得英雄好汉！掌握小单位肃反可能不错，但掌握一省，不错一个做不到。

世界上研究肃反最好的是毛主席，斯大林不及他，特别是走群众路线。但也难免犯错误，不过比较少，倒一个头，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倒为千分之一、二。毛主席向波兰代表团谈话时说“中国肃反过去也犯错误，现在才搞好些，要列宁多活二十年可能避免这个错误。介绍主席的这个指示，这也说明这个问题。

简单分析几句，知人难用干部不容易，就是知爱人也都不容易。往了解错了，了解一个爱人都搞错了，这说明了解人多难。结婚、提干部都难，而肃反更难，肃反有好多秘密的事情，不好办。我们没有人在肃反中称英雄，毛主席说要列宁多活二十年肃反不犯错误，要么是个天才！

再简单分析，鄂豫皖肃反大多数可以避免，不难。鄂豫皖肃反错误地估计了人的立场。反革命变成革命，革命变成反革命不容易，这个估计不应该错，都是自己的干部，工农出身，家庭情况都是清楚地，掌握这点可以多数不错。但要百分之二十不错就难，百分之八十不错不难，这样从理论和事实上说，中国事实上改变立场的人只有被敌人捉去入狱严刑拷打之下叛变的，是少数，而不是多数。可见这一条革命立场不容易改变。苏区的干部没有被敌人捉去，都在革命中负责，怎么改变革命立场呢？毫无条件。

三年游击战争的党的领导和生活问题，这是党的领导的特点：得不到中央和上级的指示，一切靠自己，我初见高敬亭的时候，代他向中央写封信，内中有这样一句话：“心问口，口问心，自相商量”。高敬亭很欣赏这句话，但是确也是这样的情况。独立工作，自己出政策，找方向。

第二，这些同志是农民出身，一个知识分子都没有，政治上懂得不多，文化上比今日还差，许多东西靠摸索，懂不到。25军还有我们几个知识分子，上次还说我们这些人是土包子，而28军的负责人在政治上、文化上比我们还差，党的组织原则住过党校的同志还晓得，没住过党校的连语句都没有见过，但工作做得蛮好，这个问题我以后还要分析。

第三，党内的生活不是民主集中制，一是独裁，一是协商，一是走

群众路线。高敬亭独裁，我有很大部分独裁，还有就是协商，干部调皮的，能力强的就用协商的办法。我在陕南就与几处协商，协商就是吸收谈论好的意见，协商在我手里得到发展。我当过游击总司令，是外行，连放哨都放不到，外行要领导内行，身边的通讯员是个连级干部，成了我的顾问，手下有几个当师长的，我就协商。我是九路司令，开会就说我是靠政治指挥，军事上是外行，说军队整训，部署由你们提两个方案，我批准一个你再去做，现在看来，这个法子也可以用，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工作。现在可以打通思想，那时候是协商，那个时候没有时间打通思想。再说什么是群众路线？战士开个会，人人都同意，大多数都同意了就去做。这就是军人大会，这个党的生活就影响了党的组织形式。访问得的材料我以后谈，今天我特别说明，农民干部摸索的效果大，这是一条经验。访问可以找到文字材料，他们对外宣传是红 25 军的语句，口号照抄“红军日益扩大”，“革命形势日益成熟”，可见他们拿不出东西。抗日时候与他们见面，他们仍旧是这些老宣传品。但能宣传革命蛮好，敌人蛮坏。宣传品上说反法西斯，其实没有一个人知道法西斯是个什么东西，但它是个敌人，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个明了。

摸索为什么这样大的效果？（1）是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的环境变化不大，敌我力量变化不大，而全国的环境是变化大的。斗争形式适应于这个环境，群众情绪适合这一套方式，有客观效果。（2）是英勇决心强，工作积极，党得这样做有把握，有效果。（3）就是独裁，不能主观，实际是群众发表意见后，自己下个决心。若独裁和主观连起来就行不通。上下互相信任，肃反虽产生怀疑，但对敌时互相信任团结，认为上级指示不是把工作做坏。假若像现在的环境，要摸索几个月就要坏好多事，就不行。其余的问题不谈，今天说的是 28 军的长处和弱点，概括分析了一下，便于采访和整理，不经过我这样讲一下，别的同志难这样概括，做不到。

位老谈话记录（第七次）

（未经本人审阅）

1960年5月19日上午

目前上党课比搞党史还难得多，因为党史没人逼，上党课有人逼。上党课是个难事，全国都是个难事。现在搞党课也好，搞党史也好，无论在务实方面，在务虚方面，都有困难。务实呢？有许多材料未整理好，还有些材料未登记起来。务虚呢？现在中央忙，好多问题下面解决不了。联共党史到1928年才开始搞，而且还要斯大林帮忙才搞出来。你们党校上党史与党的建设这两门课，都不好搞。写党史还可以简单些，党课天天要见面。总之，在搞党史方面务实务虚都有难题。

告诉你们一个总精神，还是要多花一点时间把毛主席著作与中央文件好好学习一番，多学理论，再多访问些材料把几个干部去认真地访问一番。多了解点实际材料，一方面学习理论，一方面访问。恐怕搞党史也好，上党课也好，都是这个精神。不然吃力不讨好，十年内到处都有困难，要十几年以后才行。当然党史写好了，党课就好办了。为了搞好党课，全国多交流经验，派几个人到几个党校住几个月，旧日学校讲个教学法，就是交流经验。湖北可能那几课讲得好，湖南那几课讲得好，这个党校的党课是这几课好，那个党校的课是那几课好，要交流经验。光是找人谈几次不行，要住到那里听课，听他们的拿手好戏，另外还要看他们的笔记。

现在就你们提出的廿个问题来说。

有四个问题都是问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即“左”倾路线、国焘路线、立三路线等几次错误路线对党的影响如何。

我谈几点总的意见，苏区几次错误路线都未总结过，不像中央苏区那样，由于当时没有总结，到今日作结论就必须等集体意见。我们个人谈的很不可靠，因此正式的回答要等。这是第一点意见。

第二点意见是，几次错误路线在鄂豫皖都犯过，但都不严重。国焘路线重在四川。立三路线也犯过，不严重。这些错误路线犯过但都不严重的原因有两大条。（1）鄂豫皖犯的错误，损失都不大。（2）当时鄂豫皖跟中央离的远，联系不密切，天高皇帝远，独立自主作用大。只要本地领导人不完全赞成错误路线，那错误路线就不容易贯彻下去。由于这两条，所以错误路线的损失不很大。鄂豫皖损失最大的是肃反，当然肃反实际是错误路线的主要内容。

不到将来把材料搞充分总结出来，对各项错误路线的影响到底多大

就很难判断，不谈过去，就是现在的也很难弄得明白，所以要弄得很明确，就要很长时间。

第一个问题：鄂豫皖苏区的特点是什么？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如何估计？

很有些特点，我可以说很多出来，但正式意见也要等集体意见，个人意见你们拿去作用不大，不必多谈。

鄂豫皖苏区在全国的作用特别大。（1）在军队中的干部特别多。（2）苏区在当时全国中居第二位，仅次于中央苏区。

第二个问题：对木兰山时期与柴山堡时期在苏区发展上的作用如何估计？

我们最近向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作的报告谈到这个问题。王部长马上出文章，写的就是木兰山到柴山堡。木兰山时期起了很好作用。但不是那样大。柴山堡时期好得很，最近找一些人座谈。一致认为柴山堡时期好处多，是鄂豫皖苏区发展的黄金时期，成绩好，几乎谈不出缺点来，要把历史分段来谈，柴山堡时期是鄂豫皖苏区特别好的一个时期，你们可以看到很多谈这方面的东西，我今天不多谈。

第三个问题：1929年的土地分配，有材料说对富农采取限制政策，也有材料说采取打击政策，没收其全部土地，哪一种说法符合实际情况？

你们看了材料，这些材料我现在记不清，记得一个笼统的概念，鄂豫皖苏区分土地当然是犯过错误，有几次改变，正式意见也要等收集将来集体讨论。总的说，中心苏区与边区两种地方分开说，中心苏区最后解决土地问题是张国焘到后，苏区的土地问题解决得好。虽然那时有错误，这与中央苏区一样，照主席说是有错误的，即有点“左”，但总的说解决得好，有错误，成绩是主要的。张国焘到苏区后，苏区还得到很大发展与土地问题解决得好有关系。张国焘在土地问题上立了功。犯错误的人多半是立了功的（没立功别人怎会信任你，你就没有本钱）。中心区的土地改革本身没现在这样细致，但它是先做了很多工作，先两年把地主都垮了才土改，对反动势力先有镇压斗争，把地主势力镇压下去，贫雇农优势树立起来，不像解放后进行土改时先得找贫雇农，树立贫雇农优势。边界苏区土改差得多，假土改等多得很，与中心苏区比不得。

第四个问题：1928年中央派曹壮父来传达党的“六大”决议，这一决议对鄂豫皖起了什么影响？

影响又大又好，但是今天去访问，除了一二十个老人外，就问不到什么，这个影响既无文字记载，只能访问这一二十人，因为那时早，农民党员听了消化不了。今日问他，又记不得什么了。

这个影响又大又好，这才真正有了明确的方向，六大虽有缺点，但是我们下面有一条真正革命的路线是从六大开始的，虽然当时印刷困难，但印的不少，尽量供下面干部看，当时不能出报。

第六个问题：鄂豫皖特委成立后不久召开的“莲花背会议”与郭述申同志来苏区后召开的第一次特委会议是否一回事？会议中曾讨论了土地、猛烈扩大红军、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等一些列重要问题。这些问题讨论的结果、意义和影响如何？从这次会议后直到八月祝家楼会议以前，特委还有哪些重要会议和决议，其具体内容怎样？

特委成立会议，莲花背会议和祝家楼会议，这三个会议都在立三路线时期，总共是一年内的事。

鄂豫皖特委在箭厂河成立，照中央指示，把军队分出去。李立三同志在中央当家，在军队中搞前委，直接属中央管，特委书记参加前委，特委不能领导军队，正是由于成立前委，才成立特委，这是立三路线的萌芽时期，隔了三个月，召开莲花背会议，这是立三路线发展时期，到祝家楼会议，有聂洪钧同志参加，他是巡视员，代表中央去的，那时是立三路线的高峰。

立三路线时期，特委召开了这三个会议，聂洪钧同志去时，当时在中央，干部不能说中央不对，一点价钱都不能还，没有一点余地留的，说话一点不对头就撤职。鄂豫皖苏区天高皇帝远，只说得那样厉害，做不那样，虽然不满立三路线的有好多，但一个也没撤，这几十独立自主的关系。

立三路线在鄂豫皖苏区不是影响那么大，当然执行还是不少。

第七个问题：1930年3月鄂豫皖特委成立后，直到同年9月和次年1月，仍有鄂豫边特委给中央的报告，究竟鄂豫皖特委是不是在鄂豫边特的基础上改组成立的？边特是否保留？若有保留，其领导关系是怎样的？

1930年3月鄂豫皖特委成立以后，还有鄂豫边特委的报告，我估计

是文件积压的关系。那时交通不便，一次不能多带，就赶急的先带，过去积压的慢慢来，中央是照顾到的日期编文件的日期的，可能有些文件写好后半年中央才收到。

商城长期属皖西北领导。

鄂东鄂豫边一带以黄麻为主，产生了红一师，商城皖西北等产生红二师及以后之红三师。1930年3月成立特委，统一了这几个部分，统一以前两个地区有蛮大的矛盾，矛盾么样多呢？商城同志为主就杀了三个主要干部，一个徐其虚，一个徐子清，他们都是被要求去的，做党代表，后来又派一个六安的同志去做党代表，都是借口讲他们嫖女人贪污而杀掉，这实际是宗派主义的严重的排斥，这样鄂东的同志有戒心，不愿与他们合作，后来敌人围剿他们把队伍开来，我么顾大局，挑了两三个人去接头，军事上派王树声带一个小队伍去接，政治上特委派我和徐宝珊去接，我们是徒手去的，我么这些人都是被特别选择的，接到后就与我们这边主要的负责人见面，见面后他们的盒子枪都是上着枪膛，简直是鸿门宴一样，我们顾大局，见了一次面就减少了他们的怀疑，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郭述申带四个干部到他们那里，郭是中央巡视员，他们听说红军打开了商城，就直接到商城，郭带去的干部有刘英（准备当师长）李荣桂（准备当政委）孔文彬（准备当县委书记）中央这个干部政策不对，这样重要地方的主要干部怎么能都由中央派呢？商城28个同志夜晚开了个秘密会议，准备把他们五个人逮捕，把那四个人杀掉，然后讲郭述申不是反革命主义者。这28个人中有个陈胡子向郭述申告密，对郭说：“同志，你们赶快走，他们要干掉你们”。夜晚五个人在司令部（他们住在司令部）偷了五只驳壳枪，翻城墙跑出来，他们在白区转了两天就到鄂东来了，以后在鄂东搞重要工作，他们搞的职务传过去了，郭述申向中央作了报告，这样中央就不敢派人去解决问题，他们认为鄂豫皖特委去好解决问题些。我们派王平章同志去，他们是排外宗派主义到了极端，借口是中央派去的人是信阳特委去的，信阳特委都是改组派。王平章去做了很多工作，他们态度好，不再坚持特委改组派的说法了，承认了错误。这样解决后，中央才写信批评他们，28个人都程度不同的收到了处分，这是三月末统一前的矛盾。

第八个问题：靳、黄、广苏区最初由哪里领导？与鄂豫皖苏区的关系如何？何时划归鄂豫皖？它在鄂豫皖苏区中的地位、作用如何？

首先它是与江南一起，与我们发生横的联系，最初它是叫鄂东，我们这片叫鄂东北，他是属于江南组织系统，因为在国民党还无力量把长江交通切断时过江比上山容易，靳黄广与江南联系方便。到国民党力量大了，国民党就切断了长江交通线，它不能与江南联系了，又不能单独干，中央才指示编到我们这边来，红十五军老底子有江南战士江北战士就是这个原因。

第九个问题：中央分局成立后，党的建设情况怎么样？鄂豫皖省委何时成立？省委成立的作用如何？分局如何对省委进行领导的？

详细回答也要等集体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以后。

总的来说，党的建设是个难题，因为是个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在各个时期都搞得不好，所以党的建设可不好讲。

先成立中央分局，有两个月左右无省委，由中央局直接领导特委（相当显著的地委），这样不好，因为不能让很多干部参加中央局。中央局干部少了就不能很好领导各个特委，因此才成立省委，领导各个特委，省委有各部，日常工作都由省委做。中央局只开会不办公，没有设立部，省委解决不了的大事由中央局开会决定，省委照中央局的决议执行。

第十个问题：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和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召开这两件事对鄂豫皖苏区具有什么意义和影响？扩大会议总的精神是什么？会议提出的“打通商光路线”和“坚决采取攻势”的方针是否正确？

中央分局成立第一次扩大会议及初期的好几次重要会议基本上正确的。错误是后半期，张国焘的初期是立了功的。“打通商光路线”“猛烈扩大红军”等是正确的，初期多是对的，错误是从肃反起，从而军事也错了。中央决议说肃反开始就是错误路线的萌芽，打通商光路线是巩固苏区的重要措施。

第十二个问题（原档案如此）：1931年6月，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中决定开除徐朋人的党籍，理由是徐违抗中央，反四中全会和“在特苏工作反对在春耕时间重新分配土地和把富农的肥沃土地分给红色战士”。以后在大肃反中又被杀害。关于徐的问题，应该如何认识？

他的主要问题是否正确？他的被打击、开除党籍直到最后被杀害这些事件在党内斗争中说明了什么？

关于徐朋人个人问题，主要是四种全会搞罗章龙时期犯的错误。他完全错误，上海中央召开会议，这边派他为代表去参加，当时正是罗章龙当红，罗拉拢一些人，徐到上海被罗拉过去，几次表示反对中央拥护罗章龙，到了会议末期，罗章龙右派垮台了，徐不能不承认错误，他要求回鄂豫皖，中央不让他回鄂豫皖，介绍他回河南省委分配工作，他拿着到河南的介绍信回到鄂豫皖，我们不给他工作，要他到河南去，他一再要求留下，我们对他指出应服从组织，要他到河南去，如定要在鄂豫皖就要受到处分，并请示中央，徐愿意降级也不去河南，我们让他当光山县水务局长，他干了几个月，这是第一步，以后在肃反中肃了他，这是不对的。

他从上海一回到鄂豫皖，大家都与他分清界限。

第十三个问题：鄂豫皖苏区是否有真的改组派，AB团和第三党？有哪些具体事例可以说明肃反的必要性？1931年秋开展大肃反以前的肃反是否基本正确？张国焘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到什么时候被纠正的？

关于曹大骏是否是反革命的问题，下面调查材料说法有矛盾：英山肃反材料中说曹是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而别的材料恰恰相反，说曹是革命的好同志，不知道曹是革命分子还是反革命分子？

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真假问题，要有真的千分之一还不够，绝大多数都是假的。

AB团这个东西，现在过了几十年，把国民党全部材料查了，鄂豫皖没有一个AB团，AB团主要是在江西，鄂豫皖的人没有一个与AB团有接触。

第三党，当时得到的与现在考查的都是一个样，许继慎在上海时有几个第三党的朋友。许爱嫖、吃，在上海时常找这些朋友借钱，这个情况有人告诉了中央，中央批评了他，他写了申请书（即检讨书）。许派到鄂豫皖后，中央在给鄂豫皖的秘密信中介绍了许的这个情况，许的申明书也在里面，这是鄂豫皖知道第三党这个东西的第一个材料。

改组派在鄂豫皖的线索多些，高建斗等好几个人曾在张发奎那里作过工作。鄂豫皖改组派的线索多些，二三十人是有的。再后来就是中央派

来的潘皈佛。当时的参谋长，这些人都是与张发奎队伍发生过关系，而肃反刚刚是从潘皈佛爱人那里发生的。这样，这个怀疑就容易发展，实际上怎么样呢？我与徐向前元帅交谈过，把那些老熟人回忆一下，与改组派有联系的这二三十人中，至多有一半人可以怀疑，有一半多是好同志，至于肯定是改组派的除了潘皈佛一个人可以考虑，其余的人也不能肯定，高建斗是与改组派有联系，但不能肯定他是改组派。

查国民党档案，没有查出有什么联系，原因是我们的干部本地人多，外面派来的人少。在残酷斗争中反革命不容易进来，可以说绝大多数不是反革命。我们总想提个意见给中央，说中央发个材料下去，使下面好工作，但我们也拿不出具体根据。去年河南有一个家属写信给毛主席，说他不是反革命家属，并说位老可以证明。这些信由组织部转给我处理，我写了一份提议，很详细（我认为肃反千分之一还少，除了千分之一外，中央接受了，发了东西下去，这个问题拖了很久到这次才算解决，其余统统是烈属）。曹大骏本质上是个好同志，思想作风上有缺点。他不满意张国焘的领导是千真万实。后来张把他当反革命看待，实际上知道他的同志都说他是好同志，下面提的那些材料不可靠。

第十五个问题：红安中心县委何时成立？领导哪几个县？

红安中心县委成立过两次，时间我记不清楚了。

第十六个问题：鄂豫皖区反帝斗争总的的特点怎样？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曾指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在鄂豫皖工作中是比较薄弱的一环，这个结论是否正确？

鄂豫皖反帝大同盟工作薄弱是千真万确，这是整个鄂豫皖工作长期的薄弱一环。中央苏区作的就好得多。中国革命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这点在大城市看得出来，在乡村就看不大清楚。蒋介石也好，地主阶级也好。实际上都是帝国主义在撑腰，在乡村开展反帝国主义就要进行好教育，应揭露帝国主义支持封建军阀地主等。鄂豫皖认为农民不容易发动，没有充分揭露帝国主义，其实帝国主义在乡村罪恶的证据多得很。这个工作在鄂豫皖从头到尾一贯薄弱，讲反帝国主义都是空洞的。

第十九个问题：如何评价高敬亭这个人？

在现在活着的人中，我了解高敬亭的材料是个垄断者，因为四支队

干部中农民干部多，文化低，感性材料多，但系统化不了，能系统化的人又不了解什么实际材料，我是两者兼而有之。

判断这个问题要分清楚。第一，反党，全面反党，他真想长期搞个独立王国，不想与中央发生关系。第二，他不是反革命。第三，确有大功。第四，当时假使不杀危险性非常大，不仅怕他到国民党那里后成了国民党的宝贵材料，最大危险是几百干部盲目支持他，他可能造反。光第一第二第三条就决不能杀，但危险性非常大。当时如果把他送到延安就不会有危险。但交通不便不能送去，所以决定杀他。杀了他，就有把挽救那几百干部，不杀他。几百干部如果跑到国民党那就危险。当时研究不够，实际上关起来教育几年更好些。

第廿个问题：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来处理鄂豫皖苏区中历史中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

当时鄂豫皖一点也没有接受到毛泽东思想，这是现在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去研究当时历史的问题，当时没有表示毛泽东思想的文字材料，现在怎么用毛泽东思想解决这个问题，要等把党史详细写出来后。

补充一句话，中央错误也好、正确也好。鄂豫皖执行时都是天高皇帝远，鄂豫皖独立自主的作用大，中央不能正常直接指示。很大程度上是本地人当家，不能作这样的判断，中央正确的时候，鄂豫皖就正确，中央错误的时候，鄂豫皖就错误。

本地干部没有哪个是至始至终代表正确路线，情况是这样：这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正确，那个人在那个问题上正确，这是鄂豫皖两条道路斗争的特殊情况，没有哪个始终代表正确，也没有哪个始终代表错误。

郑位三同志在红四方面军 战史编委会工作干部会上的报告之一

访问：汪庆根、许祖范

时间：1960年3月22日

地点：总政排演场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

今天谈一谈鄂豫皖革命初期情况。知道革命初期情况的人不多了。因此编史这个任务我有责任担当起来。麻城情况王树声同志知道，我这里不讲了。解放后，我搜集了一些材料，谈了不少毛主席文章。但我所谈的还是否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还得进一步研究。

有几件大事要先说一下：

1926年10月4日北伐军解放武昌；1927年4月4日，蒋介石反革命事变；5月湖南兴师北伐；5月17日夏斗寅叛变，21日许克祥事变；6月5日汪精卫在武汉开始做了两件反动事：一件以共产国际给中国的指示为藉口，诬蔑共产国际公开干涉中国，接着一件，于5月17日逮捕苏联顾问；7月13日党中央发表时局宣言；7月15日国共分家。这几件事与历史关系很大。

党的大事。同年4月27日党的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全党党员57000人，工农群众282万人；5月共产国际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会议指出国民党叛变在即；6月25日工人纠察队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于汉口向敌人缴械；7月15日党中央发表宣言。接着，八七会议的召开，提出土地革命的任务。这里说明一下，1927年4月1日中央四月

会议是盲动主义的会议。

湖南到井冈山期间的大事。1926年北伐前，湖南农协会会员有40多万，1927年5月两湖农民运动达到高潮，湖南农协会会员达到500万。5月21日马日事变，长沙城外曾聚集10万农民武装。

湖北省农协会筹备会于1927年4月成立，会员43000多人，7月，全省农协会员达79000多人，12月达28万多人。以5月比较，湖北200多万，湖南500多万；4月毛主席上井冈山，带900多人，三个部分组成，一是湖南警卫团，二是几个地方的工人纠察队，以安源煤矿为主体，三是农民武装；1927年4月至8月，敌人向井冈山进攻三次进剿，被打退，接着成立工农政府，1929年毛、朱进瑞金，2月至9月红军三次进攻福建黄冈一带，接着成立中共工农民主政府。

黄安的条件，首先这个时期形成了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其原因：

(1) 与国民党统治时期不同的是这些知识分子不受到思想压力引诱还可以秘密开会；

(2) 知识分子找职业特别困难，由于满清的科举制度的限制，每年只取60名，每县秀才三年二考，每次只取三、四十名，满清末，民国初学校多，用人也较多，但仍是粥少僧多，黄安北乡比南乡找职业的多，南乡由于资本家多，在工商业中容纳的知识分子多，北乡失业者多；

(3) 北伐军到达湖北，对知识分子鼓舞很大；

(4) 出身于小地主、富农家庭的知识分子较多，也较容易冲破家庭的束缚，不少同志经济上不大发生困难；

(5) 地主阶级一无武装，二无反动道会门。

我的看法，这五个条件是产生一批革命知识分子的重要原因，形成一批坚决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要有上述条件。有了这批知识分子在大革命时代，起了特殊作用，农民看到知识分子的带头打死土豪劣绅，马上看成自己人，如吴焕先打死亲叔叔吴朱，农民相信他，农民问吴为什么本事这样大，德性这样好？吴说“是共产党教育的”。因而农民都相信共产党，王部长（即王树声同志）也亲手打死过土劣舅舅。在农民中影响很大。出身于地主阶级的青年参加革命后，使地主阶级起了分化。我们知道发动农民有三种方法：一是苏联办法，即工人下乡，二是知识分子下乡，三是军

队下乡，农民与知识分子结合是革命的首要条件。

黄安的第二个条件，即封建势力较薄弱，武装少，仅资本家有一、二十支枪；第三个条件，有关国共的合作；第四个条件，黄安的七里坪、紫云、麻城的顺河集等五个地方连成一片，形成了后来木兰山根据地的条件。其他还由于董老的关系，在支援武装、筹款、刺探情报等给我们很多方便。

下面再插些具体材料。1925年暑假有一批学生回来，运用被我们党控制的教育局和教育经费，开办学校，成立农协，发动农民。当时有14个乡镇成立了农协会，会员1400多名，到1926年4月黄安特支利用国民党党部的合法名誉搬到黄安城内办公。杀土劣是从麻城开始的，接着黄安也开始反土劣斗争，要土劣带纸糊高帽子上街游行、写悔过书等，农协会实际成了乡村政权机关。2月县委决定发动农民打死土劣吴惠存，又用政府名义逮捕了土劣李公仁等。打死吴惠存是得到董老同意的，特别是派一个同志到当地发动群众，找了一个叫吴守义的（与吴惠存有新仇），保证吴守义养家活口，吴才动手的。4月下旬，由政府镇压了一批土劣，当时有一个惩办土劣的法令，成立审判土劣委员会，成员3人，国民党左右派各一人，共产党员一人，直接掌握农民武装自卫队，工作纠察队，国民党警察等。在执行阮纯青等2个土劣时，由于没有经验，未打死，被逃走了一个。“四一二”事变对我们影响不大，孝感曾举行反蒋示威游行，黄麻也举行了，农民、学生第一次提出“反对蒋介石”的口号。打倒土豪劣绅对掀起群众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了确保工农利益，这时县委提出购买枪枝，成立了农民自卫军。

另一件大事是和河南光山反动红枪会打仗，各乡都成立了武装，并向地主派枪、派款，声势浩大。

“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对黄麻影响很大，县委不传达关于陈独秀的错误决定，部分人威慑于白色恐怖自首了，县委也垮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区委除七、紫外也大部分垮台了，6月起县、区工作成了停顿状态，只有七、紫两区继续革命。县委成员是分三批跑到汉口去的，第一批有宣传、组织二个部长，借口到汉口打听消息，时间七月底，八月上半月县书王津亚和高等小学校长走后，把县书、高等小学校长都交给我担任，后来

县教育局长也交给我了，我当了半个月的独裁。同时也积极寻找上级党，于是和其他二个同志到武汉找到了罗亦农同志。罗指示立即领导暴动，不要改组县委，看了三天文件。回黄安后，由戴克敏同志起草拟出暴动计划（时间9月20日左右），我起草了传达报告，决定9月26日暴动，打了第一个土劣陈启明。我们不知道第二步怎样走法，于是又和戴季英同志到武汉请示，到武汉后我病了半个多月，戴季英同志找到了当时长江局派去黄安接替县书的王志新同志，说中央批评黄安是严重右倾机会主义，要改组黄安县委。我回黄安后连续病了40多天，后上级派一特委，一军事（吴光浩）一县书，傅相义（应为符向一）任特委书记，把我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痛骂一顿，不久打开县城，成立工农政府，只坚持了21天，当时的口号为“实行土地革命，杀尽土豪劣绅”。当时反动派视为心腹之患，积极派兵镇压，终于敌众我孤，县城被占领，是后潘忠汝牺牲，死伤百余人。这是秋收起义，通称第二次暴动。第三次暴动王树声同志文章（在星火燎原）上有记载。

在我单独担任县书时，工作是相当繁重的。从现在检讨起来，有右倾地方，但比起当时左倾是好的，而且不是占主要的。真正的右倾表现在不够相信群众、农民党员，坚决进行区委改组，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虽然曾派了一个农民干部去南乡，但没有结果。再就是政权观念不明，没有保持城市政权，第三对自首怕死同志的斗争表现软弱。

黄安县初期革命斗争情况

郑位三同志给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写人员的报告记录

时间：1960年5月

地点：总政排演场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

附录1：第一次报告——1960年3月22日上午于总政排演场

首先有两点说明：一是我讲话的声音小，请大家坐得靠前些，我养病以来，已有五年以上没有在像今天这样的场合讲话。二是要谈黄安初期的革命活动，不但缺乏材料，而且能了解情况的，没有几个人，黄、麻合在一起，不满50人。知道当时黄安县活动情况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周纯全，一是我，再就是开除党籍的戴季英。关于整个这一段的材料，全国解放后，我在这方面很下些功夫，想把这个责任担起来。我也像你们一样，有个计划，尽量把各方面的材料搜集起来；另外，读毛主席的著作（当时是华北印的），不说把书读破了，但确实读了相当遍。因为近十年来，我在养病，有时间。不过，不仅理解现实的问题。常常会发生错误，就是总结历史经验，用理论去联系实际，也常常会发生错误。我讲的一些观点，是否合乎毛泽东思想，请大家研究。

（一）

先把1927、1928两年中发生的一些大事简单说一下：

1、1926年7月9日北伐军从广东出发，9月1日到武汉，围攻武昌城，围了很久。10月10日解放武昌城。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河南还在北伐，5月17日夏斗寅叛变。21日湖南马

日事变。6月5日汪精卫开始做两件反动事：一是那时候共产国际给我党有几条指示，汪精卫知道后，污蔑共产国际干涉中国内政。二是武汉国民政府解雇苏联顾问，送他们回国。6月6日（江西）朱培德叛变。6月29日何健通电反共，在湖北黄梅县杀了我们300多人。7月13日我党中央发表对目前的时局宣言。7月15日国共分家。

党内有关大事：4月27日党的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当时全国有党员57000人，有组织的工农群众280万（党的四次代表大会时，有党员900人）。1927年5月，共产国际正在开一次比较大的会议，有指示给我党，要我们加紧准备，防止国民党反共。6月28日，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导下，武汉的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6月30日，党中央扩大会议提出的十一条决议，是陈独秀投降主义最明显的表露。

湖南农民运动到毛主席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有关大事：1926年，北伐军北上以前，湖南有农协会会员40万。1927年5月，两湖农民运动达最高峰，当时湖南全省有农协会会员500万，马日事变时，长沙城外聚集了10万农民武装。证明湖南的农民运动全国第一。拿湖北作对比，1924年12月成立省农协筹备会，当时全省只有3000农协会会员。到1926年7月发展到7万几千人，同年12月发展到28万1千人。1927年5月有2百几十万人，而当时湖南有五百多万人，所以湖南第一。1927年10月毛主席带着起义队伍上井冈山。毛主席跟史诺谈话时提到，当时有900人，别的材料记载不到1000人。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从湖北退出去的警卫团，一是几个地方（主要是安源）的工人纠察队，再就是湖南五个县的农民自卫军。从1928年4月到7月，经过敌人三次“围剿”，工农红军很打了一些胜仗。1928年11月井冈山周围的几个县成立了人民政府，根据地大体形成，1929年1月毛主席和朱总带着队伍进入赣南，2月到10月，红军三次进入福建。1930年3月，赣南、闽西的民主政府同时成立。这十几个月（1929年1月-1930年3月）创立了一大块根据地。

（二）

现在谈谈黄安地区的一些有利条件（注：主要是指对农民运动的兴起和以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的一些有利条件）。

这个地区形成了一批坚决革命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当时（注：指大革命）黄安的工作所以有成绩，这批知识分子起很大作用，所以起作用的原因：

当时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跟国民党统治时代不同。对于知识分子的利诱小，管制也松，国民党对知识分子的利诱是当官、当军官、当特务，又升官又发财。很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受其引诱。再就是当小学教员、当公务员。同时思想的、政治的列宁文选拿着进城，没有什么问题。在学校里把俄文或英文的列宁全集摆着同样没有问题，旧军阀不懂那一套。国民党统治时代就不行了。

当时知识分子找职业困难。满清时代，少数人做官外，一部分教私塾，再就是行医……等职业。满清时代，知识分子数量很少，科举时代，三年一次举考，湖北全省只有60多个名额。老秀才也有名额，黄安县32名，麻城县大，多些，40名，三年两考，一个县不过六、七十名。所以知识分子很少，职业范围也狭。光绪二十一年，废科举，办学校，办了十几年，至民国初年，继续办了些什么学校，知识分子数量大些，但军阀政府用人不多，拿当时的中央政府来说，袁世凯住中南海时，中央政府机关的全部人员只有一万八千人，这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而蒋介石统治时代，当时在南京的中央政府机关全部人员有四万多人，比袁世凯多一倍，再加上特务遍地有，和一部分知识分子搞工商业，所以容纳知识分子多些。就全国来说，知识分子找职业的情况，是“僧多粥少”。蒋介石统治时代，知识分子也有失业的，但旧军阀时代更严重些。就当时的黄安来说，北乡（注：指北部地区）的知识分子找职业又比南乡的知识分子困难些，麻城也大体如此。因南乡有资本家，工商业届可容纳一部分知识分子。北乡的知识分子就困难些。我在汉口读书时，看到有些人长期在武汉找事做，有的一连十来年还在找事做，真正经常有事做的只有二、三人，其余的常常没事做。失业对知识分子威胁很大。）

北伐军到武汉，大革命的风暴对知识分子是莫大的鼓舞。清苦的知识分子总有点爱国主义思想。

跟本地豪绅地主斗争，家庭是个很大障碍，被家庭束缚住了，更当地农民联系不起来。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冲破家庭

束缚比较容易。有些同志并不发生困难，如吴焕先、王树声、赵赐吾、曹学楷等同志的父亲早已死了，戴克敏的父亲是共产党。

黄安的地主阶级一无武装，二无会道门。所谓封建势力弱，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

以上五条是形成黄安地区产生一批革命坚决的知识分子的条件，形成一批革命坚决的知识分子，要有这些社会条件。

这一批党员知识分子的出现，在大革命的环境下，马上起几种特殊的作用：

能带头向地主阶级斗争，特别是带头打死一批土豪劣绅，农民马上对知识分子产生信任，看做自己人。在黄、麻北乡，这样的事很多。如吴焕先同志打死堂叔叔，后又打死嫡亲姑爷，农民衷心信任他，说：“小伙子真是革命的”。农民胆子就大了，而且农民对我们党开始是从感性方面认识的。如吴焕先闹革命后，周围的农民就问他：“为什么你的本事比往日大些？德性比往日好些？”吴回答说：“因为我加入了共产党。”农民很信服的说：“共产党只用年把时间，就把一个人的本事搞大了，德性也搞好了”，农民就从这些感性认识中，提高了对党的信仰，既信仰知识分子，又信仰共产党。

这些知识分子多是小地主出身，他们一革命，就把地主阶级分化了。而且情况搞得很清楚，地主有什么活动，有什么抵抗力量，他们了解最清楚，对农民帮助很大。

南乡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虽多，但少坚决分子。当时县委负责人，多数是南乡的党员，但整个南乡的党员知识分子中，只有王秀松把他的父亲打死了。在北乡像吴焕先那样作法的有十几人。南乡有个姓王的县委委员，在审判土豪劣绅时，第一个人就是他的亲戚（李介仁），他就为此不敢干。要是南乡的知识分子，也像北乡那样干，那么革命力量就更大些。再说邻县黄冈，是知识分子最多的三县（黄冈、黄陂、黄梅）之一，林元帅就是黄冈人，林元帅没在本县闹革命。大革命时，就湖北全省来说，“三黄”（黄冈、黄陂、黄梅）的农民运动很出色，知识分子很多，党员很多，也有农民自卫军，但在斗争中没有打死土豪劣绅的事。他们打菩萨，剪辫子，表面看来轰轰烈烈，但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活动烟消云散，土豪劣绅

太平无事。哪怕别的工作做的差些，只要打死土豪劣绅这一件事做好了，事情就好办了。不这样，就不能取代农民的信任。当时黄安的知识分子虽然幼稚，但干劲很大，农民正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

就全世界的经验来说，农民运动要有领导。有三种人下乡：一种是工人下乡，苏联是这个办法；在我们中国是知识分子下乡（特别是有本地知识分子）；军队下乡。太平天国也算知识分子下乡。当然知识分子本身有很多的弱点，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农民革命少不了知识分子。

地主阶级比较弱。

地主阶级一无武装，二无会道门。没有武装和会道门，就没有好大本领，我们就好办些。当时县政府有 62 支枪，南乡的资本家有 20 支短枪，在箱子里锁着，地主手里没有一支枪。北伐军的威慑力量，把地主阶级吓糊涂了，只好跑反。

究竟处在国共合作时期。

这也是有利条件。南乡党员虽多，由于少坚决的知识分子，革命力量软弱。有资本家，做官的也多，国民党的势力很大。但看到当时风气（注：国共合作），他们采取守势，革命斗争开展后，他们跑到武汉去了，写封信回来说：“支持政府，执行政策”，不跟我们斗，保持力量，准备将来行动。

七里、紫云两区的客观条件要比其余的区优越些。有两个重要条件值得指出：一是友邻区好，即麻城的两个好的区--乘马岗区、顺河集区与七、紫两区毗连，以后开辟的柴山堡根据地，又跟七、紫毗连，五个地区联成一片，互相配合，作用很大。再就是七、紫、乘、顺四个区内没有白色村庄，反革命藏不住，我们的活动很便利。民国十六年，我在七、紫走四十里夜路，毫无问题，狗子一咬，有人出来问：“是哪一个”，我回答：“我是位三”就太平无事，我那时还是县委干部，这种情况，在以后条件很好的解放区内也不过如此。南乡高桥区党的工作、群众条件很好，但是插花了，有白色村庄，行动就不方便了。

除以上条件外，董老和他周围的一些党员（黄安人多），对我们有很多支持和给我们很多便利条件：

1、跟红枪会打仗，到武汉求援兵，董老给了很大支援，对以后革命

斗争的开展意义很大。

2、到武汉去买枪容易些。

3、筹款容易些。

4、消息灵通，容易摸底。到那里走一遍，即使见不着董老本人，找他周围的一些同志了解、商量一下，就知道什么事该干，什么事不该干。

董老本人虽然没有亲自到黄安，实际上对黄安的革命斗争支援很大。

(三)

谈一些具体情况和具体材料：

1、1925年(民国十四年)暑假，黄安地区的武汉读书的一些学生(党员)回黄安做党的工作，这是黄安党的工作的起点之一。

1926年初，黄麻两县的党组织掌握了县教育局，刘任舟(当时是共产党，后变节了，解放后在四川被我镇压)任黄安教育局长，王宏文(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被捕牺牲)任麻城教育局长，特别是黄安教育局的钱很多，以后买枪就是用的这个钱。

2、有现在中央保存的档案材料为证：1926年春，黄安的汪家河、张家田、郭受九、沙平会的栗林嘴，高桥会的喻家湾、槽门等处，已成立十四个农民协会，农会会员有一千五百多人。这是黄安最早的农民协会。都在南乡。

3、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后)，黄安党的特支，到城内办公。

4、捉土豪劣绅麻城比黄安早，麻城在1926年11月，捉了土豪劣绅丁枕鱼。

5、1926年12月(北伐军到武汉后两月，)黄安全县组织起农民协会，进行广泛的斗争。1926年12月、1927年1月、2月，把土豪劣绅戴纸帽子游行，要土豪劣绅写悔过书，退租，退息，搞得轰轰烈烈，到1927年3月发展到高潮。农协成立后，完全掌握了乡村政权，实际上是乡政府，旧县长平时要行公文，那时有事就找农民协会。1927年2月(还是特支，3月改为县委)捉吴惠存，三月农民自己动手打死。另通过政府把四名大土劣捉到县里坐班房(议会会长李介仁、阮纯青、张荣廷、李士显)。后

来证明，农民自己动手把土豪劣绅打死，意义更大些。

农民亲自动手打死土豪劣绅，开始是不容易的。如准备打死吴惠存时，当时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先请示董老做得做不得，董老说可以做，但要做得艺术些。派王健到南乡，王健出了很妙的注意，他说要找个跟吴惠存有新仇的农民，后找到个牛兽医。但他有顾虑，主要是顾虑他一家四口人的吃饭问题，当时用政府保证，农民协会保证，不能取得他的信任。后用紫云区几个有威信的干部如吴焕先等向他作保证，写保证书给他，他家里人吃饭问题由我们长期负责，这样算是谈判好了。但到行动时，他还是害怕。当把吴惠存押到七里坪时，怕被流氓抢走，就动员牛兽医动手打死吴惠存，他不敢先动手，还是王健先动手，他才跟着用锄头把吴打死。他的主要顾虑是怕“阴朝报应”。

6、由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惩办的一批土豪劣绅是在1927年4月下半月。有以下情况可以说明：（一）国民党省党部3月2日通过惩治土豪劣绅条例。（二）5月1日黄安开纪念会，同时庆祝审判土豪劣绅的胜利。有这样的故事说一下：

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有国民党的县长、承审员，共产党的几个审判员，和国民党的左派一人。审判那天，怕县长、承审员事先走漏风声，发生意外，我们几个人饿着肚子，用“流水作业”办法把县长、承审员缠住，不让出门。当时使用的武装，一是农民自卫军，是主力，一是工人纠察队，这两支武装我们有把握掌握。再是县长掌握的警察队，有钢枪。经过审判就是把五个土劣拉出去枪毙，由自卫军的郑少山（在正规军当过排长）去执行，一连打了二十几枪，五个人都倒下后，就同陪他去的五个人回来了。那时，县长的态度变了，主动的告诉我们这些土劣的罪恶行为，过去是不说的。我们正在谈话时程翰香同志是个细心的人，他跑到刑场去看一下，回来问我：“位三，你们到底打死了几个人？”我说五个人，他说只有三个尸。原来有两人没打死跑掉，后抓回一人，那时，县长的听差跟我们说：“先生你们没有经验，过去把人打倒后，都要检查一下，你们没有检查”。

从3月起，到4、5月是惩办土豪劣绅的高潮，“四一二”政变对我们影响不大，“四一二”过后不久，孝感县举行群众大会反蒋，黄安也举

行群众大会，省派姓吴的巡视员参加，第一次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同时，五月接连打死了好多土劣。经过县审判处决的有几十人，农民自己动手打死的有十几人。群众斗争热情高极了。对农民运动有决定意义。

据麻城县志载：根据省的指示，将郑其玉的队伍改编为自卫军是2月28日，使用这个队伍打土劣在四月下半月。

关于黄安自卫军的形成：在1、2月间，县委有人出于自卫，想买手枪。经大家同意，三月就计划买枪。用教育经费去买，当时黄安的资本家（在重庆、沙市等地）积累起来的公款（即至诚学款）有三万多银洋，钱很多，1927年全县办义务教育，当时一支长枪几十元，驳壳枪也不过百把块钱。到逮捕土豪劣绅时，农民干部和县的干部都感到没有武器不行，就加紧买枪，加紧成立农民自卫军。农民自卫军开始成立就在党的掌握领导下，一开始就选择贫、雇农，成分不好、社会关系不好的不得参加。这是四方面军的老祖宗。总的情况是1926年12月-1927年3月，全县农民协会普遍建立；1927年3月-1927年5月，是惩办土豪劣绅，成立农民自卫军。

1927年4、5、6月，黄麻两县自卫军和农民群众联合对付河南光山县的红枪会。麻城打得更多些。黄安在5月达最高峰。农民武装起了很大作用。群众也组织得很好，广大群众担着粮食、牵着牛转移到山上，夜晚宿在山谷里。我很佩服吴焕先同志的组织能力。2、3天时间，把群众队伍组织得那样好。当然也还有一批好干部。这时各乡都成立了农民武装，没有枪，就要地主出钱，小地主出能买7、8支枪的钱，大地主出50支枪的钱，有了钱就到外县去请铁匠，自己制造来复枪（到柴山堡后自造撇把子），同时到外地去买枪。这个斗争使农民自卫军和农民群众受到很大的锻炼。

你（注：指王树声副部长）那篇文章中（指“麻城的火焰”）写的打死王芝庭的时间（阴历七月）是不是晚了些，有以下情况可供参考：6月24日光山、麻城、黄安三县县长在黄安箭厂河召开，三县红枪会斗争的“议和”会议，当时戴季伦、郑南轩（现在北京社会主义大学）随黄安县长同去，天热、下雨，戴季伦赤脚走路，有点怨言，当时郑取笑他“你还是革命党人，连这一点苦都吃不得”。回来后谈起此事，大家也跟戴开

玩笑。

(四)

再谈谈“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国共分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对黄安的影响。

上面已经谈到，“四·一二”政变，武汉的政治局面还可以，对黄安的影响不大。

5月夏斗寅叛变，6月汪精卫反动，陈独秀的投降主义也于6月传到黄安，黄安受的影响很大，变化很大，是个革命斗争的转折点。从夏斗寅叛变到汪精卫叛变，给黄安的影响最强烈，陈独秀的投降主义混合在里面。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影响不大的原因，我考虑到一是县委没有把投降主义的文件下发。二是黄安县的自首分子虽多，但没有一个人投到取消派去的。这个问题现在不能作结论，你们还要调查研究，有些自首分子还在武汉，黄安县第一任县委书记（余义成、又名余达三）也在武汉，去年我到武汉，想对这一段的情况了解些材料，我没有找他们（下从略），你们务必要找他们了解，因我们的同志死得太多，他们虽然不能说实话，但总会说出些真实情况。

汪精卫的叛变革命，对黄安的影响太大了，大革命时期的县委委员，除我和少共书记外，其余的（包括县书在内）有的叛变自首，或自动脱党或犹豫观望了半年。就区委来说，除七、紫云两区外，其余八个区（实际七个区，第五区没有党组织）的区委委员，大部分叛变自首，秋收起义时，只有少数人参加，情况稍好的是八里区，即周纯全同志所在的那个区。当时一半以上的区委自首叛变，有些则消极悲观，严格的说，只剩下了十分之一。从6月起，七个区区委的工作，已处于“半开门”的情况，大部分工作停止了。有的请病假，有的溜掉了，他们彼此是好朋友，臭味相投，用个把人敷衍我们。他们的叛变、自首和消极，是偷偷摸摸的，不敢和群众见面，因为群众斗志昂扬，已成扑不灭的火，谁也不敢去泼冷水。再就是他们都是本地人，不敢得罪群众，所以只好躲藏起来，或溜之大吉，以少数人应付门面。七、紫两区区委则不同，他们仍然继续斗争。

县委委员分三批溜到武汉。第一批是彭年（宣传部长），邓庸中（组

织部长），他们借口到省里打听消息，七月底溜走了。第二批是高等小学校长王则西和另一县委委员，他走时要我当校长。当时党员中能作为校长对象的，一个是南乡姓王的，有些迂腐，大家不同意，北乡有戴季伦、陈定侯，他们都很有才能，如果不死，是个文学家。但他们认为就全县的影响来说，他们不如我，硬要我当校长，最后，只好接受。第三批，县委书记走（八月底），当时留下的县委只我一个，他走把县书职务交给我，其他的人也要我干，他们的理由是：（一）另提干部，南乡的党员当时没有人敢坚持斗争，北乡的党员很有几个可以代理，如曹学楷、吴焕先、戴克敏（我主张开个临时会议），但他们认为从各个方面的联系来看，还是我好。（二）县长是个中立派，与我共事年把，跟县长办交涉，我适合些。跟国民党左派联系，也是我适合些。（三）在北乡的几个同志斗争情绪很高，不愿意其他群众团体的职务也由我代理。这样，我就当了半个月的“独裁”。

（五）

8月下旬到9月中旬，县委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记着想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但党已转入地下活动，很不好找。有可能了解些情况的只有两个人，一是潘忠汝，他是在我“独裁”那个时候派到县里来的。另一是县里的张道正，他也能打听到一些消息。九月中旬，原国民党左派张国恩（董老的朋友），在省里搞了个改组国民党的名单，被提名的有十几个人，共产党员占半数，也有我，并通知我到省里去一趟，我急于找上级党，便利用此机会到省，与我同去的党员有陈定侯、程翰香。过中秋那天，张国恩在他公馆请客，我们也去了，在那里碰到董老的两个学生（姓余，当时是党员，是张国恩的外甥），他们与上级党有联系，告诉了我们上级党组织的住处。我就在汉口法租界协和里五号见到长江局书记罗亦农同志，在那里看到党的文件。罗亦农同志当面作了指示，说“八七”会议的精神以两湖为中心，马上组织暴动，要我们回去马上组织暴动，要我们在三天内把暴动计划写出来，还把鄂南的暴动计划（共十七条）给我作参考。我们提出当时制定暴动计划有困难，罗亦农同志同意我们回去制订。根据这些指示，就赶回黄安，起草了两个文件：一是由戴克敏同志起草的暴动计

划；一个是由我起草的传达报告，由我签名，发到各区委。同时组织了新的县委会，吴焕先同志为组织部长。9月26日，七、紫两区开始行动，杀土劣程瑞林，接着打死了几十个土劣。农民自卫军扎在七里坪，防红枪会进攻。南乡以王秀松为起义的总指挥（县委委员，少公书记），该同志办事不踏实，我们就派北乡的吴先筹同志（县委候补委员，农民出身，勇敢、有决心），协助王秀松。当时还有驳壳枪、手枪七支，保存在县教育局的柜子里，由吴先筹同志带到南乡。南乡搞了半个多月，仍然是“两袖清风”。没有捉到一个土劣，只是没收了土劣的财产，杀猪宰羊，让农民大吃了一顿。吴先筹同志也生气了，仍回北乡。

七、紫两区在3、4天内打死土劣几十个，农民们兴高采烈。但下一步怎么办？大家心中无数，没有主意。几个同志在七里坪商量后，由我和戴季英再去武汉，由赤卫队指导员王奠川同志拿出11块银洋给我们作路费，这时武汉的反动派正在捉人，所以由我们两人去。因戴季英离开武汉的时间较晚。他去便于找到一些党员。而我在武汉有几个知己的同学，虽不是党员，但估计不会害我。由于我第一次从武汉回黄安，搞了二十多天的工作，很劳累，所以一到武汉，就害了重病。而戴季英由于不了解县委全盘情况，所以代表县委向上级汇报他有顾虑，就先到王志仁（又名王静斋）同志，向王说明来意。王说长江局省委正等我们的消息。又说：“据他了解，上级党认为我们做得大错特错，执行上级指示，已经暴动起来，是对的，但这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对你们有严重的批评。你们的县委要改组，你们马上回去，省委马上要派人到你们那里去”。戴季英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我，要我和他一路回去，因我病着，就坐着轿子回到黄安。到家后一直病了四十多天才起床，所以以后的暴动，我没有参加，只有戴季英和其他两同志经常告诉我一些消息。大约我们回黄安后4、5天，就派来了鄂东特委书记符向一（后叛变）、吴光浩、王志仁（接替我当县委书记），组织了鄂东特委，特委成员除由省派来的人参加外，还有黄、麻两县的县书。符到后，在党的会议上，大骂我们是“右倾机会主义”，我是县书职务，没跟我见面，没跟我谈话，就撤掉了。符向一很有煽动力，他走到哪里吃一顿饭，就把那里的农民鼓动起来。七、紫、乘、顺区的农民也容易发动。他走到七里坪，跟他们一起吃饭的人有几桌子。吴光浩同

志在军事上很有办法，是我一生少见的人材。过了上 10 天，就打黄安城。阴历 10 月 16 日在七里坪开动员会。军事指挥方面，麻城由吴光浩负责，黄安由潘忠汝负责。打开县城后，成立黄安农民政府，“农民政府”是符向一起的名字。当时大家认为“苏维埃”的含义解释不清楚，等以后再叫，但取什么名字好呢？想了好久，大家没主意，最后同意叫农民政府。其实叫个工农政府多好呢！就是叫个民主政府也好啊！进城后把反动县知事（姓贺）杀了，县政府门口挂着两条红布标语，一边是“实行土地革命”；另一边是“杀尽豪绅地主”。并颁布了土地法。军队出城打了些土豪，搞到些枪支。当时反动派临时从河南调姓秦的土匪队伍（二百多条枪）来攻城，城内派出 4 个人分头到七、紫两区报信，七、紫两区一晚上动员两万名武装农民保卫县城，土匪害怕，退走了。不久，国民党十二军任应歧（后加入共产党）部的一个师（师长文清林）夜袭黄安城，城破，我牺牲了一部分同志，潘忠汝同志也牺牲了，很大一部分干部被围在城内，后化装出城。符向一化装挑水的从北门跑出来。打黄安城是秋收起义的第二个动作，农民们称为“第二次暴动”，第三步就是集合两县农民武装从南冲祠堂出发上木兰山。当时黄麻到处有任应歧的队伍，所以到木兰山去是对的。开始，他们计划号召八县农民暴动，把暴动看得太容易了。他们领导的那次暴动，除七、紫两区外，其他的区参加的人比第一次要多一些。也多打了几个土豪劣绅。但比不上七、紫区。记得有这样情况：二次暴动前不久，原少共书记刘建安（二程区）到七里坪，见到特委书记，过去区委的一些干部（约有三分之一）也在那里，当刘向这些人传达特委指示后，即溜掉一批，当他在桌子上偷偷的写了“杀贺”（即杀贺知事之意）两字后，这些原来所谓党员又跑了三分之一，以后一起进城的又很少了几个人。

谈一下我是怎样离开县城的。还在符向一到鄂东之前。麻城的自卫军中发生了阴谋叛变的活动，当时徐子清同志到县城找我，我不懂军事，就找潘忠汝（黄浦学生，懂点军事）商量，潘同意我的意见，应该给麻城以支援。第二天我和潘、徐两人到七里坪，又见到了麻城来的王树声等几个同志。经与王奠川、戴克敏等同志商量后，决定派一部分自卫军（十几支枪）和吴焕先同志领导的革命的红枪会前往麻城。潘忠汝为指挥、吴焕

先为副指挥，戴克敏也随往。仗打胜了，只革命的红枪会牺牲了一个姓吴的（可能叫吴先富）。麻城出了360元作为抚恤费，此事后不久，我就二次上武汉，不久即病了。

再说我第一次从武汉回来后，近一个月时间，工作上只起个“照门面”的作用。主要是七、紫两区在做工作，那里人才多（当时我想调几个到县里来，但谁也不愿意，连组织部长吴焕先同志也不愿进城），工作就是搞得不好，首先是群众的首创精神，再就是区委的首创精神。我从长江局带回指示后的行动，主要是区里搞的，他们热情高，很多作法，出自群众的智慧，有事经常和几十个农民在一起商量。有些事情要经过我，我的主意是：他们提两个方案，我同意其中的一个；他们只提一个方案，如我顾虑不多，就同意，如顾虑较多，就要他们再考虑一次。我就是这样支持他们的斗争。新县委成立后，日常工作也只有我一人维持局面，我也曾想把县委机关搬到区里去，但是城周围的一些同志不同意，民主人士也不同意。我就留在县城。当时一些胆小的民主人士，受到土豪劣绅的影响，时常来吓我，说我没有自卫的武装，谁都知道共产党在教育局（当时我住教育局），有危险，有些好心的民主人士，也好心的劝说我。其实我心中有数，反动势力离城有数十里，县城周围的群众条件很好，况且职务在身，不能离开。现在检查起来，我在那里当半个月的“独裁”和个把月“照门面”时期，是有右倾。但和那时特委对我的批评，却有很远的距离。虽然我在城里，但七、紫两区的暴动好得很。真正的右倾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应该相信农民党员，把区委改组。虽大多数区委委员叛变了，但还有很多农民党员。我曾要把北乡的干部调到南乡去，又没有行通。由于没有比较强烈的信任农民党员的思想，所以未把区委改组。这是右倾思想。在当时情况下，如果召开个会议，除区委外，由正副支部书记（农民干部）到会，即或不能达到改组的目的，总还可以动员一部分农民参加斗争。

政权观念不明确，七、紫两区农民运动这样好，没有组织农民政府。对自首分子的处理太软弱，跟他们斗争不够。

如果这三个问题不右倾，斗争的局面会更大些。

附录 2：第二次报告——1960 年四月 26 日于位老家中

(六)

昨天（4 月 25 日）我参加审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势图想起了一个问题，就是皖西北（包括商城）的情况我必须交代一下。徐向前同志来了以后的那方面的材料好说。以前的，皖西北早起搞革命的人太死多了，活下来的比鄂东少的多。有两三个，曹广化同志知道。因此，要从那些自首的人中多了解些东西。要紧的是商城。

商城也有一批坚决斗争地主的知识分子。我亲眼看到商城知识分子多。红一军成立时，商城党内成分复杂，派我去当县委书记。我一到商城，正开党代表会，有百把人参加。宗派斗争很激烈，闹得很不好。我没接受任务，个把月就回鄂东了（当代表们来开会都骑牲口）。

那里的革命斗争也很激烈，杀的土豪也不少。××、××两区土豪都杀尽了。第二次生长的快，很快能打下县城，取决于这个条件。革命知识分子能给农民带头，是和黄麻一样。弄得不好的，有这样几个问题：里面有坏人（但不多），再就是宗派主义。

漆海峰是个坏人。漆德伟是好品质，亲自参加创造队伍，当师长，后来处分他有些“左”。但调他到上海中央又转调到中央苏区当团长，仍然安心工作，这不算好品质吗？周维炯、肖方，事后证明不是反革命，思想、作风有点毛病，有能力，尤其是周维炯（武大学生、武汉农运讲习所毕业）。地方干部：李启仁同志是有能力的。（陈一新——王明的兄弟，现在湖北当副省长，空军少将王凤吾——南溪人，他们对当地知识分子的履历知道的很清楚）。但这些同志宗派观念很厉害。再一个是排外。排外有几件事：

徐子清、徐其虚。还有安徽省委派一个姓戴的去当党代表，都被杀掉了。

打开商城后，郭述申是巡视员，带了四个人去，有刘英（拟当师长）、孔××（拟当县委书记）、李荣桂（拟当政委）。还有一个人，都是从苏联回来的。但是漆海峰主谋，召集二十多人（当时称作二十八宿，李启仁也参加了）开会。说郭是老好人，其余人是信阳特委改组派派来的。除对

郭要关押外，其余人都要杀掉。这时有一个长期在白区工作，家是商城北面的陈同志（蓄着大胡子）。向郭述申告密。郭等即偷了五支驳壳枪翻墙逃走了。当天即到商城北这位陈胡子家，把枪放在他那里。

这样，鄂东和商城方面，只有小干部来往（有时也在一块打过仗，但不提过去的事情）。解决这个问题，亏了王平章。先是皖西方面（即商南）来了诚恳的信，要求派人解决，表示愿承认错误，有些人不敢去。王平章（外号胖子）去了（王树声同志插言：是我带几十条枪送的）。王待人诚恳，去后那方面即积极承认错误和主张与鄂东合并统一领导（王回来即派我去）。商城同志这个问题解决的好。

王到时，周维炯到皖西去了，把权交给漆德玮（代师长）。中央批准了王平章的解决办法，以后中央派王培吾当政委，就站住脚了。（王培吾是大知识分子，苏联来的，因打仗不到火线，大家送外号叫炮兵司令）。

内部派别：李启仁与军队不团结；二是地方上也不团结，李启仁一派，还有反李启仁派（7、80个代表中，有2、30人反对他，谁是头子很难说）。

问题虽然解决了，但鄂东同志对商城同志信任不够。这些事报告到中央。中央对其信任比起对鄂东来也有差别。如第一届省委名单，鄂东占很大比重（提省委名单各区数目有所不同，照顾不同的历史也是一个因素）。大肃反，张国焘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但鄂东保留了一批，如吴焕先、王树声、我……，豫南主要负责的，一个也没留。

将来有关商城方面的材料，我还可以提供一些。至于皖西暴动的情况，我当时不知道。下面继续上一次的报告。

（七）

黄安失守后不多天，在紫区南冲祠堂集合了黄麻两县的革命武装，转移到木兰山。这个行动现在看来非常之好。当时任应歧的军队人蛮多。在黄麻两县扎的很密。我们只剩下几十条枪。需要保存力量。如果就地隐蔽。日子一久，走都不好走。到木兰山有好多好处：

- 1、地形好。
- 2、靠近高桥、二程两区，和老区便于联系。

3、可以利用流氓作耳目。

4、跟省委联系便利，好买子弹（王树声同志插言当时曾有一位女同志，经常到国民党统治区给我们买子弹，但名字忘了）。

5、便于收容自己的人（当时起义区逃亡该地的党员和革命群众很多）。

6、便于扩大政治影响。

这个上木兰山的计划，显然出于吴光浩同志。上面这些特点他知道，对当地情况熟悉，进退有把握些。这是他的高明之处，这个步骤得力于他（当然过了两个月敌人来围剿，就困难些）。从黄安退出之后，必须跳到一个地方。综合各方面的条件看来，恐怕以木兰山为好。在木兰山的斗争，共四个月。当时曾打算到黄冈搞个地方。这一着不妥当，太冒险；脱离黄麻太久也不行。这个计划半途停止了。

后来，在木兰山采取分散、夜间活动的方式。这一着，在当时困难条件下是对的（王树声同志插言：我们在白果镇南××，一枪未发打了一个民团，缴了八架崭新的驳壳枪，大家高兴极了）。戴克敏、徐其虚带一支武装到紫云区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但这一着棋中有一个缺点，就是军事上打反动太多了，不利于隐蔽，非常容易暴露目标。王奠川那一股牺牲（10个人，8架驳壳枪）与这一点有关系。

戴、徐一到紫云区，开始第一仗就打的很成功。这个成功，处于意料之外。这一仗是打上戴家民团（团长郑××，是我家门口的人，和我是同学），本来我们是秘密回来的，但枪一响，一、二十里路内的民众自动配合，真是闻枪而至（当时农民只有听到红军在那里打民团，就自动配合）。以后再其他地方活动的几支部队，也都回到七、紫区。

从打上戴家民团为起点，就叫作进入“柴山堡时期”。

（八）

从打上戴家民团后进入柴山堡，到以后又发展出来，我们当时称为“柴山堡时期”，前后共14个月。以后徐向前同志就到了。

“柴山堡时期”对红四方面军、鄂东、豫南根据地的创建，有莫大的意义。这14个月当中，红军本身只有几十条枪，但作用比过去大的多。

原因就是除此以外，有几千跑反的积极分子和革命群众（当时有人把他叫作“亡命之徒”）。这几千人大多是七、紫、乘、顺四区逃亡出来的。各个都是革命坚决的。还有几十万农民配合斗争（大约是五十万吧，七里区六万多，紫云区四万多）。这时农民斗争也很积极。夜晚跟着打土豪。斗争队伍大得很。这个力量还了得。所以柴山堡时期，是这几十万人唱的戏，也是前两年工作的基础。

其次，当时斗争形势有利。敌人兵力减少，而且由于敌人摧残和罪恶，民众痛恨到极点。打上戴家是旧历二月初旬，以后十来天桂系就接防，大约是阳历三月二十左右。十二军是土匪部队（他们用车子装银元往潢川送），尽量搞人多，七里坪就住着一个师部。桂系军队来了，一处只住个把连，兵力比十二军在时减少了几倍。

再说敌人摧残群众：十二军师长文清林就是土匪头子，十二军不是决心政治反共，主要是发财，两面得钱：地主请他打共产党要拿钱来；捉住共产党就罚款。到他撤走时，狠向土豪要钱，没钱也杀，我们那里就有两个大土豪被他杀了。一个土豪要几万，拿不出来狠杀了几个。这个土匪队伍，把女人拉去当小老婆，至于就地强奸，那就不消说了。土豪跑，只要买通了十二军，他就狠整共产党员。戴季英的母亲，就被土豪用四个大钉钉在墙上，活埋的，把人装在坛子里用火焙……种种杀人手段，为所欲为无所不用其极。这样就把群众的阶级仇恨刺激到极点，人人喊杀，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兵力减少，我们主力回来，你看农民斗争不斗争？

柴山堡本地的形势。当时地主采取的策略是：请兵打共产党不如“跑反”。他们请河南的军队请不来，湖北的可以一请就到，但是怕请去后损失很大（要给养、强奸）。没说十二军，就是桂系十八军、十九军要粮要饷也厉害的狠。黄安有些地主也搞怕了。柴山堡地主有红枪会，原来打我们。我们进去后，地主阶级认为他们控制红枪会，我们不能发动群众。这样一来，他们即采取两面政策：一面敷衍国民党和黄安土豪，一面敷衍我们。

我们回到七紫老区十来天后，十二军即返潢，这是个巧合。实际上，他当时把当地的钱刮干了，群众也恨透了，即便他不走我们也会搞开的。

柴山堡群众，受到黄麻革命的影响。十二军一闹，他们又厌恨军队，

我们去后地主又不请兵，并且地主的压迫又松了些，再加上红军给他一些帮助（那时我们洋钱多的很，在地富家吃饭不给钱，在农民家中吃一顿就给1、2元，小贩也大发）。这样，当地农民不说往前，眼下就好得很。地主呢，也起了分化，反共反的狠的，一批跑了，一批采取“温和”态度，两面应付。原来那些当权的不当权了，而流氓出身的吴文禄和小地主则当权。这些新当权的人，就想抓原来在老当权的地主控制下的红枪会（因为他们觉得红枪会这个东西对他们有用）。可是我们在当地，他要抓红枪会就不能不跟我们谈判。这是我们掌握红枪会的引线。而在当地，当时利用红枪会是发动群众的一个形式（王树声同志插言：当时那个地方的农民，不但不知道共产主义，连三民主义也不知道）。我们能掌握红枪会，是新上台的地主不得不给我们谈判，我们趁势插脚的结果。这样在头年五月还是敌人的红枪会，到今年3月间，就成了朋友，又过几个月就成了自己人。在柴山堡发动群众，抓红枪会抓的好。

我们当时采取的政策，现在说来也硬是高明。我们在柴山堡采取了与黄麻地区不同的政策。虽然宣传减租减息，实际上是劝减租、息。对一些老实农民明减暗送的，也不大加干涉（王树声同志插言：在黄麻杀地主，对这里的地主有威胁，使他们不敢乱动）。对流氓也采取联合，当然以后就杀了。先前不利用不行，后来不杀也不行。我们进入柴山堡的初期，采取比较缓和的策略，全部赢得了人心。我们的情报敌人难弄清，不但农民不供给，地主也不供给。敌人几次来进攻，都是黄安地主带的路。

另外，也做党的工作，秘密串联。如来和仁（相当区委）早就派在当地工作。

总括说来，“柴山堡时期”是形势好，条件好，作法也好。这当中大部分都是曹学楷出的主意。在这14个月当中建立了几个县委和地方武装。从1928年3月几十条枪，到粉碎第一次围剿可以活捉岳维峻，这个发展不算不快。14个月要完结时，就遇到蒋桂战争，敌人好多军队撤走了。从打杨坪口起三十一师长期没回老区，但老区有赤卫队可以保护地方。这是柴山堡时期打下的基础。

还有一个事实说明经过14个月的工作各县工作已有相当势力。1929年12月在胡子石开党的代表大会。军队第一次出发到河口，出发时

间向前同志戴一斗笠，穿一件雨衣来参加会议并向特委要钱。特委即和黄麻两县县委商议（麻城县书李×权；黄安县书戴季英、秘书郑位三），把钱借到了，当时两县都掌握很多钱，每县有几十条短枪。柴山堡时期结束，向前同志就来了，以后的情况我就不谈了。

（九）

谈谈我读“毛选”和研究大革命初期苏维埃运动的几个体会。

北伐统一战线，时间是不会长的。为什么？民族民主革命当中能有一定比较长期的统一战线，不外两个条件：甲乙两大阵营存在，像现在这样，统一战线时间要长一些（比如现在的印尼），但那时没这个条件。没有这两个条件，就不要幻想时间长。当时中国出现了很大的革命高潮，而且形成了统一战线，但是就革命高潮分析，也不会很长。

其一，实力掌握在新军阀手里，我们没有军队；掌握的有组织的群众，力量也小的很。

其二，统一战线中许多只是同路人，政治上很不可靠的朋友，团结他们到统一战线中是对的，但复杂的很：一是他们随时准备妥协；一是群众运动稍一大，就会反对我们。他们的敌我关系很容易转化。

根据形势判读，这个高潮和统一战线也不会长。当时北伐的统一战线和革命高潮在什么基础上形成的呢？一是军阀混战；一是军阀卖国。当时资产阶级所以反军阀——我在上海搜集了很多材料，那个军阀混战还得了，是一个民族自杀的形势，坏的狠哪！我说一条，张宗昌在津浦路打一年，报销军费一千多万，至于其部下搜刮，要捐要税，那就更厉害。这方面没禁令随便他去搞，一个排长就发很大财，冯国璋死时，家中有两千七百万银元的财产。军费硬是把老百姓逼的过不得日子，扩充队伍，搞钱搞枪，百事不顾。另一方面，那个“北京政府”干什么活？就是“借款”、“筹饷”两件事。当时内阁总理不重要，重要的是外交、交通、财政三部。“借款”是外交部，而借款都是为了打内战。叶恭绰向外国办电话借款几百万，借来后修建电话线要求用二十万，可是财政部只批了十万。这样民族危险的很，如果继续走下去，这个民族只好灭亡。军阀混战、卖国，刺激起来的革命高潮。蒋介石这些新军阀即利用这个高潮把自己搞起来的。

蒋介石等既不是反封，也不是反帝，就是把政权由旧军阀转到新军阀手里。这时在阶级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级关系一点也没变，但在旧军阀统治时代，封建统治占主要的。那时袁世凯向天津金融资本金借一百万款都不容易，而蒋上台之后，向上海资本家（通过虞洽卿）一次就借了六千万。蒋介石还在广州的时候，自己力量很小，不够资格，就到了上海，他叛变就有了条件。蒋既无组织北伐到底的决心，也无这个力量。他利用苏联援助，利用我党和革命群众，把他“送脚”送到上海。我们党应利用这个高潮，但是没有利用好，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真的成了“送脚”合乎蒋介石的要求。当时我们要利用高潮发动群众，可是个好机会。第一共产党参加领导；第二、好多军队暂时像个革命军队，封建势力又很孤立，这样农民斗争就有勇气，有信心，顾虑少。这些条件，两湖利用很好，没有这个高潮，杀多少地主也没有多大作用。

敌人的弱点在乡村不在城市；革命潜力也是在乡村不在城市。前一句话，文章书刊上说得很多，后一句话则说的少，但那个文件也可研究出这个意思。

中国和苏联不同，中国是半殖民地，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好多地方建立了据点（如租界等），当时整个帝国主义驻在中国的军队是四万多人，其中日本多一点，五卅惨案时，日本有两个师团在中国，一在山东，一在东北。这是俄国革命时所没有的。再，俄国革命是利用帝国主义被大战和经济“危机”粘住手，顾不了。而中国的内战，不存在此种条件。斯大林曾说：土耳其革命容易成功，中国不容易。因为土耳其就是那末一点点，必要时帝国主义可能放手，而中国则不行。第一次大战当中，日本还搞过“二十一条”，可见帝国主义是不会轻易放弃中国的。

还有，帝国主义对他在中国的利益，在城市不会放手，而且有一定的力量。不说增加，当时驻扎在中国的就有几万军队，中国廉价劳动力多，城市用机器生产，用一点微薄的工资，长期维持容易。所以论利益、论他的力量，他都不会放弃城市。因此，中国要在城市搞赤色工会、合法斗争是幻想。要不就是我们力量大了，把城市夺过来；要不就是他们控制，我们处于秘密状态，而且是长期的。我认为乡（村）包围城市这是一个规律。乡村包围城市者也，意味着城市我们一个较长时期内拿不到。毛主席提出

乡村包围城市的理由，我体会是：第一、帝国主义是主要敌人；第二、农业国，乡村重于城市；第三、力量对比，工人阶级人数虽然很多，但总的看来还不大。这三条就得出了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个规律。乡村就不同了，乡村经济落后，那个国家都谈不到改良。世界上的经验，敌人在乡村采取长期统治有两种：一是日本式的，城市工业比重大，可以把乡村封建势力统治住；二是某些城市经济占主营地位的殖民地。再就是阎锡山的“兵农合一”政策和李、白在广西的政策，但这也要好几年的准备。当时农村的广大人口，对以下这三个剥削受不了：一是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当时日本一要准备二次大战，二要发展重工业，都要钱，而这主要靠剥削掠夺中国，他在一次大战前剥削中国，大战后就加重了。二是军阀扩军备战，军费要大大增加（不管新旧军阀都是如此），比满清时代还要重好多倍，因此，捐税大大增加。三是地主租税也大大增加。洋货来了，地主消费大了，吃的、穿的、用的、玩的，这些增加的消费都出在租税上。因此大革命时代农民非斗争不能活下去。前面一段说明敌人弱一些，后面一段说明非斗争不可。因此革命潜力就在这个地方。再加上农村有两重割据的矛盾：帝国主义割据和封建割据，这又使农村矛盾重重。

以上这些说明：城市敌人长期不会放弃，而革命潜力在农村。

乡村革命怎样发动？一是要有共产党；一是要有武装。农村没有民主斗争。农民原来没有武装，共产党是在城市生长的。党带着武装农民的政策，怎样和农民结合起来呢？就是要和地主“撕破脸”的斗争，包括杀土豪在内。因为共产党要真和农民联系起来，只有“撕破脸”的斗争才能获得农民的信任。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的精神就是“撕破脸”的斗争，当然作文章光这样说是不够的。只有如此才能迅速取得农民的信仰，这一条只有毛主席提倡。

毛主席强调武装斗争，跟农民和当时我们强调武装斗争不同。主席是从分析整个革命特点总结出来的，是战略式的，全国式的武装斗争。而农民和我们当时强调武装斗争，是从直感经验、从当时当地斗争的需要体验出来的。

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根据地和武装斗争是伴生的东西，不是派生的东西。农村根据地意义大的很，主要是政治意义，不是单纯的军事

根据地，是军民革命的问题。格局的实际上是一个“小国家”，从一个“小国家”的角度去了解根据地，这个意义就大了。农村根据地是当时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当时农村革命为主，城市后一点，又意味着乡村包围城市时间长一点。

毛主席和斯大林同志，都主张武装斗争和农村根据地，表面上看来一样，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一）斯大林没有乡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二）斯大林没有提军事上的新思想，毛主席不但提出而且解决了，创造出的一套新的军事思想。（三）斯大林没解决多数党员出身于农民如何建党的问题。由于斯大林这个思想，影响当时中央在提出建立“百万红军”的时候，只好从城市调来工人当红军的干部。

农村根据地要解决三个历史任务，不然革命要推迟很远。（一）积蓄力量，造成乡村包围城市的形势；（二）革命有一个进攻阶段和积蓄力量阶段，这个积蓄力量的阶段，是以农村根据地为主。而不是城市和白区农村为主。这与苏联不同；（三）造成抗日时期能够形成独立自主的军事力量，没有这个力量就没有我们的地位，就不能希望解放战争迅速胜利。照斯大林的意思去办，没有把握完成上述任务。是什么思想冲淡了斯大林的农村根据地的思想呢？就是“两头发展”（城市和农村）。他认为这样革命快的很，没有长期斗争的准备。因而就有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高潮的几次指示。而毛主席把工人运动看得迟一些作用小一些。

我们黄麻这些人，比毛主席不知要差几远，但也有一些摸索。你们在看材料中承认我们很多工作作对了。什么原因？当时毛主席的思想没有给我们见面，这就是靠摸来的，事物有些是可以摸索到的，有些是不可以摸索到的，比如战略方针、总路线，没有高度的马列主义水平是摸不来的。但具体工作特别是在条件有理情况下，可以摸。摸索好要有条件，当时黄、麻的条件：（一）干部群众情绪高；（二）干部和群众关系特别好，就容易发挥群众智慧；（三）当地地主力量弱，没多大抵抗，好对付；（四）革命高潮。

徐向前同志谈话记录

鄂豫皖三省党史调查情况

调访：鄂豫皖三省党史调查组

时间：1958年11月21日

录入：黄文治

校订：李敏

徐老：在“七大”以前，很多老干部都到延安去了，利用休息时间开过会，座谈过，组织过人写材料。因为这是历史问题，人逐渐要老要死，不把它搞出来，觉得很可惜，所以我们写了一些材料，但是写的不多。那个时候大家笔记也没有，文件也没有，就是凭脑子的记忆，大家也写了一些材料，但是不大完全。当大家分头写出来这些材料之后，我病了，大病一场，病了2、3年，病好之后，日本投降了。这时候写的这些东西，不管是不是正确，好不好，我在延安时把它油印了一下，分批保存下来，一直带到北京。但是因为我常常有病，工作一个时期又垮下来了，所以有些材料没有再好好修改。最近大家都忙于别的工作，所以那些材料还是放着。

去年“八一”建军节时发动大家写文章，那些都是军事方面的东西，是短篇的战斗故事，或者是一个时期内的一些东西。写军事上打仗的事多。地方上的活动、游击战争、群众运动这方面写的很少。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搞武装斗争这些作为一般的描写是可以，但是太笼统了，这些东西记住的不多。老实说，过去做过的很多事情要找笼统的说还可以，具体的说就不行了，回忆不起来了。亲手搞过的事情，印象很深的还记得，印象很浅的就记不起来了。

在鄂豫皖那个地方，原来有一批很优秀的同志被杀了。他们究竟有些什么罪名，究竟是不是反革命，我们都不知道。周维炯、许继慎这些人都是陈昌浩逮捕的。“七大”以前在延安时找到了一个同志，他当时在保卫局看押犯人。我们问他：究竟张国焘为什么审讯这些人。被擒的有我们军队里的师长、军长，地方上的有县委、区委的干部。有些区委的同志我不大认识，但是县委的同志我都完全认识。因为常找他们要饭吃，都很熟悉。这些同志在一起都很好，以后不在一起了，当作反革命杀掉了。究竟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在延安的时候我们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就找到这个看押犯人的人问了一下。他说：周维炯的口供是：“老子20年后还是要革命”。许继慎的口供是：“你说我是反革命的，我就是改组派”。当时我们在前方打仗，后面已经开始肃反了。那时蒋介石派人送来一封信给许继慎，我们把信交到了军部。我们没有办法弄清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当时我们怀疑，也有人曾经讲过这个人（指许继慎——编校者注）比较复杂，要注意些。但是这个人我们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反革命活动。这个人打仗还是好的，打得不错。我们就想到肃反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们说：搞了半天也没有证实许继慎就是一个反革命。抗日时期在延安国民党的特务冷欣对陈毅同志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便杀了许继慎”。可见我们上了国民党的当，我们分析在那种环境下，他仍然坚持斗争，证明许不可能是反革命。

杀了这样的人，今天我们说究竟哪个是反革命，我们就没有办法整理这个材料。但是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结论：他们当中有些人的家庭成分虽然不好，但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是在那种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不可能是反革命。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那时一天到晚在一起吃饭、睡觉。我们想了很长时间，很难考虑这里面有反革命。这里主要是主观主义，逼供信加上教条主义。许继慎这些人，他们有时候喜欢讲张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劝过他们不要再这样讲。因为这个事情，张国焘很讨厌他。

我们在军队里作过一次调查。我们有五个师，再加上地方干部有6、7个师，师一级的干部没有剩下来几个。现在只有倪志亮、王树声还在，地方上也杀了一批。

反四次围剿以前，地方上在反对富农路线，也是杀。有一个时期苏

区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分子张国焘的口号。本来那里就有“左”的倾向。以后去了“洋包子”陈昌浩、张国焘、沈泽民三位大将，去了没有多久就开始搞肃反。鄂豫皖的肃反有很惨痛的教训。

这样的肃反削弱了革命力量，使群众离心，把真正和群众有血肉关系的干部杀掉了。讲起全部历史过程就很复杂，讲不完。开始游击战争搞起来了，经过扫荡之后，部队慢慢的扩大了，以后张国焘他们到了鄂豫皖。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打了一些比较大的胜仗。这个时候，一个肃反，一个是“左”的政策，肉体消灭富农，不是搞统一战线。说是反富农，实际上不是反富农，而是把贫农也反了。开始就“左”，以后更“左”，在内部大搞肃反。

再就是对军队不注意休整。那个时候我们的确干的很疲劳。我们部队的干部真是想休整，半年多来就在战争中生活，紧张的很。但是他们不同意，接着四次围剿就来了。对粉碎三次围剿不是很彻底，但是也打了一个大胜仗，如果好好休整。扩大苏区，那么四次围剿来的时候，利用群众的力量，利用敌人的盲目，利用我们的各种有利条件。那么四次围剿是可以粉碎的。以后我们在延安交换意见的时候，大家认为四次围剿还是有条件粉碎的。我们只要利用我们的有利条件，把一路彻底击溃，消灭他的主力，使他溃不成军，不能够马上作战，然后我们再打第二路，这是可能做到的。但是三、四次围剿我们没有争取做到这一点。这主要是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有关。

调查员问：一、二、三、四次围剿，下面的说法不一样，哪个算第一次？

徐老：徐夏围剿不算第一次围剿，在鄂豫皖只有四次围剿最清楚。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他要各个击破，先打湘鄂西，再打鄂豫皖，然后打中央苏区。鄂豫皖地区在津西、京汉、陇海路之间，距离武汉近，对国民党的中心区域威胁很大。粉碎三次围剿所取得的胜利也是不小的，因此蒋介石亲自出马围剿。第一次围剿时是三个地方的敌人，河南是利用一些土匪，以后主要是西北军的一些部队。湖北是利用夏斗寅，再就是河南的部队调一些到湖北。安徽是陈调元，他们有的时候两面都来了，东面、西面都来了，但有时候不一定，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具体情况，但

他们是有配合的。所以我们说第一次反围剿是安徽打了陈调元，河南打了吉鸿昌，以后活捉了岳维俊。第一次围剿被粉碎。第二次围剿比较清楚。我们过去研究这个东西时不很明显，有的时候它是几个方面都来，有的时候从一个方面来。过去我们没有很好的总结经验。有时敌人进攻的快，很快就来了，中间没有间隔，不很明显。我们写材料时把这个东西区分了一下。但是当时没有根据具体情况好好的总结这个东西。

调查员问：那时候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贯彻的怎么样？

徐老：那时候各个地区是分割的，各个区互不联系，一些文件都是经过上海中央来的，毛主席的指导思想根本不能到达鄂豫皖，因为毛主席的思想到了上海就认为它是错误的，当然就到不了我们那里。那个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一些情况呢？有时找到一些报纸看到一些东西。那时上海经常派人来到鄂豫皖，而这些人也不是有意识的作介绍，而是有时谈一谈。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样，毛主席一个报告一下就贯彻下去了。那个时候都依靠自己。那时主席的指导思想，在张国焘来了之后更不讲这些东西了。那时看到苏维埃工会组织法、军事政治工作条例等，这些东西都是从上海来的。没有根据我们军队的特点，完全搞的是苏联的那些东西。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是可以的，但政治委员有权逮捕指挥员，对这一个点我是反对的。因为我们军队的指挥员都是共产党员，有些指挥员的军事水平、政治水平并不比政治委员低。在苏联军队中有不少军官是些白军，须要拿着枪逼着他打仗的。我们的军队不是这样，为什么非要把政治委员和指挥员对立起来呢？这就是把苏联十月革命之后的东西一定要搬到我们这里来。对这一点我很不同意。那个时候上海的中央都是反毛主席的，不可能把毛主席的东西给我们搞来。

1930年初，许继慎派到鄂豫皖来了。那时正是李立三路线时期，派了军长、政治委员全套人员来，直接归上海指挥。他们把地方党和军队分开，规定前委直接归上海领导。前委和特委研究工作要开联席会议，真是自找矛盾。他们把鄂豫皖原来的人马都换下来。开始许继慎搞得不坏。但是过一个时期又从上海派卞继勋来。原来的人又将了一级，我搞参谋长，许继慎搞师长。所以，如果说上海中央对鄂豫皖地区有帮助的话，就是派了一批干部去，换下来那些土生、土长的“土包子”。像戴克敏、曹学楷

这些县委以上的干部，我们在一起搞的比较久。这些“土包子”他们和群众是有紧密的结合的，由这些人掌握政策不会搞出那么大的肃反。四中全会之后，钦差大臣满天飞。他们搞肃反，不是搞有真凭实据的肃反，而是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逼供信，结果肃反扩大化了。

四次围剿的时候，有一次我正在打仗紧张的时候，我要警卫员把袜子送回家补好，准备走很多路。警卫员回来后说：把我老婆（程训宣——编校者注）抓起来了。到了延安后我问他们（指周纯全——编校者注）为什么抓她？她有什么罪过？他们说：没有什么罪过，就是为了找我的材料。他们就是主观的拉人来找口供，拉去问是不是反革命。如果说不是就不行，如果说是，就把你挂上钩了。你说我老婆有什么呢？她的兄弟在我们的司令部当警卫员，以后也被杀了。她家里弟兄四个，有三个参加了革命。她进去后究竟受什么刑法我不知道。大概她没有什么口供，如果供了，也就把我连进去了。所以鄂豫皖那个地区真是多灾多难。那个地方的群众很好。我到过的苏区有四川、陕北、海陆丰、鄂豫皖，但是要数鄂豫皖地区的群众最好，革命最彻底。为什么呢？就是本地干部，土生、土长，和群众有血肉的关系。那么按照他们看来，外地干部应该可靠了，但是也不行。统计一下，就是连莫斯科回来的人，也没剩下来几个。上海中央派去的人，有不少也被杀了。被杀的名单里，主要的人我还记得，次要的人我就想不起来了。在延安的时候搞烈士簿，我们凑了一下，那些材料我没有带出来。前一个时期安徽来信了解许继慎的材料，我写了一些，但是有些东西记不清了。有些同志的确是为革命忠心耿耿，如果是被敌人打死了也值得，但是被自己当作反革命杀了。

调查员插话：我们下去调查的时候，一些家属一定要我们向上面反映，恢复他们不是反革命。

徐老：恢复是没有问题的。

调查员插话：周维炯的家属现在地方上还是被当作反属看。

徐老：这是不对的。在豫南，周维炯和地方党结合起来搞暴动。有周维炯、肖方、漆海峰（这个人被我们枪毙了），还有一个漆德伟太软弱了，中央没有办法处理他，以后送到中央苏区，在路上牺牲了。肖方这个人我的印象不太深。周维炯，许继慎是陈昌浩逮捕的，这个我知道。周维

炯这个人有毛病，但是打仗很勇敢，人很聪明，就是有一点英雄主义。我是1929年5月端午去的。以后听说，徐其虚到了豫南之后和他们联系想把鄂东北与豫南统一起来。徐其虚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我不知道，可是派他做三十二师党代表，周却把徐枪毙了。再以后又派吴光浩去，被屯家堡民团逮捕，在半路上牺牲了。又派刘英，郭述申同志到鄂豫皖，一个搞军队工作，一个搞党的工作。这些人去的时候周又想整他们。刘、郭知道后就跑掉了，没有整到。周维炯这个人有英雄主义，在旧社会流氓习气很多，但这个人并不是反革命。把他抓去之后，也没有问出口供，他只是说：“老子再过二十年还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表现的很坚决。据看犯人的人讲，这些人是被绳子勒死的。应该肯定周维炯搞革命工作有功劳。以后做师长、副师长作战很勇敢，就是作风不好，再一点就是党性不纯。在1929年中央决定我们这里三十二师和三十一师会合。他们在山里活动范围小一些，弹药缺乏。我们给他们一些枪、子弹。在打仗的时候，他们打一面，我们打一面。我们对其也是不大放心，一方面要配合，按照党的原则谈问题，一方面我们思想上也有准备，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子弹上好，带着枪，怕这些人乱搞。如果他们乱搞，我们就不客气。那时山区很困难，他们来之后，给他们子弹、枪，配合行动。这些地方还是不错的。我对他的印象是：这个人打仗很勇敢，服从军部指挥，以后打仗中没有看出来什么。以后鄂东北三十一师改编成为第一师，到豫南，没有看出来周维炯有什么变化，他是服从指挥的。以后一、二、三师互相调配了一下，第一师人多枪少，二、三师人少，战斗作风差一些，把我们第一师的调了一部分到那边，他们那边又调了一些到我们这里。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平衡发展。在这期间，周维炯都没有什么，所以不能说这个人是反革命，他的家属不应该按照反属待遇，而应该按照烈属待遇。1929年正是革命低潮的时候，他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暴动，应该受到高级干部烈属待遇，受普通烈属的待遇都不应该。

周维炯和漆德伟是姑表兄弟。漆是一个大地主，他的成分不好。李梯云和肖方是亲戚。我对李梯云的印象比周维炯好。估计李在那种肃反的情况下不会在了。如果还活着的话，可以说是虎口脱生。有这些人在，豫南的工作就好搞多了。我对这些地方的情况也不完全了解，你们还可以找

徐立清同志谈一下。

调查员问：豫南这方面的材料不好写，周维炯、肖方这些人没有了。还有个王效亭当时成立了一个三十四师，他是师长。

徐老：这个情况我就知道了，因为我没有到过这些地方。

调查员问：当时有没有三十四师？

徐老：我们只有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不记得有三十四师。是不是由地方上搞起来的，就不清楚了。

调查员问：红三十四师 1930 年春成立起来后不久就失散了。它曾经和三十二、三十三师配合打过仗。

徐老：那时候已是第一军了，1929 年以前是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1930 年春就改成一、二、三师，那么在 30 年春怎么会跑出来三十四师呢？这个就不清楚了。

你们三个地方搞协作这样很好，因为过去它就是一个整体。关于地方上的情况，位（郑位三）老了解的多一些，军队里的情况我了解的多一些。过去在延安时用了二分之一的搞这方面的工作。搞了之后总觉得不像个东西。反正作为一个材料还是可以，你们拿去看看，这上面有些东西在群众那里是调查不到的。但是这里面有些提法是不对的，有些观点还要修改。

调查员问：四川方面的情况徐老是不是能谈一些？

徐老：四川方面的材料写了一个东西，比鄂豫皖的材料写的还要好。二十八军方面的材料，有些观点很不负责任，只是作为材料参考。

徐向前同志谈话记录

时间：1982年8月14日上午

地点：后海南沿三号

访问：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缪楚黄、刘经宇、佟英明、叶心瑜

整理：叶心瑜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

廖盖隆同志：上次我们给徐帅写了一封信，想请徐帅谈一些问题。

徐向前同志：你们的信，我已经看过了。还有什么问题？

廖：如还有时间，也请谈谈西路军的问题。

徐：可以。还有什么问题，随便谈吧。

最近2、3年内，写战史、写回忆录的人很多，有些问题找我谈，就引起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引起我对过去问题的回忆。我们都是党员，要把党的历史按本来面目研究出结果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论的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研究出结果来，得出正确的答案，这的确是很重要的问题。你们花了不少心血，看了不少资料，研究好了，把问题提出来，引起我们回忆思索，是很好的。

最近2、3年内，有好多同志写回忆录，一些已经谈了。有些问题要回忆回忆，究竟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情况。过去有好多框框，现在没有框框了，冲破了框框，就能得出正确的答案，提供正确的参考资料。

你们的信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提到1977年9月我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整理者）。那篇文章是我签了名的，我要负责。我看那篇文章有三处不正确，被歪曲了，需要更正，现在有个问题，我看了吕继熙（吕黎平）写的文章，又把我那篇文章的看法重述一遍。

因此，我感到有些问题自己也需要根据事实进一步研究。这样我就叙述些历史背景，提供历史事实，请党史工作者研究。那篇文章有三处讲得不对：

（一）关于“张国焘擅自决定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的问题。

过去，也有的文章说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是逃跑。一些同志研究了这段历史，认为这个结论不对。四次反“围剿”失败了，苏区不能存在，怎么办？只有退出鄂豫皖。我回想当时召开了黄柴畈会议，有二十多人参加，我也参加了。会议临时决定离开老根据地，到平汉路以西，兜个圈子，打下敌人再回去。原来是这样计划的。结果过了平汉路以西，敌人追得很厉害，仗打得很多。我们在枣阳的新集和土桥铺一带打得很凶，损失也很大。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也没有什么退却不退却的问题，我们是被迫撤离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冲破敌人的阻击，向西走。关于这个问题，在延安的时候，陈云同志，还有康生找我谈过。他们问，你们到四川是不是有计划的？我就把战斗的经过说了一下。我说不是有计划的，是被迫的，开始是准备兜个圈子，等打下敌人再回去。后来回不去了。回不去就向西退。起初准备在豫西建立根据地，不行；又准备进入陕南一带建立根据地，也不行。那时杨虎城已守住漫川关，胡宗南已经追来，进入陕南，我们去汉中的路被堵住了。我们在敌人追击下，越秦岭转到西安附近。在西安附近，遇到敌人重兵堵截围追。经过激战后，我们再越秦岭，到了汉中。接着我们就到了四川。那时四川军阀混战，反动统治力量薄弱。到了四川我们就站住脚了。我对陈云、康生叙述了这一过程。至于中央给张国焘有什么电报，我没有看到过，也不知道。但今天看起来，退出鄂豫皖是不是退却、逃跑？当时被围困在苏区里面，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想在苏区继续战斗下去，就有被消灭的危险。所以只有在外围兜圈子，结果被迫兜到四川去了。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就是这样的情况。我把历史背景讲出来，你们可以考虑考虑。

（二）1935年（左路军）南下时，张国焘是否发过“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问题。七七年文章说有这样的电报，是不对的。我没有看过这样的电报。帮助我写文章的同志，是按照传统的说法写的。那时我很忙，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多加思索。有人以为我对这个问题很清楚，其实我对这个问题不清楚。在毛儿盖开会的时候，会议决定是到川陕甘去搞根据地，于

是才兵分两路北上（你们可能已看到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他也谈到这点）。原来是决定一路走，同中央红军一块走。但张国焘要把红四方面军分两路走，他有野心，想当头头。张国焘决定要把四方面军分两路走，我们是没有办法的，他是红军总政委，中央对他也没有办法，我们对他更没有办法。我和陈昌浩带四军、三十军到了包座，到了班佑、巴西一带，在巴西停下来。张国焘和朱老总、刘伯承同志带九军、三十一军到阿坝。我们在巴西停下以后，我和陈昌浩曾经给张国焘去过两次或三次电报，催他过河。我们说，草地久驻不行，一是外面敌人在调集兵力围追堵截，二是我们这个地方吃饭也成问题。那时，驻巴西的四方面军天天都向中央报告，陈昌浩究竟每天向中央报告些什么，中央有什么指示，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我们给张国焘的电报中还说，你们应该赶快过河（嘎曲河），从阿坝快些来，争取时间出草地。最后我们还去电报说，你们实在不好走，我们派四军的三十一团带粮食来接应你们。而张国焘回电说，那里是草地，嘎曲河下雨涨水，实在过不来。

接着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任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讲过的危害。至于怎么危害，我们也不好问，我们也说危害。我们执行过张国焘路线，我们也不便怎么说。

关于“武力解决”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我们四方面军文化太低，一方面军人材多。我们请求中央派人来红四方面军，中央就派叶剑英同志来当参谋长，还有陈伯钧、张宗逊、彭绍辉等同志。“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是没有看到过的。当时，他们（一、三军团）夜里走了，我们不晓得。早上，前面部队打电话来，说他们走了，还筑了工事，放了警戒，打不打？当时接电话的是陈昌浩，他手中拿着话筒，面对我说：“这事怎么办？”我肯定地对陈说：“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怎么说也不能打。”这句话是我亲口讲的，这是事实。我不回避上述的事实，我不隐瞒事实。

还有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象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人译的。发给谁，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是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

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人译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过去都是这样传说。但要南下的电报是有的，我们南下了，这是违反了纪律，我们承认了错误。

（三）关于西路军过黄河的问题。七七年的那篇文章说是张国焘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过河的，西路军失败是执行张国焘路线的结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的确是我率领四方面军过河的，这是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来电决定的，是中央军委的命令。我和先念见过面，谈过这件事。他也说是中央决定过河的，不是张国焘擅自决定的。因为我们接到中央的命令后，四方面军总部找了李先念，要三十军先头过河。后来三十军就过河了，九军过河了，总指挥部过河了。敌人赶上来了，四军、三十一军没有过成。

我看过说张国焘擅自命令西路军过河，西路军过河是违背中央命令的说法，是不对的，不能把中央命令说成是张国焘的命令。今天要实事求是，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搞清楚它。七七年的文章中那种说法是不对的。如果文章再版，就要修改，或者现在就要写说明，因为那样说法不对。不能把要求（指张国焘曾经提出的西进的要求一整理者）当成事实，不能把中央命令说成是张国焘的命令。西路军过河是中央军委下的命令，不是张国焘的命令。

关于西路军过河的问题，在延安时高岗问过我，我对他讲过这个问题：西路军过黄河以后，如果不打一条山，不在永昌、山丹建立根据地，一过黄河我们就往西面走，打嘉峪关，把玉门、把安西守起来，把敦煌守起来，那里没有好多敌人，建立根据地，还可以立住脚，马步青是怕我们的，我们有准备。以后青海的马步芳追上来后，跟我们打起来了。在永昌地方打敌人，时间打得太久。那地方北面沙漠，南面是祁连山，中间是狭道好像弄堂。在那里搞根据地，一是吃饭问题不好解决，二是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有民族隔阂，人也少。况且敌人是骑兵我们是步兵，他要吃掉你，搞久了，不行，无法建立根据地。在延安时，高岗问我：你对西路军怎么看？我回答说西路军过黄河后，不打一条山，不在永昌、山丹一带搞根据地（那是中央指示搞的），一过黄河，我们就往西走，打嘉峪关，把安西、玉门守起来，把敦煌守起来，那里靠近苏联，一是有饭吃，不挨

饿；二是不受冻；三是有弹药补充。陈云同志他们从苏联搞了武器。如果补充了大炮、机关枪，马家军再多一倍也不够我们打。过去我是这样看法，今天我还是这样看法。这不是“事后诸葛亮”，而是研究问题。

西路军的失败究其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过黄河后，轻视马家骑兵，这是我们的错误。西安事变后，毛主席打电报给我们，问是否可以回来，我们也往东打过，但路被敌人堵了，没能回得来。如果那时过了黄河不打一条山，不搞跟根据地，一直往西走，西路军是不会失败的。

因为你们提问题来，所以我给你们讲这些情况。过去那篇文章有些地方是不对的，要更正。

你们提出来的问题，我回答的就是这些。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你们是研究党史的，过去的框框都没有了，思想都解放了，要用新眼光来看旧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如实反映当时情况，我觉得很有必要。你们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有价值，把资料整理出来，对党史是宝贵的贡献。

你们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廖：关于张国焘电报的问题，宋侃夫同志曾经来党史研究室谈过，说四方面军的电报都经过他的手。他说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字样的电报。

徐：电报都是经过他发的。“文化大革命”中整他，就是说他是张国焘忠实的“走狗”，被关在地下室好几年。

廖：宋侃夫同志说要四方面军南下的电报是有的。

徐：张国焘原是中央代表，我们都是受他指挥的，哪里知道中央还有另外的意见！原先我们稀稀拉拉的，接到南下电报后立即过去。他还要我们准备，要我们过去。毛主席来征求过意见，我的意见是一起走。我考虑的不是别的，是不愿意把四方面军分开，这支部队从鄂豫皖一直打过来，很不容易，一个南下，一个北上，这样不好。

我是1929年去的鄂豫皖。后来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也到了鄂豫皖。1931年11月7日成立了红四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时，我们南下打英山、广济等地，以后奉命回来。张国焘在白雀园肃反，杀了不少干部，把那时部队的指挥员、几个党代表、政治委员都搞掉了，县委书记、地方干部也被杀了不少，军队干部杀了一批又一批。鄂豫皖肃反比湘鄂西

好不了多少。第四次反“围剿”那么紧张，他们还杀人。连我的老婆也杀了，我那时也感到紧张。我对张国焘、陈昌浩私人感情并不好。我对陈昌浩说，肃反杀了这么多的人，是不对的。我曾要求调中央区工作，张国焘、陈昌浩不同意，我也就没有向中央提。

1977年的那篇文章，在三个问题上犯了错误的。当时有当时的框框，当时有中央文件，有西路军事件，有那样的传说，说退出鄂豫皖是错了，西路军过河是错了，当时就是有这些框框。

廖：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因为电报是他交给毛主席看的，请他回忆有无“武力解决”中央的字样。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我们研究室的同志看到1937年中央政治局批判张国焘的会议记录，毛主席的发言中谈到，叶剑英同志把电报交给他看，电报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样的话。

徐：我没有看到“武力解决”字样的电报。吕黎平的文章引了我的文章，你们写文章是或否也引了我的文章？那篇文章是我签了名的，我要负责的，不管怎么说，我是要负责的。只有再版时更正。

郭春福同志：1977年，《人民日报》为了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请徐帅写文章。《人民日报》社推荐军事科学院的几位同志同《人民日报》的同志帮忙写了那篇文章。他们写好稿子后交给我，徐帅叫我先看，我对这段历史不熟悉，文章中出现问题应该由我负责。

徐：我怎么能把责任推给你们呢？责任我是要负的。

廖：总之，张国焘要求四方面军南下的电报肯定是有的，主要是电报用什么措词现在有不同的说法。

徐：南下电报是肯定有的。我们同意南下，是犯了错误的。

廖：中央看到张国焘要四方面军南下的电报，感到处境危险，所以立即离开四方面军北上了。

现在还有个问题，也请徐帅谈谈。鄂豫皖苏区发展得很大，后来川陕苏区也发展很大，部队发展到八万多人，一说十万人，这说明四方面军有成功的经验。另外，最近在南充市召开川陕根据地学术讨论会，会上有的同志说川陕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其中有张国焘的功劳，因为他是头头。到底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川陕苏区是有成绩的，但成绩该不该算在张国

煮头上？张国焘在政策上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川陕苏区有那么大的发展。至于打仗方面，大家都晓得，张国焘不会打仗。为什么打胜了呢？仗是徐帅、曾中生、旷继勋、许继慎（许已在鄂豫皖被肃反杀掉—徐注）……等等同志指挥打的，不能说张国焘有什么功劳。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看？

还有西路军的问题。这牵涉到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对张国焘退却逃跑有些批评的看法，毛主席说，西路军失败说明了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到底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有什么关系？

到陕北后，我们同张国焘没有直接关系了。我们主要是与中央军委联系，我们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领导，是受中央指挥的，受毛主席指挥的。西路军有个军政委员会，主席是陈昌浩，副主席是我。我们西路军主要是军事上的问题，是战略战术的问题。我们过黄河后瞧不起马家军，结果吃了几个大亏。我在延安对高岗说过，我们过黄河后不打一条山，不在山丹、永昌建立根据地，一直往西走，和苏联联系上，有吃有穿，不挨冻受饿，弹药又可以得到补充，我们是打败马家军的。这就是西路军的问题。

过去说西路军过黄河是张国焘退却逃跑。西路军到底执行了谁的命令？据我看，过黄河不是张国焘的问题，是中央下的命令，不是张国焘下的命令。你们是研究党史的，该中央负责，还是张国焘负责？可以查一查当时的材料。

张国焘这个人，他是有野心的，最后成了叛徒。但是，不要因为他是叛徒、坏蛋，就认为他一切都错了。我对张国焘一生也不大了解，他在二七运动中，在大革命时期的行为，我不了解。我以前还不是党员，在武汉时期我是新党员，一般党员。

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确是王明派来的代表，他是执行王明路线的。毛主席说过，王明路线时期，“钦差大臣满天飞”。的确如此。张国焘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博古到中央苏区，夏曦到湘鄂西苏区。但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时，苏区已经很强大了，根据地有很大发展。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完全执行了王明路线。我们南下打英山、浠水、蕲春、黄梅、广济地区，他要我们出安庆，威胁南京。我们打仗的战术是“围点打援”。这种战术是在我们力量不大，武器不如敌人，敌人力量强大的情况下采取的办法。也只有采取这种战术才能取得黄安战役、苏家埠战役的大胜利。

这时已经有红十师、十一师、十二师、十三师，以后又有七十三师、七十四师、七十五师。黄安战役是围点打援的典型。后来，商（城）潢（川）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川）光（山）战役也是这个打法。我们没有炮火，子弹也不如敌人多，我们就采取战壕对战壕的办法消耗敌人，慢慢接近敌人，把敌人围住。我们没有吃的，敌机便空投粮食，结果十分之八、九都投到我们阵地上来了。因为敌我之间空隙很小，空投的粮食一飘就飘到我们阵地上来，我们围住敌人，打他的援兵，最后把他们消灭了。

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后，我和陈昌浩主张在北边赤白交界处休整，可以向白区要粮，可以扩大苏区。但张国焘和中央分局不同意我们的意见，要我们夺取麻城，威逼武汉。我看到省委的一个文件上出现了国民党是偏师的观点。我们围了麻城，敌人的四次“围剿”就来了。那时我们情报很差，中央也没有供给什么情报，敌人到了跟前才发现。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我们打了卫立煌的李默庵，打了陈继承部的黄杰，把黄杰的司令部也占了。我们打垮了不少敌人，但没有消灭敌人，只是击溃战，因为自己的力量不够。最后，被迫转移。

张国焘是川陕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到四川后，他的错误是明显的。如对地方部队本来应该很好地帮助人家，三十三军帮助他，他却削弱人家，最后他把三十三军番号也取消了。对地方政策，只要是当过保长哦，他都杀掉。我有看法，有的保长还是穷人，是大家把他推出来当的，不应该杀掉，但政策是那樣的。张国焘主要是执行“左”的政策，所以搞来搞去，最后还是撤离川陕苏区了。当时我们有好多意见，我也直接讲了，但张国焘不采纳。鄂豫皖苏区主要是“左”的错误，土地政策是“左”的，经济政策也是“左”的，一块银元才买二两或四两咸盐，把小商人、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我说鄂豫皖苏区即使第四次反“围剿”搞得好，按我和陈昌浩的意见打，把敌人打垮了，敌人还会来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是三步棋，一是打湘鄂西，二是打鄂豫皖，三是打中央苏区，各个击破。而我们三个苏区是互不相联的。蒋介石把湘鄂西搞掉后，就来“围剿”鄂豫皖。我们即使按原来的设想打，把敌人击溃了，也不过伤其一指，蒋介石的基本力量还是存在的，他还会发动第五次“围剿”的。而我们由于“左”的错误政策，把苏区搞的民穷财尽，人力物力都没有了。农村开个会，你看主要是

妇女，男的都当红军去了。当时扩大红军，贫下中农出身的年轻人都参加了红军。如果你看到年轻人没当红军的，那就是地主富农出身的。这样的政治、经济政策是不行的。在四川也是这样。当然我这些想法，都是“事后诸葛亮”，但作为历史问题来研究，可以有这样的看法和想法。

廖：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是被迫退出还是退却逃跑，现在还有不同的看法。

徐：是有不同的看法。当时是被迫退出川陕苏区，不退出怎么可以？我把川陕根据地情况给你们谈谈。

我们粉碎敌人的六路围攻以后，我和李先念极力主张渡过一个师到嘉陵江西岸去，把嘉陵江西岸掌握在我们手里。因为那时敌人溃不成军，西岸都没有敌人，南部县有过暴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都是很高的。川东、川北党组织的基础都很好，我们去以前，革命都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川东的万县、达县、宣汉一带有党的活动。我们主张在嘉陵江两岸活动，一方面回旋余地大，另一方面可以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要准备粉碎敌人新的“围攻”。但张国焘不接受我们的意见。他是中央代表，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把主力全部撤回去。我们回来后，敌人重新整顿，在嘉陵江东岸活动。这时我们接到中央的电报，命令我们派一个师迎接他们。我们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消息：徐海东部队也到了豫西一带。我们也想派一支部队去策应他们，迎接他们。中央要我们派一个师去迎接他们，他们想过长江。我们觉得派少了不行，派多了又派不出来，因为按照四川地形需要我们出较多的兵。中央的电报我看过，我还记得这件事。派一个师的兵力迎接中央是不行的，兵力太少。四川是那样的地形，敌人在后面堵住，这一个师就回不来了。

在四川也是几进几出，加上我们“左”的政策，错误的肃反政策。如旷继勋同志曾任红四军的军长，竟在肃反中被张国焘杀掉。我们到四川开始还不错，但很快群众就有反映。我们是“左”的政策，主观认定人家是地主。有的地方我们占领了一下，后来又退出来，有时进去，有时又出来，几进几出，苏区遭到很大破坏。一是敌人的破坏，一是自己政策上搞错了。我们本来想打胡宗南的部队，占领嘉陵江西岸。我们在广（元）昭（化）战役后，又把兵收回来。要过嘉陵江，不但遭到敌人阻击，还要爬很高的山。张国焘见通（江）、南（江）、巴（中）守不住了，有点恐慌。

我倒不管，因为我不常在后边。我到四川后，几乎每天都在前线打仗，到后方也不过三、四次。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之后，张国焘找我商量，说在四川地区不大好搞。“左”的政策把苏区搞得民穷财尽，民不聊生，怎么好搞？到汉中，汉中南面是巴山，北面是秦岭，那地方很小，不适宜搞根据地。敌人来了以后，把你围在那里，就没有办法。我在清江渡会议上曾提出，接应中央红军，派小部队不行，一派出去就会被敌人吃掉，大部队也派不出去，在老苏区不行，我们只有在川、陕、甘交界的地方建立根据地。这样四川可以联接起来，陕南可以联接起来，甘南可以联接起来。川陕甘计划过去也有过。我们打的主要敌人是胡宗南。我们开始讨论今后怎么办时，我就提了上面的意见。于是我就带部队过嘉陵江，张国焘留在后面。我们打到剑门关，剑门关南面和北面不一样，剑门关形势是南进容易，从北进难。人家说剑门关险要，我说也险要也不险要，从陕西到四川就很险要，从四川到陕西就不险要。我们占领了江油、中坝等地。江油是邓锡侯的部队，我们没有和邓锡侯硬打，我们把它围住了。这时我每天都打电报给张国焘，说我们前面部队已打开局面，你们后续部队要马上跟上来，不然我们前面没有办法。本来我们要集中主力打广元、碧口。碧口是胡宗南的老巢，是嘉陵江和白龙江的汇合处。但张国焘他们不上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只有两个军的实力。一个军攻广元、碧口，一个军已打到中坝，差不多要到绵阳了。四川军阀是惊弓之鸟，我们不怕他，少量的部队可以对付大量的敌人。但张国焘不及时跟上来，他们是搬家式的，整整延迟了四十天，大部队在那里慢慢行动。大部队本来可以迅速行动，围住胡宗南，可以给敌人痛击。当然要有牺牲，我那时是下决心牺牲的，牺牲几千人、万把人，也要打下来。当时关键性的问题是打下胡宗南。你要打垮胡宗南，不牺牲这些人是没有办法的，我差不多每天都打电报给张国焘，而他们却延迟了四十天才上来。那时敌人已经把阵地巩固了，搞得好好的。而我们却大搬家，什么都搬，而且后面陈昌浩还指挥烧房子，搞什么肃反、坚壁清野。这事我一直到延安才知道。他们说什么总指挥部内有暗藏的敌人。我们好多干部、战士死在他们手里。那时部队干部、战士挨了整，不少人牺牲。大部队到了万州坝，那是个很大的镇，人也很多，也很热闹，我在那里住过几天。部队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没有办法，被

迫退出来。当然，张国焘是不是有计划地退出，我就知道了。川陕甘作战计划未能实现，打不开局面了，被迫撤离，退出通南巴，到了懋功、松潘。而且退出通南巴也没留下多的部队，只留下刘子才率千把人枪，坚持当地斗争。刘子才也不怎么精干。应该多留些部队。

张国焘是否有计划的退却，我不知道。四川那个地方，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直要爬到山顶上。通南巴那个地方，小镇子很多，有的镇，山是很险要的，你占领它，堵住山口就没有办法过去。

放弃川陕甘苏区的过程就是这样。你们今天叫我下什么结论，我讲不出来。因为执行了过左的政策，结果那个地方搞得人力财力都没有了，根据地如果没有人力、财力，怎么能存在？一要吃饭，二要穿衣，三要弹药，弹药主要来自敌人。没有人无法打仗，弹药也无法补充。毛主席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道理就在这里。伤其十指，不碍大局，他擦了药又好了。就是说，断其一指才能消灭其主力。胡宗南的部队有补充，我们打仗没有补充。我们每打一仗，都要考虑究竟为什么要打仗，怎样才能消灭它的主力，这是军队存在的重要方面。你打消耗战，怎么能打败他？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就是和敌人拼消耗。你人力没有他多，财力没有他多，物质力量没有他多，怎么能和敌人拼消耗？因此，毛主席主要强调要进行运动战。我们军队是长于打运动战的，我们战士能吃苦耐劳。“围点打援”也是运动战。我们没有武器，但是能打运动战。一个苏区要存在，一要政策对头，二要苏区不断扩大。政策不对头，苏区就不能扩大。执行“左”的政策，苏区就不断缩小，怎么能存在下去？政策错了，只有退出，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唯一的生路就是打出去。这就是我给你们介绍的当时情况。你们问我得看法，这就是我的看法。

廖：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汇合时，到底有多少人？

徐：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一方面军不知多少。我们确实确实有八万多人。我说八万多人，不仅是正规军，也包括地方部队；真正有战斗力的部队，大约五、六万人。我们有五个军，三十三军其实力量很小。我们最大的范围，打到嘉陵江边。我们曾打到川西，打到中坝、江油、绵阳。

中央红军是多少，我不知道。陈昌浩写标语，说三十万红军大会师。我在旁边发冷笑，哪有这么多红军？你这样宣传还兑现不兑现？两个方

面军会合时，我不是先头部队，先头部队是三十军、九军。李先念是先头部队，但他们也不好问人家，你们有多少兵力？

廖：四方面军南下时损失很大，差不多牺牲了一半。

徐：那差不多。南下差不多牺牲了一半，过草地牺牲很大。一方面军牺牲少些，因为他们没过那么多草地。我走过的这条路很清楚，死的人很多。南下时，主要是百丈关和雅安的战斗，我们损失很大。我们要和四川军阀打仗，还要和胡宗南、蒋介石打仗。张国焘南下想跑到安全的地方，结果也呆不住。你兵多了，在那安全地方没饭吃；兵少了，人家要吃掉你。

佟英明同志：陕南战役应该怎么评价？现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全盘否定；一种是说军事上打了胜仗，但在政治上破坏了同杨虎城建立的统一战线关系。

徐：不管怎么评价，陕南战役不是真正打杨虎城的，只是虚晃一枪，我们的真正目标是打胡宗南，不是想打下汉中，但后来打到了南郑城郊。不知道当时情况的人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也就是不身临其境，就不知道其中底细。陕南战役只是虚晃一枪。因为我们与杨虎城签订了停战协定，有统战关系。上次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学术讨论会，听说你们参加了会。（叶心瑜：我参加了。）你们对陕南战役怎么看法？（叶：《中央党史大事年表》已经谈了。）

缪楚黄同志：西安事变以后，西路军是否有两种发展方向？或是向东发展，或是继续向西发展，后来怎么又决定向西发展？

徐：毛主席给我们打电报说，你们如果有困难，是否可以过河来。那已经是西安事变以后了。没有西安事变，我们也准备过河东。宁夏战役计划并不是四方面军过黄河后才定的，而是事先定的。我们红四方面军过河，是中央原先就有宁夏战役计划。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们调查一下，定远营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绿洲，地方那么小，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无法解决，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远营是不行的。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我在会上列举了六、七条理由，说明西进的好处：如西进可以拿到武器；可以打通国际路线；西进对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也是鼓励。我们占领山丹、永昌时，九军遇到马家军，在古浪打了一仗。马家军比我们少，损失很大，

我们伤亡也很大。那时我和陈昌浩发生争执，我说现在形势是我们处于守势，处境不利。陈昌浩却轻视马家军，说什么完全击败了敌人。他看到敌人有后方、有补充，而我们没有根据地，没有补充。我和陈昌浩的辩论没有什么结果。反正我讲我的理由，他讲他的理由，我们争论了很久。我是从来不想和他公开争论的，这次实在忍耐不住了，而且这时他也没有张国焘作后台了。

廖：西路军过河后，张国焘有没有给西路军发过电报？

徐：没有，我的印象没有。那时西路军收的都是军委的电报。可能有个别他和别人共同签署的电报，因为他是总政委。

廖：好像有一次西路军想回来。

徐：是这样。在永昌时我们想回来。想叫于学忠接应我们。为什么以后没有回来呢？因为马家军又追上来了。他们超过我们，到了山丹。那时我们前面的一位指挥员回来说，马家军见我们想回去，很快地就调兵来阻止我们。在凉州、永昌之间的空隙堵了。我们已失去返回河东的机会，只好又继续西进。我们是步兵，他们是骑兵；我们一夜只能走六、七十里或七、八十里，敌人是骑兵，走的快。中央有指示，命令我们在永昌一带建立根据地。中央曾批评我们信心不足。中央是这么批评的。其实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不行，北面是沙漠，南面是祁连山，中间是弄堂，地方很小，回旋余地很小。建立根据地不是说一去群众就起来，要有个过程，要把敌人打败，要不断取得胜利，群众才能起来。要几起几落，群众真正想通了，才真正起来，根据地才能真正巩固起来，这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建立根据地不行；如派部队出去，派少量的部队不行，敌人要吃掉你；派游击队、筹粮队出去，又出不去；大部队整个出去，那等于整个搬家，准备打到底；打到马家军占领的地方又不行。在这种情况下，最后还是只好西进。

廖：徐帅刚才讲了三个问题，我们准备把录音整理好，请徐帅审定，我们将作为党史资料保留下来。

郭：不供发表。

廖：我们只是作为党史资料，供领导参考。

徐：对。我只是给你们提供资料，提供研究这些问题的历史背景。

访问徐立清部长谈话记录

谈豫南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

调访：鄂豫皖三省党史调查员

时间：1958年11月27日

录入：黄文治

校订：李敏

徐部长：在北京了解鄂豫皖方面情况多一些的，第一是位老（郑位三——编校者注），第二是徐向前同志，第三是徐海东同志，第四是王树声同志。这些同志了解的比较多一些。

有些情况我不太了解，因为我没有参加暴动，暴动之后才去红军的。地方工作也没有参加。军队工作现在有很多东西记不起来了。最近病了几年，搞得记忆力非常坏。过去也没有什么文字的东西，搞了一些文字的东西，就在一个麻袋里装着，丢了好几次。现在什么文字的东西都没有了。有些东西有印象，但是记不清楚，也不具体了。

关于鄂东北方面，现在人多，材料也比较具体。材料少的是商城、固始、光山、罗山这是在一起的。商城一带和皖西北的材料少一些。少的原因主要是那个时候参加暴动的老人，过去肃反时都杀了。在豫皖一带，不要说是领导暴动的，就是参加暴动的人，现在我知道的也没有几个。有个别的人，现在岁数大了。脑子也不清楚了。所以，豫皖方面的材料更少了。

在鄂豫皖参加军队的人还是不少，我知道的人还有好几十。但是，这些人都是以后参加军队的，都是在1930年左右参加的，那个时候还是十多岁的孩子，对鄂豫皖的情况就了解的很少。

还有周纯全同志可能了解一些情况。苏井观，他是潢川人，以前在北京、天津念书，学医的。在28年到了鄂豫皖，就在红军里，一向在红军里搞卫生工作。

你们需要了解一些什么东西，可以出一些题目，我们把情况凑一下。

调查员问：我们在金寨调查了一个多月，这方面的情况了解的很少，我们想请徐部长把这个地方暴动之后党组织的情况、武装斗争、军队编制的情况谈一下。还有这个地区的行政区划也不清楚。那个地方是豫南党委领导还是属于皖西北党领导，也没有搞清楚。我们最近在中央秘书局看了一些材料。从材料上看商城好像是归皖西北，但是在下面调查时，他们都说明商城归豫南。从材料上看，有一个党委领导同志叫方英的，他在报告中说归皖西北。这个区划我们不清楚。

还有，有的材料上说十二师在豫南、皖西北叫做三十三师。但是方英的报告中十二师在皖西北，师长是肖方。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十二师的师长是周维炯。

徐部长：1931年以后才成立了党委，以前是特委。十二师的师长是肖方。

开始时的情况我记不清楚了，因为暴动的时候我没有参加。我记得情况是这样的：

暴动以前的大体情况知道一些。在商城这一带，在大革命的时候搞过农会。农会搞了3个月就失败了。大概是1927年的5月到8月这个时间，公开成立了农会。当时是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多少人，什么人负责，现在搞不清楚了。我们那个时候，只有十五、六岁，正在念塾书，有一个洋学堂的洋学生和我们谈过一次话，意思是要介绍我们入党。他讲得一句话对我印象最深，就是要土地革命。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懂得。所以，那时有党组织，但是什么人搞，就不清楚了。

大革命失败之后，反动派在我们那里也杀了一些人。杀的这些人不是主要负责人，而是打菩萨的那些人。那个时候打菩萨是最不得人心的。大革命失败之后，周维炯、漆德玮不在那里，而在武汉军校学习，估计他们是在那里入党的。武汉失败之后，他们回家了，就进了民团，这主要是漆德玮的关系，因为他的家庭是土豪劣绅，他的伯父是漆二老爷，他父亲

是漆五老爷。由于这个关系，他们进了民团。漆德玮做了中队长。周维炯和漆德玮是亲戚。因为这个关系，周维炯也进去了。大革命失败之后，主要负责人还是周维炯、漆德玮。

到了1928年，虽然党没有公开活动，但是还是有秘密的活动。我记得老百姓叫作黑杀党。活动的办法就是晚上出去到处贴标语。由商城到金家寨，经常晚上出去贴标语。最坏的土豪劣绅，我们一个晚上就把他一家都杀掉。这是1928年的情况。

1929年2月27日晚上暴动了。这个暴动主要是民团。这个时候民团住在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晚上暴动的。在暴动之后，我记得大概是4月间就在南溪、丁家埠一带活动。开始的口号还是打倒土豪劣绅，也没有分土地，也没有成立苏维埃。这个时候成立了赤卫队、少先军。4、5两个月就在这一带，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在暴动之后，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那个时候叫三十二师。开始暴动的时候，只有两、三个大队，好像是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三个大队。暴动之后，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排长，叫关云山在固始附近起义了。本来，我们给他钱让他回家，但是他没有要钱，他的六七十人全部参加了红军，改成九十八大队，关云山当大队长。这个时候周维炯领导三十二师。这是五月间的情况。

到了6月间，夏斗寅部从麻城经过。三十二师就到了光山和三十一师会合了。三十一师和三十二师是两个地方的，互相不大了解，不太团结。不团结的主要原因是三十二师引起来的。开始暴动时，派徐其虚领导参加暴动，暴动之后成立了三十二师，由徐其虚做党代表，但是一个多月之后就把他杀了。为什么杀，就不清楚了。杀了之后，三十一师和三十二师会合时，就问徐其虚为什么被杀了，三十二师说他是反动派。结果三十一师不满意，这样搞的就不团结。三十二师就回来了。夏斗寅的部队走了之后，就剩下了民团。这一次三十二师回来之后，苏区就有扩大，打开了金家寨，以后打到燕子河、霍山、英山，在这里打了胜仗后又回来了。

到11月间就打商城。那时商城有一个民团，和一个豫南的军阀任应歧。打商城时，参加的部队不过一、二百人，都是化装进去的，有卖油条的，有卖柴的。卖柴的就带着长枪，卖菜的就带着短枪，很快的就把民团

和任应岐部杀掉了。商城打开之后我们占了三个多月。

商城打开之后，有一段这样的事情：（中央——编校者注）派了郭述申到那里去，那时三十一师和三十二师不团结，他们计划要杀他，他听说之后就跑了。

调查员问：那个时候的商城归哪里管？

徐部长：我记得归皖西北管。凡是属于皖西北的是一个党委，不记得有两个党委。这个情况苏井观可能知道一些，因为他在这一带住的很久。

调查员问：我们在下面了解，三十二师到了鄂东北之后，位老主持的一次会斗争了一个漆海峰，把他杀掉了。

徐部长：这是以后的事情，是30年初的事情。30年1、2月间，我们把商城放弃了。那时红军又回到了金家寨一带。就向六安、霍山一带行动。我记得这时在这一带已经有一些武装暴动了。到3、4月间，三十二师又改了漆姓，周维炯就走了。他到了霍山又成立了两个大队，一个是一〇六，一个是一〇七。六安这里还有一个毛正初，是一个青红帮，也有一些武装，也改编成为红军。以一〇六、一〇七两个大队为基础，又在六安成立了三十三师。30年4、5月间成立了三十三师，周维炯做师长。

三十三师成立之后，三十三师和三十二师一起行动，打了霍山、英山，以后又到了罗田。这个时候，肖方就来了，以后六安的暴动他就参加了。三十二、三十三师就在霍山、英山、麻城、滕家堡一带。

快到7月时，许继慎来了。这时成立了工农红军，许继慎当军长，他是中央派去的。他带着上面的人到了金家寨。这个时候正是李立三路线统治着，决定全国红军打到武汉过中秋。中央决定成立第一军，他带着军部到了金家寨。以后三十二师、三十三师也到了金家寨和许继慎会合了。这时还成立了一个独立旅，有一百多人。

八月间，由许继慎带着三十二师、三十三师经过光山，到了红安和三十一师会合，后又到了孝感、花园，这时再打武汉不行了。所以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就顺着京汉路北，到了信阳。信阳被打开之后，国民党虽然从武汉那里派来了铁甲军，但是，潢川、光山、罗山还是被打开了。在这里住了不到一个月。上面说的漆海峰就是在这里杀的。进去之后，把

三十二、三十三师整编为一个师。因为这两个师的人少一些，三十一师的人比较多。整编以前开了一个斗争会（那个时候我们不清楚，是以后听说的），听说黄麻斗争皖西北的人，以后就把漆海峰杀了。把漆德玮送到上海去了。周维炯做三十二师的师长。

我们的三十二、三十三师到了黄麻之后，敌人占领了金家寨。这时蔡申熙的十五军还有一些人。当时群众要求打金家寨，但是他们武器少，没有打开，群众对他们不满意，他们就到了黄麻。然后我们打开了光山之后就会合了。会合的时候还有四、五百人，编到了三十二、三十一师里面去了。这时就改成第一军的第一、二师。

这个时候把漆海峰杀了。这个人不算顶好。他是三十二师的参谋长，军阀主义厉害的很，打人骂人。过去在民团里他也很有力量，暴动的时候他起了作用。这个人也不是反革命，但是他有自己的野心。漆德玮也送走了，主要是家庭成分不好。周维炯的成分好一些，所以当师长了。

整编之后，到了1930年的10月，又从罗山走了，又到黄安、麻城，打开了宋埠。这个时候就开始反立三路线。从罗山之后，就再没有向外发展，又从黄安、麻城、宋埠回到金家寨，把豫南、皖西北的苏区会合了。然后继续打霍山，但是没有打开。以后又经过金家寨，到了商城。在商城附近遇到了吉鸿昌的部队。

这时，邝继勋来了。中央决定成立第四军。邝继勋做军长，许继慎做师长，周维炯做团长。这是30年底，31年初的事情。成立第四军之后，又回到了黄麻。这时敌人把这里占了，我们打回来，又恢复了这里的苏区。以后黄麻、黄陂、光山都扩大了。过去很多地主占的寨子也打开了。把很多苏区连成了一片，把敌人的反动武装扩大了。我们的队伍也扩大了，成立了十二师。在四军的时候，就叫作十师、十一师和独立师。到31年成立了十二师。

31年的夏天，张国焘就来了，陈昌浩也来了。他们来后不久，四军就南下到了英山、蕲水活动。这个时候，四军的政治委员曾中生（曾希圣的哥哥），他们坚持要到湖北，要和湖南打成一片，张国焘就不同意。这个时候有一个路线的争论。过了一个多月，张国焘坚持要四军回来。四军回来之后，到了六安，张国焘就开始肃反了。一到六安、英山就开始逮捕

一些人。这时逮捕的还不是主要负责人。我记得不久就把许继慎逮捕了。因为发现国民党给他的一封信，要他来投。这封信给了张国焘，就把他抓去了。以后部队就住下来，开始了大肃反。部队里班长以上的干部杀了一、两批，排长、连长全部都杀了。周维炯这些同志都杀了。鄂豫皖暴动的领袖都杀了。有的不只杀一批，杀一批之后，提拔一批，然后把提拔起来的又杀了。肃反搞了一、两个月，有一点文化的都被杀了，没有杀的只是个别的，平常表现非常老实的。所以，鄂豫皖的干部里，文化高的很少。在豫南、皖西北杀的更厉害。

肃反搞了一、两个月之后，红军里要增加工人成分，就由地方上调了一些工人到军队里来。只要是工人成分，都可以做干部。在这之后，就成立了四方面军。陈昌浩做政治委员，徐向前做总指挥。成立之后，就打黄安，包围了一、两个月。我们那时候还有一架飞机，用来散传单、扔炸弹，配合着把黄安打开了。赵冠英也被活捉了。这个时候的红军就多了。这时除了一个独立师、十二师之外，还成立了二十五军，包括七十三师、七十四师。

1932年春，四方面军又到了豫南，打到了苏家埠。这次战役打得非常有意思。我们十师包围了苏家埠，十一师包围了□□□，包围了一个多月，那一次兵派的最多，结果把敌人大部分消灭了，少数人跑掉了。包围的敌人没有饭吃了，把树皮都吃光了。以后敌人都投降了。胜利之后，又从皖西北到了麻城。这时敌人就搞四次围剿了。这一次围剿我们事先没有很好地准备。结果我们打到麻城，敌人一下跑到红安来了。敌人有七个军，分成好几路，蒋介石亲自在武汉指挥。敌人来了，我们措手不及，很慌忙。从麻城到红安是一百多里路，可是我们半天就走到了。匆忙打敌人，消灭了一些，但是没有解决问题，跟张国焘跑到了四川。上面这些情况我记不太清楚了，大体上有这样一些印象。

调查员问：以后三十三师有一个师长是徐百川？

徐部长：最早不叫三十三师，那个时候叫独立师。所谓师，也就是一、二百人。有徐百川，还有毛正初。这些人都死掉了。还有一个姜镜堂，共产党员，在三十三师做政治委员，也是早就被杀掉了。

调查员问：和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明显的有哪些？

徐部长：那一次斗争曾中生之后，就不敢斗了。张国焘是主席，要人喊他万岁，不喊万岁就杀人。肃反期间，很多地方是有斗争的，但是结果都是被杀了。到四川之后还又杀了一批人。这个时候有些斗争，主要是中央派来的一些人，他们不同意到四川去，和张国焘有斗争。中央派的人开过几次会，大家认为张国焘违反了中央的路线。说张国焘不好。以后张国焘知道了，就把这些人也杀了。

调查员问：肃反是从30年开始的，扩大化发生错误是张国焘来了之后吗？

徐部长：在张国焘来以前，下面是有扩大化的。但是，大批的杀，是张国焘来了之后的事情。

调查员问：AB团、改组派当时在党组织和部队里有没有混进来？

徐部长：这个问题我看完全是扩大，这个完全是王明搬来的，哪里有这些东西，我看没有一个是真的。我熟悉的一些人，不过是成分不太好。有文化，有的是作风上不太好，更多是这样一些毛病。现在这些帽子都要去掉，都承认是烈士。在鄂豫皖许继慎这些人就弄清楚了。漆德玮、周维炯这些人哪里是什么反革命？

调查员问：笔架山暴动以前是不是有党组织？

徐部长：是有党组织的，但是不清楚是谁领导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小，就记得是有些学生回来了，找我们谈话。

调查员问：张国焘来了之后，很强调打通皖西北，反对截断长江的计划。从文件上看，这件事在党内有斗争。有的人主张截断长江，张国焘主张打苏区内部的敌人，我们对张国焘的军事计划应该怎么样评价？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

徐部长：在这一点上，当时的人民和军队是拥护张国焘路线的，不愿意苏区有反革命。

有些情况周纯全知道的多一些。过去他在鄂豫皖做保卫局长，比现在的公安部长更有权力。所以，肃反时谁杀、谁不杀，他大体上知道一些。我们现在对他有意见，就是乱杀人，听张国焘的话。

调查员问：徐部长是在豫南、皖西北活动吗？

徐部长：我家就在商城以南。1929年暴动时我没在家。1929年7、

8 月间回去之后才参加了红军，以后就没有离开。

调查员问：为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还需要访问哪些人？

徐部长：人是不少，但是知道材料的不多。苏井观、张琴秋他们可以谈一谈。还有吴京天不在苏区，在河南白区。徐海东了解一些情况。因为四方面军走了之后，他在廿五军。

把鄂豫皖的党史整理出来这是很好的，也是很有必要的。当然各个苏区的历史都是光荣的，但是鄂豫皖地区的斗争历史更光荣。从大革命起，一直到解放前，三十多年来斗争没有停止过。人们付出的代价很大，但始终没有妥协过。张国焘的肃反路线杀的那么厉害，但是你杀好了，我还是革命。大家也知道说不定有一天会杀到自己的头上来，但是也没有人打算逃跑、叛变，反正是革命，死也革命。我们那个时候小，比较老实，没有被杀。

现在北京招待所住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参加革命很早，但是他的记忆力不好。有很多人和他谈起过去，他谈的都不对头，所以了解情况的人不多了。

访问戴季英老人

时间：1980年5月16日上午8时40分-10时40分

访问：周密、戴定欣、白开基

整理：白开基

录入：李敏

校订：黄文治

一九二六年间关于麻城党组织的发展

麻城的革命来源，是由陈潭秋、董必武、肖楚女在武汉领导革命，麻城青年1925年在武汉中学读书（省立第一师范专科学校）有几个人，如：放寒假之前，蔡济黄、吴济民、王宏文、刘象民、王幼安已入了党。1925年主要是董必武、陈潭秋在那里发展的，1926年他们开始回麻城本地发展，发展当地（麻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冯树龚、刘文蔚、王树声、桂步蟾等。以后在自卫军中发展了廖荣坤（廖过去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过几年兵，自卫军的排长）在农村发展的有徐其虚，到了1926年冬发展较多，有丁学宏，程汝阶、杨业广，王宏学、舒乃贵、余伯成、胡英（胡静山的儿子）、江道明。

到了1927年初，形成区委，城区书记丁学宏，乘马区书记余伯成，顺区书记舒乃贵，黄区书记江道明，中宋边区是党的工作人委员会由杨业广负责。东八区的封建势力统治太严，未有发展进去。到了这时，麻城的局面比较好，麻城特支于27年1月成立，书记开始时是王幼安（搞了一个月）后来成了县委（2月底3月初）县委书记是蔡济璜。蔡济璜和刘文蔚以后在顺河牺牲了。王宏文当教育局长，刘象民负责农民协会，丁学宏参加了县委，吴济民在省里没有回来，但仍为麻城县委委员，不久他就到了苏联。

国民党到了武汉，麻城成立了县委。不久反动势力组织红枪会进攻，主要是向麻城的西南部，麻城当时形势紧张，董必武当时是省政府的负责人之一，他与省政府主席程潜商量，决定派讲习所的学生军去麻城，刘文蔚是学生军的一分队长（学生军的编制是大队、中队、分队）。

1927年“七·一五”以后，冯树龚、蔡济璜、刘象民等在县城不好立足，农民自卫军中只有廖荣坤一人是党员，其余一百多军枪是国民党县长指挥。县长不知姓什么，他叫赶走教育局。王宏文、蔡济璜、刘文蔚，他们在城里不能占了。冯树龚后来是县委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乘马区当农协主任，当过麻城县委书记（1929年底—1930年春）到30年红军发展了，到地方调了一批优秀的干部去担任红军中的领导，冯树龚就调到了30团当政委，二次“围剿”时牺牲。他很勇敢，文化好，喜欢打仗，麻城的那一批干部是很强的，刘象民是农民协会的负责人，麻城没有召开农民代表会，所以没有正式成立农协。

吴济民没回麻城，在省委宣传部当过干事，后去苏联学习（1927年—1931年），回国后仍回黄麻工作，任红军独立第一师政治部主任，（1932年春）后调鄂东工作，张国焘派他到广济工作，国民党发觉了他，在浠水上巴河饭店把他捉去杀害了，刘象民后来下落不明。

“七·一五”以后，政局变动，城区区委也离了县城，迁到乘马与县城之间的一个什么山上。后来省委指示放弃县城，转移靠近黄安，所以后来麻城的中心在乘马岗区、顺河区。到了黄麻起义，乘、顺、城、黄、中宋几区包括在内。黄麻的关系很好，这是在乘马岗工作的有程汝阶、桂步蟾、余自成、王树声。王树声任乘马农协主任。

关于麻城历任的县委和县苏主席，1928年7月—11月，黄麻两县合组为黄麻县，由我担任黄麻县合组书记，这是中央代表郭亮决定的，后来工作发展了，我就叫徐其虚搞麻城的县委书记，我就专任黄安的县委书记。到了1928年秋，徐其虚到商城发动商南起义（因为商南那里有姓徐的是徐其虚自家的，党当时利用这个关系派徐其虚去的），徐其虚在商南牺牲后，就由冯树龚担任麻城县委书记（1929年—1930年春），冯树龚调到红军中去后，我就兼任了一个时期的麻城县委书记（1930秋—1931年1月），1931年过了春节后，我调到江汉路任特委书记。我走后省委

派原在鄂东特委工作的曹向时担任县委书记，任至1931年底，1932年县委书记由王宏学担任，任至四次围剿，大概一年多时间，当时王宏学是县苏主席，1928年成立的县农民委员会委员。农民委员会的委员长是杨业广。1930年麻城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县苏维埃，王宏学任主席。县苏维埃成立后，农民委员会也就不存在了，县苏行政委员会的委员有：王宏学、颜长如、王立功、杨业广、舒乃贵五人。县苏成立后，各区苏的负责人，城区苏维埃主席丁学宏、黄区苏维埃主席江道明、乘区苏维埃主席程汝阶、顺区苏维埃主席舒乃贵，中宋工作委员会吴行忠（红安箭厂河人，因那时黄麻关系好，不分彼此）。1929年—1932年，麻城县的中心人物是王宏学。这一时期，麻城产生了很多人才，王树声到红军去了，张才干、赵丙能、杨志雅都是那里人，那里产生了一批红军干部，成绩不小。

“四次”围剿以后，陈守信（顺河集人）任麻城县委书记，1932年底在战争中牺牲，陈守信牺牲后，也是麻城的一个姓王的担任（王少卿），兼任麻城的游击司令。王以后省委派聂维文担任麻城县委书记，并把麻城游击队集中编为麻城独立团，（1933年）聂维文以后在北风咀战斗牺牲。牺牲后是王正祖1934年—1937年，麻城的县委书记是王正祖。1937年，抗战开始，县委书记由四支队军政委员会派来熊佐芳担任麻城的县委书记一直到39年。以后由鄂东区党委的领导。

关于“八七”会议传达情况

传达“八七”会议在麻城有两次。一次在邱家畈，大概是八月间，省委派符向一传达的。另一次是在林家山，由中央驻汉代表刘镇一（原是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时间是9月，有的地方暴动已经开始（9月2日开始了暴动）。刘镇一认为符向一传达“八七”会议不彻底，所以他到林家山重新传达，他再讲一讲。参加者都是党员，有的是农民小领袖，那时麻城的地方党员有一百多人（红安也有一百多），刘镇一在群众会上也讲，在乘马岗、七里坪都开了会。

关于六大会议的传达

1929年3、4月间，矛盾从中央来传达六大文件，地点在光山，文件决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建立政权等内容，麻城县参加会议的有王宏学，舒乃贵，丁学宏，王树声，桂步蟾等人。

六大会议精神传达以后，省委召开了代表大会，产生了军委员会，1932年，麻城又召开了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传达省的决议，政权没有改进，讨论了关于土地问题，粮食问题，赤卫军问题，贸易问题等会议，由王宏学主持。

关于县苏，县委的住地

县苏驻北风咀，县委驻西河（离北风咀不远）。

关于麻城县工厂、学校、农场

缝纫工厂：在寸腰石，属四方面军的，有几百人。

兵工厂：首先在排罗河，后在西张店。

红军医院：顺河有红军医院，西张店也有一个。

学校：各区都有列宁小学，因为那时的报纸叫“列宁”，所以各地学校都称列宁小学。

县里还办有训练班，北风咀有财经训练班，五十余人。

关于地方武装组织一些情况

扩红委员会：1930年1月，县成立扩大委员会，地址在河头店（在顺河区，离北风咀不远），负责人由王宏学兼任，任务是招收新兵，进行教育训练，再送到红军里面去，与此同时成立了反帝大同盟贫农团。

红军补充军：1930年春秋，麻城全县的赤卫军成立红色补充军军长王宏学，下面还有师团，一个区为一个师，这以前的赤卫军是分散的。

红军独立团，1933年，聂维文任麻城县长，他把麻城的游击队集中编为独立团，约三千人。

关于麻城特支及初期革命活动情况

1925年，省立第一师范有黄安、麻城、黄梅等小组。麻城是王幼安

负责，到了麻城为麻城特支，王幼安为书记，这是董必武、陈潭秋领导的，到了麻城后，党组织未公开，特支未公开宣布。但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左派名义，争取麻城教育局，夺教育局的权。王宏文当了麻城的教育局长（以前是北洋军阀的），这是董必武同志领导搞的，当时各县都搞，国民党当时有个党政，参加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

关于邱江浦的情况

邱江浦是个农民，参加了县里传达“八七”会议的会议。黄麻起义，刘文蔚、邱江浦都参加了。黄麻起义打黄安时，邱江浦先是义勇军大队长，后来是游击队大队长。最后把他杀了，完全是错杀的，当时我说杀他不应该，那时杀他的理由是说他反动，好骂人，说他把赤卫军搞散了。其实是与麻城保卫局长徐汝志的个人冲突，因邱江浦的个性强，不承认错误，与徐汝志搞不好，要用枪打徐汝志。徐汝志就抓住他从红军中跑了，说他反动，把他杀了。麻城保卫局 1931 年春成立，徐汝志一直担任麻城保卫局长，陈立福也是在保卫局工作，这个人是不好的。他想当军长，没有当上，王宏文也跟省委说过，徐汝志不好，以后徐汝志犯了错误，把麻城的武装搞垮了，据说他与磨角楼的敌人有勾结，省委调查此事，就把徐汝志杀了。

（问：说他叛变过是怎么一回事）。没有叛变，主要是他个人强，与别人搞不好关系，受不了红军纪律的约束，他私自跑了，据说跑到了一个社会关系那里去了，别人说他到社会关系那里是反动，其实不是。

关于廖荣坤

开始自卫军里只有廖荣坤一个人是共产党员，他是自卫军的大排长，参加了黄麻起义。打游击跟我在一起，后来在红军里当队长，以后当师长，25 军的副军长。（他原来在夏斗寅部队里当过几年兵），他是后被错杀的，是吴焕先搞的，杀他的借口是说他打仗不好，又说他打仗不勇敢，又说他动摇，怕他投敌，说他犯了军法，廖荣坤是一个很好的同志。

戴季英同志的谈话

整理：雷世贵

时间：1984年2月

录入：黄文治

校订：李敏

1983年12月6日，麻城县党史办雷世贵及县博物馆白开基二人在河南郑州走访了革命老人戴季英，有关（一）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麻城农运情况；（二）革命火种在麻城早期传播经过；戴老作了如下谈话。

1、董必武1925年前常在麻城搞选举，活动当参议员，搞选票，想当省参议员，后当“武汉中学”校长。“武汉中学”原为黄冈八属共办的学校，开始叫“启黄中学”，只收黄冈、黄梅、蕲春、麻城、红安、罗田、广济、英山八县的学生，学生为公费。同盟会时，董就常到八属之地活动，该校政治上属左倾。我是“启黄”学生，1925年由中华大学附中转入该校的。

2、麻城在武汉中学的学生有桂步蟾、刘文蔚、徐其虚（住过一段时间，后回家）、刘象明、还有胡静山的儿子胡英。王幼安在一师读书，时间是在1924年秋至1926年，蔡济璜也是一师的，他和吴济民一起去的，后来，吴被派到苏联，他们都在第一师入党。

3、王宏文、王幼安（按：实为一人，戴叙有误），蔡济璜、刘象明、吴济民这几个人参加了工作组，组长大概是王宏文，活动很频繁。红安组长是徐其烈（一师学生，党员）。工作组的任务是发展组织，抢教育局的权。因当时是北洋军阀的教育，反对五四运动，大兴孔孟之道，党决定在

全国搞教育局，省委也是如此决定，后王宏文（幼安）得到了局长之职就办学校，发动群众。

4、王幼安 1926 年国民革命军打到武汉后，由组织上派回县。当时，尚未毕业。回县后，成立县党部。其时，上级派很多学生下县抓县党部，成立农协会。王幼安、蔡济璜都下到县里，当时，刘文蔚还留在武昌。二五年冬，红麻两县多成立特支。黄安特支书记是余文治，麻城是王幼安。

5、刘文蔚由武汉中学调至农讲所，桂步蟾也考上了。但组织上没有让他去，而是调到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同徐向前在一个队，徐是大队长，桂是学员。当时，武汉有“学社”，学生不住在学校，可住在学社。各县学社只接待本县学生，麻城进步学生组织了“励进社”，黄安是“黄安旅鄂学生读书会”，麻城的是有王宏文、蔡济璜、吴济民等人组织的，是否办有进步刊物，我没见到，黄安办有“黄安青年”。

6、关于麻城县党组织是如何配合学生军的，我知道的是，动员群众欢迎，送东西给学生军，有鞋、毛巾、还杀猪慰劳，学生军吃不完、用不完。县农民方面的负责人是王树声，徐述凤也参加了。农讲所所长是周以力，县敢死队具体负责人不清楚。麻城自卫军的成立时间与黄安同，都是由省政府农工厅厅长董必武统一安排。麻城开始的队长是熊振翼，后熊不好，王树声、刘文蔚将熊推倒。后来，由吴光浩接替，任大队长。潘忠汝在湖北省教导队当学生，没到黄安，也没到麻城。吴光浩拿着省府介绍信到麻城，县长不理，他就到乘马。县政府掌握了一部分“自卫军”，其实不叫自卫军，叫警备队，到乘马的一部分才是革命的，这一部分武装拉到乘马，徐子清、徐其虚在中间起了作用。丁茂富、林柱中也出了力。

7、刘象明、刘文蔚、胡英，还有两位农民参加了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麻城有 4、5 个人。我当时在武昌上学，也作为黄安的代表参加了大会，也只有 4、5 个人。

8、谈谈黄麻起义的经过。“七一五”后，各县的党组织不能立足，县政权为汪精卫的人把持，原来的县党部被改组，中央决定发动秋收起义，重点是两湖。黄安的党组织没有人，郑位三是书记，跑了。省委于是派我回县，公开身份是教师，在七里坪小学任教，后刘镇一、符向一来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准备起义。黄安和麻城都没有多少武装，麻城只有几个

班在北沙河防守北边的红枪会。会上讨论时，我说没有武装，最后决定揭竿起义。10月5日前几天，会议在黄安七里坪召开。七里坪是大本营，我是召集人，地点在七里坪小学。参加的人有戴季英、吴光浩、曹学楷、刘文蔚、吴焕先、程昭续、戴季伦、叶乘庆、明汉华、戴雪舫、石健民、高建斗、吴力行、汪奠川、郑友梅、程绪富、邱绪征、秦练如、徐其虚等人（名字可能有误，只按读音记录），通知了蔡济璜、王树声，但他们没去。10月5日，在七里坪北门外举行誓师大会，宣布成立总指挥部，总指挥和党委书记是戴季英，起义中心是黄安，办事全靠我的工薪30元。

后起义大爆发，中心区在七里、紫云、乘顺区，一共有二三十万人组成起义大军。真正参加起义的只有一两万人，麻城动员有一万多，没有赶上。吴光浩说，不能等麻城的了，要行动。当时，顺河北风咀、林家山、谭畈河附近的麻城人去了千把人，自卫军只有一个排在北界河与光山交界处防红枪会，排长是晏仲平，其余两排人都参加了攻城，陈再道也去了，不是党员，当兵。领导是徐其虚、廖荣坤、林柱中、丁茂富，他们都去了。王树声准备去，但城打开后，因城内物资供应困难，又通知他不要去，同时，进城的一万多农民军，也陆续回去了。

攻城时，我是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城北三里岗，刘文蔚、吴光浩协助我，打了几个钟头。进城后，打垮县警备队，活捉了贺守忠（国民党黄安县长），就在县审判庭公审他，由刘文蔚、程昭续主审，不几天，就公开镇压了贺。打县城时，符向一（省巡视员）在麻城没来，他想当特委书记，我们不能决定，由省委决定，他以黄安县委的各义向省委写报告，报告写得不好，有人不同意，我说算了，给他送去。后省委派王志仁来到黄安，成立黄安县委，是由我提出的意见，当时王志仁在省农协组织部当干事。成立了农民政府，曹学楷当主席，程昭续当县农民委员会委员长，这些人事安排，都是我的意见。几天后，成立鄂东军，麻城、黄安各一个大队。起义胜利后好几天，潘忠汝才来到黄安。省委介绍信上写明叫他负责鄂东军军事。后由潘当总指挥，吴光浩为副，一共有二百余人，枪一百七十八支。

9、关于防务委员会。该组织主要是防红枪会，是群众组织，由群众负责防止红枪会，麻城由王树声、徐子清领导。靠福田河一边是江道明等

人负责。

10、1928年，成立黄麻县委，我是书记，麻城有党，王树声、徐其虚、余伯群。黄安有程昭续、张心炳。1929年春，麻城县委在大河铺成立，书记徐其虚。

11、中宋边区大革命时有活动，冯树龔（武汉中学学生）在南乡活动，后当书记。成立麻城县委中宋工作委员会，开始的负责人是舒乃贵，舒调到县财政局任局长后，由鄂东特委派吴行中主持工作。工作委员会掌握有一个武装部队（游击队），主要活动于中驿，负责人由吴行中兼。

12、1930年春，麻城县委书记是冯树龔，县苏在北风咀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县苏主席王宏学，舒乃贵、徐述凤、阎常如、程玉阶为行政委员会委员。1932年，也是在北风咀召开代表大会，会上没有改选，只是调程玉阶到少共国际团当团长（此事尚需作调查核实）。这次会议的任务主要是传达省工农代表大会决议，就麻城一些具体工作进行讨论，如发展游击战争、发展生产、工农联盟、整顿赤卫军等。当时，县政府在北风咀，县委在北风咀河对面的一个村子里，团县委在河头店，负责人是黄家寿（后调到黄冈当县委书记）、董纯其。

13、谈谈邱江甫的情况。邱原是自卫军的一名战士，打红枪会、攻黄安城，他表现得很勇敢。从木兰山转来后，他当麻城游击队大队长，与黄安赵赐吾（黄安游击队大队长）齐名。以后，说是敌人捉住了他，又放回来，别人就怀疑他有叛变行为。邱说是由亲戚偷偷放回来的，大家不相信，改由晏仲平任大队长。保卫局长徐汝志与邱发生冲突，徐将他关起来，后杀掉了。也有人说他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红二十五军杀邱，没有这回事。我常跟王树声谈到他。王对邱的死因，没作结论。

14、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中央主要负责人是周恩来，周在上海一外国租界代表中央召开会议，决定统一鄂东、豫南、皖西为鄂豫皖边区，成立党委，由郭述申任书记，并成立红一军（据说比毛主席搞的早几天）。鄂豫皖的情况据说是由中央巡视员朱瑞向周恩来汇报的。

15、麻城少共国际团由省委领导，省有少共国际师，师长袁克服，他也是少共省委书记。

16、在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中，麻城有个独立团，团长赵赐吾。

后又成立了独立团，团长聂维文，后到二十五军七十三师。聂牺牲后，由陈守信主持工作，后独立团更名为麻城第三路游击师，师长陈守信兼县委书记，县委随军行动。后来，陈因伤寒病逝于杨泗寨下孙家院。

17、1932年红四方面军西征后，只留下二十七师，省委又决定成立二十五军，我为军政治委员，开始就只是我那一师，改为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军长吴焕先。后又有七十三师（师长廖荣坤）和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后七十四师师长为徐海东，我兼政委。以后，又调周化贤来当政委，我就到军部工作，全军共一万多人。

18、廖荣坤1933年任红二十五副军长兼七十三师师长。廖老呆在七十三师，他不满意吴焕先当军长，我曾劝过他说，吴当军长是省委的决定，不要去争这个职位了。后来，廖部一营长叛变，有人说是廖指使的。吴焕先提出杀廖，省委不置可否，结果廖被吴杀害。廖打仗勇敢，参加打黄安县时当排长，木兰山下来后，我叫他当队长，在大崎山工作二十多天，不错。他当十一军一个团的团长，指挥得很好，但他指挥大部队不怎么样，只能指挥两三个团，他文化程度低，个性强，与人家的关系不好。廖的被杀是在1933年6月间。

19、七十三师一个团和皖西的独立团在大阪成立二十八军，由省委决定，有战略作用，以一个军的名义活动。

20、1934年，二十五军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程子华任司令，徐海东为副司令，政委吴焕先，我任政治部主任。到陕北改为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程子华任政委，我离开二十五军，成立陕甘晋军事委员会，我任军委主席。1938年2月，我由中央派遣来改编二十八军。高敬亭勉强同意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成立军政委员会，高任主席，我任副主席，高敬亭带着部队到了六安后不走，我就带着部队上前线。高腐化，有神经病，不服从中央领导，叶挺建议枪决高，毛主席同意。军部到了长江以北，高被处决，我任四支队司令兼政委，后改为新四军第二师。皖南事变后，我离开军队，到中央参加七大，后又参加延安整风，河南失守，长沙失守，日寇进攻西安。河南省委成立，我当书记，并任河南军区政委。王树声是司令员。毛主席给六千人我们。王震到湖南，也是六千人。我们在河南发展了几万人。日本投降后，一九四五年南下与李先念五师于桐柏会师，成

立了中原军区，司令先是徐帅，后是先念，政委郑位三，副司令王震、王树声，我是河南省书记，中原军区副政委。中原突围后，军区只剩下我领导的河南军区一万多人。王树声领导二万五千人到鄂西，损失殆尽。五师突围后，我从山西过渭河到中央，以后到华北局，又派我到河南。刘、邓大军南下，准备成立豫陕边区，叫我当行政公署主任，刘少奇不同意，收电报扣下，毛主席后也不同意。以后我到开封，我批评了中原局的路线错误，所以一直放在基层。

当时，毛主席不赞成过汉水到鄂西，也不赞成到陕南，要求在大别山区回旋作战。我拥护毛主席的决策，但刘少奇不同意，部队过汉水后，王树声消极了，一过汉水，他不管事，大事由刘子久抓。

我现在就是争鄂豫苏区创始人这个地位。王树声临死时说过，鄂豫皖的创始人是戴季英，其他都是假的。

21、几件史实：1、新四军五师和鄂东独立旅到过乘马岗，与伪军打过一仗，但未消灭过一个团。2、鄂豫皖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政委段君毅，在团风消灭敌人一个师。3、刘邓可能在麻城住过。4、戴季伦是我亲哥，雷绍潜调回到省，戴季伦临时代理书记，只几天，后是冯树龔（1929年）。戴雪舫在县委搞了好几年秘书长。

戴季英的回忆

调访：河南师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张仁荣；河南省博物馆段铁安；
光山县文管会李学明；新县文管会陈士农

时间：1980年5月30日-6月1日

地点：郑州省委四所九楼戴季英的住室内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

1、木城寨会议

黄安县失守后，追到七里坪，从七里坪又到太平寨。太平寨是黄安、麻城交界的地方，就在那里打游击战争，后来有国民党的几个民团向那里进攻，要包围消灭我们，后来我们就在木城寨召开了一个会议。决定改变战略，到起义区之外去打游击战争，打一个时期再回来。这个会议是我召开的，那时的党委书记就是我，黄麻起义的总指挥是我，兼党委书记。参加会议的人有我、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汪奠川、江竹青、徐其虚、王树声，就几个人。木城寨会议就是为着改变战略。敌人两三个团包围过来，不能够让剩下的武装力量再在起义区被敌人打死、消灭。突出那个包围圈子，到木兰山去打一个时期的游击战争，再回来。这是一个战略上的改变，这个战略很重要，也很有意义。

2、关于汪洋店

黄安城退出后，到了七里坪。我原来就是在七里坪那个高等小学里教书，名义上教书，实际上做农民起义的工作。那个时期有校长，教务主任，都是年纪比较大的，身体不太好的教育家。起义后，为他们的安全，我就叫那个地方的党员，姓郑，叫郑真，到汪洋店去。因为他后来在商店

里当店员，同汪洋店那个地方有往来。汪洋店产烟叶，孝感那个地方也产烟叶，因此与七里坪烟店有往来。就利用这个关系，叫校长、教务主任这几个人躲到那个地方去。一方面做地方工作，一方面闲住，比较安全。这样呢，就有个汪洋店嘞，到1929年春天才叫他们回来。

1928年，木兰山打游击战争回来以后，我又派陈定候到汪洋店去。那个时候派他去想把那个地方的工作再加强一下，建成一个游击据点、游击根据地。他是从柴山堡去的。

3、关于木兰山打游击的情况

在木城寨会议上，决定上木兰山去，这个意见是我提出来的，就是向外打游击战争，避免敌人的包围，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就是在长江以北，起义区以南，从木兰山到大别山，到黄冈、罗田。在这几百里路上之间开辟一条路线，牵制敌人。到那里去，就减少了起义区的压力。我对木兰山的情况知道一些，有同学在那里，也有省委党的关系，那个地方有个五六垸，就是木兰山下。五六垸有个党员叫王多福，还有个殷少清，是木兰山下那个殷家大垸的。大革命时候黄陂岗有个党的组织。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才到木兰山。木兰山是个山区，再呢，又在起义区之外，离起义区很近，一天可以到，所以就到了木兰山。一开始去在观音阁、陈秀冲、尹家大垸、木兰山上、塔耳岗都活动过，当时也没有敌人。

就那个地方出去到了木兰山，在木兰山打游击战争，从木兰山打到黄冈，黄冈到大崎山，从大崎山打到罗田，打好几百里路的游击战争，打得很好，从那里打转后来又回到木兰山，这个时候没有转入地下工作，公开的游击战争。不过，到处沿途组织群众，也做秘密工作，建立些组织。这时候，负责的还是那几个人，也就是在木城寨开会的那几个人。这个时期在木兰山，将后来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

在木兰山，国民党来了一个团，包围了木兰山，打了一仗，这个团包围圈还没有合拢，我们就从这个空子冲出去了，就到了红麻寨。夜晚敌人又跟上来，又在那打了一仗，又冲出来了。那天我就很危险，把我的衣服给打住了。从那里到了大崎山，大崎山属黄冈。这是1928年初。在大崎山停了一个时期，那里有党的组织，黄冈县委。黄冈县委就同我们在一块开了个会议，他们也有些武装，我们就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时期。后来，

敌人又有一个团来包围我们，又在那里打了一仗，我们就到了罗田，很远。罗田的敌人来阻击，罗田县城敌人有一个团在那里阻击，不要我们向东去。这样我们在罗田打了一仗，以后又转到木兰山。这时还没有分。后来，国民党又几次来包围我们，要消灭我们，没有成，就急忙分好几路，来包围木兰山，不管能不能消灭我们，他们要占领木兰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分散为好几路，八、九个人，十几个人一路，几十个人一路，分成十几路，三个两个人，去做群众工作。在木兰山还停了几天，因为敌人来包围，我们就决定回黄麻去。

4、关于第一次“左倾路线”及影响

第一次“左倾”路线影响也有，不多。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损伤，受了批评就是打罗家岗，烧了罗家岗当铺。罗家岗不是我们烧的，是群众烧的，因为罗家岗当铺有武装，有几十条枪，有的群众没有钱，当了东西取不出来，很多的群众呼声就是这样的。他们的东西送进当铺后，到了时间，有当条，没有钱拿不出来，不给他，我就把那个当铺打开，把几十支枪打跑，打走了。这样群众涌了进去，就把当铺里很多自己的东西拿走了。群众烧的，不是我们烧的，上级没有批评，讲了烧杀政策是错误的，讲了这个事。那是在1927年8月中央的扩大会议以后，肃瞿秋白的“左倾路线”就是那次会议，因为那个时候反共白色恐怖很厉害，瞿秋白提出报复。他抢中央银行，在武汉暴动，破坏铁路，烧火车站，烧码头报复。我们后来纠正了，六次大会瞿秋白自己讲那里盲动，批评就是这个事情。

5、从木兰山到柴山堡的情况

1928年春，七军从大崎山转到木兰山，分成八九个人、十几个人一队活动，敌人一个团来袭击，围攻想消灭我们，不管能不能够消灭，反正他们要占领木兰山。后来我们就决定回黄麻去，先组织先遣队，戴克敏率领先走。一共有十七、八支手枪、驳壳枪。总部，我们就从木兰山到姚家集。河口西边的姚家集，就在那里建立了黄陂工作委员会。黄陂有领导机关，就是从那地方开始，我们亲自建立的。黄陂地方党的同志叫做刘家练，叫他当书记，我们就到他家，在那里停了几天，计划叫戴克敏先打松树岗民团，我们再作下步规定。派先遣队打民团是我们党委决定的，我们没去，是戴克敏、廖荣坤、王树声他们去的。古历3月2日，戴克敏率领先遣队，

从木兰山经过二程区笔直从七里坪西边到松树岗，七里坪西边有个河汉会，灯笼山，从那地方过来，就到了松树岗，他们没有去姚家集，姚家集属于黄陂，在河口之南，他们去的这条路是河口之东。

6、关于打戴家民团

戴克敏他们3月2日从木兰山出发，三月四号就打了来奎园的民团。那时戴克敏一共带了十七、八条手枪、驳壳枪。而来奎园有五、六十人，戴克敏是趁夜晚他们不知道，包围了他。民团的门口有岗军，有站岗的，两个人一把把那个站岗的抓住，站岗的问“你们是什么人？”他们就讲，是工农红军，你如果喊就打死你，站岗的就没做声，把他的枪也拿去了，其余的都在屋里睡着了，睡在地铺上，一排一排的，那房子也没有灯，就用手电照，那些民团都睡着了，枪都挂在床头边墙上了，拿着枪对他们喊：“不许动！”就没有人动，把他们的枪都收了，奎园瞎子当时就被抓住了，把他带走了，是以后打死的。他这个民团就这样解决了。

打松树岗清乡团，是在松树岗街上，北头饭店上面那里有个小学校，就在那个小学校里打的，不是在上戴家这个村打的，上戴家好像没有打。

打掉了松树岗民团，就住在清水塘。戴克敏的丈人家，姓郑，是清水塘的。住在清水塘，就是这个原因。清水塘是个小村子，两三户人家，在松树岗西北，离松树岗不远，一、二里路，离程维猷一里路，就在那里开了一个会，就叫程启光给总部送信，送信给我、吴光浩、曹学楷，这是总部。我们就回来了，他们3月2日从木兰山出动身，3月4号就打了松树岗民团，就叫程启光送信，再隔了3、4天，我们就回来了。

我们回来没有去清水塘，是回到刘家园子西边那个方家垸，就是陶家边，方家垸就叫陶家边。戴克敏的家是上戴家垸，程维德，松树岗下边几里路。陶家边那里没有上戴家，就是戴克敏的家叫上戴家。陈家洼下边、程维德上面，离陶家边十多里路。因为戴克敏的信叫回到陶家边。他说他住在清水塘，叫我到陶家边去。我们3月8、9号回到陶家边，回来的第二天，敌人就来到那里。只有一个营，打了一仗，就在陶家边，可能是10号在陶家边打了一仗。我们就到了道仕山。

我们到了陶家边以后，后来也到过清水塘，从清水塘绕了一下，了解情况。过了清水塘，就到了木城寨，很快就上了道仕山，总部回来那一

次没有住过清水塘，以后住过好几次，也开过会，我们几个人住在那里早晚在一起说说就算开会，那次数很多。

我们住陶家边时，敌人来了一个营，打了一仗，他退了，住在曹门口，没到陶家边，离松树岗还有十几里路，松树岗的清乡团消灭了，以后没有了，啊，以后有敌人来。

在陶家边打了一仗以后，第二天就到了道仕山。就是打仗后的第二天，就到了木城寨。木城寨不远，它下边那个地方有个村，就叫野鸡笼，在那里停了几天。从那里了解情况后，就上了木城寨，又从木城寨下来，上赵家岗、双山门，又从双山门、赵家岗这个地方到团鱼沟，团鱼沟就是王家湾，王志仁他那个村子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到了那个地方，就在那一片活动，总部在这个地方有两个多月，这里是紫云、七里、柴山堡、光山东区这几个区交界的地方，箭厂河工作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发展了一个时期，搞了好几个月。这时戴克敏，七军和总部住在一起，也不是经常住在一起，那个时候，行动不是经常停在一个地方，工作很紧张，在这两个月内，我们有了很好的发展，就在黄麻各地开展了。第一次仗，打松树岗，第二仗打袁英河。麻城那边也打了好多次仗，六、七十多个地方民团都打掉了，在木兰山游击战争的部队都转移回来了。转来就发动群众，又发动了这次起义，叫第二次起义，仍然是在那一个起义区。这个时候我们感到光在原省的地区不行，要向外发展，就在鄂豫边界上移动，就决定向河南发展。这个时候开始鄂豫边区的思想，就开始边界割据。这时候，地方没有国民党正规部队（后来才有的），任应岐的部队调去了，桂系李宗仁、胡宗铎的十八军、十九军来接防。

后来，敌人来了两个营，就是胡宗铎的十八军，来打我们的。我们在铁门坎同他打了一仗，这时我们就在道仕山，可能是六、七月间在铁门坎打了这一仗，把敌人两个营打退了。打了铁门坎以后，我们感到光有黄麻还不行，要向河南发展，就进到柴山堡，决定到柴山堡去。

7、关于清水塘会议

在没有进柴山堡之前，我们先开了一个会议，就是在道仕山顶上那个小村开的。道仕山就是一个村子，当时参加会议的，就是我们党务委员几个人，还有两个不在，王树声、徐其虚没有到，我们九个人，就是他们

两个人没有到，其余的几个都到了。决定去柴山堡是我提的，我先去。

根据我的回忆，决定去柴山堡的会议是在道仕山开的，而不是在清水塘开的。清水塘也去过，也开过好多会，但那不是决定开辟柴山堡。前面讲过那是在这以前，从陶家边到道仕山。清水塘是一条路，经常去，也开过很多会。我认为即使不是在道仕山，但也不会在清水塘，因为这时敌人已经来了，总部已离开很久了。

8、关于河南垵战斗

在铁门坎打了一仗，很快就到了柴山堡区尹家咀。到了尹家咀之后，才到河南垵、河北垵。这时候先把柴山堡各乡到处的工作都搞起来了，就从尹家咀那里到程土垵，从程土垵那里到河南垵、河北垵。那以前，七军没有住过河南垵，到秋天，天气将冷的时候，我们在河南垵打了一仗，那是方晓亭带来的十八军来打我们。那一次很危险，早晨，敌人来了，打了一仗，后来我们唱歌：“河南垵、河北垵，盒子枪缴三管。”就是那个地方。这是铁门坎打仗以后的事情，河南有个庙，叫新庙，也叫好庙。还有一个付家洼，没有方洼。付家洼是方家湾后面的一个小村子，隔个山岭，在付家洼住过好几次。那附近没有观音堂，就是有个新庙，就是个庙，没有经常在观音堂开会，在郭家庄开过好几次会。沈泽民来传达“六大”会议就是在郭家庄（此说法有误，应该是曹壮父）。

9、关于开辟柴山堡开始的统战工作

那个时候很多人不敢进柴山堡，因为原来和红枪会冲突得很厉害。柴山堡我有关系，我想去。我祖母是柴山堡的，河南人，我叔伯佬娘家，是大屋朱家的，我自家还有人。我以前也到那个地方去过。我就利用这些关系，我想去，我祖母是柴山堡的那个翰林张家垵的，翰林是他自家的叔，有这样一个地位关系，张家又是有势力的人，我就走这些地方亲戚，戴家岗又是我自家的，论祖先戴家岗是老三，是从我那个村子搬到戴家岗去的，我的祖先是老四，我到戴家岗一讲就是自家人。我想去，我去了。这几个地方欢迎说：“你来吧。”我率领部队去了，不会怀疑的。当时是在大屋朱家，具体联系的是亲戚家，有朱瑞君，朱瑞君的姑奶是我自家的叔祖母。这以后就进了尹家咀，为什么到尹家咀呢？因为尹家咀离大屋朱家很近，讲话可以讲的应，就住在尹家咀这个小村子（实际上那里只有几个

人)，有啥事情我就到戴家岗我自家去。戴家岗有很多人，他那个庄子有好几百人。戴家岗有很多人，后来发展到好几百人。大屋朱家有帮助，还给粮食吃。就这么一些亲戚。当时戴家岗帮助我们，有名一点的人就是戴立清、戴立和，其他的记不清，其他的也不熟悉。那时戴立清他们年轻，又是我自家的叔，那次去了，他们就对别人说，戴季英来了，啊，是自家，你们可不能危害他。他们到处讲，我就经常同他们往来，也送东西给我们吃，这已是铁门坎战斗之后，以后就住在尹家咀。

那时在柴山堡有基础的就是王志仁这个村，除了他，没有发现其它的党员，也没有听说杨万家这个人，同情分子有一些，你象刘名榜、陈里胜、吴文保，那时还不是党员。到了柴山堡以后，很快这些人都来了。柴山堡的群众基础是好的，统战对象也不少。最早的有朱瑞君、朱香竹、杜子充；陈德祖的陈故浩、陈故用；郭家河的郭道昌；还有细吴家的红枪会的头目吴文璐，还有崔世祥。到了柴山堡以后，我们就到处活动，到处去，找人谈话，有熟人一路，就由熟人介绍，没有熟人一路，就自己找。他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地主。当时没有跑，跟他们谈话，还算好。一开始做吴文璐的工作，做的还算不错，是叫曹学楷去的，我也同他谈过话，把他找来谈了好几次话。后来吴文璐反对我们，就把他枪毙了，那是一九三〇年。当时红学里面同情我们的也多，不止一个，几个也有。有罗明高，那是比较好的，还有个郭小五，叫作小五爷。红学里面后来有悔改、分化。我们进行了很多分化工作，吴文璐以后就孤立了。小五爷那些人以后就倾向我们了。这是吴文保起的作用，就是吴华铎的父亲，他是那个地方的人，本村的，对那里很熟悉。他们到尹家咀来过好几次，我们同他谈，他算好，很接受意见，叫他到吴文璐的红学里面去瓦解那些红枪会。

罗明高、郭小五是曹学楷去找出的，因为曹学楷是刘家园的人，刘家园过来就是那个地方很近，他还有亲戚关系。当时杜子充没有跑，做工作的是陈定侯，是他的女婿，陈家洼的人，共产党员。陈定侯的哥哥是陈文侯，柴山堡这个地方的负责人，也是共产党员。

10、关于尹家咀会议

我们是1928年6、7月到尹家咀的。到了尹家咀之后，没几天，就开会决定将七军改为十一军。参加会议的还是那几个人，没有多的人。这个

会议是在尹家咀那个祠堂召开的。会议还决定成立光山县委和区委，恢复黄麻县委。成立光山县和罗南工作委员会。罗山南部，找豫南特委，派人到商城去，找安徽六安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到了柴山堡、尹家咀之后，我们的方针就决定了：在鄂豫皖交界的地方开展游击战争，把这一块建成根据地。所以尹家咀会议后，就派人到豫南，到安徽六安，到那里找关系。向安徽发展，有鄂豫皖的思想，就是从尹家咀开始的。

11、关于红十一军成立

七军到柴山堡，就是那么多人，一营不到一百人，将近一百人。尹家咀会议后，第七军改编为十一军，是一九二八年底。在这以前，敌人十八军一个连，在长冲哗变，来到尹家咀。成立十一军，底下就是几个团，这里是三十一师。后来商南起义那一部分为三十二师，它是按照三三制编下去的。一个军三个师，十个军三十个师，原来第七军没有师，改为十一军时，才编有两个师，三十一、三十二统属十一军。

12、关于找豫南特委（包括找豫南各县委）和六安县委以及豫南党代会情况

1928年秋，我们七军党委会一到柴山堡就找豫南特委，就到孙铁铺去找张侠生。因为孙铁铺当时有党的组织。原来知道这一块的工作情况。找到张侠生以后，就由张侠生到潢川找特委，因为他离潢川很近，一两天的路程。找到特委后，张侠生又转来，来到尹家咀，了解我们的情况后，张侠生又到潢川特委报告，讲了我们的情况。特委知道后，所以就敢于在尹家咀召开豫南党代表大会。后来，特委又派张侠生转来，还有本地的两个农民同他作伴，是不是熊少山，记不清名字。通过张侠生的关系打通了豫南特委的组织联系。

这个时候，也同开始到六安，找六安的组织，因为我们原来就知道六安有组织。我们的方针就决定在鄂豫交界的地方开展游击战争，随后就想起安徽六安。到那里找关系的人叫石生才，他是个商人，做小生意的人，到过六安做茶叶生意，所以就让他去。他去找到了六安县委的游池，游池也就来了。六安县委到尹家咀之后，就开始开会讨论，向东发展，六安是安徽的，安徽来的和找陈孤零的是同时派人去的，一个计划，那边又派郑大开去到罗山，找郑新民，他原是罗山教育局的，这和找豫南特委都是一

个计划。同时派去的人，他们都回来了，大家共同商量决定就是这个地区，这几省。发动游击战争，搞武装斗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自己要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要自己掌握武装，武装革命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到处扩大武装，搞游击战争，就是这个方针。决定商南起义也是这个时候。到了尹家咀，找到商城杨百如来了以后，他那个时候的关系是豫南特委领导。我们这里有公开的武装。他们也同我们往来，我们就叫他起义，后来商城就起义，搞武装了，成立了三十二师。商量决定这次起义，是尹家咀，不是党代会，是少数人。

在木兰山，我们决定回到原来的起义区，再就不走，就在地方立足。回来以后，感到光靠黄麻那个地区小了，不够，我们就决定向河南发展，同时，准备向安徽发展。我们原来知道都有党组织，到了道仕山，我们讨论了好几次，这个时候就想派人去找，派谁去，还没有个时间，咋样去，从什么地方去，怎样找？到了尹家咀，后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决定，做最后决定，都派人去找了，都找到了，这样就形成了鄂豫皖的形势。

尹家咀会议后，找到了豫南特委，接着豫南特委就在尹家咀召开了一个豫南党代会，共有四、五十人参加，豫南各县的，陈孤零亲自主持，有潢川的方召、有罗山的戴子旺、何幼清，商城的杨景昭（杨百如）、潢川的苏井观（四方面军的卫生部长，后来死了，前几年癌症死了）。这时候豫南特委除了特委外，下面县有些没有县委，就是一个特支，各县都有特支。商城特支李梯云，支部书记。光山的特支张侠生，罗山特支戴子旺，潢川大概县委之内的苏井观，信阳也有，特委以后迁到了信阳。

这次豫南党委代表会的主要内容是：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还存在，领导机关还存在，要继续进行党的工作，发展党，组织群众，结合我们的游击战争，准备发动全豫南的游击战争。它的总方针就是这个东西，它这个党代会，是1928年底开的。过了一个多月两个月，何玉琳就来了。何是湖北省委的巡视员，省委委员，他来主要是巡视工作，了解情况。同时我们向省委写了报告，准备成立鄂东特委，就是传达这几件事情。成立鄂东特委，正式成立鄂东特委就是这一个月。1929年2月，以前就是党委会，不是特委，何玉琳没有批评，他是同意建立鄂豫边界割据的。湖北、河南两省交界的地方，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建立根据

地，省委同意这个意见。

13、光山县农民委员会情况

光山县农民委员会是1928年成立的，一到尹家咀之后，不几天就叫尹良太筹备成立光山县农委会，因为当时就住在他家里，跟黄安、麻城县农民委员会成立时间差不多。这就是在尹家咀站住脚以后，在豫南党代会还没召开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跟黄安同时成立的，光山县农民委员会当时成立是叫主席。主席尹良太，筹备豫南党代表大会的一切事情，就是在光山县农民委员会，县农民委员会地点就在卢家庄，尹家咀后边的那个村子，山坡上的那个村子就叫卢家庄，农民委员会有尹良太、卢从珠、程秉璜、吴文保、细吴家的就是吴华铎的父亲，前几天到我这里来过（后边他又说过是1928年11月成立的，比七军改编为十一军还迟一个时期）。

14、关于光山县、区、乡党组织建立和发展的变化

光山县委的成立是1929年春、夏天，3月间，县委书记是张侠生，他是第一任书记第二任书记是来合云。

在县委书记成立之前就有区委，一到柴山堡一个多月就成立了弦南区区委，很早。1928年7-8月间，在尹家咀。7、8月间，南区就在柴山堡，南区区委的几个人就是来合云、陈文候，还有一个是程秉璜（程土坑人），还有尹家咀的尹良太。区委就在程土坑，他们几个有时也住程土坑，有时候住陈德祖到冯家坑之间的任家畈。在程土坑的那个地方时，活动的时间多，那个地方后来成了他活动的中心。白沙关暴动主要是弦南区领导的，那时我们也在那里。打白沙关，党委有三个决定，让他们发动的，先向西北发展，先向老叶坑发展，成立了弦东区。1928年秋，又成立了弦西区区委，书记是徐明人。不多久成立了弦东区，也就是光山的东区，双山门以东、马岗以东，到韩老屋，到八里畈，一直到沙窝集，书记是石生才，三个区成立了，以后就成立县委，成立光山县委。张侠生在光山担任书记的时间很久，直到1931年春打大山寨牺牲，才换成来合云。来合云原来就是县委负责人之一，等于副书记。一开始成立光山县委除了张侠生、来合云外，还有尹良太，他是本地人。石生才、徐朋人大概还有程秉璜，他是柴山堡程土坑的，他很活动、很能，是个很出名的人。

光山县委成立时在尹家咀，后来迁到南湖家，领导白沙关暴动就在

那里，1931年春打大山寨，张侠生牺牲了。以后光山县委书记就是来合云。1931年秋、冬，他又是打大山寨牺牲了。大山寨打了好几次，这次调几千赤卫军一起，由光山县委领导一起打。那时候省委的命令很厉害，一定要把它打开。那上面敌有几十条枪，有很多石头，山很高，四面没有隐蔽的地方。一往上爬，上面就打，是石头下来，砸伤许多人。后来，来合云也是在那个地方牺牲的。大山寨打了好几次，最后一次打开了。来合云牺牲后，是徐宝珊兼一个时期。后来，成仿吾也来了，名义上他兼任南区区委书记，实际上他是宣传部长，是个文学家，写文章的。他自己愿意到那里去当区委书记，实际上是叫他管光山县委的事情。徐宝珊以后的县委书记是来显安。徐宝珊时间短，来显安还没有去的时候就是成仿吾。这时光山县还在大朱家，那个时候的环境不好。成仿吾住陈德祖、伍家畝、张家垵这些地方。

我也担任过一段光山县委书记，那是在三次围剿的时候，我从京汉特区回来。当时京汉路就是特区，我是特区区委书记，兼京汉特区的游击司令。特区包括汉口一带的那些县，京汉铁路以南。十几个县划为一个特区，就在那里打游击。那时候游击战又紧张，三次围剿要来，形势很严重。那时红军主力在安徽。这个时期豫南这一区，国民党两个军到潢川，要向新集进攻，就调我到光山，在光山县任县委书记兼军区指挥部总指挥，住在徐家畝，这个时候县委有我，高敬亭、王大鹏，就这几个人，我县委书记，高敬亭是县苏主席，王大鹏是保卫局长。就在那个时候那里要打仗，成立两个独立师听我指挥。就在豫南这个地区打游击战争。打仗，对付张钫、对付刘峙（河南省主席）。对付他们那两个军，把这两个军抵住在潢川城，就没有南下到新集，后来反三次围剿胜利了。后来第四次围剿来了，我就离开那个地方。以后的县委书记是王大鹏，王大鹏以后是王正祖，王正祖牺牲后是卢从珠。就这几个人，王正祖是黄安长冲王垵的。

“四次围剿”来了，我去的，高敬亭比我先到省委。后来又回到豫南特委，商城城里头。

15、关于光山县委住田铺、周河情况

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走了以后，光山县委还在徐家畝。我走了以后就交给王大鹏。“四次围剿”以后就是王正祖，这个时候县委不在徐家畝，

住在新集东边的白石庵。“四次围剿”到来的时候，就是刘峙从潢川南下
的时候，县委从徐家畷挪到白石庵，它一直都没有走，进行游击战争。

1933年春天，我们在田铺的，易家、田铺、西高山、癞痢寨好几个
地方都住过，县委也在那里住过，他们和我们不是一块来的。因为我们住
在那个地方。红军一到那个地方，就有敌人来打，经常作战，他怕敌人经
过白石庵，就迁到靠近我们，跟我们在一块，后来又挪到白石庵，这时还
是王正祖，以后王正祖牺牲了就换成了卢从珠。王正祖什么时候牺牲的记
不清了。他也有病，1933-34年光山县委就一直住在白石庵这一片。县委
住白石庵时，红二十五军也在那里。白石庵、付家洼、慈姑堂、韩家老屋
那一块的村子都住过。省委没有住过，省委有人住在那里，省委机关、省
委书记沈泽民跟我们红二十五军住在一起，一路行动。红二十五军走时，
在周河没有开过欢送大会，程子华没有到过那个地方。

16、光山县委苏维埃建立的情况

光山县委苏维埃是1929年秋，阴历八、九月间成立的，黄安统统是
这个时候。1929年4月以后，斯大林、共产国际决定，中国成为苏维埃，
苏维埃是斯大林提出的，那个时候斯大林是想把中国也加入苏联，他们共
有十六个国家，像高加索、乌克兰国十几个国家叫苏联。想把中国也加入，
所以给中国命名为苏维埃政府、红军。这都是在六次大会上的决定。六大
决议上都写上了。1929年3月到4月之间，是4月，沈泽民也就是矛盾的
弟弟，来传达六次大会决议，那是在郭家庄传达的（此说法有误，应该是
曹壮父）。六大会传达了以后，就成立了苏维埃。原来是叫农民委员会，
由县农民委员会改为苏维埃，开过代表大会，成立县苏维埃时，当时有好多
建立苏维埃的歌：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扯起来，……”这就是当时唱过的
歌。这支歌是柴山堡本地方的农民作的，是谁作的不知道，不是外地传来
的。那时因为复写、油印，我们都亲自看看、改改，我们那几个人，谁都
修改。

17、关于弦东、南的来历

鄂豫皖边界有个天台山。天台山的来历是清朝初年有个耿天官，姓
耿名天台（耿天台即耿定向，应该是明朝的人）。耿天官就是清朝的天官，

官气象的，管天文的。他七八岁时候，就懂天文，他父亲很器重他，他父亲就跟他一起到处走。他读书也很好。那时有个耿年，就是在土门，在土门附近有个大屋。大屋是姓耿家的，他在大屋里住了一些时候，他后来就考察天文。考察天文嘛，就要找个最高的地方，就找到天台山。在天台山下面，他父亲给他租了一栋房子，他就住在那里。那房子还在。在天台山顶上，每天晚上他就观察月亮，月亮不是有上弦和下弦吗？圆月、弦月，他们以光山为中心，月亮的影子到了这个地方，也把它划个界限，叫做弦东，再到了那个地方也划个界限，叫作弦西。

后来清朝皇帝招考，耿天台到那里去报考，考上了进士。因为他懂天文，皇帝就把他留在那里当天官，耿天官。因为他的名字叫耿天台，那座山的名字就叫天台。那是清朝初，顺治帝年间的事。耿天官是湖北七里坪一带，耿家洼人。他那个弦也不是以天台山为中心，只是在天台山上看月亮。

18、关于党务委员会、鄂东特委和黄麻合组县委以及黄麻县委分开情况

1929年初，湖北省委巡视员、省委委员何玉琳来了。他们主要是巡视工作，了解情况。同时，我们向省委写了报告，准备成立鄂东特委（以前就是十一军党委会而不是特委）。十一军党委书记我兼任。委员有我、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王树声、汪奠川、江竹青、徐其虚等人。中心就是这几个人，名义上是十一军党委会，实际上是黄麻起义总指挥部党委会，继续存在。尹家咀会议之后，黄麻两县合组为一个县委，这是中央代表的指示，统一领导，书记也是我兼任，委员有王树声、徐其虚、刘培成、张行炳、郑大开等。黄麻县委是1929年“徐夏会剿”时分开的，麻城书记王宏学。1930年春换成雷绍潜，后换成张治有干一段时间。又换成戴雪舫，没干几天，身体不好。1930年秋到31年1月初，我兼任。当时，我是土地委员会主席。1931年1月初我离开麻城，调京汉特区任书记。我走后曹冠英任县委书记（中央来的）。

19、关于七里坪区工农兵代表大会

七里坪区最早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区苏维埃，大概是1929年5月间，那是蒋桂战争之后，胡宗铎的军队撤出七里坪，他的军队是三月

间走的，5月间我们就进驻了七里坪。后方还在杨家畈，过去的就是黄安县，不是鄂豫地区。边区的领导机关，那个时候，有时在这个地方，有时在那个地方；有时在这里留几个人，有时在那里留几个人。他的中心还是那几个负责人，那几个人在哪里，那个主要机关就在哪里。办事情各地方都留有人，你找鄂豫边特委可以到七里坪去找，到了七里坪，他就告诉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们同七里坪有联系，行动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

20、关于正月十九遭敌袭击的情况

在尹家咀下面的陈德祖和敌人打了一仗，有这件事情。这是1929年正月十九。那是胡宗铎的队伍，来的很突然，原来有消息，听说的很晚，敌人分几路，长冲一路，七里坪一路；七里坪一路又分两路，长冲也分两路。七里坪那边的敌人是从郭家河来一路，从陶家边刘家园这边来一路，长冲有一路是任家畈后山、王家垸那边绕过来的；另一路就从任家畈经木城寨镇过来到这个地方，共四路。四路包围柴山堡，郭家河那一路直插到摩云山背后，从摩背后上山。这样就把整个柴山堡包围了。这个时候我正在尹家咀。

正在尹家咀打了一仗，敌人来包围的事情我们事前不知道，也听说过敌人要来进攻的这个消息。因为前几天在这里召开了豫南党代会议，有影响，被敌人知道了。会议开完走了两天，散会代表到了陡山河。当时陡山河还是敌占区，在这个框框之外，敌人来包围，落了空。我们在那里打了一仗，没有什么损失，就是程昭续被俘了。他是从黄安来的，是黄安县农民委员会主席，来找我，向我汇报。那天夜晚天黑了，他就歇在任家畈倪志亮那里，倪志亮那个队住在那里，其余的队都到外面去了，程昭续准备第二天就到我们这里来，谁知那早敌人就来了，倪志亮就上任家畈后面山，他说不要紧，没有好多敌人，这天有很大雾，看不见，敌人到附近来了再跑不急，被敌人把他（程昭续）抓住。以后，就把他杀害了。他没有当过特务营长。

1929年正月十九，敌人的这次进攻，我们的部队分散在各地。主力部队有四、五百人。当时，都不在柴山堡，这个时候戴克敏回到河南湾去结婚去了，还没有回来。他结婚的对象是曹学楷的妹妹，不是清水塘那个姓郑的。那是童子婚，他没有结，退了。其余的人都到各地去了，只有倪

志亮那一个队。第一队，他住在任家畝，在任家畝的对面同敌人打了一下，就退到河里。任家畝后头有座高山，后来他就退到那座高山上。那个山不好上，又不好打，敌人没有上去。

21、关于白沙关暴动

白沙关暴动是弦南区区委领导的。那时南区区委只有几个人，就是来合云、陈文侯，还有一个就是程土垵的程秉璜，还有尹家咀的尹良太。区委有的时候住程土垵，有的时候住陈德祖到冯家垵之间的任家畝。住程土垵活动时间多，那里后来成了活动的中心。白沙关暴动主要是弦南区委领导。那个时候我们也在那里。打，是我们党委决定的，让他们发动，先向北发展，先向老叶家垵发展。白沙关打下后，在白沙关上面开了一个群众大会，以后国民党派人夜晚送了个通缉令，贴在白沙关。通缉我们那几个人，说把我、曹学楷这几个人抓住，赏十万银洋。这是群众大会之后，国民党从光山城送到白沙关高头，夜晚贴的。

白沙关暴动时，我们总部还在尹家咀，我还在那里。白沙关暴动之后，没过几天便是“徐夏会剿”，徐源泉、夏斗寅两个军来围剿。没有打进柴山堡，打到松树岗北边，打到麻城排家河。那里有个孙家垵，下面不是有个排家河吗？南边来到七里坪。

我们这个时候在紫云区，“徐夏会剿”有大半年的时间，这时徐向前来了，他参加反围剿了，他来时正是反“围剿”。

白沙关暴动时，是鄂东特委，没有成立鄂东北特委。鄂东特委有个计划。不只是白沙关，象卡房、陡山河、孙铁铺都想搞暴动。其它没有什么武装，张侠生叫派武装，那时我们人也不多，就没有派武装。结果就在白沙关搞暴动起来了，张侠生领导这个暴动，主要靠光山县农委会。有义勇军，不是利用红学形式，这个时候就是义勇军。各县都有，后来改为赤卫军。红十一军有一个队，住在白沙关朝郭家河这边，有一个店子里，白沙关下面，红军有一个队就住在那个地方，没有支持打，是农民自己打。

22、关于胡子石党代会和鄂豫边特委

1929年在柴山堡和胡子石召开了鄂豫边党代会。开完会后，成立了鄂豫边特委，就住在胡子石。胡子石之后就住在王家湾，王家湾最南边的那个垵子，不远，算是王家湾。在王家湾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挪到箭厂

河的杨家畝，住的时间比较久。还在细吴家也住过。在杨家畝的时候特委和特区苏维埃住在一起。

成立革命政府的时候是住在细吴家，在细吴家开的会议。

为什么在胡子石开呢？比较安全，七里坪离黄安太近，4、50里路，两三个小时就可以赶到。住在黄安的敌人一共有两个团。怕他们来进攻。不是胡宗铎的人，他们已经走了。是魏益三的三十军。

23、关于土改问题

1928年在方家湾党委开了一个会。那时已经急着要土改，因为已经要搞秋收啰。这时，党委就作了一个决定，实行“耕者有其田”，“谁种归谁收”，发了一个指示，“耕者有其田”。如果要在正式搞“耕者有其田”，还是在这一次。到了1929年开始分土地。在柴山堡把那几家大老财、大地主，陈德祖、大屋朱家、郭家河、杜家湾，这几家大地主土地没收，分配了，这是第一步，也就是一九二九年春天。这个时候，按照中央指示，二十石田以下的不动，不分配，只是没收二十石以上的大地主，对二十石以下的小地主，私有者不动，争取他。第一步是“耕者有其田”，第二步是没收柴山堡那几家大地主。二十石以下的也划成分，划成小地主，不没收他。到1929年冬，1030年春夏是平分土地，平分土地分区都是一样，把所有的土地都平均一人三亩，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计算了一下，鄂豫皖的土地和人口平均，一个人三亩，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计算了一下，鄂豫皖的土地和人口平均一个人三亩。南区跟那里也差不多，平均一个人三亩田。这个时候就是按照列宁的政策土地国有，都归公有，从30年开始也划成分，不管贫富都分三亩田。

分配土地的领导是在农民委员会之下，成立了土地委员会，县、区、乡都有，村里就一个人叫土地委员，以自然村为单位，具体步伐就是先统计土地多少，好坏远近，交给群众大会讨论。讨论以后，群众同意了，就公布，分到个人所有，发土地证，地主家财产太大的，象陈德祖、大屋朱家的都没收了，分给农民了，什么钱呀，衣服都没收了，在土改分配以前，训练过土改干部，没有专门办过训练班，召开会议，就是召开八、九、十几天的会议，长期的讲。村土地委员都参加，各区开各区的，县里没有开，大体还是以乡为单位，一个乡有几十个自然村。把这几个自然村的土地

委员集中在一起，学习讨论有六、七天，上十天，然后再去调查分配。当时是作为一个中心工作任务的来抓的，叫土地革命。县、区的干部训练是由土地委员会开会，主要还是县委这一级，各县为单位。这就是第二次土地改革，1929年秋天到1930年春这几个时期，鄂豫边区土地委员会委员是我，吴焕先是黄安县土地委员会委员。

24、关于文化、经济建设

在柴山堡这一段时间，全区的小学很多，叫列宁小学。凡有人教书的地方都办。郭家河靠南头那所房子，那就是列宁小学（以后是列宁高等小学）。其他各乡也都有。有人教书的地方都有统一课本，不是“四书”“五经”。课本是边区文化教育委员会编的。1929年有的文化上，各地都有识字班、以及夜校，还演戏。

商业上：有合作社。1929年—1930年还有做小生意的，当时政府不干涉。按照六次大会的决定，公家有个贸易局，那是领导机构同时又作生意，还派人在武汉等地采购，主要商店设在各镇子上，柴山堡这一片在郭家河有商店。

卫生上：有医药店，有部队医院设有地方医院。在柴山堡、芦家山有个地方医院（可能指大吴家）。

25、关于新集的一些情况

在新集召开了几次大会：党代表大会、工农兵代表大会，还有一些公审大会，就是蒋介石派来的两个人，到红军里面，被抓住了，在新集公审枪毙了。再一次就是1932年的“五一”纪念大会，会开的很大。

那时，领导机关就在新集，开了“五·一”纪念大会，党代表大会，全省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公审大会这几个大会。

鄂豫皖共青团中央分局书记是陈昌浩，后来，是钱文华，他是中央来的。袁克服是少共的一个委员，是少共国际师的师长，担任过一个时期的团省委书记，不是分局书记。

26、关于徐向前、倪志亮来边区

徐向前1929年从中央到汉口，从汉口到黄麻，1929年7、8月间来的，“徐夏会剿”的时候来的，战斗他参加过。就他一个人来的，没有别人。

倪志亮是1928年11月间来的。他是河南省委派来的，他同河南省委有关系，河南省委就叫他到我们那里作军事工作，他也愿意去，后来就到了柴山堡。

27、关于郭述申、曾中生等来边区

郭述申是1930年春天来的。他来了以后，把鄂豫边区改为鄂豫皖，安徽、湖北、河南都统一起来。这个时候又召开了各县代表会，还是苏维埃，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作以传达，把这个大计划都传达开。后来又派曾中生从中央来，又搞工农兵代表大会。鄂豫皖很注意政权。县农委会、县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这是个政权机关。要建立根据地，没有政权，根据地就建不起来，所以这个代表大会时常有开的，各县时常有开的。

28、关于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和花山寨会议

红二十五军走的时候，在周河白石庵附近没有开过欢迎大会。程子华也没有到过那里，他到过浒湾、泼陂河。泼陂河、浒湾过去，到了白雀园的东边汪桥，他有个部队，地方武装送程子华到了那个地方。二十五军在安徽，从安徽转来到汪桥和他来会合。从这个地方往西去长征。

红军长征是集中在一块，那里在罗山西边，礼山县的地方。去之前省委在光山，在山寨的西边很远的一个小村子，开了一个会议，离净居寺不远，在它的南边，离花山寨有好几十里，这是一个很好的村子，门口有个水塘，有十几、二十户人家。那次会议就是二十五军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改变战略，二十五军离开，北上抗日去，原来叫二十五军，只是改了个名称，会议是程子华传达的，参加会议的就是省委的人，省委的那几个人。

29、关于王志仁及他村里的情况

王志仁家在王家垸，他那个村子好，在革命的时候，那里面的人，都倾向革命。他的家是很有钱的家，他对革命的认识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是1925年到武汉，考上了董必武当校长的那个武汉中学的，1925年秋入党，后来就住在武汉中学。1927年组织上把他调到湖北省农民协会当干事，省农民协会组织部的干事。在武汉的时候，我同他很熟悉。黄麻起义以后，那个时候没有人啦，缺少人，我就打电话给那个中央驻武汉代表团，叫他到黄安来工作，后来他就回到黄麻了，那里是起义之区，七、

八、九、十天，起义以后十天他才回来，那是我的意见，回来以后，原来黄安县委都不存在，我就叫他暂时担任黄安县委书记，因为我不只是搞黄安、还有麻城、黄陂各地方的几个县。那么黄安这个地方呢？经常要有个人在那里管事情，就叫他担任黄安县委书记，他那时候就在黄安县城。后来，当国民党十二军进攻黄安的时候，他同潘忠汝在城里，潘忠汝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大队的总指挥，第二大队是吴光浩，他就与潘忠汝一起，在黄安城南边作战打仗，十二军从南边进攻，他们就在城墙上同敌人打，在那个地方牺牲的。潘忠汝负重伤，抬出城也死了。

他和桂步蟾不是同学，桂步蟾是1926年春，还晚些。我们后来进柴山堡时，他们那村子还有些基础，他在那儿作了一些工作，他那个村子还有个姑娘叫王淑媛，还有个王才贵，王才贵就是解放后河南省军区的副司令，已经死了。

30、关于吴焕先的情况

木城寨会议，吴焕先没有参加。黄安失守后，我们从黄安退到七里坪，在七里坪集合，准备向太平寨移动，这个时候，我找他到七里坪跟他谈，他没有参加他要走。他从这个时候就退出了。之后，他就同那个吴维如，从那个地方就已经到了新洲，他在那里教书。

吴焕先读初小的时候，跟我同学。后来，他到麻城住农业学校。农业学校毕业后，1927年春，他又到武昌黄土坡崇实中学里面的一个训练班（学习），这个训练班叫做青年训练班。学习了三个月的时间。后来他从训练班回到黄安。回到黄安就搞红学。那时对付光山红枪会，北伐战争的时候，北洋军阀就在豫南组织红枪会，这个红枪会要打武汉。这个时候，他就在箭厂河组织红枪会，革命的红枪会对付那个新县以北的红枪会、潢川这片的红枪会。后来箭厂河这所红枪会就参加了黄麻起义。吴焕先跟我在一起。起义以后，后来退到七里坪的时候，他就走了。1928年我从木兰山回来以后，我就派人去找他。第一次他没有回来，他在新洲郊外教书的那一家很有财产，只有一个独生姑娘，那一家就想把他收为坐堂女婿，那一家没有儿子，把他的姑娘给他，还没有结婚。后来我就派人去找他，算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天气冷了，就到了冬天。1928年冬后的事。他回来见到我哭、流泪，他感到很惭愧，他没有参加跟我一路去木兰山打游击，

我们胜利回来了，他感到不好意思。他人还好，他承认他不对。因为他表现很好。后来，我叫他到紫云区去当区委委员。紫云区委书记是程昭续（程小贩的人）。当了一段区委委员后，又当区委书记，就参加县委。

31、关于张侠生和孙铁铺起义

张侠生在潢川中学上过学。大革命时期就入了党。是光山县委第一书记，是光山孙铁铺张胡店人。大革命时期他在孙铁铺领导了一次农民起义，大概是27年，当时殷家棚暴动是一个时期，两回事。北洋军阀打到许昌，大概是1927年春后，组织了三千人，就是起义暴动。1928年秋，来到柴山堡，1929年3月成立光山县委任县委书记。1931年春，打大山寨时牺牲。

32、关于高敬亭的情况

我和高敬亭是1928年冬认识的。这个时候，他跟石生才在他家乡工作。原先他家里宰猪、卖肉。28年秋石生才去了，他就不干了。不干了就革命，就跟石生才一起。这个时候就成立了光山东区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是党和群众在一起的，好像农民协会这样的。书记是石生才。高敬亭是委员。当时石生才是党员。他经常和石生才在一块工作。1929年石生才从六安转来以后，大概是三月间，给他介绍，我批准，高敬亭入的党。高敬亭入党以后，就参加了弦东区区委。从1929年到32年，他一直在弦东区工作。30年底才到鄂豫皖边特区来工作。他就在鄂豫皖边特苏，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立鄂豫皖省，是鄂豫皖边特区。鄂豫皖边特区叫他搞粮食，做粮食工作，没有具体职务。32年在鄂豫皖边粮食委员会。31年才到省里头来，在省里没有担任啥职务。省里有个训练班，他在训练班住了几天。后来有个经济公社，在经济公社住了几天。后来派他来到光山县苏维埃主席。我去之前他兼任过光山县委书记，因为省里认为他干不了，就不叫他兼任，就叫我兼任县委书记，兼任军区指挥部总指挥长，打游击战争，他充当主席。

四次围剿来了，我们都走了。高敬亭先走，他是到省委的。后来到商城，到豫南特委，他担任过豫南特委书记，这是1932年四次围剿快要到来前几个月，当时的豫南特委在商城城里头。原来是豫南特委，特委书记是王平章，后来改为豫南特委，包括固始、霍邱、这时候还是王平章，

以后就是高敬亭。

33、关于邱江甫

邱江甫，麻城邱家畈人，麻城赤卫队大队长，和徐汝志合不来。后来参加了红军。又和排长搞不来，跑了、开了小差，被徐汝志抓住坐牢。1931年秋枪毙了。当时徐汝志是麻城保卫局长。

34、关于省妇女部长朱淑芳、张宗杏

省委是妇女部长，姓朱叫朱淑芳，是光山东区人，就是你们新集东边的。她是个童养媳，家里很穷，给她做了亲，后来就送到她婆家去了，当时她年纪还小。她娘家姓朱，她是光山东区新集不远的一个人，记不清是哪个村子。我同她很熟悉，她人很好，很能，也会讲，讲得很好，思想也好，是由区乡选上来的。在县里做过工作，不是部长，在光山在县苏维埃也做过工作，省委找妇女部长，就选中了她。三次围剿到四次围剿之间病死了，当时只有20多岁。

张宗杏也当过省委妇女部长，那是在朱淑芳以后，她当过妇女部长，当过一时。

陈再道同志谈黄麻起义前后 革命历史斗争情况

时间：1980年4月23日下午3时

访问：周密、戴定欣、白开基

整理：白开基

录入：李敏

校订：黄文治

孙中山搞了几十年革命没有成功，以后到了苏联，学到些东西，从苏联回后，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实行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要改善人民生活，得了人心，所以北伐军一直打到武汉，叶挺打先锋，成为铁军。董老当时就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

1926年，知识分子从武汉回到黄麻一带，组织农民协会，开展革命活动。真正的创始人，麻城有徐其虚（后派到商城，说他是假的，把他杀了）。还有王树声（1927年当过区长）、廖荣坤、洪文曙等，红安有戴克敏，紫云有吴先筹、曹学楷、陈得桓，（把家里房子烧了，革命很坚决，大家说房子烧了，走得成），还有李先念、谢富治，是木匠，张广才是窑匠，都是工人阶级。把家里房子烧了，革命很坚决。1926年秋，我们就有了农民协会，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别地都没有自卫军），还有敢死队、赤卫队。自卫军是脱产的，我在1926年秋就参加了农民自卫军，参军时就拿了两件破衣服，连门就有上锁（当时只想得要革命，别的什么也不懂）。约1927年初，就开始打红枪会，打土豪劣绅，当时的政策是有土又劣就打，有土不劣不打，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耕者有其田。

麻城农民自卫军有一个队，三个排，廖荣坤是一排长，就他一个人

革命，队长熊正翼，被地主施美人计拉过去了。三排长余佩芳后来也叛变了革命。

1927年“4·12”事变，蒋介石反水，陈独秀当时任总书记，说什么革命要以蒋介石为主，要我们解除武装，国民党派一个营到乘马岗来缴枪，我们不缴就上山了，我们有五、六十条枪，长、短枪、驳壳枪都有，以后就搞赤白对立（红安一个连也上山打游击了）。26年底至“4·12”共4个区，红安有紫云、七里；麻城有乘马、顺河。合起来同反动地主武装斗争，土豪都吓跑了。

与红枪会的斗争

1927年6、7月间，记得稻子还有割，西张店大地主王芝庭跑到河南组织会道门，纠集红枪会、白枪会、黄枪会、黑枪会、碰头会、扇子会等等，和我们作对。主要是红、黄枪会，特别是黄枪会，包头、腰带、背后都用黄色的，背上有符，他们进攻前要跪着念符，进攻时不能掉头，一掉头就要退却。在北界河，王芝庭带了200—300人进攻我们，我们自卫军就100把人，加上人民群众，红安支援的没到。但我们都不怕，因为我们打会道门比较有经验。在癩痢寨、杨泗寨打过好多次仗，抓住了敌人进攻不掉头的弱点，等敌人进攻到30米远，就用抬枪、大炮、枪、统一齐打领头的教师爷，边打边喊“后面已撤退了”。所以很快就把他们打垮了。这次除杀死他几百人，还活捉1000多。王芝庭也在福田河被我们活捉了。

黄麻起义

国民党叛变后，党中央派人到黄麻领导革命，有潘忠汝、吴光浩，潘是总指挥兼红安队长，吴任副总指挥兼麻城队长。11月份，攻打黄安县城，我们两个排进攻，吴带一个排在七里坪警戒北边，这次兵力是黄安一个队，麻城两个排，还有敢死队等约1000-2000人，打开占领了20多天，以后国民党派任应岐（河南督军）一个军包围了黄安城，围了好几道，硬冲冲不出来，就同敌人打巷战，潘负重伤跳城墙突出来，以后牺牲了。这次突出来几十人，北边有吴光浩带的3排，我也在3排，出来在紫竹园庙里集合，共有八、九十人，六、七十条各式枪支，义勇队都跑散了。我们不足一连兵力，撤退到黄陂木兰山。

艰苦的游击战争

在向木兰山转移途中，走到红安以南高桥的一个什么村子天就亮了，我们有好些战士穿的还是国民党的衣服，戴的国民党的帽子，为了安全起见，又干脆装成国民党的兵，但又不会说河南话，就廖荣坤一个人会说，就他一个人跟别人讲话，其余的都不做声。廖讲我们是任应岐的兵，到这里宿营，要准备牛肉、面粉给我们吃。土豪听说是任应岐的兵来了，信以为真，都跑来作揖打躬拜访我们，我们只准他进来，不准放出去，到天黑，都捆起来枪毙了，乘黑夜赶到木兰山，打了半个月的游击。

我们住在木兰山下边向阳沟庙里，再过去就是黄陂罗家岗，有个土豪很富，开着个大档铺，快到过阴历年的时候，我们想打开罗家岗档铺，打不开，到了除夕夜，估计要出访请菩萨，我们就准备冲上去，结果地主不出访，在炮楼上烧纸放火炮，我们就开枪往里硬冲，把两筒榨烧着了，离他房子不远，他要跟我们讲和，要我们退五里路，他们就缴枪，我们打不开，只有退，他们赶快都跑了，只剩下档铺，都是穷人档的衣服，怎么办？就出布告，请来先生，叫老百姓都来取档，取了4天，第五天里，罗家岗土豪请来一个团打我们，打了一天，我们天晚就撤到木兰山。

以后在木兰山站不住，就转移到黄冈，黄冈有党的县委，还有一支游击队，漆大爷就是黄冈的，在黄冈住了十几天，一次，地下党报告说，国民党有一个团长从汉口带回很多枪，我们派廖荣坤去打死了敌团长，枪也缴来了，大家都很高兴，敌人很快追上来了，在黄冈还是站不住，我们又返回到塔耳岗、木兰山来，当时情况比较严重，这边塔耳山，那也是集镇，反动势力很强，又蹲不住。一天，正吃晚饭，报告说敌人来了，我们又转移到塔耳岗，把长枪都捆起来藏好，脱了军装穿便衣，组成三个队的短枪队，每个队20人，到八里湾一带打游击，我跟王树声一个队，我任班长。以后目标大了，又分散，每人给几十块大洋，各人去找出路，我约我们班里郑世中，他湾里有个大土豪叫扁担二大爷，到他丈娘家住了一晚，对面就是大土豪扁担二大爷，当晚游击队就打扁担二大爷。

郑世家中原是教员，有点财产，他卖了2斗田，加上我们每人发了几十块大洋，共100多块，晚上，我们就跑到仓子埠，打了点货，有花布、平光呢等，共八、九匹，约六、七十斤，还有胡椒、白糖、黑砂糖等共20多斤，当天回来就黑了，郑老婆在家中也为我们做准备。情况很紧张，

又有清乡团，当晚就出了门，郑挑的布，我挑货物约40斤，走到河口不行了，肩磨红了，咬着牙第二天坚持挑到宣化店，肩都磨破了，我们把货卖了后就去找他叔叔，找不着，只好歇店，在店里听到说游击队还在活动，当地人管游击队叫黑杀党。在店里和歇店的一块摸牌，都输了，没办法，剩几个钱买了几头奶猪赶回来，路上又病死了，只剩一头赶回他家，我们又把枪取出来，又干起来了。

1928年初，爆发了蒋、冯、阎战争，情况又好转了，农村只有少数清乡团，我们又回到黄麻，搞统一战线，办医院、学校。很快地发展起来。

鄂豫皖的壮大

1928年徐向前到了鄂豫皖，最早是倪志亮，当时只4、5个连的兵力，去后就指挥打花园，孝感花园打一仗，得了八架机关枪，战士们高兴得不得了，有的把屁股也烫了，以后成立两个营，国民党哗变一个连，力量就慢慢壮大起来。

到了1929年，在宣化店二道河，敌郭汝栋来了，六安周维炯一个师，我们一个师，首先打郭汝栋一个旅，又缴了很多枪，不久就打岳维峻，在双桥镇，岳也是督军，缴了不少枪，成立了一个军、3个师，旷继勋军长，徐向前副军长兼一师长，我们向岳要了很多物资，装备了自己。以后又打苏家埠，韩摆渡，消灭了两个军，活捉了副总指挥陈调元。

1929年、30年发展更快，鄂豫皖原总以为张国焘来了才发展，实际以前很强大，发展很顺利。后来执行立三路线，准备攻打武汉，我在30团，高建斗任团长，到处打攻坚战。伤亡很大，吃了亏。

关于张国焘的问题

我们在苏联留学的28个回国后，有王明、博古、洛浦、张国焘、陈昌浩等。王明、博古在中央篡了权，派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来，当时红一军长许继慎，政委曾中生，把他们都杀了。张国焘到鄂豫皖是没有做什么好事的，杀的都是好人，没有坏人。王明在中央杀AB团，张国焘在鄂豫皖杀改组派，都是一路货色，一路的野心家。长征时张国焘反对毛、周、张、博，派朱总司令到四方面军来，南下时朱也在一路。

在延安反张时，但把下面的都划成了张国焘分子，我们觉得冤枉，要出来打游击，还把洪学智、王建安、詹才芳、许世友等关起来，后来主

席知道，并到窑洞门口来看望，说张国焘的问题由张一个人负责，中央负责，不怪四方面军的同志，这几句真心话使大家思想都开朗了，所以许世友写文章还说窑间门开了。

关于邱江甫

邱江甫在 1927 年、28 年就很有名，搞得很好，革命坚决得很，他是反对张国焘路线的，说他跑了，叛变了，为什么不早跑，跑了为什么还回来，杀他显然是杀错了，是高敬亭杀的，邱江甫是多好的人，他在游击队还不断地往正规军输送力量。

对苏区建设的几点意见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要加强农业第一线，把农民搞富。木材都搞光了，山也搞光了，怎么富起来。1979 年我到新县，看了一下自由市场，就是树，这怎么行。

小鱼塘怎么样，要搞起来，大牲畜也要发展，把群众搞得有吃有用有穿，不受苦，就是好的领导，不能搞官僚主义，少搞闲人，把生产搞起来就是很好的政治工作嘛！要讲实践，不求表面，老苏区要好好注意一下，说再好实际不好，怎么行，要说实事求是的话。劳力不要调走了，一出去就是半年，这等于破坏生产，要增加第一线的劳动力，不要光顾眼前。现在要讲究因地制宜，婚姻法也要实行，原来有的地方搞集体自杀，有的就是为婚姻问题。

计划生育不能强迫，计划生育好多人反对，有的搞强迫命令，按倒割，有的人吓跑了，6、7 个月还做人工流产，有的人愿罚 800 元，还是要生孩。有的地方生两个就要罚，特别要防止强迫命令，再就是技术，有的不顾影响，乱搞。

有些地方还不敢说话，黑暗、不民主，现在有法律，有法要守，知法不要去犯法。

生活不搞好总是落后，穿的那么破，黄猫黑猫还是要的，生产搞好了，增产了就好，人民就高兴，棉花怎么样，花生呢？也要多种一点，要有发展。

程启光同志的十次谈话

调访：惠彤、李东

时间：1981年12月8日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李敏

最近，惠彤、李东访问了程启光同志，八十高龄的程老，连续跟我们谈了十次。每次谈话半天，谈话前用一天半时间认真做准备。他从1926年黄麻地区农民运动讲起，一直讲到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入川。程老因为去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鄂豫皖后期的几个重大的战斗没有谈完，准备以后再谈。现将他的十次谈话简要整理如下。

1925年，黄麻地区就有革命的火种了。那时我才24岁，家里穷，给人家打长工混口。没念过书，不识字，从小学了个手艺，会弹棉花。打长工、弹棉花也混不下去了，没有办法，我就到了武汉，想在那里找点事干挣点钱，可是也找不到。怎么办？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有一天，我看到湖北军阀夏斗寅的部下在招兵，就想去当兵。当了兵总有口饭吃吧。可是心里又拿不定注意，想来想去下不了决心，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个摆卦的。我很迷信，就去抽了签，问了卦。那先生说：“哎呀，你老哥现在不能当兵，一当兵就回不来啦，要当兵得再等3年。”听了算命先生这一说，我就没敢去当兵，想不到过了3年，我真的当了红军。事情就这么巧的很。这次抽签问卦，对我的一生，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要不，就当了夏斗寅的兵了。

一、农民运动的兴起

我们黄安的革命火种，是从1925年到1927年的三年中发展起来的，

是在统一战线、南北战争中发展起来的。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从广东打到武汉，革命力量发展比较明显。那时，黄安有共产党的组织，叫党团支部，党跟团合在一个组织，后来才党是党，团是团。当时湖北党的领导人是董必武同志。在董必武同志领导下，黄安在武汉读书的青年学生，一批一批的回来了。这些青年学生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有的就是党、团员。青年学生回来，就做农民运动工作，在农村里组织农会。农村里没有工厂，只有小手工业者，所以，黄安的那个组织一开始是发展农会，强调贫雇农参加，成立贫雇农委员会。

组织农会，口号是学习十月革命，学俄国，搞共产主义。农会组织，开始在黄安地区并不普遍，七里、紫云两个区搞得比较好。这两个区离县城远，接近河南，是湖北、河南边沿的地方，因为有了这个有利条件，群众发动的就比较好些。县城附近反动势力大，县城南边离武汉近，反动势力更大。群众发动就比较差些。农会组织起来以后，就公开同地主恶霸作斗争。1927年春天，黄麻群众斗争高潮到了，夜晚群众不睡觉，到处捉土豪劣绅，捉来就斗，那是公开的，开始叫减租减息，没叫分地。有的捉来就杀。一批一批从武汉学校毕业回来的学生。不少人自己家里就是地主，他们把本阶级叛变了，斗他们家里的人，杀他们家里的人，他们也参加。比如曹学楷，他家里就是地主，戴季英的哥哥戴季伦，家里也是地主。戴克敏的家里不是地主，但也是幸福人家，有饭吃，有衣穿，比中农高，比富农低，他家有十多口人，他父亲是教书的老先生。戴克敏家跟我家是一个大队，七里区的。七里有个七里坪啊，七里坪在旧社会，是个小汉口，镇子不大，人口不多，但离河南近，做买卖的多，比县城还热闹。农民发动起来斗土豪劣绅，斗地主，他们这些都非常积极，主动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斗争，那时候，我们心里都有点想不通，他们有饭吃为什么要革命，后来在斗争中证明，这些人确实是好样的。在黄麻群众斗争到了高潮的时候，群众把土豪劣绅吴惠存抓起来了。吴惠存是紫云区最大的地主，这个人善于打官司，造假印，欺骗农民，手段很毒辣，老百姓恨透了他。农友们把吴惠存捉起来后，县里叫往城里送，当时是国共合作，共产党也参加政府，农友们将吴惠存送到半路上，听说他的爪牙要组织人拦路抢，群众怕吴惠存被抢跑了，就在半路上活活把他打死了。

群众发动起来了，公开捉了一部分土豪劣绅，偷偷杀了一部分土豪劣绅，又斗了一部分土豪劣绅，这样一来，土豪劣绅们都害怕了，纷纷向外跑反，有的跑到了武汉，有的跑到了河南。跑到河南的，同河南的地主豪绅勾结起来，组织红枪会和民团，和我们打仗。打红枪会的情况，我们后面再谈。

黄麻在搞农民运动的时候，就很注意在农村里发展党，当时党在湖北的领导人是董必武同志，那时武汉回来的学生，有的是党员，他们回到黄麻，一开始就注意在农村里发展党，把在农民运动中斗争的积极分子发展成党员，被发展最早的一批是汪奠川他们。汪奠川后来是农民自卫队的总队长，家在黄安县城附近的汪什边，黄麻起义时，他是农民义勇军总队长，防务委员会总队长，前线总指挥。坚持木兰山斗争后，下山活动被敌人包围，英勇牺牲了。在组织农会，搞农民运动的时候，党很注意发展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少量有钢枪的叫自卫军，多数没有钢枪的叫自卫队，同土豪劣绅斗争中，和同红枪会打仗中，又产生了义勇军，除老弱病残外，凡是能出来斗争土豪劣绅的，都参加了义勇军，这个规定的任务，我参加义勇军，当队长。

二、与反动红枪会战斗

北伐军打到武汉以后，黄麻地区农民运动的高潮来了。那时，分南北军，南北战争。南军就是革命军，就是北伐军，北军就是吴佩孚的军队，就是北洋军阀。革命军到了武汉以后，提出的口号就是“打倒北洋军阀”，“打倒豪绅地主”。北伐军到了武汉，农民运动一起来，地主豪绅就纷纷跑反，有的地主豪绅跑到河南去，同河南的地主豪绅勾结起来，利用封建迷信，组织了红枪会，来打我们。

红枪会组织的真是不少，我们黄麻这条线，从东到西一百几十里路长，战争没有时间性，也没有地点，没有个边界。红枪会一来就是上万，或者好几千，一来就是杀人、烧房子、抢东西。麻城的不说，黄安的其他地区也不说，就讲七里、紫云两个区，光房子被他就烧了好几千家，牛拉走了好几百条，东西拿走了不知多少，弄得老百姓没办法，天天在外面跑反。天天跑反，不做庄家不行啊，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老的小的跑反，

年轻的守岗，和做庄稼，白天一天换几班岗。

红枪会一来就是上千上万，开始你看到就是害怕，害怕他那红枪，他说打不进杀不进。他们穿五颜六色，有穿一身黄的，有穿一身红的，有穿一身兰的，还有白的、黑的，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头上也扎什么颜色的毛巾，他是姓兰的就穿兰，姓白的就穿白，成千上万的红枪会打过来，先是跪下来念经念咒，然后就是大声喊叫着往前冲，一面冲一边念着经，开始我们没有经验，一看到铺天盖地的扑过来，心里发慌，当时钢枪很少，有几根钢枪，一慌也打不准，心里就更慌，所以，开始打红枪会就吃亏，有的人真的以为他们打不进杀不进。

后来，我们看到红枪会他们手里拿的苗子短，不到八尺长，我们就想了办法搞长的，打脚鱼叉，搞到一丈一二尺。哎呀，那个时候把铁匠可忙坏啦，一天打到晚，家家户户的铁都搜出来，让铁匠打脚鱼叉。脚鱼叉，有的两个叉子，有的三个叉子，一根长竹竿。我们有了脚鱼叉，比他的红枪长，他就打不过我们了。有几次我们就把他打跑了，我们的脚鱼叉一叉就把他叉倒了，有时我们把它杀了不少，这样一来，他不是打不进，他骗人骗不了。

当时我们没有钢枪，只有少数几条钢枪是指挥部的，我们就想办法去买枪，就通过组织，通过省委，通过董必武同志买，那个时候是允许农民武装起来，买枪是合法的，允许农民组织钢枪队。

自卫军开始比较散漫，慢慢地组织起来，村有班，区有排，有领导的进行斗争。用的武器主要是脚鱼叉，配合少数的有大刀、鸟铳，以后又买了一些枪，铁匠又打了一些来福枪、掰把子枪，打一仗有一次经验，用了八个月的时间，把红枪会打败了，红枪会的总头子叫我们把他争取过来了。

同红枪会的斗争比较激烈的，光山的地主组织红枪会打不过黄安，就去搞麻城，麻城有个反动头子叫王九聋子，他勾引光山、新集红枪会几千人，把麻城围住了，麻城没有办法，到黄安求救，还不行，王树声就到武汉去找董必武，“王树声搬兵”就是这个故事，省委派警卫团一个营三百多人，开到麻城，帮助农民自卫军把红枪会打败了，把王九聋子打死了，活捉了王治平，这一仗以后，北边的红枪会就求和，就谈判，以后就开庆

祝会，把王治平枪毙了。

1927年的“七·一五”，汪精卫叛变了，地主豪绅有的就试探着回来想报复，农民就把他们捉住杀了，学苏联的办法，铲除地主豪绅。以后武汉政府就派三十军一个师，分布在黄安、麻城两县，镇压农民运动。武汉政府很害怕农民运动，叫黄安是赤色的黄安，黄梅是小莫斯科。黄安离武汉115公里，所以他们很害怕。

打红枪会时间虽然不长，但锻炼了工农，提供了以后军队干部建设的基础，我们的干部那时都没有打过仗，学生也没有打过仗，但他们都指挥打仗。那时，谁也不知道谁是党员，只有开会时才知道。我老二启宗是党员，我都不知道，起义后失败了，吴光浩叫他去当侦查员，敌人围上来了，他不朝山上跑，他朝屋里跑，敌人把他围起来，捉去杀掉了。当时战争时间虽然不长，但锻炼出一大批人。黄安的七里、紫云，麻城的乘马、顺河，这些地方青年农民后来大多都参加了队伍，所以后来当了领导干部比较多。当时领导农民自卫队同河南红枪会打的是吴焕先、吴先筹、吴先保、曹学楷、陈定侯，他们都是挨着边界，在前线领导斗争，徐朋人在县里做领导工作，同董必武、曾忻水，都是当时的领导同志。在军队里的是戴克敏、汪莫川、戴学诗、江竹青、戴潜汉，还有麻城的廖荣坤、王树声，陈再道也是比较老的，是麻城的老自卫军，他年纪小，现在70岁。

三、黄麻农民起义

省委组织农民暴动，开始是在阳新、大冶，吴光浩在那里领导，暴动没有成功，失败了。省委告诉黄安去的郑位三同志，说汪精卫叛变了，要组织暴动。有了鄂南暴动的教训，很快组织了黄麻武装暴动。

1927年10月里，在七里坪文昌宫小学校里召开了一个会议，听了曹壮父（记忆有误，应为郑位三——编校者注）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确定秋收暴动，以武汉夺取黄安城。以防务委员会的名义，把两个区农民组织起来，11月13日晚上，进攻县城。先头是两千名自卫军基干、赤色红枪会。自卫军那时没有帽花，穿短装，有的缠手巾，打县城热气很高，城墙有两丈多高，三四个梯子，一扒就上去了。黄安城在山脊上，一条梁下去。我们是从西门北门中间爬墙进去的。打县城并没有费多少力，敌人

不到百条枪，我们也不过百条枪，主要是梭镖。县城打下后，开大会枪毙了县长贺守忠，活县长成死县长了。接着成立了工农政府，主席曹学楷。自卫军改成了鄂东军，第一路是潘忠汝兼，第二路吴光浩兼，戴克敏是党代表，汪奠川是参谋长。县委机关都搬到县城里面去了，县委书记是王志仁。

黄安打下后，群众情绪高极了，编了一个歌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面八方，男将打仗，女将送饭。1949年解放时，黄安只有二十八万，有的地方是划到别的县去了，死了十三万，这是张体学统计的，他说黄安为革命贡献了十三万。

黄安县委迁到县城后，领导农民自卫军打土豪斗劣绅日夜不停。成立审判委员会，审判地主豪绅，但是，当时领导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验，警惕性不高，第一次敌人来了四百多，被打跑了，第二次来的更多，把县城围了起来，潘忠汝不在，只有少数自卫军守城，用的旧武器，后来区、乡自卫队都来了，才把敌人赶跑了。12月5日，黄安土豪劣绅收买河南地方土匪武装任应歧的一个师，从麻城那边过来，采取突然奔袭的办法，距离75里，奔袭来了，我们麻痹还不知道。我们守城的有七八十条枪。潘忠汝从县南回来，脱了衣服去洗澡。敌人的枪响了，他穿了衣服，敌人已从南门攻进来了。在打巷战中，潘忠汝负了重伤，同志们把他抢了下来，抬着从北门走了。抬到七里的檀树岗才牺牲的，埋到了紫云的檀树河。县委书记王志仁也在这次牺牲了。

从县城突围出来的两路部队，在闵家冲集合到一块不到百人，九十多条枪，教训就是缺乏农村根据地思想，觉得县城总比乡村好，所以，起义后21天，就把县城又丢了。跑出来的人集合起来怎么办？吴光浩讲话，把这个教训提到最高度，敌情观念不加强要吃大亏。讨论怎么办？提出到木兰山打游击。要坚持，只要人在，就要革命到底。把军队改名工农红军第七军。

四、木兰山上打游击

木兰山打游击一开始我不在，敌人打了县城后，我和老二跑反了，跑到了武汉，我对老二说：“你有文化，去当兵吧，还能当个师爷，我算

过命，3年内不能当兵。”我们老二是党员，他不干，跑到老丈人家去了。我在武汉，听到我们的部队12月底到了木兰山，影响很大，武汉那里传说，木兰山发展到了两千人，赤匪不得了哟，一个团打了一整天，也没有打上去。听到这些后，我就打定主意上木兰山。

木兰山，东西长，南北像鲤鱼形状，山上有一百多个庙宇，传说有木兰将军的故事。最高的一个叫祈嗣顶，站在顶的高峰上，没有云雾的天气，可以看到玉带般的长江和云烟弥漫的武汉。木兰山和红岗山是连接起来的，红岗山矮一些，西头有长轩岭，从那里坐摩托车，半个小时就到武汉了。

1928年阴历二月初八（阳历3月4日），我到了木兰山，见到了曹学楷，我们都是老熟人，他开了个杂货铺。一见我就问：你怎么来了？我说不革命不行啊。他说：好，好！他立即写了个条子，叫我去找徐朋人。徐朋人正在集中部队，叫工农红军第八军，都是穿老百姓的便衣，六七十人，只有一条半枪，怎么是一条半枪？徐朋人有一支手枪，还有一支汉阳造，枪筒被锯掉了一段，所以说一条半枪。六七十个人住在红岗山的一个庙里。戴克敏的叔叔戴老八是这个部队里的医生。我到后的第二天，发两块白洋生活费，大家都一样，吃饭是地方送饭上去吃的，我们那时是天天过年，顿顿吃大米，吃肉。

我们天天派人下山打听，有一天打听到第七军到了，大家都很高兴，便到塔耳岗西五华里的陈家祠堂，两个部队住在一起。祠堂很大，一百三四十人，到了祠堂里好像看不到什么人，吴光浩、吴先筹、汪奠川、王树声，都来了。没有见到戴季英，困难时候他跑了，隐蔽起来了，知道我们回到黄安时，他们才冒出来。郑位三也隐蔽了一段时间，我们三个部队在陈家祠堂住了4天，就整编了，140人，48支枪，有20多支步枪。给了我一支德国套筒子，学了3、4天才学会用。阴历八日下午吃晚饭的时候，两顿饭，约摸三点多钟，侦查员回来报告，说敌人已经到了门口。大家一听，饭也不吃，枪也不要，就向外跑，我还继续吃，我看枪没人要，就将枪都背出了祠堂。后来才弄清楚，军阀混战，是敌人追敌人，把我们夹在中间。结果大家又回来找枪，继续吃饭，没碗就用手捧着吃。以后就到离陈家祠堂有一华里的陈家寨集中。

这天晚上，吴光浩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边讲边流眼泪。讲农民暴动他经历过两次，鄂南暴动失败了，黄麻起义建立革命武装是不容易的，牺牲了好多同志，现在处在很困难的时期，我们要保存力量，部队要分散，长枪要埋起来，转盘枪也要埋起来，只留二十几支短枪。讲到最后，吴光浩同志说，愿意跟着我打游击的举手。除领导同志外，140个人，只有31、2个同志举手，我也举了手。吴光浩同志对不举手的同志说，你们愿意回家的就回家，愿意做小买卖的，我们给钱做小买卖。

会后，就决定除留下人埋枪，其余二十几个人从敌人空隙插出去，从九点走到十二点，才到了李家寨集合，我到王家河镇装卖柴的，把留下埋枪的同志接了回来。

我们在李家寨住了3天，吴光浩几个人开党会，叫我也参加了。有几个不是党员的知识分子不满意，问我会上讲什么，我说记不清，不知道。党会上讲得还是八七会议精神，继续开展土地革命，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是一致的，但又不一样，我们要建立农村根据地，按毛主席指示，建立农村根据地。

那时我们打着工农第七军的旗号，军长陈信（吴光浩改名陈信），党代表戴克敏，到处贴布告。三十五六个人，分成三个大队。每个大队编十个人。吴光浩是省委委员，经常到武汉去。确定一队在黄陂木兰山地区活动，二队汪莫川带着回黄安二程、七里、紫云了解情况，三队廖荣坤、王树声到麻城活动。我在一队，在木兰山以南，一个月活动非常频繁，夜里不睡觉，特别是那些参加革命的学生，不怕吃苦，不怕牺牲，使我非常感动。我们在木兰山以南活动，杀人放火，烧地主的房子，捉住地主就杀，不晓得向地主主要东西，左的很。听说中央不承认我们这支队伍，说我们土匪差不多。但是，黄安群众积极要求我们回去领导斗争。

汪莫川带领二队去汪家河，利用鸦片馆作掩护进行活动，他太麻痹了，有一天他们在鸦片馆里活动，老百姓报告他们，说国民党来了，他们没有动，敌人一个营走过去了，有坏人报告，说共产党在鸦片馆里开黑会，敌人又回来了，把鸦片馆围起来，打了一天，十个人，戴学诗被俘，其余的都牺牲了。戴学诗被俘后是不是叛变了，不清楚，以后组织上再也不让讲这事，党的纪律很严，戴学诗这个人以后再也不听说了。第三队是经过

黄安这条路去麻城的。

我们在木兰山活动，今天在这个庙，明天在那个庙，第一仗是袭击罗家岗的大地主，他家有粮有当铺，还有二三十条枪，我们袭击了他，缴了十八条枪。袭击以后，我们把粮仓打开，让群众挑，把当铺的东西拿出来，是你的，你就拿走。那时候胡宗铎是省主席，夏斗寅是师长，他是麻城人，徐源泉是黄冈人，他们在木兰山、红岗山跟我们打仗，打了一天，我们的子弹打得差不多了，就从敌人的空子里走了。到了黄冈，过了一个小平原，到了回龙山、大岐山，那里有个农民暴动的第六军游击队，二十几个人，不到十条枪，不愿意我们跟他们一起活动，我们就又回到了木兰山。

五、从木兰山到柴山堡

1928年5月初，我们从木兰山到柴山堡。柴山堡在新集西南，属河南光山县境，紧连着黄安的七里、紫云，麻城的乘马岗，上层封建统治势力比较薄弱，且山高壁陡，交通闭塞，地形对我们很有利。木兰山到柴山堡有一百华里，路上到处有红枪、民团，老百姓吃的苦不少。下山时我们的队长是戴克敏，副队长是吴先筹，队员有江竹青、徐其虚、戴学汉、郑子黄、郑家楼、邱强合，还有我。

我们下山的第一站到了高桥，那时都是晚上行动，白天隐藏起来，住下来就把老百姓封锁起来，怕老百姓出去泄露消息。第二站到向阳沟，这里有个大庙，庙里比较富足，有四十几个和尚，我们去了以后，因为人不多，对我们招待的还不错。吃了饭我们就走了，摸黑到了琉璃河村，离七里坪有七华里。这时敌人来了，把我们吓跑了，我们出了村，查点人数，十个人还剩了九个，徐其虚不见了。戴克敏对我说：程启光，你带个人，去把徐其虚找回来，我们在施家洼等你。我答应了以后，就带了一个人，去找徐其虚。我们顺着原路往回找，找到向阳沟，问和尚，和尚说，他吃了饭在庙里睡觉哩。我跟徐其虚讲，你倒好，吃饱了又睡了，把老子们累苦了，还要回来找你。我们这么一说，和尚赶紧给我们做饭吃，吃了饭我们就去找部队。

我们3个人走到了米家集，我认识一个人，过去我们一块给人家帮

工的，名叫白义，叫他给我们做了一顿饭吃，我给了他一块钱。吃了饭，我们继续走。那时正是菜子开花，麦子长得很深的时候，下午三点，我们到了王锡九村，碰到了敌人，我们在塘梗底下，敌人在塘梗上面，看到徐其虚穿着大褂，戴着礼帽，还戴着驳壳枪，不象个老百姓，敌人就打枪。徐其虚一听枪响，就拼命地跑，我怕他跑丢了，就跟在后面追，我说徐其虚你跑不了，你跑到哪我追到哪。我们跑了，把那个同志又丢了，他一个人跑错了方向。我对徐其虚说，全是因为你，你看怎么办。徐其虚脸色蜡黄，吃的饭全吐出来了。我一看也就没说什么。我们两个人到了施家洼，那个同志早已回来了。

我们又接着往前走，第三站到了陈家冲，只有三家人，茅草房，生活很好，自给自足，我们把老百姓封锁起来，又休息了一天，晚上又走了十来里，到了清水塘戴克敏未婚妻家。我们了解到民团团长，叫郑国桐，坏得很，带二十几个人，住在戴克敏家里。我们就决定消灭这股敌人。

戴克敏家离清水塘，说是三里路，山路难走，当十里路走也不够。这点路，戴克敏当然熟悉得很，他带着我们走，一进家门就碰到民团团长，他眼尖子快，机动灵活，一枪就把郑国桐给打倒了，民团那二十几个人，未来得及还枪，我们就冲上去了，敌人有的就跑了，有的就缴了械，一共缴了十八支枪。这次我们是十个人，后来戴克敏的叔伯哥哥也赶到了，共十一人，缴来的的枪后来交给地方，组织自卫队，后来叫赤卫队。

后来我们又打檀树岗，民团一听枪响就吓跑了，没有捉到民团的人，捉到了两个坏蛋，一个是上戴家的，就是戴克敏村上的。我们在戴克敏家消灭民团时他跑了，跑到我们村（我和戴克敏家是一个大队的）。我们村名叫程维德，这是我们老祖宗的名字，老祖宗兄弟三个，还有叫程维修、程维善，三个人名变成了三个村名，相距二三里。上戴家的那个坏蛋，跑到我们村的坏蛋程绍林家里。那天夜里我们把两个坏蛋抓住了，我对戴克敏说，我们用刀把两个坏家伙割了吧，戴克敏说，时间来不及，还是用枪打吧。戴克敏就用枪打，黑夜里也看不清，上戴家那个坏蛋被打死了，程绍林没有被打死，只打掉了舌头，后来他跑了。程绍林跑了后，我家可吃了大苦啦，专门找我家进行报复。村上老百姓也埋怨我们，把坏蛋抓住了不该让他再跑掉。我跟戴克敏说，戴克敏说，这是个沉痛的教训。

我们到了檀树岗，群众纷纷来向我们诉苦，群众说，天天把眼睛都望穿了，盼望你们回来替老百姓报仇。我们对群众说，回来不仅为老百姓报仇，还要建立政权。群众看我们人不多，问：你们来了多少人？我们不敢说实话，就问群众：你们听说我们有多少人？群众说：听说你们有好几千人。我们说：不止好几千，到处都是。群众说：听说你们打死好多地主恶霸。我们说：我们就是专门回来看看你们的。

我们很快的建立红安第一苏维埃游击队，抓到地主恶霸就用枪毙刀杀，注意发展武装，那时搞到民团一条枪就是一个胜利。原来埋下的枪，我们也把枪挖起来了，埋下48条枪，挖出来32条，步枪都锈成了麻子，怎么擦也擦不好，就那样当时也是好东西，扛着也吓人。转盘枪没有一粒子弹，我们就用套子将其套起来，到处给人家看。群众来看，多远地就吓唬人家，说不能碰，一碰就响，咚咚咚咚。

后来，我们到了柴山堡。黄安、光山边界、新庙、河南垸、史家洼、大张家、西张家，过去都是受两面的气，以后我们发展到这一带，成了我们的根据地。敌人来不敢在这里停。有一次，是阳历六月，桂系军一个营住长冲，归紫云区管辖的地方，还有一百多便衣队，都是短枪。当时，我们在河南搞整训，有一百多人。紫云区区长方小亭，是恶霸地主，他给敌人报了信，方小亭亲自带路，突然向我们驻地河南垸奔袭来了。待我们发觉时，敌人已接近我们。我们数十人枪，勇猛地占了后面的高山。接着，趁敌人的阵脚还没有完全摆好，又从山上打下去，把敌人打乱了。我们乘胜追杀，捉了两个俘虏，缴了三支驳壳枪。土豪方小亭逃回去后，被国民党的营长用鞭子揍了他一顿，还骂他：你连多少人都弄不清楚，谎报军情。事后，当地群众编了一首歌谣唱了好久。歌谣说：工农革命军真勇敢，河南垸一仗，盒子枪缴三管，方小亭挨皮鞭。这一仗缴获虽然不大，但对柴山堡人民的影响却很深。

进入柴山堡以后，为了集中对付国民党的围剿，党决定由曹学楷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并取得了当地的红枪会革命化。同时，广泛的展开了发动群众的工作。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柴山堡尹家嘴宣布改编为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下分四个大队，一个大队就是一个团。军长兼师长吴光浩，党代表戴克敏。

有一天早晨，我们正在驻地新庙，忽然发现敌人一个连向我们驻地前进。我们立即做好了战斗准备。

敌人越来越近了。他们发现了我们，不仅没有开枪，倒有许多人坐在路边休息。我们非常诧异，不知道他们要搞什么名堂，后来，一个军官，摇着白手巾，沿着羊肠小道，向山上走来，离我们数百公尺远时，站着一面摇手巾，一面喊“我们哗变投红军来了，我们哗变投红军来了”。

开始我们怀疑敌人诈降，吴光浩就派一个人下去，半小时后，下去的同志回来报告说是真的哗变来了。

原来这是桂系十八军的一个连，其中一个学生出身的排长，受到我党宣传的影响，有进步要求；该连事务长与连长有矛盾，这个排长就和事务长秘密议定把连长打死后，带着队伍投奔我们来了。全连共过来七十五人七十三条枪。

不几天，我们对这个哗变过来的连进行了整编。不愿留下的，发给路费遣回家。有三十多人留了下来，补充部队。这些同志都很进步，有一个姓姜的，1931年就当了营长。

当时农民对土地要求比较大，要发展武装必须把土地问题解决好。鄂东特委要曹学楷为主，做统一战线的工作。曹的爱人是柴山堡胡子石的姑娘。柴山堡有三个反动头子，一个是大地主吴先州，一个是民团头子吴文楼，一个是红枪会头子罗民高。他们三个反动头子统治了柴山堡，是光山最南面的一个区。曹学楷一去就争取这三个人，一谈他们就答应了。我们一进柴山堡就宣传群众，争取群众，搞些建设，建立兵工厂、被服厂、医院，柴山堡工作做得好些，曹学楷是出了力的，他是有功劳的。

到柴山堡以后，活动面比较宽了。打的仗也比较多，敌人一来，我们就到七个莲塘、八个稻场，那里人很少，野生作物比较多。后来有些重大的会议也在柴山堡开。柴山堡以后部队就是大发展时期。

六、特务队的活动

1928年10月间，组织上给我三支驳壳枪，叫我带两个人，成立鄂东特务队，又受到鄂东特委领导，又受军队领导，任务是在京汉路一带，帮地方建党，筹款，打地主恶霸，开仓放粮，发动群众，主力部队来了，配

合打仗。就在那个时候，我父亲被方小亭捉去挨了打，用香烧他，烧了四个大花。父亲来找我，说活不了啦，连衣服也穿不了，我也没办法，给他一些钱，叫他找个地方休养。

特务队一共3个人，我当队长，后来增加到8个人，江竹青当队长，我当副队长，我们的活动，从孝感到黄陂到黄安，和地方党联系，打土豪劣绅，筹款，解决困难问题。江竹青和我对这一带很熟悉。有一次，我们在十里铺附近的一个小村里，与一百多人的民团遭遇上了，他们在塘上，我们在塘里，我看到民团团长在前面跑，我就一枪把他打倒，把他的枪缴了，民团的一个士兵又给我一枪，子弹打在我的肚子上，我又赶紧还了一枪，把那个士兵又打死了。这一仗我缴了五支步枪，一支驳壳枪。后来民团被打跑了，我负伤也不能走了。碰到有顶接亲的轿子，同志们把人家新娘撵走，让我坐在轿子里，抬到一个姓周的地主家里去养伤，并警告他出了事由他负责，地主的小儿子天天跟着我睡觉。肚子里这颗子弹到了1940年129师在太行山活动时，才开刀取了出来。

伤好后我又归队活动，到了12月，快到阳历年了，我们活动到四姑墩。这里有一种反动组织叫仁义会，有武装，经常跟我们捣乱，江竹青通过关系，同仁义会的人拜把子，江竹青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过左了些，打死了一些人。以后，仁义会又勾结红枪会来打我们，有一天，红枪会打来了，把詹才芳的屁股上砸了一枪，砸出血了，我一枪把那个红枪打死了，詹才芳跑了，后面的红枪又来追我，把我的腿上砸了一枪，我腿痛，跑不动，后面还追，好不容易才跑了。

到了晚上，红枪会的头子又和江竹青谈判求和，请我们吃饭，我不能走，他们来了个大个子，把我背了去。达成协议，我们不打他们，他们也不打我们。

我们特务队的活动，欢迎我们的人很多，反对我们的人也有。筹的款，都是白洋，白洋多得很，特委同志说白洋不要，不好保存，要湖北票子，湖北票子有的是，又怕靠不住。后来我们把洋钱装在麻袋里，有的放在河塘里，有的埋起来，存放在四十多个村，一点也没有丢。上面一要钱，我们就送去，我一次挑1000块白洋，50斤。

我们不但筹款，还弄药、搞枪搞子弹，有时干脆问上面，要什么我

们就给弄什么。活动的方式跟过去也不一样，过去烧房子、杀人，后来就不烧房子，一般也不杀人。有次到平原一个地方去，那里有个左老虎，家里又有钱又有势，真是富得不行，我们8个人到了村上，就把左老虎捉住，没有杀他，叫老百姓把他抬着上山，一下子掉到雪窟里爬不起来了，我们又把他扒出来，交给上面去处理。我们的活动不怕苦不怕累，总是抱着牺牲的态度，一天都要走7、80里，再不好走的路，也能过得去。有人说，不能吃地主的饭，他在饭里放毒要药死你。我们有的是办法，等他把饭做好了，先用筷子试一试，叫他先吃，他不吃我们也不吃，所以地主对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在活动中，碰到过年过节，还给群众做点好事，1929年春节，我们把铜板拿出来，叫穷人拿回去好过年，洋钱不给。老百姓很高兴，我们活动就更有群众基础了。

后来，我送钱到特委去，特委要我去学习，一听说学习，我的脑袋就大了，不愿意学习，可特委叫去，不去又不行。我去学习，学什么呢？学历史，说我们的老祖宗是猴子，哎呀，把我弄的糊里糊涂。后来又讲共产主义，我实在学不下去，又要求回去工作。

七、见到徐向前同志

徐向前同志是1929年6月11日到鄂豫皖的，住在箭厂河。他是从上海走水路到武汉，由我们的秘密交通一站一站接来的。那时我在箭厂河养伤刚好，他听说我活动很多，就把我找了去。

我见他，是领导介绍去的。我背着驳壳枪去见他，看到他的个子比较高，比我们高，很威武，不算很胖，也不算很瘦。穿的大褂长袍，戴礼帽。挺谦虚，见了人有点害怕似的。他是山西五台人，讲本地话不好懂，不过他的话还是比较好懂的。那次见面的时间很短，只是问问，戴克敏同志也在，戴对他很尊重，不断给他介绍情况。我们谈到，鄂豫皖这块地方，又好又不好，好因为是中国的中心，不好是因为力量小不容易发展，南边是长江，北边河南是平原，就是一条山，山不那么富，富是两边富，山里头还是比较穷，工矿很少，生产的東西也不多。这块地方，在军阀混战中，开展革命运动很重要，这是全国的中心，革命的心脏，蒋介石的心脏，你在他心脏里活动，要他的命，他能放了你呀。现在开展革命活动困难，我

们一定要领导好革命。

第一次见面，我们都很兴奋。后来，在打仗的时候，经常见面。徐打仗很沉着，很尊重群众意见。有一次，徐向前同志对我说，你除了搞经济搞筹款，又要搞子弹。以后我就大量搞子弹。有一天打仗了，我搞了好几大车子子弹送去了，他见了我，就要子弹，我说有一点，不够还可以继续来。他问我有多少，我说问数我说不了，就一麻袋一麻袋算吧，但是小枪子弹不能用袋子，他听了挺高兴，问：用什么？我说：用斗量。他说：那好，用斗。我说，送子弹多少斗，多少麻袋，你给个条子，我回去就好交账。

1929年下半年，徐向前同志和我的妹妹程训宣结了婚。程训宣是宣统三年生的，是我的第二个妹妹，第一个妹妹很小就死了。结婚时训宣十九岁，他很有点长色，个子高高的，大眼睛，爱说话，比我们长得都好看，没有读过书，是个农民。她和徐向前同志结婚，是有人介绍的。箭厂河离我们家很近，许多领导干部都是我们那一带的，曹学楷同我就是隔壁坑。我母亲是个很热心肠的人，曹学楷、倪志亮他们常到我家去，徐向前同志就是曹学楷、倪志亮同志带到我家去的，经他们介绍，和我妹妹认识结了婚的，年底我回家，徐向前同志住在我家，我母亲告诉我他和我妹子已经结了婚，我妹妹当时是不是党员我不知道，后来肯定是党员，到特委机关去工作了。1932年初张国焘搞肃反，他想整徐向前同志，把我妹妹捕了，叫她说徐向前同志的情况，她坚强得很，一问三不知，后来张国焘就偷偷地把她杀了，一直到了延安，我才知道。

我还有个最小的弟弟程启波，跟徐向前同志当勤务员，他在家念过四年小学，跟徐向前同志学习进步很快，后来当了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打仗牺牲了。

程启光回忆工农革命军第七军 从木兰山到清水塘

调访：郭家齐

整理：郭家齐

时间：1982年8月30日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李敏

黄麻起义胜利后第21天，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黄安县城失守，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撤出县城转到县北紫云区。复又从紫云区的木城寨集结到黄陂木兰山打游击，我同二哥程启宗先跑到武汉，在那里呆不住，又回到七里坪，二哥去他丈人家，我就上了木兰山，我先找到曹学楷。他叫我到徐朋人那里去，这时，鄂东军已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开往黄冈打游击去了。木兰山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八军，有七、八十人，多是黄麻地区跑去的同志，也有木兰山一带的群众，只有一条半枪（一支短枪，一支长枪锯了一截，叫半支枪），由徐朋人负责领导，住在洪界山一个庙里。

1928年阴历二月初四（公历2月24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即黄麻起义的队伍）又回到了木兰山，部队在洪界山脚下经过，第八军的侦查员跑来报告说敌人来了。因为只有一条半枪，无法抵御，徐朋人决定大家疏散隐蔽。后来有人发现山下一个抬子上抬的是戴八老（医生，戴克敏的叔父），大家这才放心不是敌人，而是我们自己人，经过联系，果然是第七军回来了。当天夜晚两军会合，住到塔耳岗四五里的陈家祠堂里，共计150多人，没有棉被盖稻草，大家挤在一起休息。

阴历二月初十至十三（公历3月1日至4日），敌人十八、十九军和三十军将我们包围在中间，形势很严重。工农革命军领导人决定：有枪的留下，无枪的分散隐蔽。决定刚作出，部队尚未分散，说敌人进攻来了。大家一下跑散了。后未见敌人来，才又集中到陈家祠堂开会，会议由党代表戴克敏主持，第七军军长吴光浩讲话。吴光浩从黄麻一直讲到木兰山，又经木兰山讲到黄冈打游击回来，讲得声泪俱下，大家听了也都伤心流泪。吴光浩最后说：大家还要继续革命。接着，他发表了几点意见，他说根据目前的形势，我们这一百多人集中一块活动目标太大，有可能被敌人消灭掉，因此我们决定：一，凡能出去做生意的，我们给钱你出去做生意；二，凡能回家隐蔽的，我们给钱你回家去；三，凡愿意留下的，跟我一块打游击。吴光浩讲后请大家根据三条意见自由选择。然后举手，结果有三十六人愿意留下，其余的同志，有的回家，有的去做生意。陈再道去做生意，他带了二百元去河南赶猪，结果生意蚀本了，只剩下一头猪，他送给了别人，又跑回部队。

陈家祠堂会议后，又开了一次党委会议，决定将一部分长枪埋起来，使用短枪。参加埋枪的都是领导人，有吴光浩、戴克敏、汪奠川、戴学诗、吴先筹、江竹青、廖荣坤等人。枪都埋在王家河的河滩里，一共埋了48支，后来取走了32支，有16支找不到，收拾停当后，部队即往觅儿寺这边开。

到了李家寨，部队住了4天，开了3天会。中间由第七军领导人吴光浩、戴克敏、汪奠川主持，开了一次党委会。全军留下的战士36人中有二十几个党员。有些人虽不是党员，但是积极分子，也被吸收参加了党委会议。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次会议讨论了部队整编问题，决定除留宏坤（姓刘或姓孙）江波（外号豌豆）在军队担任勤务工作外，其余的统一编为三个队。第一队队长戴学诗、吴先筹，共10个人。我被编在一队。第二队队长由汪奠川兼共12人。第三队队长廖荣坤、王树声，共12人。戴季英等未编入各队。这次改编的时间约为公历3月8日左右（阴历二月十七日），到了阴历闰三月初，部队又重编一次，这时湖北省委指示说，戴学诗率领的一队烧杀的太厉害，要立即予以纠正。军部将戴学诗绑到二队，即汪奠川率领的那个队。一队队长由戴克敏兼，之后部队又分散活动，

三队由廖荣坤、王树声率领往麻城老区游击，二队由王奠川率领到黄陂王家河一带活动。他们都化装成便衣队，在王家河一家烟馆里休息，烟馆里来往人多，有好人有坏人。有人向汪奠川他们报告说，国民党一营军队开来了，你们要快走，汪奠川他们未及及时走，接着有坏人去告密。敌人将王家河困住，汪奠川率领全队与敌人战斗了一天，除戴学诗叛变外，其余全部牺牲。后来听说戴学诗认识敌营长。

再说第一队。我们队里有戴克敏、吴先筹、江竹青、徐其虚、戴先汉、郑植煌、郑芽绿（混名，本名记不清），石生勇、张宗景和我共十人。戴克敏率领我们从塔耳岗直插高桥河，在田家畈找到了田开寿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又从田家畈到张石河北面的向阳沟，这里是老区，我们可以公开活动。我们得到情报，驻县城国民党军部发生火并，三十军跟十二军打起来了，我们不理会它。第三天又经向阳沟，经柳林河向檀树岗方向走，天下雨，我们刚到柳林河，七里坪的敌人也来了，差点遭遇到，我们赶紧往东跑。到了石家岔，不见徐其虚。戴克敏派我去找，我顺着来时路程往回去，直找到向阳沟，徐其虚在那里，我们连夜赶到石家岔。大家在这里住了一天，是第四天。这时戴道普带一支驳壳枪来参加我们队。第五天我们又出发到陈家冲，打听了一下当地敌人的情况，又住了一天，第六天到清水塘（在高山岗的东北面，程维献村靠西北的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垅子）。住在戴克敏的岳父家里。他的岳父姓曹，是个瞎子，戴克敏立即宣布纪律：任何人不准出屋！我们都要严守纪律，白天隐蔽，晚上派人出去侦察情况。经过调查，摸清了上戴家民团的情况，大约过了三天，戴克敏集合全队出发打上戴家民团。我们约在晚上十时动身，清水塘到上戴家只有四五里路，很快就到了，戴克敏带领大家一进村，正好遇到民团团长沙国桐，一枪崩了，其他的团丁一见慌了手脚，有的拼命逃跑，有的束手就擒，就这样，没费多大工夫把上戴家民团解决了。一共缴了十八支枪，接着我们去打道观冲，这个垅子在上戴家这条冲的口头上，垅里有个反动头子，他听到上戴家有枪声便跑了，接着到程维德我们捉到了程绍林的儿子，程绍林是个很坏的富农，当地群众痛恨他，我们原想捉到他将他杀掉，谁知他也跑了，戴克敏主张将他的孩子杀掉，大家有些不大同意，戴克敏认为应该杀，以便打开局面，结果拉去打，大概是夜晚看不清，没有打

死，后来这孩子伙同他父亲程绍林干坏事，可厉害！最后还是被我们抓住杀了。接着到下溪河。五个地方，震动了整个紫云区，群众纷纷相告共产党回来了，反动派不知我们回来了多少人，都成了受惊的兔子，纷纷向外地逃跑，当时有一首歌谣是反映我们从木兰山到清水塘这段斗争情况的，歌谣唱道：

党员游击转回还，
黄陂到黄安，
先打清乡团。
铲土豪，除劣绅，
一致要共产。
谁敢来反抗，
叫他狗命完。
民团把枪缴，
军士又回还，
只急的土豪劣绅，
两眼朝上翻！

打了上戴家以后不久，戴克敏派我到木兰山去接曹学楷。

肖永正同志讲述革命斗争史

关于黄麻革命的根基

时间：1980年3月30日

访问：周密、戴定欣、白开基

整理：白开基

录入：李敏

校订：黄文治

黄麻革命为什么这么坚决？

总的说来是董老、陈潭秋播下的革命种子，他们在武汉办中学，实际上是培养我党干部。麻城第一批上武汉中学的有乘马胡家冲的胡静山、石槽冲的王幼安、徐其虚、邱江甫，徐家湾的王大成，泽里区（今新县）有炉子凹的桂步蟾、余学中、余守芳（后叛变）。第二批有王树声等，王树声是徐其虚介绍入党的。黄安有戴季英、赵赐吾、吴焕先等。

以后毛主席在武汉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王树声又由武汉中学转到讲习所学习，除胡静山没去外，其余都到讲习所了。这些同志回来后都成了我党优秀的工作骨干了。

怎么闹起革命的呢？

这些同志于1926年秋回到麻城后，组织起农协会，减租减息，宣传孙中山三大政策，教唱国民革命歌。1926年秋首先在乘区、泽里区组织农协，发展组织，我任泽里区少先队长。以后成立敢死队，我在1927年1、2月间就到了敢死队去了。当时老百姓情绪非常高涨，高兴得不得了。土豪劣绅反对我们，和我们打仗。凯老四（癸户两长），跟胡静山闹对头，我们利用河南土匪头子任应歧抄了凯老四的家，以后凯老四搞红枪会、民团，用这些地主武装和我们闹对头。

当时乘区与福田河区是死对头，福田全部是红枪会，没有革命组织，还有清区的顾敬之，西张店的王芝庭，他们和光山红枪会合作，与我们打的很厉害。革命组织首先起于麻城乘马、泽里，以后发展到顺区、西张店一带，红安起于紫云、七里。开始很顺利，革命组织发展快，老百姓拥护，地主不敢动，后来他们利用民团与我们作对。1927年4月份几乎把我们打垮，他一来几万人，我们手里没有枪，到任应歧那里买了6、70支枪，每支枪花一块白洋，配给3、40颗子弹，（因任应歧想投靠国民党，国民党不接收，打了起来，任应歧被打败，兵也跑散了，我们就去买枪）。这样组织起了农民自卫军。

后来光山、清区、加上丁家岗、罗家河、朱家冲、西张店等地的红枪会进攻我们，说什么刀枪不入，用以吓唬人，打了很多仗，最多要算杨泗寨一带。大约3、4月间，红枪会4万人进攻我们，把我们打得不行了，就派王树声到武汉搬兵。

鄂豫皖的革命王树声是有很大功劳的。一是大义灭亲，大年初一带了自卫军捉了罗家河的丁枕鱼，他奶奶亲自出来保（王的舅爷），王树声不见奶奶，说明他革命坚决彻底，把丁游行到乘马岗，当天就杀了，头挂在城楼上。第二是武汉搬兵。搬了一个营打了两个月，搬兵时我们都知道，但准备不足，配合不好，第一仗在丁家岗打败了。第二次学生军与我们配合起来，敢死队在前面，我们使用的一般是竹矛。第二次打了丁家岗，谢家洼，清水塘等地，一打就攻上去了，竹矛一桶一个，并不是刀枪不入。红枪会全部投降，大约有几千人。

我们部队住在杨泗寨，约一礼拜，红枪会投降后，帮我们做事，供给我们吃喝。接着打光山，也有了经验，打出了威风，打到那里，那里的红枪会都投降，至此，革命势力都有很大发展。农协会也发动起来了。乘、顺、泽里，清区，连光山也发动起来了。土豪劣绅吓破了胆，都跑了。但福田始终没有发展。

黄安的红枪会特别厉害，比我们农协会的人还多，几乎把农协搞垮，他们派人到麻城，搬了学生军去，麻城的农民自卫军也去了一部分，结果打赢了，农协发展比我们还快，红枪会都投降了，成立了革命的红枪会。

国民党“4·12”事变后，武汉还未变，共产党总部还在武汉，但学生

走了后，王芝庭在河南几个县纠集了几十万红枪会匪，大约6、7月间，稻子快成熟，他们人山人海，从新县出发来进攻我们。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都集中起来用排枪、九节雷、鸟铳、矛子，我们也组织了几十万人到旧饭店设伏，不让他下来，情况是侦察员侦察到的，我们有步枪100多支，还有来福枪等，土炮也很多，摆成了阵，打了三天，把他打垮，王芝庭躲到福田里，被拖出来杀了。

杨泗寨突围战

武汉“7·15”叛变，大革命失败了。“7·15”后，王幼安在麻城任县长，派了五个警察送信，说国民党要叛变，要我们做准备，信送到董家畈王树声二哥那里（区委机关干部都在此地），我们集中了200多人到杨泗寨开会，王树声、王大仁，徐其虚也都去了，赤卫军在旧饭店守边界没回，因此未去，一到杨泗寨，红枪会就知道了，来了5000多人，分三面包围了我们，北面因是悬崖峭壁，未被包围。开会动员是革命到底还是不革命，大家一致要革命。原估计只需一天，没带粮食，事先也无准备，我们无水喝，无饭吃，没吃的还好点，没水喝实在难受。最后拉尿喝，以后连尿也拉不出，一直坚持了三天三夜。有利方面就是有城墙，我们用石头、鸟铳、土炮，他攻不上来。第三天晚上我们用割来的蛟腾扭成绳子，从北面突围出来，只伤三、四人，共五支枪，打坏了一支，叫做四支半枪，后改为马枪，王大仁在这次战斗中被打死了。

突围后，我们也不认人了，为什么五个警察送信知道，我们上山敌人也知道，因觉察余守方有叛变行为，这次他又未上山，我们突围后头一个就打到他家去，杀了他哥，他父亲和他都跑了。

自卫军队长熊正翼被土劣用美女计拉了去，他在旧饭店叛变了革命。

王树声挺身而出，到黄安搬兵，这是他的第三大功劳，紧急关头他就站了出来，杀了自卫军队长熊正翼，争取了自卫军的绝大多数，他们是革命的，当时廖荣坤是二排长，许世友、陈再道都是班长，我在敢死队当班长，敢死队当时有200多人，专门打冲锋，队长姓杨，排长龚守甲。

自卫军解决后，国民党的部队都来了，我们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集中起来攻打黄安县城，轰轰烈烈地黄麻起义爆发了。这次主要负责人是吴光浩，吴原是麻城自卫军队长，后同熊正翼对调的。

“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我们在杨泗寨实际上就是贯彻“八·七会议”精神，负责人徐其虚，大概是阳历9月传达的。

攻打黄安，麻城的党政军负责人都去了，自卫军和革命的群众共有200多人去黄安。

关于邱江甫

现在对邱江甫的案件，老同志都有意见，他虽然出身地主，但打仗非常勇敢，谁都佩服，从他的队伍出来的没有一个是熊猫，我有一年多在他队里搞，红军出鄂豫皖，留下25军74师一个师，廖荣坤师长，邱江甫副师长，据说被高敬亭一块杀的。既然说邱江甫叛变了，跑到黄土岗红枪会那里去了，为什么还要回来，显然不是叛变，廖荣坤打仗也非常勇敢。攻打黄安，身负72处伤，还不下火线，他是雇农出身，据说现在恢复了名誉，但邱江甫还没有。这都是1958年王树声同志对我讲的。

黄安突围

黄安突围伤亡很大，突围后部队转移到木兰山，成立了第七军，军长吴光浩，坚持了两个月，这里离武汉太近，站不住脚，被敌人发觉，便组织围攻。党派吴焕先到郭家河做他舅舅的工作（他舅爷是红枪会大头目），搞统一战线。舅舅开始要杀他，吴挺硬，向舅舅宣传了革命道理，工作做好了，加上我们的力量也很强，突破了敌人围攻，在柴山堡打了个大胜仗，这是次关键战，军心大振，并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这里没有国民党的部队。他舅舅的红枪会也编入我们部队，编成了一个团。我认为，鄂豫皖的革命成功与否柴山堡战斗起了很大作用，具有很重的地位。

商南起义

1928年春党派徐其虚到商城开展工作，发动农民暴动，结果商城党内有两派闹对立，把徐其虚捕起来，后来吴光浩带十一人去救他，走到半路，得知商城已经把徐其虚杀了。转来时又中了敌人埋伏，被敌人打死了。

28年底成立第一军（打谢家店以前），一军长许继慎、政委曹大骏，辖1、2、3个师，鄂东1师，豫南2师，皖西北3师，1师长徐向前，2师长周维炯，3师长肖方。9个队编为一个师。

在此前，徐向前带一个连编为第9队。1队王树声，2队廖荣坤，3队江竹青，4队林柱中，9队徐向前。

从黄麻起义到鄂豫皖苏区

除了发展农民组织外，还创办了很多学校，儿童团员都上了小学，穷人都有了上学的机会，是空前的大发展，它对革命事业能否后继有人有很大关系。还动员妇女放足，破除迷信，打菩萨。党的思想教育起了很大作用，通过宣传，群众觉悟都有很大提高。

例如：大革命失败后，乘马、西张店还驻有国民党的部队，我们游击队到群众家，都被群众很好地掩护了起来，连本垸的人都不知道。甚至还把新媳妇的房让出来给我们住。非常亲切。

我们的纪律是很严格的，加上坚决执行政策，吃顿饭给一块白洋，喝一碗茶给几个铜板，杀只鸡给一块白洋。（当时除吃喝，部队每人每月发四块白洋）群众都争着要我们去住，愿意保护我们。

侦察敌情也不需要我们去，一般都是房东代去，他们借卖柴禾之便，把侦察到的情况告诉我们，侦察一次发给一块白洋。

通过宣传发动，各地群众组织也有很大发展，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传到河南、安徽，党的组织也建立了，游击队也发展壮大，群众都纷纷要求参加。这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有很大意义，在鄂豫皖斗争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的。

黄麻起义一直发展到鄂豫皖苏区。鄂豫皖苏区还是主要的，原十大苏区，鄂豫皖发展快，四方面军发展快。全国红军最多时是30万人，四方面军就有15万人。红军长征，四方面军损失了三个军，西路军失败，以后又补充了2000人。（30军我们9军、5军）三个主力军都损失掉了。到陕北号称三万，实际是2万5千。一方面军长征开始号称8万，到陕北1万不够。2方面军三万人，长征后也不多。四方面军有31、4军到陕北。以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129、115师都是四方面军的。

关于三次围剿

1929年第一次围剿，岳维峻任总指挥（河南省长、督军），1929年秋，在孝感花园捉了岳维峻。粉碎了第一次围剿，我们发洋财了。物资供应没有问题，当时我在一军一师3团。开始我们没杀他，还叫他当我们独立师师长，连以上干部一人一块手表，全军的服装都是他发的，他的部队送东西到花园，我们赤卫军去接，我们也就是向他要东西。

第二次围剿是30年正月，张学良的总指挥。住董家畷、杨家河、五楼等地，老百姓一家一缸榨油，敌人拿去炸糍粑吃，第二天早上起不了，个个拉肚子，一枪未放缴了一个师的枪。后在潢川打一仗，歼敌一万多人。第二次围剿很快被粉碎了。

第三次围剿是1931年热天，吉鸿昌做总指挥。后吉是地下党员，吉的参谋长来要跟我们合作，吉有30多万人，还有大炮、坦克、10多架飞机，张国焘说他们人多。我们人少，恐怕来了把我们吃掉。没有合作，这是张国焘的一大错误。

三次围剿不仅冲破了，而且打下了黄安县城，包围了一多月。

打了吉鸿昌，又打苏家埠陈调元的部队，我们一个团包围5个旅，我32团包围韩摆渡敌两个旅，王树声一个团包围清山两个旅，围了苏家埠48天，敌人连树皮、猫、狗都吃了，陈调元派两次援军，都打垮了，这次歼敌6、7万人。俘虏兵大多数是穷人，没有补充部队全部放走了，走了3天3夜，每人发5块大洋，有的不愿走，要求留在部队，也不要，非要补充根据地的。枪都库存起来，老百姓也不发，所以以后的四次围剿就抵不住了。这又是张国焘的一大错误。

苏家埠回后马上就打黄安，敌人援军也都被打垮，赵冠英固守城内，我们两架飞机飞起来，赵摆香案以为救兵到了。我们飞机丢了两颗炸弹，赵被吓坏了。

关于吉鸿昌

吉鸿昌接触我们，被国民党反动派发觉撤了职，出国私访，没有军权，到上海国民党想杀害他，我们党把他保护下来，以后国民党把他搞到华北。（这里加以说明的，为什么红军只有一、二、四方面军，三方面军到哪里去了呢？就是方志敏，在九江、庐山一带，群众说，上有朱毛，下有方张）方把部队带到华北。同冯玉祥，吉鸿昌合作成立抗日联军，开始赢了几仗，后日本与蒋暗地勾结。蒋派特派员要吉去北京，遭到了杀害，方志敏同志也是在北京被害的。他们是1934年杀害于北京的。

关于张国焘及肃反

张国焘是30年1月初到的鄂豫皖，带了3个人，邝继勋、陈昌浩，一个刘士奇，是个秃子。去了后把一军长许继慎降为师长，邝继勋任军

长；军营政委当师政委，陈昌浩任军政委，原吴焕先政治部主任撤后由刘**接任、师长降为团长。张第一步就是运用亲信，培植亲信。将红一军改为红四军。

1931年正月打新集，反动军队向我们喊话，叫我们过去，敌人太顽固，攻不进去，结果熬硝，掏地洞，埋了八棺材药，只响了一个，炸开缺口，部队往里一冲，敌人打垮了，水塘、井里淹死了不少，歼敌一万多。这是邝继勋的一大功劳。

以后打英山、霍山、黄梅、广济，执行立三路线，8月15日打到武汉过中秋，正涨汉水，张造谣说国民党去急电要许继慎带部队过去，给人给钱、给地盘。走到河南把许捆起来。拖在牲口后面拉死了。

肃反从班以上干部，一批一批的捆得走，只有走的，没有谁回来。不知杀死了多少人，新集有个万人坑，一个班就不敢走路，连狗子就咬人。

张国焘带的三个人就两个人反对，张又把邝、刘提起来杀了。地方上的肃反也是搞得挺凶的，不是张国焘去，鄂豫皖的红军还要扩大。白雀园肃反，乱杀一顿，根据地的老百姓也被杀死不少。

群众向往革命，虽经肃反，部队战斗力还很强，30年打鸡公山捉了七个洋人。还打了河南东面*角山一个镇子，缴获几十万斤盐运回苏区。

关于第四次围剿

1932年稻子出来快成熟了，还在打麻城，敌人四次围剿就开始了，蒋介石亲自指挥，敌有5、60万人，敌人进攻到七里坪，我们还不知道，正围着麻城，来了紧急令，连夜撤出麻城，第二天早上赶到七里坪，我们10师对敌10师。缴了好多自动步枪，当时我们有5师，歼敌一、两万人。敌人太多，我们就撤走了，打了新集，英山、黄梅、广济、新洲，又去打黄安。实际不撤出没有事，后来留了一个师，我们走了4个师，长征到枣阳新集受敌四面包围，晚上4个师全部出击突围在汉口河打开冰过去的，4个师4万人到四川只剩9000人。

四方面军长征到川陕的情况

到了四川，打开通江，张国焘的主要错误是通江有一个旅哗变投降我们，旅长也叫任应岐，张国焘将旅长杀掉了，部队改编了，这对统战工作是很有阻碍的。

离开鄂豫皖时我们共有3万人，到了四川后只有9000人了。到四川后部队发展很快，穷人多，地下共产党多，一个通信员出去一趟就可带回几十个。32-35年，红军扩大到15万人，五个军两个独立师，还有游击队。四川有个军阀田頌尧，派参谋长与我们谈判要求合作，因他与刘湘打仗，权被夺了，想与我们合作共同打刘，结果不但没合作，而且把参谋长也杀了。

我们打开舒宝浦，是军阀刘承原的老巢子，把兵工厂枪支火药统统弄来了，震动了整个四川，群众都朝苏区里面跑，发展到二、三十个县，来了不知有多少人。国民省主席来了，游击队司令王维舟来了，省委书记杨克明来区政府召开群众大会，一次大会扩大一个军，一、二万人，王维舟军长，杨克明政委，来的人多，也不审查，开始不错，大部分拥护我们的，后来混进了一些坏人。苏区里面也闹起土匪，又杀了很多人，军长政委都不同意，先后不少偷着跑出去当了土匪。

在四川有4、9、30、31、32五个军，杨克明原五军后32军。四川地形比鄂豫皖还好，能攻能守，物资丰富，群众条件也非常好。

十大苏区丢了9个就剩陕北，这是王明路线所造成的恶果。

30军、4军跟毛主席一路，一方面军战斗力差，朱总司令跟张国焘一路，我们一个师抽一个团补充，原1个师4个团，他们走阿坝，我们走上巴河，据说张国焘来电报，要把毛主席部队解决，叶剑英知道了，毛主席一方面军到陕北，如果四方面军到陕北就没有损失，叶剑英任30军参谋长。张接着南下，反对毛周张博，到四川成立伪中央，部队受了很大损失，后与二方面军会合，又北上到陕北。

问：关于王幼安、余守芳、敢死队

王幼安是1927年当县委书记，黄安是李先念，在黄麻起义前，后来的县委书记在农村，国共合作是麻城县长（公开的），党的书记是不公开的。

余守芳叛变后跑到西安当县长，我们在延安，他曾与我联系过，后来被国民党杀掉了。

敢死队每个乡都有，一乡一个班，我当班长；还有赤卫军预备队。

鄂豫皖的战略战术

鄂豫皖为什么能够存在，还坚持了几年，还有所发展？

实际上是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把党首先巩

固起来，不能分裂要团结；军队要扩大，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

我们的战术是，敌进我退，敌走我追，敌搜我打；以运动战为主，不能打攻坚战。打花园时，敌人根本不知道，从黄安出发，一晚上就到了，打开后，缴了八挺机关枪。到处传开：“孝感花园打一仗，得了八挺机关枪……”。岳维峻被俘后，武器就更多了。

从麻城宋埠到独山，60里路，独山敌人要跑，命令一点钟赶到，刚赶到，敌人正集合，把他们消灭了；打蕲春槽河，我们在英山，要半晚上赶到，刚天亮就到了，敌人刚吹起床号，我们打了进去，缴了敌人的枪。

打运动战有的打不开也不免强打，如打黄安三天未打开就去打谢店，打料棚三天有打开也走了。

部队的给养

我们部队的供应来源，原发四块，以后没发的，衣服也没发的，供应就是靠打土豪，分田地，就是搞的土地革命。

部队每个连队一个宣传队，宣传队主要是调查工作，一个是组织群众，组织地方政府，地方武装，团政治部有一个总的宣传队，下面的服从分配，部队供给主要靠宣传队。搞得好吃穿都好一点，剩余部分逐级往上交，师有宣传部，下头往上交，没收的什么布做什么样的衣服。

根据地里还有特务队，都挂手枪，专门捉土豪劣绅，捉到看守处罚钱，数字不等。

部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饱一餐，饿一顿，遇到什么吃什么。例如打潢川时，人都跑了，搞不到吃的，把塘里水放干，捉鱼吃，无盐无油，以后见了要吐。另外，陕西中江沟，也没有粮食，但那里柿饼多，到处晒得有，一个人背一大包，开始好吃，后头厌了。当时部队中得疟疾的很多，还得不到休息，但是，一到要打仗就好了。

部队纪律是相当严格，一次，一个营部管理员，在清区吃饭宿营，和老板娘吊膀子，第二天就杀在集合的地点。

睡觉也没被子盖，下面垫草，上面盖草，脚上用破布一缠。长征时更艰苦，草根、树皮、皮带什么都吃，吃了屎都拉不出来。

关于个人的一些情况

在四川，我任团部宣传队长，打土豪，供给部队，我会找东西，以

后要我做后勤工作，成立 30 军，调我到后勤部当部长，军部号召过草地每人给 50 斤粮食，我们有 200 头牲口背，自己骑的牲口带一些，我们到毛儿盖，林伯渠是总供给部长，说拨 60 万斤粮食，离驻地有 100 多里，我带一个营的部队去背粮食，100 多匹牲口。还有一营的武装，找到个地窖，小麦、布匹等什么都有，满载而归，做成炒面，定量发给，不准多吃，一天一碗，吃完了刚好走出了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我们没有吃亏。

长征中，我脚烂了，不能走，就坚壁起来，好了后，装成老百姓，走到兰州，遇上叛徒，捕起来坐了 4 个月牢，每天伙食伍分钱，一天两顿稀糊糊。不久押往西梁，走到西梁，我们一共 1000 多人，敌人派一个营押送，我组织了 30 多人跑了出来，一晚上就跑了 600 多。对我审查了三次，找到刘伯承，第一个恢复党籍，安排工作，在援西军任管理科长。

以后红军改为八路军，编在王宏坤部队搞后勤，我不去，要求调动，在抗大学了 3 个月，后就在抗大工作，延安保卫战时在 20 兵团任后勤部长，后到河北省军区任后勤部长，以后任副司令。

官兵关系

部队的连排班长非常辛苦，政治工作做得好，这样艰苦，没有人开小差，心情舒畅，主要是共产党员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干部做到三前三后，班排连长扛的枪是满的，一到宿营地就烧水给战士洗脚，晚上起来看看那个战士睡得怎么样，照顾病号，做思想鼓动工作，让大家一块走。政治工作也是很艰巨的，特别是班排连的干部，不象军阀部队，我们都团结一致，上下一致。部队还设有步兵委员会，帮干部提意见。

郭述申回忆麻城惨案委员会 成立之经过及其活动

时间：1990年6月18日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

1927年4月，我参加了麻城惨案委员会的工作，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个革命知识青年，接受了一点革命教育，这年我在师范还没毕业就当教员，参加了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被选为省农协常委，是这次大会产生的后补执行委员。毛主席是这次大会的名誉主席当时省农协下设好几个部，有宣传部、组织部、武装部、教育部。我当时任教育部部长，蔡以抗同志任宣传部部长，邓雅声同志是秘书长。省农协会委员长是陆沉（共产党员），以后这个人参加了托派，是黄冈人。陈荫林同志任副委员长（是陈潭秋的弟弟）；黄冈回龙山人，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再从南昌到广州的路上病死了。毛主席是在1926年底到达武汉的，一来就积极筹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但根据革命的需要，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主席又亲赴湖南考察农民运动。3月在武昌都府题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同时发表了。主席这篇著作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给当时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以热情的赞扬和支持，同时有力的回击了党内外一些人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责难。

1927年1月8日，湖北省党部召开了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的记录是刘昌群（黄陂人）同志，是武汉大学学生。会议讨论了农讲所的筹办问题。当时主要想招收湘鄂赣三省的农民学员，以后考虑范围太小了，因为这时的武汉正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加之又是国共统一战线组

织，所以决定举办中央农民讲习所，招收全国学员这个意见很显然是毛主席指示的。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要负责人是董必武同志，他是省党部的主任委员。当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人很多，有吴德峰，邓演达（大革命时期邓是国民党左派首领，反帝反封建非常坚强，是当时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是主任），大革命失败后他组织第三党，以后被蒋介石抓住杀掉了，还有李汉俊（他是一大代表，后脱党，他还是接受党的主张大革命失败后就被胡宗铎、陶钧杀害了）及李哲时和我等人。现在活着的人不多了。还有罗贡华，是国民党的右派，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当时农讲所的学员，麻城有刘文蔚，桂步蟾。黄安（现为红安）有王秀松等。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领导人是毛主席，还有周以栗，陆沉。陈荫林也在农讲所讲过课。

那时候湖北省很多问题都是通过省党部作出决定、安排工作、布置工作的。当时农民起来就是向地主豪绅作斗争，麻城的大地主丁抚岳把农会的标语撕了，农会把他抓起来，送到县里关押，那时候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路线激烈斗争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制造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许克祥也在长沙叛乱，夏斗寅在湖北相继叛变革命，当时的形势很险恶但是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满腔热血地支持农民运动，并指出农民不能满足于减租减息了，要在政治上把地主豪绅的威风彻底打垮，要分土地。陈独秀不但不接受毛主席的这一正确主张，而且竭力反对农民运动，推行右倾投降路线。再说农民运动起来，打倒地主豪绅，又直接触犯了国民党军官们的利益因为他们的父辈就是地主豪绅嘛，所以他们当然要反对农民运动。

当时，麻城的地主武装红枪会、白枪会就镇压百姓，到处杀人放火，制造惨案，麻城党组织派王树声和一个农民自卫军到省里报告了惨案发生的情况，要求省里解决。当时省里同志省党部出面，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惨案调查委员会，即由省政府、省党部、省农协及各界组成了一个20多人的“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我是省农协派的代表。我们没有枪，还是通过关系从外国人那里购了一些枪支和王树声一道来到麻城。

我们到麻城时是蔡济黄、刘文蔚、刘象明等同志接待的。他们当时

是县党部、县农协的负责人，都是党员已公开身份。我以为当时麻城的革命搞得不错，他们几个负责人工作很积极，反帝反封建很坚决。我们当时一起开会研究，要一起武装抗击红枪会，白枪会。但是手中没有武器，怎么办？当时县里有个民团，团长郑齐玉，决定调他们一道去打红枪会。会上蔡济黄提出：“郑齐玉会不会和我们一道去打红枪会呢？”因郑本身就是地主，他的民团是为地主豪绅服务的。后来通过商量，郑表示愿意去打红枪会。

我记得当时是阴历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们和蔡济黄，刘文蔚，刘象明，王树声等同志，带着十余支枪在前面走，郑齐玉的民团先是在我们后面走，走到半夜，后面没有人来，再往回一查，郑齐玉溜了，我们鉴于这种情况当即决定连夜转回麻城。

到了县城一看，豪绅们都跑了，连那个姓符的县长都跑了，城里很空虚我当时认为我们不能离开麻城，要留下来。我们马上研究，叫王树声同志把城关附近的农民自卫军调到城内来，由蔡济黄、刘象明把城内的贫民、店员都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把各种武器都拿出来。我们当时估计地主武装红枪会要来追我们，果然不出我所料敌人果然围城来了。我们都同自卫军、贫民、店员一块守城，并动员各家各户把灯笼拿出来点着，一个城垛放一个，便于夜晚巡查。在守城时有一个叫罗偏头的地痞，在城里企图趁乱打开监狱，放跑关押的土豪劣绅。事情败露后，我们立即将其逮捕，并组成革命法庭，由县党部、县农协、工会、商会、妇女协会等代表团体参加，惨案调查委员会任法庭主审，宣判罗偏头死刑，立即执行，显示了革命人民的权威。我记得我7天7夜没脱过鞋袜休息，昼夜巡逻，加强戒备守城抗敌。那时我们虽有一些枪，子弹瞄准再打，所以敌人攻城数次，都被我们和农民自卫军用石头，石灰罐打退了。他们虽然人多，也没有办法把城门打开。战斗中，几名会匪首领被打死，终于被迫撤退了。

敌人撤走后，我们惨案调查委员会就返回武汉。向省党部报告了麻城情况。这时第二次北伐，已向河南进军，省里又没有其他武器，只有一个警卫团。董必武就将麻城的情况向主席报告了，这样主席就决定从农讲所派300名武装学生和警卫团的一个营支援麻城，这以后的情况我就知道了。

附：

麻城县党史办：

你们经手的文件中有郭述申同志一篇文章《麻城惨案委员会成立的经过及其活动》现经过郭述申同志修改后，复印寄给你们请你们今后利用此文章时用这篇文章修改稿也可作为王树声同志陈列室的参考文件。

此致

敬礼

另外：郭述申同志1986年6月24日所写的《关于处理麻城惨案的回忆》一文与这修改稿可以一同使用。郭述申同志处。

郭述申同志谈有关 鄂豫皖根据地的一些情况

时间：1980年9月25日

地点：中纪委郭老办公室

采访：方明治、韩熙型、赵太乙

整理：韩熙型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

（一）鄂豫皖根据地党组织的组成问题

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的革命斗争，从1925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起，特别是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湖北地区农民运动发展的规模很大，同时河南南部地区农民运动开始兴起。在安徽一些地区，农民运动的影响亦大。大革命失败，党的八七会议以后，在鄂、豫、皖地区的党组织根据八七会议的决定，组织农民暴动。1927年湖北黄安、麻城就准备武装起义。河南光山等地区的起义失败后，起义人员跑到商城又组织领导1929年5月立夏节起义。两个起义的队伍都组建了红军。1929年六霍起义，以后也组建了红军。这些起义武装在鄂豫皖广大地方进行活动。在1927--1929年，各省活动都是分散的。虽然湖北的31师与河南的32师相互间有来往，有联系，互派干部，但都是以兄弟组织的关系进行联系的。这时，党组织还幼稚，不成熟，在联系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如鄂东派到豫南的同志，由于互不了解，团结方面出现问题。

1929年我在湖北地区工作，后到豫南工作。当时都是在秘密条件下

工作的。我在 1929 年底到商城巡视工作，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富农问题的指示。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国情，也不知道中国富农的情况，从教条主义出发，说中国富农是反革命，中国党和红军内都不许有富农成分，要清除干净。32 师党委和地方党委开会，我传达是照本宣读的。当时，党的领导干部出身工农的很少，大多数出身地富家庭，对这个指示接受不了。他们怀疑我这个中央巡视员是假的，要抓我。当时中央工作也有欠缺之处。周维炯是暴动领导人，当 32 师师长是可以的。可中央又派刘英来当师长。如果刘英当副师长帮助师长工作就好了。我就回上海向中央汇报。中央决定三省边界党组织要统一。三省边界红军要统一指挥。1930 年初，周总理代表中央宣布：三省边界划为一个特区，三省边界红军统一组成红一军，并宣布：我为特委书记，许继慎为红一军军长，曹大骏为政委，熊受宣为政治部主任。

周总理在 1930 年 2 月召见我、许、熊三人，宣布上述决定的。在和我们谈话中，指出三省地处长江以北，战略地位重要，三省边界党组织和红军统一，便于工作，便于今后更好地开展斗争。当时，周总理的谈话，还没有很明确提出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只强调要加紧工作。做好工作对今后发展有利。谈过话后，我们四人即分头到大别山。我单独走，1930 年 3 月到鄂豫边特委（在湖北）。当时商南 32 师、安徽的 33 师与湖北的 31 师是隔绝的，中间有国民党民团统治的亲区。许、熊等先到商城，然后到鄂东与我回合。当时我们思想上也没有明确去是建立武装割据与国民党进行长期斗争。只是从实际工作中出现的矛盾，感到力量要集中，指挥要统一。

（二）肃反问题

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在农村的环境里，碰到革命与反革命斗的问题。外部有豪绅地主，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红军。开始，我们的武装很小，既怕敌人公开进攻消灭我们，又怕敌人从内部来破坏，经常提出：防止反革命破坏，这种警惕是革命的需要。但当时斗争激烈、尖锐，敌人要派特务打到内部还是比较困难，比较少的。当时也确有反革命，在农村分地、斗土豪时，有给地主送信的，藏东西的，造谣破坏的。在残酷的斗争

环境里，党内、军内，动摇的，开小差的有，斗争困难时说怪话的也有。有些领导人把说怪话、动摇的，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看成敌我问题。当然也有个别投递叛变的。在社会上有反革命要肃清，军内、党内有反革命也要肃，有反必肃嘛。可是，斗争到困难时，有些领导人思想方法主观、片面，不作客观调查，不分析思想问题，而把一般倾向的问题、思想错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不仅鄂豫皖一个地区有，其他根据地也存在）。如有个群众说：乖乖，敌人有那么多飞机大炮。有的领导人就把他上纲了，说这是动摇军心和民心，是反革命。把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违反纪律，都看成是反革命行为。造成扩大化，一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不调查，不分析。二是一犯错误就加刑讯逼供，谁要你干的，你是不是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谁发展你的，你又发展了谁，就一连串的抓出来了。三是有些人想整人，就把问题说重重的，当成反革命肃掉。鄂豫皖的肃反，开创最坏的先例，最大的冤案，这就是四方面军的肃反，抓到一个就刑讯，口供为凭，再把过去的错误加上，就定罪了。白雀园大肃反时我在陕安南当县委书记，分局要我们也肃反。

四中全会王明篡权，东方部米夫派张国焘、陈昌浩、夏羲等回国，后到各根据地。他们一到就把当地老干部排斥了，由他们取代领导。用肃反作手段，排斥政治上不同意他们主张的领导人。所以肃反扩大化，除思想方法问题外，还有思想意识问题。肃反对干部摧残十分厉害，在战场上牺牲的干部没有被肃掉的多。地方干部，大多死在肃反中。本来吴保才、江究顺不是反革命，非要我抓，我不抓，就说我右倾。张国焘对知识分子有许多错误的看法，说：干部犯错误，工农分子减轻三分，知识分子加重三分。也以此来拢络工农干部，利用他们朴素的阶级情感。

鄂豫皖时期被肃的指挥员、干部中，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肃反问题是当时第三次左倾路线严重的一个问题。

毛主席在 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上宣布：凡在内战时期被错误肃反杀害的同志一律平反，受错误肃反处理的同志也一律平反。许继慎同志平反没有单独的文字决定。

我的印象中没有单独搞清党运动，是以肃反为中心，代替清党。

（三）四方面军撤离根据地问题

1932年，蒋介石亲任鄂豫皖剿总司令，派大量兵力进攻苏区。当时，到底有没有可能粉碎蒋的进攻？参照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我们如按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既不要与敌硬碰，避其锋芒，诱敌深入，分散活动，把敌人拖疲惫，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一路，各个击破，是有可能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可是张不按此方案作战，而是与敌硬拼，将敌人包围在麻城，给敌人造成集中兵力的机会，敌集中力量进攻我们，我则节节后退，未能粉碎敌包围。张国焘惊慌失措，仓促撤离。走时对鄂豫皖地区工作未作任何交代、布置。中央苏区如执行了毛主席路线，也能粉碎第五次围剿。所以，从总的讲，湘鄂西、湘赣、鄂豫皖、江西各苏区，在错误路线指导下，都失败了。

张带四方面军到四川。四川人民受国民党、地主压迫、剥削厉害，人民贫困，纷纷起来反抗。四川军阀之间矛盾十分尖锐，杨森、刘文辉、杨虎成之间矛盾很深，如有正确路线，四方面军的情况会更好，发展会更快。四方面军的战士特别能打仗。

四方面军反四次围剿失利，责任是中央的错误路线指导。1933年中央说省委、军委、四方面军领导都有责任，这是中央推卸责任。要说地方有责任，那就是执行了中央的错误路线。

四方面军撤离后，鄂豫皖地区党内主要危险是左倾，而不是右倾。当时统治党内的是左倾路线。

（四）过左的土地政策，加重苏区的困难，使赤白区对立，地主逃跑，富农反水。这与1929年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富农问题的指示有关系。

（五）对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的看法

张、陈、沈是中央派到鄂豫皖来的。来后，吸收一些同志。组成分局，分局主要核心是他们，分局不执行民主集中制。当时苏区的党组织和群众，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执行，对中央派他三人来也是拥护、接受的。认为张国焘是建党的发起人之一，是比较老的干部，张自己又摆出一副在党和军队工作上很有权威的架势。干部对他有某种盲目的崇拜。张又能引

经据典，认为他是有能力、有经验的领导干部。分局讨论问题时，沈对张的主张常有不同的看法。但沈是个知识分子，缺乏实践斗争的经历，虽然对张的主张不同意，但从理论上和经验上都说不出个道理，张也不买沈的帐。但在执行左倾路线上，他三个是一致的。陈昌浩对张是百依百顺，张派他去接替曾中生的四军政委职务，张带陈离开苏区。走的时候也未向沈打招呼，沈对张逃跑很有意见。

张国焘到鄂豫皖，坚决执行王明左倾路线，来后拢络工农干部。工农干部品质正直，工作积极，单纯，组织性纪律性强，服从性好。张利用他们的这些特点。他们对张盲目崇拜。到四川后虽打很多胜仗，但仍坚决执行左倾路线，把班、排长都肃了。到白区将凡在国民党里干过事的人的房子都烧了。虽开创了通南巴，但后来群众反对他，实际上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最后闹分裂，西路军三个军被马鸿逵骑兵消灭，张最后破产。张国焘从苏联回来，1931年初到根据地，最后到1938年叛变，前后八年中，做过一些工作，但张是阴谋家，野心大，是分裂党、搞阴谋的千古罪人。

陈昌浩是红四军政委，很能打仗，是张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陈到鄂豫皖时24岁，犯错误不怪。相比之下，张是老资格，陈对张言听计从。西路军失败回来以后，陈多次沉痛检讨，给中国人民革命带来沉重损失。陈对四方面军的建设做了许多工作。

沈泽民没野心，书生气十足，执行了错误路线。理论上有一定的基础。从大学毕业后留苏，回来就来鄂豫皖苏区当省委书记，当时也年轻。他的经历就如此，犯错误可以想象得到的。

（六）安徽省有没有统一的省委问题，我没听说有。

我在鄂豫皖特委时，长江局派巡视员来巡视工作。鄂豫皖特委所在地在鄂东北，但湖北省委没有领导过我们。长江局也不领导我们。中央直接领导我们。如中央派曾中生来任鄂豫皖特委书记接替我的职务。

郭述申谈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情况

时间：1980年四月一日

采访：公安部王初、海伦、冯秉直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

1929年，党派我巡视黄安、商城工作，接着又派我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1930年2月，周恩来同志召见我和许继慎、熊受暄、曹大骏，并指派我为鄂豫皖特委书记，许继慎为红一军军长，曹大骏为政委，熊受暄为政治部主任。我们回到鄂东成立特委了，开展了工作。

1931年5月，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组织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并把原中共鄂豫皖特委改为省委，下辖道（相当于现在专区）、县、区、乡苏区政府。张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沈泽民任省委书记，陈昌浩任团中央书记，后任红四军政委。各级地方政府都设保卫局。军队系统，师设政务科，营、团设特派员，做肃反工作。……

关于肃反组织和白雀园肃反问题。据我所知，在建立革命组织初期，就有肃反的组织了，因为搞土地革命就要同反革命斗争，不搞肃反就搞不起来。……但还没有把肃反扩大到内部和领导机关。

白雀园肃反后，才开始全苏区（内部）的大规模肃反。当时，我是行委书记，不在白雀园，对那里的肃反是怎么搞起来的不很了解，据说因许继慎、周维炯等同志不执行中央分局的指示，反对张国焘引起的。还听说许继慎同国民党派来的什么人勾结，要瓦解红军，就开始肃反了。肃反中，上上下下，株连了许多高级将领和一大批营连排干部。后来，张国焘到麻埠对我讲了一套他搞肃反的理论根据，他说，红军的胜利，动摇了

反动派的整个统治，反革命统治中国几千年，他们不甘心失败，就要派改组派到苏区和红军中进行破坏，无产阶级要巩固苏区，一定要镇压反革命。大肆鼓吹他在白雀园肃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许继慎等是不是改组派我不知道。对张国焘他们搞逼供信这一点，我在当时是有感觉的。他们对待同志，处理问题，根本不调查，看你像什么，就苦打成招，许多同志对此都有意见，但也无能为力。道委书记郑位三同志，不同意他们搞逼供，提了点意见，被张国焘批为“右倾”。我在皖西任道委书记，省委派高敬亭来巡视工作，高说，要“以肃反为中心”开展工作，诬指道区指挥部（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的副营长吴保才同志是反革命，是要从逮捕吴打开局面，我问什么根据，他说吴承认了，我说是你们苦打成招。最后，他说他是省委代表，我说我是省委委员，相互争论不休。后来，省委相信了高敬亭的汇报，诬指说我“右倾”，撤了我的职，就在皖西北搞起肃反来了。

肃反杀人，这在当时是很简单的，只要苏区主席、省委书记或保卫局长同意就行。……在肃反中对出身不好的人，如果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甚至不是什么错事，联系阶级出身，就是反革命，反之就可以算作错误，不计较了。对不同意他们意见和有不满言论的人，也可以上升为反革命，所以一次肃反总有成百上千的人被逮捕，受酷刑，被杀掉。……党员不是改组派，就是 AB 团；不是恋爱委员会，就是吃喝委员会。什么吃喝委员会，就是把土豪分来的猪肉和白酒，战士们一起吃吃喝喝，就说这些同志都是反革命。毛主席在延安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不仅仅是对抢救运动提出来的，而主要是总结了苏区这段经验，这是苏区最大的教训。

当时我们队伍的干部和群众，觉悟是很高的，在这么严酷的肃反中，遭冤枉受委屈，但他们在作战中还是很坚决。一些抓起来没有被杀掉的所谓“改组派”，敌人来了，他们杀敌很勇敢，打散了又自动找部队。这就是启发很多同志想这么一个问题，既然说他们是“改组派”，为什么他们还拼死的打散敌人呢？他们被打散了，为什么又不往敌人那边跑而找回来当“改组派”呢？！同志们心中逐渐感到肃反扩大化了，杀了好人了。

张国焘为什么要这样搞肃反，我想他是六届四中全会后，派来执行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他错误地认为根据地领导“右倾”，他是来“改造”。他到根据地后，带着极左眼镜，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对不同意见的人，一律被视为是坚持“立三路线”，反对四中全会，诬指这些同志是“改组派”，加以迫害残杀。红四军政委曾中生同志，对张国焘指挥战斗提过些意见，对南下作战有不同看法，张国焘就视为是反对中央分局，不服从他的领导，为了排除异己，巩固他的领导地位，便把曾中生撤下来，由陈昌浩任政委，后来把曾秘书处死了。陈昌浩到了红四军，抓住许继慎与国民党派来的人有接触的说法，就把许抓起来杀掉了。

那个时候搞肃反扩大化，除主要原因是由于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搞所谓“肃反中心论”以外，在具体工作中，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不搞调查研究，抓住事物的某些现象，就无限上纲，指为反革命，动用各种酷刑，逼迫关系，熬不住就乱供，供了就信，信了再抓，再逼，再供，再信，以致伤害了很多根据地的创始人和英勇善战的军事领导人，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郭述申同志对1934年9月 鄂豫皖省委第四次常委扩大会 《对郭述申同志决议》有关情况回忆

时间：1980年9月28日上午

地点：中纪委郭老办公室

参加：方明治、韩熙型、赵太乙

整理：韩熙型

录入：黄文治

校对：黄文治

1934年四方面军撤走后，三个道委改成两个道委：鄂东北和皖西北。鄂东南归皖西北道委领导。

1932年秋末，廿七军东路游击后，廿七军并入廿五军，我就坚持在皖西北工作，一直到1934年。

1931年正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篡夺中央领导，成立临时中央，开始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张国焘是四中全会后，被王明的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的，同行的有陈昌浩、沈泽民。他们来后坚决贯彻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四次反围剿失败是张国焘不执行毛主席路线，执行王明路线的结果。张国焘带四方面军走后，鄂豫皖省委由沈泽民当书记，坚决贯彻四中全会王明路线的，也是夺取中心城市。四方面军走时，留下少量武装和伤兵，还有一些游击武装，在此基础上，又组织红廿五军。省委仍执行的左倾路线。如当时根据地中心是七里坪，攻打七里坪是军事上的左倾。政治上打倒一切，肃反扩大化，用肃反推动一切，实行肃反中心论。当时战场上牺牲的远没有肃反中被杀死的多。敌人又疯狂进攻，蹂躏苏

区，党内执行的左的政策，使苏区的困难更大。这就是1932—1934年鄂豫皖苏区的一般情况。

1932年廿七军东路游击问题。国民党四次围剿，张国焘不按毛主席指示（避敌锋芒，诱敌深入，分散活动，把敌拖疲惫，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路），在敌人强大兵力进攻下与敌硬拼。当敌人从大汉口大批进攻时，红四方面军把兵力集中在麻城，也给敌人造成兵力集中的机会并与敌拼，结果黄安、麻城、黄陂一仗未打好。张惊慌失措的后退，就从鄂东北退到皖西北，到鄂东南，最后撤出苏区。当敌人大批兵力压下来时，刘士奇、徐海东的79团被敌切断，与我带领的部队在英山东界岭会合。我们为牵制敌人，分散敌人兵力，决定组织红廿七军。并有意识的，大张旗鼓宣传成立红廿七军（又名东路军）。以迷惑敌人，吸引敌兵力到我们这边来，减少敌人对四方面军的压力。廿七军成立后到潜山、桐城、舒城一带活动。当时四方面军撤出鄂东北时，鄂东的群众，撤出鄂东南时，商城的群众跟着跑出来。以后四方面军到皖西北，跑反的群众跟着跑到皖西北。当敌人将四方面军切断后，这大批跑反群众就跟我们。当时跑反的群众大大超过红廿七军几倍、上十倍。当时情况困难危急，天天打仗，一天打二、三仗。东路游击五十天，没有哪天不作战，不行动。一打仗，群众就漫山遍野地跑，将部队冲散。敌人在后面追击，确杀害了许多群众。无组织的群众，一打一跑，一分散。如六安与黄安的群众混在一起了，没法组织起来了。打伤的要抬，组织群众自己抬，没人肯抬。开始抽部队来抬，后来抽多了影响部队作战。又没有吃的，当时的情况是难以想象的危急、困难。就考虑、研究，想多种办法解决群众问题，以使部队好作战、行动。刘士奇是位老同志，一直在江西工作，张到鄂豫皖后才来到四方面军任政治部主任。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很强的。在最困难时，考虑如何把群众处理好，不然敌人没将部队搞垮，跑反的群众反要将廿七军拖垮。刘士奇说过一句很有水平的话：“红军是阶级斗争的锋芒，不能将红军搞垮，不能与群众同归于尽。”想了很多方法。想方设法了解情况。但当时没有报纸，没有电台，与上面失去联系，没有情报，也没有群众可问（群众整村整乡跟着我们跑了），也不知进攻苏区的敌人撤退没有。曾想派部队将群众送回苏区去，可又不知敌情，不敢冒然，而且廿七军只有二千多人，派太多

的部队去送，又没可能。最后决定廿七军转战，顺原路回到苏区，走一路送一路。刘士奇同志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廿七军与廿五军合并，刘就留在部队，我回皖西北工作。1933年时，说刘是反革命被杀害了。廿七军东路游击不是畏缩逃跑，而是保存力量，坚持斗争。

省委认为我肃反不坚决，包庇反革命。白雀园肃反杀了大批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当时我在鄂东北当县书。地方肃反将起义的领导人陈定候（领导黄麻暴动的领导人之一）等都杀害了。我在皖西北当道委书记时（道委相等于现在的地委），道委的军事指挥吴保才，廿七军政治部主任江求顺，这些同志政治斗争坚决，工作很好。高敬亭（省委委员，红廿五军七十五师政委）到皖西巡视工作，抓住一营长搞逼供信。问我知不知道江、吴是反革命。我说他们不是反革命，就和高拍桌吵起来了。吴保才是雇工出身，江求顺是烟匠，革命坚决，不是反革命。高回去向省委报告，省委轻信。这就是1934年鄂豫皖省委常委扩大会撤我职的直接原因。再加上廿八军与廿五军会合问题。当时吴焕先是廿八军军长，知识分子出身，缺乏军事作战经验。徐海东带廿五军到皖西，这时张国焘等已撤离苏区，省委在鄂东，没有紧箍咒，打了些胜仗。当时鄂东到皖西，顾敬之控制商城洛东一带，我们行动困难，来往没有一个营兵力通不过去。1933年10月徐海东（红廿五军七十四师师长）来皖西北，问我为什么没有去鄂东会合。我们没接到省委指示。如接到指示，我们会执行的，不管有什么其它问题和困难。

夏云华（红廿八军政治部主任）问题，她是留苏的，与丈夫一起在苏留学后，被派到鄂豫皖苏区的。省委决定要我将夏逮起来。这时夏的丈夫已被肃反杀了。省委说她是反革命。我说是反革命就回去逮捕。回来后一了解是个好同志，就没有抓这个同志。

刘德利也是好同志，年轻有为的指挥员，他是廿七军特务营营长，廿七军并入廿五军后，就留刘的一个营。以此为基础，我们组建了八十二师（廿八军）。刘是师长。

这个检查是违心的。在那种情况下不做检讨不行的。曾经几次要杀我啊。

郭述申同志谈话记录

时间：1980年11月20日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

我认识海东同志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夏季，我在陕安南县任书。李先念同志任县苏主席。当时海东同志在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当团长，因肩部受伤在我们那里休养。

.....

1932年，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蒋自任总司令，副司令是张学良。由于张国焘不执行毛的指示，所以没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后来，张国焘带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实行右倾逃跑，转移过程中，在苏区内没有打过好仗。

1932年初，我被调到皖西北任道书。当时三个道委，还有豫东南和鄂东北两个道委。海东同志已由团长升为独立四师师长。国民党围剿部队的主力集中在鄂东北。卫立煌、李默庵、汤恩伯的部队在平汉线。当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东向皖西转移时，我带皖西北的地方部队在东西界岭同海东同志会合。他当时带了一个团在那里担任后卫，掩护主力转移。由于敌人插入，徐海东和刘士奇带的一个团同主力失掉了联络。我带的二个团是地方部队，只有一个有战斗力。徐带的那个团，战斗力很强。不久，中央分局来信指示，要徐、郭两部留在湖北，安徽边境坚持斗争，组织鄂皖工作委员会，让我当书记。当时，我们不明了张的意图，以为分局的指示是要我们牵制追击四方面军主力的敌人，谁知他已带着主力逃跑了。当时，我们开会研究，想既然留下坚持斗争，就得树起一面旗，决定成立红

廿七军，军长刘士奇，我是政委。海东任 79 师师长，王建南任政委。我们打出红廿七军的旗号，制造声势，牵制敌人。部队经英山，打到安徽的太湖宿松靠长江一带。敌人跟踪追击。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除一两天外，天天打仗，有时一天打好几仗。那时，有很多苏区的群众跟部队一起行动超过部队多少倍。我们为了保护群众，想走快也走不快。没办法，决定往回打，返苏区，把群众送回家。部队打到商城一带。那时，大部分城镇（如六安、霍山等）被敌人占领，我们占了村。后来，部队到了七里坪，才知道红四方面军主力早已离开苏区到四川去了。于是，省委决定与留在当地的红廿五军合并，海东同志回廿五军工作，我带着一个特务营又回皖西。这时，海东任 74 师师长。

1933 年，在围攻七里坪问题上，海东同志同省委一些同志的主观主义作过斗争。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坚决反对这个错误的决定，反对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不同意围攻。当时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书生气十足，想把敌人困死，坚决主张围攻，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结果不仅没把敌人困死，倒把我们搞得非常困难。

围攻七里坪时，我不在。1933 年夏，我由皖西到鄂东北向省委汇报工作，看到战士们饿得不成样子，马瘦毛长，人瘦颈长，部队疲惫不堪。红廿五军在那时约有一万多人。我们皖西只有一个小团。跟敌人打游击，部队发展到二千余人，是第二战场。那时，王明搞什么“两条道路的决战”。一些同志受王明路线影响，决定打七里坪，结果把部队搞成这个样子。

1933 年秋，红廿五军在鄂东处境困难，就转移到皖西北。那时，皖西北那里有着一些粮食，可供部队。部队从鄂东到皖西来，一路上，冲破敌人一道道封锁线到达了皖西。红廿五军在皖西北行动短一段时间后，又返回鄂东，在返回的路上吴焕先同志率部队在前边。到了麻城往商城去的公路上，被敌人割断了。海东同志带了一个团担任后卫，没有过去。过了一两天，海东带部队来找我，敌人兵力增加，看来突不过去了，准备就地坚持斗争。皖西北道委决定成立红廿八军。他任军长，我当政委。不久，我生了场大病。我病了以后，党、政、军工作都由海东同志主持。他干得很好，取得了很大成绩。

到1934年初，敌人又加强了兵力，向苏区进攻。由于敌人反复“围剿”，粮食都被敌人抢走了，人民群众生活非常困难，有的整村整村的人饿死。但是人民宁死不屈，坚持斗争。这时，我和海东同志认为，要坚持下去，一定要想办法保证部队的健康，吃饱了，才能打仗。海东很灵活，他带部队到六安、霍丘一带打游击，得到了补充，打了很多胜仗，俘虏了敌旅长柳树春。在肃反问题上也没有扩大化。因此，那时政治、军事形势都很好。为了这事，有人还骂我们“右倾”。坚持皖西北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海东起很大作用。

当时我病得厉害，海东怕把我放在地方养病出危险，一直带着我，他组织了上百名的担架队，整天抬着我行军，那时部队天天打仗，有时刮风下雨，道路泥泞难走。苏区没有一片完整的房子。宿营时还要给我搭席篷子。省书沈泽民同志在鄂东生病，因没人照顾，结果病死在天台山……

……不管怎样困难，我和海东同志总是想方设法让战士吃饱。我不会打仗，充分发挥海东的作用。……吴焕先同志对军事方面学习也努力，政治工作很好，他能自我批评，错了就改。

1934年夏初，红廿五军又从鄂东到皖西北来，同廿八军合并，省委的代表高敬亭同志来，指责我们“肃反不坚决”，从一个副营长的口供中说吴保才、江求顺两同志是反革命，我不同意，就撤了我的道书，还杀了皖西北游击司令员吴保才，政治部主任兼82师政委江求顺等同志。高敬亭执行了王明错误路线，搞逼供信，很多干部就被杀害了，教训十分深刻。当然，他后来在战斗中也有贡献，历史地、全面地看，他还是功大于过，现在已经平反。海东同志在肃反问题上的观点同我一样。我撤职后到红廿五军政治部当了一段时间的宣传科长。在霍山、太湖一带打仗。

陶家河战斗结束后，程子华同志带来了中央的信，要我们的部队转移。我们接到了信后，开始长征。海东当时是副军长，他在长征中，指挥部队作战，起了很大的作用。吴焕先是军政委，程子华是军长，他们合作得很好。原来打七里坪时，吴在主张围攻。经过实践，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承认了，改正了。海东同志善于团结同志，和吴、程等同志的关系很好。

……

在独树镇，海东救了我的命。戴继英等人找海东同志研究，要杀我。

说拐河战斗时部队后退应由我负责，还说我是“反革命”、“第三党领袖”。海东同志一听就火了，拍着桌子说：“说郭述申同志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就这样，才没有杀我。如果不是海东同志，我就被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掉了。这件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天晚上就把王建南、雷全相皖西北少共道委书记等干部杀掉了）。

……

到陕北后，我是鄂豫陕省委后补委员。在鄂豫陕省委与陕甘省委联席会议上讨论廿五军、廿六军会合问题，讨论干部问题时，我和海东同志都认为戴继英不是一个好干部，不同意戴当保卫局长。后来，戴继英当了保卫局长，抓了刘志丹同志，还杀了一些陕北干部。

成立红十五军团时，海东同志任军团长。他指挥部队打了几个胜仗，对配合中央红军北上起了很大作用。

在西安外围打仗时，我们从邮局得到了很多敌伪报纸，知道中央红军到了松潘一带，有北上的动向。当时，省委开会讨论，认为应当绕到胡宗南后方，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而后到陕北同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军会师。以后就打到了天水，又到了陕北。

在打直罗镇之前，毛、周召集一军团、十五军团的干部开会，亲自交待先打上张村驿，打开通往胜利的道路，使两路红军会合，共同打击敌人。主席还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们军队走到那里，根据地就发展到那里。现在到了陕北，根据地就建立在这里。主席对徐、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们的粮草筹备得怎样？怎样运送？

在瓦窑堡举行的一次干部会议（主要是部队干部），海东同志参加了，我也参加了，毛主席在会上讲了军队团结问题，说红一方面军有两面光辉旗帜，一个是一军团，一个是三军团。

在直罗镇战斗后，在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会师大会上，毛讲了话，其中讲到长征是播种机、宣传队……就是后来在毛选上看到的讲的那段话。肖华和我分别代表部队讲了话。直罗镇战役以后开始东征。东渡黄河时，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相距一百多里。当时十五军团是徐海东、程子华，我是政治部主任。一军团是林彪、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是肖华同志。

东渡黄河后，两军团分路活动，毛主席带着电台住在敌人相距三十

华里处。我同海东同志到毛那里受领任务。主席同我们讲了军事部署。兑九峪战斗后决定分兵南下北上，“各撒一个网”。后来，海东还被毛找去谈了一次。

.....

抗战初期，海东在 115 师任旅长。1939 年，又被调到新四军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总指挥张云逸。那时，我在五支队当政委，司令员是罗炳辉同志。在江北指挥部，我同海东同志又见面了。戴继英是四支队政委。戴个人英雄主义，推行王明路线，搞肃反扩大化，错误很严重。1939 年中央为了教育他，任命他为四支队政委，在新四军四支队以前，很长一个时期他对徐一直是打击、排斥的。有时甚至连中央的电报、文件，他也不让海东同志看，在四支队时他还要门卫不让海东同志进司令部，许多作法很不像话。中央局曾批评过他。由于戴很不象话，海东同志很生气，一病不起。海东同志是气病的。

总政几位同志为写纪念徐海东同志文章，与徐文伯同志一起于 78 年 11 月 17 日下午访问郭老

郭述申有关皖西北 苏区革命斗争史料的回忆（一）

中共大市委第一书记郭述申口述
省委地方党史调研组钟、许（初步整理）
时间：1960年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

1. 党的建立：

南溪、丁埠、固始原是河南。党的创始人周维炯，肖方、李梯云等是河南人。大革命失败后到商城南部组织武装暴动。皖西也有过农运与武装暴动。具体情况可向曾韶山（旅大军区司令）、徐立清（中央军委干部部长）、陈先瑞（九兵团政委）、丁国钰（阿富汗大使）了解。

党初建时期，党的组织是秘密的。六安、霍山、霍邱等皖西的党组，一般都是在大革命时期开始建立的。

2. 鄂豫皖边特委于1930年3月间成立的。书记是我，委员有郑位三、戴季英、吴焕先、徐朋人、徐先瑞、周纯全、戴季伦等，特委机关设在箭厂河。由于苏区交通不便，主要行动地区在鄂东北、豫东南。特委机关与皖西联系，主要靠武装交通。因中途隔一清区匪敌顾敬之反动民团的阻挡不容易过去。

特委成立后，把原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改为一、二、三师，红军第一军，统一领导。许继慎为军长，徐向前为一师师长兼副军长。

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是31年春去的。在他们去以前，中央在六

届三中全会后曾派曾中生到鄂豫皖，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革革命委员会主席，统一了党政军的领导。

张国焘去后，成立中央分局与省委。分局与省委的委员大体相同。张国焘任分局书记、沈泽民任省委书记。

分局、省委成立后，将鄂豫皖、豫东南、皖西北划分为三个道区，组织三个道委会，当时，皖西北道委书记是方英（后由我代替）。道委与省委是否同时成立，可调查一下。

3.张国焘、沈泽民领导时期，曾开过一次党代表大会。回忆内容已记大多：

土地改革政策，基本与中央苏区颁布的土改条例相同，但具体执上没有统一规定，大都是打乱平分，贫雇农充分满足要求，中农不动，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土地改革的路线是：依靠贫困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土地改革，无论就其彻底铲除农村封建的土地制度，还是发动群众，支援战争来说都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执行中有过左的偏差，没收富农土地、农具、分最坏的田，以及对地主毫无分别对待地扫地出门，不给生活出路等。

经济政策，我们组织了一部分苏维埃商店，但不是主要经济形式，私人商店发动不充分。过去赤白区对立很厉害，苏区最需要的日用品不是从白区运进来，这和没有充分运用统一战线也有关系，郑位三同志当时是人民委员会负责人，负责管财经工作，对经济政策有研究，关于这方面有史料，可向他了解。

肃反政策，对反革命坚决镇压，保卫苏维埃政权这是对的，但过左了，扩大化了，只重口供，不重证据，错杀了一些好同志。

另外在地方肃反上（如对地主武装），不区别坚决反动的，可以争取的，采取一切打倒的政策。对利用敌人矛盾也不注意，没有集中主要力量打击敌人，以发展革命力量。

4.地方党的任务：主要是支援战争，发动群众。红军有二、三万人，转战各地，因而地方党、政府负担的供给、运输、扩军、参军任务是异常繁忙的。

5.群众团体有贫农团（是领导土改的骨干）、雇贫工会、少先队、赤

工队、青年团、儿童团等组织与全国相同。

6.四方面军长征后，留在后方的武装是不可少的，二十七军在安徽活动很大，自西界岭起至霍山、六安、岳西，后至鄂东北，改为二十五军。两年多来的游击战争是频繁的，敌人采取了灭绝人性的“围剿”、“清剿”、“包剿”政策，但革命的红旗始终飘扬在大别山上。

郭述申有关皖西北 苏区革命斗争史料的回忆（二）

中共旅大市委第一书记郭述申口述

时间：1960年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

1. 皖西北道委建立的过程，领导哪些县委

我是30年代初到鄂豫皖省委的，任组织部长。在我任省委组织部长及去陂孝黄之前还没有道委这一级组织，但有特委，当时开党代表大会是特委召开的。特委改道委是31年张国焘、陈昌法成立中央分局之后，我已到皖西北。

道委辖霍邱、六安、黄安、金寨等苏区，舒城、桐城、寿县、合肥一部分游击区。总之，淠河以西地区差不多都属于苏区。

我任道委书记，吴保才任道苏主席，江求顺任军事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组织变化不大。

2. 白区特委及其与苏区特委的关系

白区是有一个特委，组织情况不知道。四方面军走之前，没有联系。四方面军走之后，有过一次联系，但很简单。仅仅传送了两个中央文件，一个是关于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的决定，另一个是关于福建人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抗后的政治形势的分析。后来听说陈昌浩、徐向前，带四方面军打败了陈调元的部队进入山河尖。曾与白区特委建立了联系，但详细情况不了解，可问陈昌浩、徐向前。

3.关于皖西北的土地改革问题

我到皖西北后，土地改革已完毕，因而对皖西北土地改革的评价说不上来。但是肯定的说，土地改革是有成效的。当然也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上次我已简单的说了一些，从新老地区所进行的土改来看，老区比新区好，问题较少。六安三、四、六区都已是老区。也是土改进行的较好的地方。但究竟好到什么程度，不好到什么程度，印象又不深。道委当时也没有专门的研究、讨论。由于受着历史条件的限制，土地革命时期的土改和解放后的土改，在领导方法上究竟不同。

4.关于二十七军的建立

四方面军长征开始，主力进入湖北境地。徐海东同志率领的后卫团（约数百人），被敌人切断在黄山东西两界岭地区，后在商城和我们会师，道委为统一行动计，决定以后卫团做基础，集中黄安、霍山、六安三个独立团成立红二十七军。刘士奇（原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任军长，我任政委，下设两个师，共两、三千人，号称东路军。后张国焘、陈昌浩来信，分局成立鄂豫皖工作委员会。指定我为工委书记，坚持敌后斗争。

二十七军成立后，即带了大批跑反群众，东征太湖、宿松，沿途抗击了梁国英等数师国民党军队的追击，转战了一个多月，大小战斗数十次。

5.道委的变化

四方面军走后，大片苏区丧失，政治都垮台了，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活动范围限于赤南一带，工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将豫南合并到皖西北道委，我任书记。委员分工作了调整，原豫南道苏主席张德山任皖西北道苏主席，其他委员不动。直到1934年，中央派程子华同志来皖西北，将二十五军带出苏区，开始长征，皖西北道委书记由高敬亭接任。

郭述申同志谈话纪要

时间：1979年3月17日

地点：北京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

1929年我担任中央巡视员，与1929年底到了豫东南的商城。商城当时属于信阳中心县委领导。这一年夏初周维炯、李梯云、漆德玮等同志领导了立夏节暴动（即南溪暴动）建立了红32师。不久中央派刘英同志任红32师师长，李荣桂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周维炯任副师长。以后，32师攻占了商城。我到商城时正是攻占商城不久的事。

我去商城是巡视工作的，同时还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富农问题的指示》。指示中强调要在红军中清除“富农分子”。可能由于红32师党委及商城县委同志对于共产国际指示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加之当时红32师的部分领导干部出生于地富家庭，对共产国际的这项指示（这个指示是不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不理解。由此对于我担任中央巡视员的身份也产生了怀疑，又可能掺杂其它原因，他们计划要把我和中央派到32师工作的刘英、李荣桂等同志（还有一位从信阳中心县委派去任商城县委书记的同志）捕起来。有位参加会的同志把消息告诉我们。为避免发生严重后果，我和刘英、李荣桂等同志商议决定立即返回信阳中心县委，然后再去中央禀报。

到上海后，周恩来同志听取了我的禀报，1930年初，周恩来同志在中央一个机关（吴德峰同志住处）召集了我和许继慎、熊受暄三人开会，宣布中央决定把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划为一个特区，成立特区委员会。三

省边界地区的红军统一为红一军。决定我担任特区书记，许继慎同志任红一军军长，熊受暄同志任红一军政治部主任，已经在鄂豫皖东北巡视工作的曹大骏同志任红一军政委。

我带了中央介绍信经武汉、信阳到黄安。许继慎、熊受暄同志是合肥、六安到达皖西的。许继慎同志年龄比我大些，过去不熟悉，只知道他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关于许继慎同志到皖西后，在金寨成立兴中县并由桂月峰当县长的问題，我不清楚，我想有些可能，希望进一步查实。

1931年春，皖西、鄂东还未联成一片，中央分局成立后1931年下半年第二次打到商城，大概在占领商城后，鄂豫皖苏区驻麻埠就分别建立了皖西北道委（成立道委主要是什么组织我记不清了）；鄂东北道委，驻黄安；以及豫东南道委，驻商城（这三个道委都相当于现在的地委）。

我是1931年冬或1932年年初到皖西北任道委书记的。1932年夏天反四次“围剿”时我由麻埠去霍邱一次。当时红25军卞继勋军长率红25军的一个团和霍邱的地方部队正在守霍邱县城。黄岩是霍邱的区委书记。我去霍邱是传达军委指示并了解情况。当时反四次“围剿”的主要战场在鄂东北，我们主要兵力也布置在鄂东北，皖西北以及霍邱是牵制方向，卞继勋同志以旧的军事观点顾虑霍邱的防守问题。并错误的提示“要与霍邱城共存亡”。导致在敌人优势兵力进攻下遭受了重大损失。反四次“围剿”时，中央曾有电报指示，大意是：发动群众游击战牵制敌人，要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而窃据鄂豫皖分局领导职务的张国焘，没有执行中央的指示，致使反四次“围剿”遭受很大损失。

当时皖西北道委的主要工作是集中全力支援反“围剿”的战争，我们动员群众参加反“围剿”斗争；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征集并运输粮食支援战争，任务繁重。虽然日以继夜的工作，但由于鄂豫皖分局没有执行正确路线，也就没有取得反四次围剿的胜利。

郭述申同志谈话记录

时间：1975年6月5日晚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

1929年底，我担任党中央巡视员时，奉中央委派到豫南商城一带巡视，并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我同来的还有刘英等同志。刘英在苏联学习过军事，是奉中央命令到豫南红三十二师担任师长的。我们的介绍信交给河南省委，省委转介绍到豫南（信阳）特委，特委又给我们转到商城县委。1929年12月底，我们一行到商城时（当时商城刚打开不久），三十二师正在开党代会，主持党代会的是李梯云，他们说：“巡视员的介绍信是假的。”还有人告诉我：“他们要抓你们，离开商城吧！不走，可能有危险。”我和刘英同志回到上海，向党中央、军委周恩来同志作了报告。中央遂决定：鄂豫皖边界成立中共特别委员会（即鄂豫皖特委），要我担任特委书记，把三省的红军统一编为红一军。

当时，红一军和特委是平行联系，红一军直属中央领导。

1929年底，是我第一次到商城。当时商城县委书记可能是李梯云，那时，红军三十二师还是商城县委领导的，三十二师开党代会，李梯云是主持人。李梯云很有魄力，可能是在白雀园大肃反后，被张国焘杀害的。

关于1930年4月，郑位三担任商城县委书记一个月的问题，我不记得。当时我任特委书记，可能在以后，张国焘任分局书记时，委派郑位三同志去商城的。1930年4月，特委刚成立，商城第一次打下后，又丢了，还未二次打下。

1931年5月，鄂豫皖分局成立时，我任组织部长，是分局委员。1932

年1月调任皖西北道委书记，实际上是接替方英的书记。1931年冬，王平章当选皖西北道委书记，他没有到职。王平章当时是红二十五军政委。1934年5月（春夏之交），我离开皖西北道委，高敬亭接任道委书记，我到部队去了。我在皖西北共两年多。

1932年9月下旬（9月20日），金家寨被敌攻陷，我由麻埠方向来到古碑冲，见到分局的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等，决定我留下。当时张国焘已提出离开鄂豫皖苏区，沈泽民不同意，沈泽民抱怨张国焘不抵抗。接着，由古碑冲、燕子河，在去燕子河的路上，见到分局押解的一部分“犯人”，其中有方英，绑着双手，走在一队“犯人”中间。我走到燕子河的西界岭时，徐海东同志带一部分部队在打掩护（后卫），这时，我接到分局指示，红军主力已过英山。分局指示，成立鄂豫皖工作委员会，指定我（郭述申）任书记，刘士奇（原四方军政治部主任）、徐海东为委员。为吸引敌人兵力，我们决定用新的番号，成立红二十七军，以迷惑敌人，刘士奇任军长，我任军政委，徐海东任七十九师师长，王建南（原皖西北道区保卫局长）任七十九师政委，下有三个团，和围攻鄂豫皖的敌人周旋了一个时期。

1933年初，省委决定，我仍担任皖西北道委书记，并决定豫东南道委并入皖西北道委，皖西北道委领导豫东南工作。皖西北道委当时实际上主要活动在商南，即今南溪、丁家埠、汤家汇等一带山区。

关于赤城、赤南县的时间，是在第二次打下商城后，成立的赤城县和赤南县，直到四次反“围剿”失败，商城失陷。

高开文任过赤南的县委书记，时间是1933年上半年（某月），到1934年5月，高敬亭未接替我任皖西北道委书记时，高开文都是县委书记。高开文是个小知识分子，瘦瘦的，很有工作能力。我随红二十五军去陕北后，听说高开文同志被高敬亭杀害了。

在燕子河成立过五星县，时间是1931年春，你们讲是1931年4月成立的，是对的。当时在几个县之间成立一个新的县是有的，如成立过陂孝北，陂安南等县。

1933年5月，七里坪战役，红二十五军受到严重损失。转战红二十五军来到皖西南溪，和红八十二师会合。九、十月间，红二十五军去鄂东

北，吴焕先率部过去了，副军长率二十五军一部是后卫，没过去。徐海东带领约一个团在赤南葛藤山、斑竹园之间见到了我，皖西北道委有个八十二师，我和徐海东商量，我们决定重新组织红二十八军，徐任军长，我以道委书记兼二十八军政委，时间是秋末冬初。我们一起活动了几个月，打了好几个胜仗。

1934年春（4月），红二十五军吴焕先率部自鄂东来到皖西，在汤家汇不远的豹子岩会合，我们决定二十八军再度并入二十五军。这时高敬亭也来了，他审问一个副营长，这个副营长供吴保才（道苏主席），江求顺（游击师师长、军区指挥部指挥）是反革命。高敬亭问我，我说吴、江不是反革命。我们就吵起来了。高说是，我说不是。高敬亭报告了省委（省委徐宝珊），省委未作调查，同意高敬亭的意见，后来把吴保才和江求顺杀了，我也受了处分。这次（指1975年6月30日--注）我经过六安，听说吴保才已追认为烈士，江求顺的手续还未办，江求顺的弟弟来找我，我为他写证明，应追认为烈士，江求顺是雇农出身，为革命很负责任。

关于吉鸿昌，吉是“围剿”部队的领导人，驻豫东南的指挥官，吉派人（参谋）来找过张国焘取联系，张国焘不相信，张国焘说：不受他的骗。吉倾向革命，他的部队，容易被打垮，吉后来在天津被蒋介石、何应钦杀害的。当时是否是共产党员，还要查一查。牺牲时是共产党员。

关于沈泽民，沈是鄂豫皖省委书记，又是二十八个半之一，是抬王明上台的人。但与张国焘是有斗争的。沈是大学生，毕业后，又到莫斯科留学，回国就当负责干部，没有经验。沈和张国焘不同，不是阴谋家，他反对张国焘离开苏区，反对逃跑主义。1932年秋，分局在古碑冲，我们见了面，沈泽民埋怨张国焘不抵抗，他主张坚持根据地的斗争。他后来一直坚持在鄂东，重病死在天台山。他有教条主义，组织能力不强，但不是阴谋家，不是野心家。是我个人看法（郭述申讲到这里时，郭述申的爱人许云同志插话：正式评价留待中央决定）。

李梯云、方英在烈士传上无名，我回去问清后才说。

在梅山打毛排，是刘德利（八十二师师长）高开文指挥的（高是县委书记兼游击师长），不是徐海东指挥的，徐当时在鄂东。打毛排的时间是1933年6（夏）月，是夜间打的，臂上还有记号。

在南溪消灭郝梦龄一个旅，是徐海东指挥的。

1933年下半年，江求顺带领游击队在莲花山消灭了一支反动民团。江求顺是道区政治部主任。

关于商城、六安等县的历届县委成员，我记不清了，当时是战争环境，整天忙于打仗，我在武装斗争方面抓得多些，可以找陈祥同志（北京部队副政委）、许军臣同志（福州军区后勤部政委）、黎光同志（叶集人，铁道部队政治部主任），当时都在皖西北道委工作，他们年纪轻，常到基层去，访问他们，他们知道得清楚些。

程启波担任少共皖西北道委书记，我离开皖西北后是雷全根任少共道委书记。丁武选现住郑州，任过皖西北保卫局局长。西藏军区副政委姓陈，也在麻埠道区委员会工作过。石玉田任过赤南县委书记，以后在红二十八军工作，现在上海休息。詹化雨干过六安少共县委书记。上述这些人都是可以访问。通过这些人，可能搞清楚商城、六安历届县委、县苏的成员和组织情况。位老身体不好，接待访问可能是困难。

红四方面军战史，红二十五军战史，都是以战斗为主的。政治路线方面的都没有写进去。党领导的革命事迹写下来教育后一代是很有必要的。老人渐渐地少了，宜抓紧访问、了解，现在已没有前些年人多了。

上述谈话记录是原任鄂豫皖边特委第一书记，后来担任分局委员、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政委于1975年6月4--5日访问金寨时，两天晚上的谈话记录。本记录曾全文读给郭老听，听后表示同意。

当时，在座的有倪学昌同志（金寨县书）、张发奎（副书）、张立胜（人武部副政委）、地委副书记冯林等同志，以及回乡探亲的候补中央委员、福州部队副政委余积德同志。县人武部长高尚同志、军分区副政委梁杨清同志第一天在座。

记录于梅山电站宾馆

六安地委皖西革命斗争史编写筹划办公室抄于梅山

1978年4月9日

郭述申同志谈话纪要

时间：1979年3月20日

地点：北京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

关于许继慎同志

1930年初，在周恩来同志的召集的宣布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特委组建红一军的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许继慎同志，同年5、6月间许从皖西率领部队来到鄂东，又是在会议上我们再次见面。听说他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但他在北伐战争打下武汉后到1930年年初这段时间里有些什么革命活动，我不知道。

1930年9月皖西北开会成立“六英霍行动委员会”问题。成立经过我不知道，这正是执行立三路线时的事。在鄂东也是在当年9月建立行动委员会。原来，这是事实。到1930年11月，立三路线才开始纠正。这段时间皖西北地区贯彻立三路线的具体情况以及遭受的损失，我不知道，因为当时我在鄂东，也没有见到皖西向特委要作这方面的报告。

红一军及其所属各师受立三路线的影响问题。应参考红四方面军战史的有关部分，因为编写战史已作了大量的调查。

当时鄂豫皖特委是执行了立三路线的，建立了行动委员会，提过“打到武汉过中秋”的错误口号。但在执行过程中认识到不附合实际情况，在中央三中全会后即纠正了。

1930年11月曾中生同志来到鄂豫皖以前，鄂豫皖没有军事委员会这样的组织，也没有皖西军分会。皖西军分会建立大概是1930年11月曾

中生同志来了以后。当时皖西北道区苏维埃主席是吴宝才，他又是道军事指挥部的指挥，机关驻在麻埠。现在健在的原在皖西北工作的有总后勤部的李跃同志，郑州的丁武选（当时在道区保卫局工作），铁道部的黎光同志当时在霍邱作少共和儿童团工作。

1931年秋及以后的大肃反，是张国焘等人顽固地执行三次左倾路线，大搞逼供信造成的。首先从部队开始。以后扩展到地方，错杀了很多的同志。许继慎，熊受喧同志都是被张国焘错杀的，政委曹大骏同志也被撤了职。

1932年10月张国焘带红四方面军在反四次“围剿作战由鄂东撤退到皖西北又转向鄂东行动，这个时候，我和刘士奇、徐海东等同志组织了红27军，去潜山、舒城、太湖等地游击，曹大骏同志当时和我们在一起，不幸在一次作战中牺牲，就倒在我的身旁，当时情况非常紧急。连烈士的尸体都没有来得及埋葬。牺牲地点于青山，或是英山。

成立鄂豫皖分局是在1931年4、5月间，张国焘来了以后成立的。他任中央分局书记，陈昌浩任少共分局书记。同时建立鄂豫皖省委，沈泽民同志任书记。我是中央分局委员又是省委组织部长，不久又派到陂孝北担任县委书记，又调任陂安南县委书记。1931年底离开陂安南去麻埠任皖西北道委书记。

关于鄂豫皖苏区的土地改革问题

1929年苏区就开始分配土地（游击区部分的分配土地）。对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过左的土地改革也是造成地主逃亡、富农反水，形成赤白区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工商业的政策，也是没收他们的财产，造成苏区的山货特产不能运出销售，急需的食盐、工业品运不进，给苏区经济造成极大困难。这都是执行三次左倾路线的结果。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成立鄂豫皖区党委问题

我于1938年9月从湖北省委去延安参加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和朱理治分任正副书记。我同李先念同志一道去河南竹沟，以后到鄂豫皖约郑位三同志一同于1939年1月间去金寨白水河，同年二月我在白水河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六届六中全

会决议。不久由中央来电指示成立鄂豫皖区党委，区党委书记郑位三也是中央决定的。区党委的委员还有何伟、彭康、张劲夫等同志。中央还决定是以新四军八团为基础成立新四军三支队，罗炳辉同志任司令员，我任政委。

关于追认江求顺同志为烈士的问题

江求顺同志完全应该追认为烈士。它和吴保才同志都是皖西的主要领导干部。1934年初夏，高敬亭代表省委检查皖西工作，搞逼供信，仅根据一个副营长的“口供”，硬说江求顺、吴保才是反革命。我说不是。与他发生争执。高敬亭向省委报告说我肃反不坚决，撤了我的职。江求顺，吴保才二同志被杀害。

1975年我曾写信给六安地委书记胡坦同志证明江求顺在苏区肃反扩大化中被冤杀（可能也提到吴保才同志），应追认为烈士。如果尚未解决可以到六安地委找一找我1975年写的证明材料。

吴保才是皖北某县人，他也应追认为烈士。

两份纪要我都看过。

陈明义关于1931年 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的回忆和看法

时间：1983年4月4日

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对安徽省六安地委党史办公室周进、鲍劲夫同志的谈话

整理：周进、鲍劲夫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

1931年冬，皖西北特委改为皖西北道委。机关驻在麻埠镇。我就是在这时调到皖西北道委保卫局工作的。当时，道委机关有四大单位。道委会，苏维埃政府，军分区和保卫局。保卫局下面设侦察科、审讯科、执行科、保管科和一个保卫营（辖三个连）及一个男、女分开的看守队。保卫局长王建南、侦察科长丁武选、审讯科长傅绍堂，执行科长XXX、保管科长余一文、保卫营长余寿纯。

保卫局长王建南是黄陂人，窑匠出身，一九三一年秋，由鄂豫皖省保卫局派来皖西北。他的前任局长曾泽民、曾任商城县委书记，是个知识分子，出身子小地主家庭。王建南认为此人不可靠，不久在“肃反”中把他杀害。当时的保卫局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个独立系统，权力很大，认为谁是“改组派”、“第三党”、“AB团”、“反革命”即可逮捕或者杀害。以上讲的是皖西北道区保卫局的组织机构及其权力概况，这是第一问题。

谈一下鄂豫皖根据地 1931 年大“肃反”的情况：

一、肃反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一）是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进行的。四中全会名义上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的旗帜，为纠正党内“左”的倾向而召开的，但实质却是一次“反右倾”的会。不仅“左”的倾向没有纠正，相反比立三路线更“左”，“左”得没有办法再“左”了。

（二）是在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发生的。张国焘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由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来后，他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极力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对鄂豫皖苏区的党和红军横加指责。他的错误言行，一开始就遭到当地许多同志的反对。因而，张国焘对这些干部很不满意。他认为商城、六安、金家寨等皖西北地区虽是在搞革命，但革命不彻底。正如他在回忆录里所记述的：“这里没有赤白区的明显对立，离金家寨愈远，苏维埃的色彩愈淡”。他把所谓革命不彻底的原因归因于许继慎（六安人）“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影响。因此，他对原鄂豫皖苏区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不信任，尤其对皖西象许继慎等出身于本地的领导干部更不信任。张国焘借用了六安当地一句俗话，“金麻埠，银独山、苏家埠好比金銮殿”，说许继慎想到苏家埠做皇上，故对许继慎等领导同志很不放心，把他们当成对他实现独揽大权的主要障碍。

（三）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当成敌我矛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等人，在鄂豫皖苏区，处处以钦差大臣自居。（到了）不久，便和原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中生和徐向前、许继慎以及军内、地方上相当一部分领导同志，对根据地建设及政策，尤其对军事行动方针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当时根据敌人对中央苏区采取攻势，对鄂豫皖苏区采取守势的情况，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等多数领导同志认为红军应向外发展，不应老呆在根据地里。向外发展，既可能恢复蕲春、黄梅、广济根据地，解决物资、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又可大大牵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但张国焘坚决反对。后经激烈争论，在多数领导人的坚持下，

张国焘才勉强同意，除留一部分部队在商城、商光一线和皖西活动外，主力出英山。当红四军南下时，在出击的方向上和张国焘又发生了分歧。曾中生、徐向前和许继慎等同志的意见是：占领英山后，应立即出蕲(春)、黄(梅)广(济)来恢复原红十五军的根据地，并使其同鄂豫皖边区连成一片；同时，出击武穴，威胁武汉，更有力地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而张国焘却主张占领英山后，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胁南京以配合反“围剿”。这显然是孤军深入的冒险行动。红四军领导根据实战情况，坚持出蕲、黄、广的正确主张，并将行动计划报告了分局。结果打了胜仗。消灭了大量的敌人，活捉了敌旅长王光宗，占领了浠水、罗田、广济等城镇，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尽管如此，红四军的领导同志却被张国焘以红四军有“反分局的暗流”、“不执行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命令”、“重复立三路线”等等罪名，而受到批评、斗争、甚至撤职的处分。随后，问题逐步升级，竟诬称红四军南下时，许继慎伙同熊受暄等人“有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投降蒋介石”的“全盘计划”。从而，把军事行动上不同意见的争论与“反革命”问题混在一起。

1931年9月初，当部队南下胜利后在鸡鸣河开会时，蒋介石企图瓦解我们革命队伍，派反动分子柏良的胞弟给许继慎送来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让许把部队带到黄冈地区，整编为一个军，委任许继慎做军长，并发饷30万。许继慎当即把来人和信一起送到军部。四军领导徐向前、曾中生和许继慎都是黄埔军校的先后同学，又是一起战斗多年的战友，他们对许继慎是了解的。深知他为人正直，对党忠诚，很有指挥作战的才能。1930年由中央派来鄂豫皖苏区不久，成立红一军，把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统一起来，打了金家寨，霍山等地，消灭了土匪包刚，扩大了豫南、皖西苏区，1931年初组建红四军，他先后任该军十一、十二师师长，立下了不少战功，在广大干部、战士中威信很高。因此，徐向前、曾中生看信后，认为这是敌人搞的离间计，立刻将来人和信件一并送交分局。但张国焘为了排斥打击持不同意见的人，从而达到独揽大权的目的，就借机说许继慎和蒋介石有勾结，是“反革命”，责令陈昌浩将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红四军中的领导同志逮捕。从1931年10月起，在河南光山县的白雀园开始了“肃反”运动。

（四）莫斯科“肃托”的影响，斯大林在苏联“肃托”搞的很厉害。凡同意拥护他主张的就是布尔什维克，不同意的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不少人被搞掉了。我们党到苏联留学的一些同志，把苏联“肃托”的那套搬到中国，其实当时红军中许多同志连托洛茨基这个名字都不知道，哪来托洛茨基？完全是照抄照搬苏联“肃托”的做法。

以上四条，国内原因三条，国际原因一条，我认为肃反就是这几方面来的。

二、必须明确当时党内、军内、苏维埃内的“肃反”是个冤、假、错案，与社会上的镇反（即肃反）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我们应严格区别。

社会上的镇反，是革命人民起来打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是正确的，不能也认为是错误的。但在“左”倾政策的影响下，多杀了一些人，有的地方也存在着扩大化的问题，可那是革命初期，是很难避免的。

三、张国焘在党内、军内、苏维埃内搞大“肃反”，是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和出于他个人野心所导致的恶果。

他从1931年在鄂豫皖的大“肃反”及以后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内部“肃反”，杀了不少好同志，在白雀园就杀害了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肖方、李荣桂等红四军的很多领导同志；同时在皖西北等地先后杀害了方英、陈奇、毛正初、徐百川、戴季伦、戴克敏、吴保才等同志。军队师、团、营各级领导及英山、商城、霍山、霍邱、六安等县的领导同志被杀害的就更多了。象割韭菜似的，割了好几茬。他们任意罗织罪名，说许继慎是“第三党”、熊受暄是“AB团”、周维炯是“改组派”。还说有什么“吃喝委员会”，是个“反革命外围组织”。到底啥叫“吃喝委员会”？我们的同志也闹不清。记得打下正阳关时，有的同志进城后，约了几个人一道下馆子，回来就被抓起来，说他们是“吃喝委员会”，同下馆子的人都脱不了手，一起被杀掉了。我在保卫局工作期间，亲眼看到在“肃反”审讯中施行灌辣椒水，吊打等多种酷刑，完全搞的是逼供信那一套，各级保卫局都搞。上到省保卫局，下至县保卫局。有个活生生的事例：我们商城县少共书记漆先昂（现名漆先棣，该同志1929年曾参加商南暴动），

以后调英山任少共县委书记。1931年冬，说他是“改组派”，从英山抓到道委保卫局，经过逼供信，苦打成招，把他和那些待杀的人关在一间屋里。1932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夜里，他们想到反正是死，因此，趁哨兵瞌睡之机，推倒哨兵破门而逃。身体弱的没跑掉，抓回来统统杀了，跑掉的几个人中就有漆先昂。他逃到外地混了十几年，于1949年又参加我军，后来部队搞政治运动，说他是阶级“异己”分子，把他转业到马鞍山林场工作。1980年我在安徽的芜湖见到他，了解了他的情况后，我向安徽省委组织部写了证明，反映了他那次逃跑的实际情况，说：“如果不逃出，也会遭到无辜杀害”。后来，组织上对他的这一历史问题平了反。总之，当时“肃反”搞逼供信是上上、下下，军队、地方都盛行，苦打成招，互相株连，搞得人人自危。真正证据确凿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在党内、军内、苏维埃内我还没有见到过，这个问题，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复兴社的头目冷欣，一次和陈老总交谈时，曾得意地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把许继慎杀了”。据我了解，解放后我们从敌伪档案和其他方面，还未发现和了解到敌人那时派有改组派、AB团、第三党在我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有关材料。上述情况说明了大“肃反”中被杀害的同志，是我党的历史上一个大的冤、假、错案，使我们党遭受极大的损失。

最后，我还要重复强调：必须把党内、军内、苏维埃内的“肃反”和社会上的镇压反革命区别开来，笼统地讲肃反错了、扩大化了是不对的。而党内、军内、苏维埃的“肃反”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是我们党当时还不够成熟。加之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把党内斗争和敌我斗争混淆所致。但作为张国焘又是另一回事了。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很好地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它。只有认真而实事求是的作历史地分析和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真正吸取历史的教训。

每当我回顾这段历史时，总不免对在鄂豫皖苏区大“肃反”及以后在川陕苏区的内部“肃反”中，以莫须有罪名逮捕杀害的先烈们产生一种怀念之情。他们是一批忠于党的优秀指挥员和战斗员。其中不少同志是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拿起武器，投身革命的老前辈。仅我知道的在鄂豫皖苏区就有：许继慎、周维炯、曹大骏、熊受喧、庞永俊、肖

方、李荣桂、陈奇、方英、毛正初、徐百川、戴季伦、戴克敏、吴保才、王培吾、姜镜堂、廖业祺、关叔衣、柯柏园等，连徐向前同志的爱人程训宣同志也未能幸免。以后在川陕苏区又有：旷继勋、曾中生、刘杞、余笃三、舒玉章、王振华、张逸民、杨白等同志。这些同志为创建鄂豫皖、川陕红军和根据地立下了很大功绩，并经受了革命斗争的考验，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们无愧是革命的坚强战士，党和人民的优秀儿女。

今天，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对在当年内部“肃反”中被杀害的先烈们应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其丰功业绩应彪炳史册，以励后人。

丁武选关于鄂豫皖苏区的四份口述材料

一、丁武选口述材料

口述：丁武选（现任武汉军区军事法院院长）

访问：薛国明

时间：1960年7月8日

录入：黄文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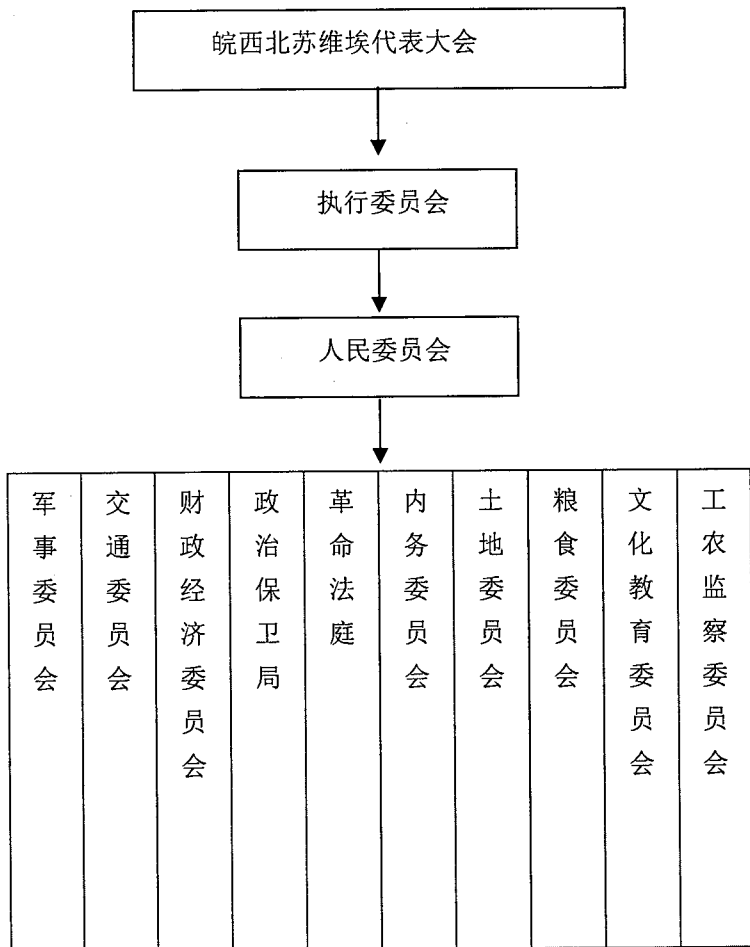
校订：黄文治

我是安徽阜南人，参加革命是在河南固始。1930年我任皖西北道委会保卫局科长，到1932年8月间离开鄂豫皖苏区，前后在安徽工作了2年时间，虽说我是安徽人，但对安徽革命斗争知道的很少，感到惭愧，现在我将知道的一点东西献给你们。

皖西北道委会的组织是于1931年秋由特区改编的。当时道委机关驻麻埠街上，特区机关原住在金家寨，道委书记是王平章同志。后王平章调红二十五军任政委，由郭述申同志接任的，道委会分中共道委会和少共道委会。道委会里面有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等，皖西北道委会有常委七人，我现在记得的有王平章（书记）、王建南（保卫局长）、吴宝才（道苏主席）、雷振一（指挥部指挥长）、丁武选（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兼）还有两个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了，只知道一个是组委部长，一个是妇女部长，另外，当时除常委，还有尚委，人员比常委要多，包括各县工委书记和县苏主席参加。具体的有哪些人，现在都记不起来了。

皖西北道委会，下设有霍邱、六安、霍山、合肥、英山等几个县委会。六安县委会机关设在独山，霍邱设在顾店子。当时各县的范围很小和现在比起来，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区的范围。

皖西北道区苏维埃组织系统情况：



各委员会的负责人，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知道王建南同志是政治保卫局局长，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是我兼的。

此外，我记得还有个反帝拥苏大同盟组织，这个组织接收的会员很广泛，不管党员也好，团员也好，非党团也好，只要愿意参加都吸收为会员，这个组织主要任务是搞宣传。

二、访问丁武选同志笔录

时间：1984年4月27日下午

地点：郑州河南省军区干休一所

访问：王导平、许正刚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

丁武选同志说：我老家在安徽阜阳，逃荒到了河南固始商城。参加党是在固始，参加部队也是在固始独立团。我当时在独立团政治处当宣传队长。1930年4、5月间，固始县委在松树岗区成立，选我当县委宣传部长。晚稻割完时，鄂豫皖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皖西去二十多人去开会，由方英带队。到了商城飞机山时，接到来信说会期改了。方英动员说，哪个要学习就到省委办的训练班学习半年。这时我们有四个人去训练班学习，其余的人都回去了。方英就带着我们到了新集。1930年9、10月去学习，到了1931年5、6月间毕业，我们皖西北道委把四个人都留下了：有英山1人，太湖1人，霍邱1人，六安1人名字记不清了。他们3人都有点文化，省里成立保卫局而没有人，把他们调去。有的当文书、当秘书的、当事务长的，我没有文化送到看守所当战士看“犯人”。我们没有回皖西，1931年11月间省保卫局又派一批人到皖西。我要求回皖西，他们3人没有见回去。回去以后，这时道委已经搬到麻埠，我被道委分到保卫局当二科科长，搞侦察敌情，跟机关工作不大接近，我带手枪队不很在家。春天麻、茶下来了，我们和游击队配合打民团让商人进来，那时对工商业是保护的，机关工作不太熟，因我主要搞审查敌情的。到了1932年7、8月敌人进攻时，道委机关搬到金寨街上，有一部分向南庄畈那边运动。保卫局搬到金寨河西汪家祠堂。1932年8、9月道委叫我把银行十挑钢洋分给伤病号。几个医院分掉六挑，还有四挑带到南庄畈。这时张国焘到了南庄畈，他叫我跟着十二师二十九团。到了英山石头嘴，撵到部队，把钱送到了参谋部。张国焘叫我回去。这时道委书记王平章到部队去了，书记

换成郭述申。这时我带几个小鬼在路上小界岭遇到了敌人，回不去了。我们又回头撵队伍，一直撵到黄安西四姑墩，这时张国焘正在那开会，参谋主任苏玉章报告说我们回不去了，张国焘叫我跟参谋部一起走，走了一天。第二天张国焘又叫我到铁路游击队当指导员。这时我得了疟疾。参谋主任说，你要他命啊，他病成这样子怎么去打游击。所以我又随参谋部离开了苏区到了四川。

肖方、许继慎、方英、熊受暄、周维炯十几个高级干部是1931年古历8、9月间（已经下霜了，感到有些冷了）被害的。头天晚上执法队都把他们一个一个叫出去，我在放哨，没有见送回来。第二天晚上，我们一个班都叫去了，两个人拿一根毛竹抬尸首，一看都是我们看守的“犯人”。他们都是用绳子勒死的，脖子上有印子，十多个尸首都放在新集西门外一个门朝南跟戴季英的一个院里的一间房里。当时我们把尸首埋在西边山洼里。这是千真万确的，以后知道这是被张国焘肃反杀害的。

当时戴季英担任省保卫局审讯科科长，前几年，我一次在北京开政协会议时，徐向前元帅也证实戴季英当过保卫局审讯科长。徐帅说：“张国焘带我到保卫局审讯科去看过，并在审讯科见到了戴季英”。当时省保卫局局长是周纯全（当时皖西北道委保卫局长是王建南，黄安人，以后也被张国焘杀死了。道委保卫局营长姓李（李泽纯），现在住金寨古碑区哪个公社，前年他还写信给我）。

关于张国焘大约在1931年农历8月前后逮捕四个县委书记，情况我不清楚，因为那时我还未去省保卫局工作。

希望你们以后有什么材料寄些给我，看到一些材料，可能还能回忆一些事情。

王、许说：88高龄的老首长，还能和我们谈这些重要情况，我们表示感谢，以后如有材料，一定寄给首长审阅，还有一些搞不清楚的问题，我们再来请教。

注：丁武选同志1960年因病休息，此前是武汉军区军事法院院长，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正军级待遇。

三、访问丁武选同志笔录

时间：1984年4月28日上午

访问人：王导平、许正刚

地点：郑州河南省军区干休所丁武选同志家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

张国焘杀害旷继勋是在四川。我们部队1933年初到了四川准备建立根据地，我调十师当保卫科长。十师驻洪口镇南边山上小庙里。十师政委周纯全一天叫我打扫房子，说有一个“犯人”要处理。我们说保卫队没关犯人吗？到了晚上，周纯全带两个警卫员押着旷继勋进了那房子。问他，你旷继勋反革命要好好交待！旷继勋说，我不是反革命。周纯全指出他三个“罪状”：一、打霍邱，不应该打巷战。部队损失很大；二、1932年10月部队过了铁路以后，我方面军在枣阳、新集指挥他去占一个寨子失利（那时我们就是二颗子弹，一根步枪怎么能占寨子呢？）。三、部队到了四川营山，旷继勋原来在营山是杨森部队当过旅长的，四川士绅名流听说旷继勋当了军长。就背了些银耳、腊肉拜访他。人来人往，这时就说旷继勋勾结地方武装要叛变，就是这样安了三个罪状。周纯全叫警卫员把旷继勋勒死了。勒死后，就埋在庙山北头。庙门朝西，座东朝西。我给中央干部部写了材料。旷继勋死是我亲眼见周纯全叫两个警卫员勒死的。兰州军区副司令员胡炳云就是他的司号员。

四、丁武选谈鄂豫皖苏区保卫工作

时间：1982年8月7日

地点：河南省区干休所

采访：田子志、杨云清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

……因为1930年9月新集召开全苏工农兵代表大会没开成，我作为代表之一，被皖西特委书记肖方同志派到鄂豫皖边区的一个干部训练班学习，1931年1月份结束，分配到（政治保卫局）看守大队当战士。张国焘来新集之后，成立了政治保卫总局，我仍当战士，业务一直是看守犯人……。新集政治保卫总局成立后，各县也都成立了政治保卫局，1931年5、6月份，中央分局调一批人学习搞审讯，学习后都派到各县政治保卫局当保卫局长，同年11月间，我调到皖西北道委政治保卫局工作，任二科（侦查科）科长，当时还兼道苏银行副行长和监委主席，皖西北道委政治保卫局局长王建南，红安人。三科（审讯科）科长姓名记不清楚了，也是红安人。二科的主要任务是侦查苏区以外的敌情，同时保护外地商人到苏区进行经商，1932年8月张国焘准备放弃鄂豫皖根据地逃跑，道委派我押送10挑银元到金家岩几个医院分发给伤兵员后，剩下4挑又送到英山县交给红四方面军参谋部，并交代我回皖西和郭述申书记一块打游击，当走到小界岭时路被敌人封锁，又转回去跟参谋部过京汉铁路进入川陕，1932年冬到四川，1933年3月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治保卫局时，曾传六同志任局长，我任副局长，……张国焘说我对反革命（指“改组派”）不恨，9月我就接到四方面军总部的命令，免除政治保卫局副局长的职务，调任陕南军事指挥长，搞地方武装工作……。

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戴季英同志最了解，……审讯在西关外一个小院子里，1931年10月，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等红军将领都是那时杀害在此处的。那时戴季英带着几个人到这里审讯许等，被害在这所院子里，将他们用绳子勒死的。保卫局一个勤务员来通知叫我们一个班的人把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等几个人的尸体抬到西门外一个山沟里埋掉。回来后，我几天都没吃好饭，回想起那时的事，心里就不好受。再就是光山独立团，一团人全杀了，炊事员马夫都杀了，当时只放走了一个团长戴季伦（戴季英的哥），戴季英说他哥是改组派咬的（注：

据查，戴季伦同志以后在皖西北工作，仍被当做“改组派”杀害)。解放后，我见到徐海东同志问皖西北道苏吴保才和边区保卫局长王建南的下落，徐说都被杀害了，（红二十五军时期）他们还要杀郭述申同志，我顶住了。

当时鄂豫皖根据地的审讯工作，完全是逼供信那一套，杀害了许多好同志。张国焘来鄂豫皖办了三件事：一是他当了中央分局书记；二是他当了军委主席；第三件事就是对大别山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进行大屠杀，许多同志参加革命拼死拼活，都被张国焘杀害死了，死后还戴着“改组派”、“反革命”的帽子，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张国焘杀那么多人，完全是为了争权夺利。

丁武选同志在建国前曾任过鄂豫皖政治保卫局总局看守大队战士、皖西北道区政治保卫局分局侦查科长、川陕省苏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建国后曾任武汉军区军事法院院长，现已退休。

袁克服等同志回忆

鄂豫皖苏区1930、31年一些左的政策

口述：袁克服、张广才、曾传六等同志

录入：黄文治

校订：黄文治

一、集体空防情形（略）

二、反富农与分配土地问题（略）

三、肃反

前一时期，1927、28、29年时，这分配土地中谈到的打倒那一批就是，其中地主也有，富农也有、流氓也有。给地主富农送信的也有。1928年时，是夜晚偷偷地跑到那家去打的，打死以后的第二天还不知是谁打的，1929年时，是赤卫军与地方人员公开的打，全家打尽，不问青红皂白地带到山坡上，意料不到的打了。这一直到1929年秋冬后就少了。这时期农村中尚未有多大恐慌有一些不在乎，有的老百姓不吭气，老实的农民不做声大家以为这些人不好才打的，如果好，为什么打呢？

1929年冬以后，是第二时期，这时期改组派，有时捉一些。一般的说中农以上富农地主的及一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多多少少对革命有不满议论，有些不好的，捉起来，捉了以后，给红军家属做苦工，不一定都杀。这共有一年半时间，一直到31年直止（方止）。

这个时期只个别的杀，杀时开群众大会出罪状，一个乡只杀个别的人，几千人只杀个把人，所以老百姓还没有什么。

第三时期是31年春夏季以后，那时保卫局到处建立，开始杀人与捉

人了。捉的是 AB 团、改组派、第三党等，有公开杀的，有秘密杀的，如夜晚拉出去杀了，第二天就没有见人了，但是 31 年春夏秋时，杀的还少。1931 年夏，张国焘到鄂豫皖，1932 年春，肃反是个大高潮，不管思想政治面貌如何。有口供就捉，富农出身，学生出身的杀的很多。

肃反首先是老军队中搞起的。整个红军中，主要是从许继慎案及白军中夏斗寅岳维峻过来的人搞起来的，主要对象是三种人：一是白军过来的，一是地主富农出身的，一是学生知识分子，那时捉一个就问，问了就打，打了就供，供了就再捉。地主富农出身的，不是反革命也清洗，如袁克同志当政委那个团，连肃反到清洗共八十几人，内中有连长、排长、文书、青年工作者等，思想上没有经过整风，当然多少有些毛病，如像调皮骡子说些怪话的人，有 1、2 年历史的，打仗打的很勇敢，很多被清洗出来时，哭着不想走，该团三个连长换了两个，连长与指导员换了三分之二，政治处只剩下两个股长，杀只杀了两个，其他都送交上级去了。其他连长、排长、班长等被供出来而没有捉的共 100 名，虽然尚未影响到共产党员要求脱党，但是 1932 年以后，部队中就不敢加入党，以为支书一捉，一供说下面党员都是，当然大家都害怕。王树声、徐向前等同志，亦被当作有问题的，他们在部里不敢多讲话，戴季英是很老的同志，也被不相信，特委省委都不要他，以后调到保卫局工作，名义上是工作，实际上是监视。徐向前同志的老婆，也给杀了，本来她是没有什么的，一家人都参加革命，家里又是贫农，学生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主富农出身的很多被逮捕了。如像上述那个团的团长，是黄埔学生，兼该团的党委书记，也被捉了，中央派来的冯静，也被逮捕，工农分子捉的很多，而富农地主出身的及学生知识分子，不敢做声。

正规红军中这种做法，对地方部队也影响起来。如江子英、许继慎、潘崇禹、高建斗、肖方等都被逮捕，其中有些不但老公、老婆也被捕，这些人都是从暴动搞起，家都不要了，不一定有问题的，如果好培养的话，都是党很好的干部。部队中的肃反，在 1933 年阳历年前，大致告一结束。

1931 年冬 1932 年春时，地方肃反也很凶了，部队的材料传到地方，地方上就搞起来了，大致捉了两批：第一批是知识分子，很多是大革命时期搞起来的，是当地最老的干部如黄安县除吴焕先、戴季英、郑位三等数

人外，其他都被捕了。这些都是在1928、29、30年时在孝感、罗田、豫西等地工作的区级干部，区一级的干部有区委、区苏、区工委书记等，那时捉去的，算起来有200多，一个村也有几个被捕。这是党政机关，群众团体还不算在内。连黄安县保卫局的也被捕去三个，保卫局长石世农也被捕了。这批共约捕了200多人，下面经常秘密杀掉的党员还不算在内。这批被捕后，大都提拔了五区的干部，来接替工作。到32年一月以后，又第二次又大批捕捉。这些捉的多半是新接替工作的五区干部，所以会引起以后的五区的暴动。

这时老百姓的情绪相当不好。尤其是农村党员，他们不敢去领导部门工作，他们的生活又苦，工作又忙，但是党内没有民主，他们不敢吭声，精神上非常苦闷的。老百姓经常看到便衣队随便捕捉人，捉去了就审，审了就供，供了就杀，所以认为：“过去革命是革反革命现在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有吃的快吃些吧，谁知道哪一天死呢？”“反革命究竟有多少，红军中捉了很多人，有的从1916年大革命搞起，家里房屋烧了，人杀完了，革了多少年的命，还说是个反革命，如果是反革命不早打了白旗，地主富农不革命，不满意还可以说，但有些是雇农。掌握了政权了，有什么不满意呢？为什么当反革命，如果是反革命，他为什么革了很久命？还有什么苏区？”苏区中心老百姓青训都如此。这些话是见熟人才敢说的，见生人根本不吭声。事实的确这样，像袁克敏家里兄弟三个家里有老婆三个，孩子三个，家里受了这样多打击，结果袁克敏、袁克朗都被捕了，没有音讯，老婆一天到晚哭。到32年四五月时，老百姓就不让自己儿子出去做工作，说：“在家里种庄稼，生活还保险一点，出去工作生命就不保险。”

这是当时地方上肃反的情形。下面谈五区群众暴动的情形。

肃反的第一批，都是些知识分子，开初搞起来的干部这批肃反后，就调了很多五区干部去，五区文化程度高，人口多，所以出的干部亦多。由于五区在外面工作的干部很多，所以消息也灵通。第一批被捕时，五区是感到很奇怪的。第二批肃反，主要将五区的调出工作的干部捉去了，这样，老百姓，地方党，地方工作同志就不满意，曾联名写信给五区的同志，要他转达上级。信上说：“我们区出去的干部很多，一出去就被捉了，捉

了以后也不知道是否反革命，就不见回来了，捉了以后也不知其是否反革命，就不见回来了。如果是反革命，请交回五区我们开群众大会来枪毙，如果不是反革命，可以调回五区工作，我们全体老百姓作保。”信是送给县委的，县苏，县保卫局。这信一去，县反而派了两个便衣队下去，省也派了一个便衣队下去，像老总一样到处视察。老百姓知道，视察以后就接着逮捕人。这样区级、乡级干部及老百姓等，更加恐慌了，就只派了一个区工委的委员长留在那里，其他所有干部老百姓都搬到西山去住，那时还集合了二十个赤卫队营，共八、九百人，准备保卫局来捉人时就打，事实这个区上的工作还是好的。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还井井动员了一个营去参加红军，以后知道五区暴动，并未让这个营参加，而且将营的干部也逮捕了，老百姓认为肃反不好，而红军是好的，他们以为参加了红军有保证，不会被肃反肃了，当时省保卫局的便衣队被他们捉去两个，县的捉了四个枪都也卸了，但未杀的，这是在32年的旧历新年时。

这时袁克服同志去黄安巡视工作，县书就告诉了他这件事，接着问袁敢不敢去，袁说敢去，于是袁就带了六个干部，并带了一个便衣队，出发去五区，是公开去的，从县到五区共九十里路，到五区边界，正是吃午饭时了，五区边界有放哨的，见袁去，就请吃饭，袁一面吃饭，一面与这站岗的谈起来，放哨的说：“现在人心慌。”袁说：“这是苏区中心，为何人心慌？”他说：“有些人捉走了，不知为什么就不见回来。”讲到五区，感到老百姓很惊慌，有人告袁：“夜晚老百姓都上山了，怕保卫局捉”。到区政府，什么都没有了，连狗都没有一只，只有拥护红军的五六百担米及一两千双鞋袜子、手巾等放满了两屋。当时袁感到奇怪，如果是反革命捣鬼，这区参加红军的为什么这样多？慰劳红军的为什么这样多？于是去区工委，碰见了委员长，姓金，过去是个事务长，与他很熟悉，他一见袁即惊奇地问：“你回来了？”袁答：“我死了吗？我不会来！”他说：“我可真怀疑你被杀了，现在外来干部杀了我们好多人，现在革命可不好革了，搞得不好，脑袋都割了。袁说：“你乱弹琴。”他说：“怎么，我们多少人都杀了，我们写了信去的。”最后他还问袁：“你是不是张国焘、沈泽民的走狗。”他说：“张国焘是帝国主义，是杀人的刽子手，我们革了多少年命的同志，都给杀了。”他说：“你要注意，你是工人出

身，革了多少年命了，小心杀了。那里经济合作社，公营商店，统统都跑了，买吃的都没有，如果你还是我过去的同志，就给你饭吃，如果是张国焘的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你就小心，饭都不给吃了。”袁说：“我与你多少年了，你还不信任我？”这时袁要他将区委的人招来，他说：“人都在，没有跑，在西边，你要开会，你可以去，要他们来可不行！来开会，把他们捉了可怎办？”晚上袁吃了一顿饭后，给袁准备个很好的地方睡觉，他就走了，临走时说“我们捉去的人都是在夜晚里捉去了，我还是回去睡好。”他走后，便衣队来接了头。当晚，袁就照实际情况，写了报告给县委，那时他们要袁去山上开会，袁有些害怕，不敢去。第二天一起来，袁见满街贴满标语：“打倒帝国主义张国焘”、“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徐宝珊”、“我们大家团结起来警惕起来”、“要求释放被捉的人”、“拥护红军，动员大家参加红军”。拥护党及红军的口号还是不少，街上老百姓都跑完了，五区通七里坪及县委路上，都放了警戒，山上插了红旗。第二天，正是正月十二，事务长又回来了，一来就发了很多牢骚，说县委、保卫局如不放回捉去的人，他们在山上的人就不回来。其次，以后不能乱捉，如有反革命，交到五区自己处理，五区如有反革命，五区就自己负责。事务长主要讲了这两条，言语间表示对外来人恨入骨髓，骂外来人像帝国主义一样的杀中国人，他说：“把干部都杀完了，这些人不怕一切的干革命到现在，是否都是反革命，这样杀，国家以后要不要人！”他说：“反对张国焘这个屠杀革命的刽子手”。这次暴动，可能里面有些反革命，可能有地主富农的不满分子在里面。因为，有个富农、地主（实为地富子弟），他们原先是革命的，以后被清洗了，很不满意，回到五区去了，这两个人可能起些作用，但基本是由于我们政策不对，那天下午晚饭后，袁即回县，并给省委打了个电话，省委下了个紧急通缉令，黄安、光山等靠近五区地带，均不准五区的人进出。15日（正月半）县就派出两个便衣队由袁率领到五区邓家桥，在那里就与老百姓打起来，老百姓当然不行。县里派去的两连都是干部，而罗山等跟着进来搜，当然就打开了，区级干部等全被捉了，因为他们实际上并非反革命，所以无反革命关系，也不会跑了的，原来被他们捉去的保卫局的便衣队，也释放回来了，正月十六、十七就公审，当场杀了两个。区级捉了一百多，再加上是一个乡的干部，一下捉了

一百多，而且各地五区工作的干部，有嫌疑的都逮捕了。没有嫌疑的也都停止了工作。这捉了的一百人多，虽未完全杀，但也杀了不少。这些人，今天看来，不是反革命，最多是被地主富农利用，而主要的是逼上梁山，政策搞的不好，这事情以后，五区的干部，均由其它各区派去了人。

这个区以后老百姓还是很好，因为以后没有捉什么人，所以大家也安静下来，一直到4、5月份，五区参加红军的二三百人仍是全县的模范区。除此以外，游击队还搞了一百多，鞋袜等慰劳红军的东西，也搞的很多，代耕、运输等组织都好，不管在哪方面的公差，五区的人都比较正直，这以后，四次围剿来了，五区鄂边老百姓打的很凶，据说那里以后，老百姓一直都是很好的。

宋侃夫口述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

时间：1981年11月12月

采访：齐特

整理：齐特

校订：黄文治

一、重操旧业

1930年，我在上海法南区委工作¹，大约在四、五月份，中央通过江南省委派陈寿昌²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到中央特科³工作，原因是我曾学过点电机专业。我说：“我都丢光了。”他说：“你有基础，可以边学边干嘛。”我是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参加共青团后又转党的。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地下做学生青年和工人的工作，对于在学校时学过的电机知识都已荒废了，真是没有想到，早已丢掉的专业，又要捡回来。既然组织已经决定了，党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我只好再从头学起。

过去整天在群众中活动，东奔西跑，现在非常安定，深居简出，来往人员很少，一心一意埋头技术学习，完全摆脱了群众工作中那种纷繁忙碌的复杂状况，也增加了安全感。客观环境的突然变化，开始我还很不习惯，久而久之，也感到了这一变化给我带来的好处。由于斗争形势的发展，我知道在白区学习的时间不会太长，为了尽快掌握技术，能够独立工作，以应付斗争的需要，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学习。

和我在一起的还有湘鄂西派来的两个年轻同志（一个是广东人，姓

-
- 1、河南区委，即上海法租界。
 - 2、陈寿昌，后也进入苏区，牺牲。
 - 3、特科，也称特委。

名忘记了，一个姓周，当时只十七八岁），我们先在沪东华德路租了一间房子。我的任务是帮助他们学习，负责我们三人的组织生活和衣食住行。不久，陈寿昌同志派翁英⁴为我们讲授无线电和电机工程的一般基础知识，他还给我们一本无线电课本和英文的袖珍本《业余无线电学》要我们学习。我们从组装三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开始，然后四管、五管，同时我们还要学报务，学普通电码⁵，伍云甫、王子纲同志又先后用手键教我们收抄练习。那时年轻，手巧眼明，学得非常顺利，两个多月后，我们就可以收英文120字母，阿拉伯数字则可达到80到100个。并曾用我们自己安装的15瓦功能的发报机，为附近地区我党的地下电台做试验性的通报。当第一次叫通时，我们兴奋异常。后来和我们联系的还有吴永康同志（1937年在西路军阵亡牺牲），他们在北四川路开了个电器行，我们需要的设备、器材、元件，大多数是他送来的。

为了避免外界的怀疑，不能在一个地方久住。不久，我们搬到沪西小沙沟路和康脑脱路⁶交界的地方，此时湘鄂西来的两个年轻同志已经回原地去了，组织上又派来两个同志，一个是湘鄂赣来的，姓王（此人，后来发现他常到舞厅去玩，组织上不放心，将他调走了），一个已经忘记了姓名。突然，有一天陈寿昌同志闯了进来，他脸色阴沉，神情严肃，进门后就从衣袋中掏出一卷钞票，往桌上一放，对我说：“小宋，现在外面很紧张，除了到街上老虎灶打点开水外，从现在起，不要往外面跑，在小饭铺包饭吃，让他们按时给你们送。”又说：“估计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不可能找你们联系，翁英和伍、王两位同志也不可能到你们这里来了，你们自己学吧。”事后我们才知道是特科书记顾顺章⁷叛变了。虽然，顾不知道我们的地址，但此人很精，对党中央情况非常熟悉，因此我们要格

4、翁英，进入苏区后叛变。

5、普通电码，即世界通用电码。

6、即现在的康定路。

7、顾顺章，1931年送张国焘去鄂豫皖，从信阳回汉口时被捕。捕后要求蒋介石接见，随即押解南京。叛变后，又回上海，由此党组织遭到巨大破坏。幸有我党打入国民党中央军委任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同志得知情况后，及时报告给周恩来同志，他当即离沪去苏区，中央才幸免于难。不久，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中央亦进入苏区。

外小心。两三个月后，陈寿昌同志才再来和我们联系，并对我说：“翁英已去中央苏区。”不久，王子纲同志也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又不久，中央派乐少华同志接替陈寿昌同志领导我们。乐是外行，业务上我们不仅自学，而且还要教别的同志学习。

在小沙沟路住的太久了，我们只好又搬回原来的地方。这时，那两个同志也走了，组织上又派来徐以新同志和我同住。经过观察了解，我们的房东是个流氓头子，拉帮结伙，人员来往更是复杂，同官方也有联系。他经常到我们的房间串门，我们对他十分戒备警惕，不再搞发报的东西。总之，一切文件以及任何能引起他怀疑的东西都不在家里存放。我们两人只有一把钥匙，任何一个人出门，总是把钥匙交给老板娘，以示我们对他的信任，也表示我们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将近一年的学习，我们已基本掌握了无线电通讯的基本技术。这时，红军的革命战争发展的很快，我们预感到新的战斗任务正在等待我们。果然不出我们所料，1931年9月，乐少华同志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在中央搞无线电通讯的一些同志，要进入苏区，宋侃夫和徐以新同志到鄂豫皖去。”并要求我们在动身之前记好四套密码。为了避免进入苏区时发生意外，密码不能写在纸上带去，要背熟记在心里，到苏区后再默写出来。要我记住的是三套：同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联系的密码。要徐以新记住的是与上海中央联系的密码。并告诉我们这个任务是由当时特科负责人黄平⁸制定并指定要我们去完成的。

当我们把密码背熟后，就准备离开上海进入苏区。

二、进入苏区

我和徐以新一路，我们虽然同岁，但我显得大一点，于是决定路上以兄弟相称，我为兄，徐为弟。行前，组织上向我们交代了沿途所住的旅馆和路上所用的化名，并告诉我们，在约定的时间、地点自有交通来接我们。再有，此次进入苏区的不只你们二人，路上如果碰见其他人，即便认识，也不要打招呼。我们乘车经南京走陇海路到开封，当晚住进组织上为

8、黄平，广州起义时曾任广州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后叛变。

我们指定的旅店内。那时，旅客的名字都写在账房间的黑板上。果然，当晚按约定的时间和我们接了头，并已为我们买好去信阳的车票，叮嘱我们在鄂州换车时，到什么地方去吃饭，这时不会有人来接头，但会有人在暗中保护。到信阳后，住哪家旅店，用什么化名，在什么时间去一个卖纸烟的小铺子，用约定的暗语去买烟，会有人同我们接头。我们到信阳，待住进旅店后，天色已经很暗了，徐以新急忙找到那家小铺，由于接头时间已过，小铺已经上板关门了。关系接不上，我们很着急，只好再住一个晚上。但那时每晚都要查店，于是我们谎称去武汉路过此地，徐突然生病，只好在此地下车为徐看病，桌上还放了几个药瓶，就这样骗过了查店的。第二天再按规定时间到小铺接上了头，与我们接头的同志要我们明天去天主堂医院去拿药，然后到另一个房间，有交通在那里等我们。第二天，我们在天主堂医院找到了交通，当即改装，我们扮成小商贩，交通挑着担子在前面带路。出了信阳西门后，他告诉我们：“城外有几道岗哨，你们不要四处张望，对付盘问，不要惊慌。”走了将近大半天，他又告诉我们：“前面是国民党民团的一个寨子，你们不要理他，我们和他们有过协定，如果他们抓了红军的人，我们就血洗他们的寨子。”果然，走到寨子前，他们喊我们“老共”，可是并不管我们。天色越来越暗，下起了毛毛细雨，田埂狭窄，泥泞不堪，一路上跌跌撞撞，浑身溅满泥浆。我这个一直在城里长大，过惯城市生活的学生，几乎无法走这样的乡村小路，我只好在冬水田里行走。这时由另一个交通员带路，从路上又走来几个人，我们会合在一起后又继续赶路。夜幕降临，我眼睛又不好，人家早就到了宿营地，我才慢慢地摸进村里。到了老乡家，这才相互做了介绍，其中有成仿吾同志，任炳煌同志，还有一个姓戴，一个已忘记了姓名。同志相见，分外高兴。交通员告诉我们，这里已是游击区，房东非常热情地款待了我们，有酒有肉，成仿吾同志酒兴很浓，兴致极高，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大家为我们开始的新生活而干杯。当晚就睡在牛棚里面，身下铺的虽然是稻草，身上盖的虽然是草帘，但心里塌实，睡得很香。

第二天，雨还在下，路极难走，可兴致很高。当晚到达罗山宣化店，在县苏维埃留宿。第三天，我们继续上路，县里的同志要我们骑马，我从来没有骑过马，不敢骑，其他同志也不骑，仍然结伴步行。这里距离新集

（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还有一百里路，当天行军五十里，在过界河又住了一夜。两天来由于在雨中的泥泞小道上赶路，我的两条腿已是寸步难移了。同志们决定把我留下，他们五人先走。没想到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竟然一个人落在后面。第二天当他们出发以后，我觉得很不是滋味。于是我对我那两只不听用的腿进行按摩，活动筋骨，慢慢觉得腿脚可以勉强行动了，我决定继续赶路。此时，身体虽感十分疲劳，但心情异常激动。沿路看到的是少先队的岗哨，听到的是劳动妇女的歌声，老人和孩子们的笑声，精神怎不为之一振？两腿顿感轻快得多了。经过沿途老乡的指点，肯定在晚饭前就可以赶到目的地——新集。当我进入苏区的腹地后，再也不担心自己的安全了。

走了十几里路之后，爬上一座小山，山梁上有三个手持红缨枪的妇女在放哨，她们笑着对我说：“同志弟坐下歇会儿吧。”看了我的路条后，她们给我倒茶，问长问短，十分热情，看到我穿的鞋子太大，帮我在鞋子上缝了两根带子，当我拿铜板给她们表示谢意时，她们却哈哈大笑觉得十分奇怪。反而以警惕的目光盘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是从上海，她们说：“上海？是中央来的？”我说是的。她们不但放了心，而且更加热情，一再要把我送到新集，我婉言谢绝了。但无论如何要我装点干粮，并把我的上衣扣子重新钉好，给我削了一根柴棍做为手杖，一再叮嘱我：“好走。”对待一个路人如此体贴入微，顿时一股欢快炙热的暖流浸透了我的全身。我想，今后我就将生活在这样的“同志爱”当中，这是真正的幸福啊。

午后，我一个人沿着山腰上的羊肠小道独自行走了三十多里路，并不觉得孤单，而“同志弟”这一新的充满阶级友爱之情的称呼，一直萦绕在我的耳际。进入苏区的第一天，就使我激动不已。这时路上走来一群年轻人，他们唱着少年先锋队队歌：“曙光就在前头”，更加使我憧憬着未来的新生活，尽管它是艰苦的、险恶的，但也是幸福的、愉快的，因为“曙光就在前头”。

在天色将黑的时候，我终于赶到了新集（即现在的新县）。新集原是地主民团的土寨子，寨墙已经坍塌，墙基还在，有红军站岗，问明我的身份后，就领我到中央分局。在分局见到了先到的五个同志，他们让我和一位姓蔡的秘书长接了头，我把中央密写的介绍信交给蔡后，他热情地接

待了我，随后带我去吃了晚饭。饭后，安排我和徐以新同志到对面的军委机关住下。在军委我见到了从徐州、蚌埠、六安先期进入鄂豫皖苏区的蔡威同志、王子纲同志。在新的环境、新的生活即将开始的时候，旧友重逢，怎不令人激动呢？我们彼此交谈进入苏区的各人见闻，越谈越兴奋。是啊，新的人群，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一句话，新人新事是那樣的吸引我们，看来我们都开始热爱上这块土地了。

苏区的生活和地下党的生活完全是两个样子。在这里，人和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兄弟般的关系，诚恳真挚，亲密无间。地下党工作呢？同志间虽然也很亲切，但由于环境的限制，接触的圈子狭小，视野不可能开阔，更不能畅所欲言，因此总觉得有点距离。可以说在我的一生中，苏区的这段生活是永远令我怀念的，我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快活、那么兴奋、那么舒畅。

从到达苏区的第二天起，清晨听到号音，住在新集的所有机关、部队、民兵，全都涌入“红场”，进行操练。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人人热情奔放，个个心胸开朗，这里真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各种私心杂念将一扫而光。我深深地感到，这才是万众一心，这样的队伍是不会被打垮的。更可贵的是苏区的所有领导同志经常和大家一起来到“红场”，进行各种活动。在活动的间隙，广泛地和群众、干部接触，谈话、散步，晚集会也是如此。节假日也要在“红场”搞各种活动，大家在一起演戏、唱歌、球赛、开运动会，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干群之间，毫无拘束，同享欢乐。当时我还是一个奋发向上的青年，在这滚滚的革命洪流中怎么能不激动呢？真是什么事都想做，什么活动都想参加，每天的情绪都在亢奋之中。

三、电台还是建立不起来

我到苏区是为筹备建立电台的。可是苏区的通讯器材奇缺，电台暂时建立不起来。于是比我们先期到达苏区的蔡威、王子纲他们首先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培养通讯人才，我和徐以新来后也参加了这个训练班的工作。这个训练班不仅搞无线电，也搞有线电，电话也归我们管。那时在训练班学习的学员，现在还在的有：游正刚、冯吉禄、徐明德、刘息生、陶万荣等同志，耿协祥同志也是此时来学机务并兼学报务的。担任教师的

除蔡威、王子纲外，还有钱钧、戴国栋、马文波等（钱、戴二人过铁路时已经离开，不知下落）。

在没有正式建立电台前，我参加了不少苏区的文化活动。那时在苏区搞文化活动的人毕竟很少，因此我还是省苏维埃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成员，主任是中央分局宣传部长成仿吾同志兼。我曾和一个同志编了一个油印小报，取名《军事通讯》，我又当编辑又写稿，他管油印校对；另外，我还在新集列宁小学兼过音乐教员，教小孩子唱歌。再就是搞体育活动，我曾做过红场运动大会的总指挥，组织球队赛球更是经常性的活动，我那时是“红星”篮球队的队员（还有一个“红旗”队）。而负责演剧活动的则是李春林同志（柯伯年同志之弟，以后任张国焘的秘书，在四川通江时，张国焘诬陷他反党而被杀害，这是一个很好的同志）。

在未建立电台前，组织上要我临时在军委参谋部工作，主管谍报和机要方面的事。而电台方面的工作，只好一方面训练人才，一方面积极收集电讯器材进行筹备。在1931年活捉岳维俊⁹那次战役中，曾缴获到不少电讯器材，同时让军委的特务队通过红安界河口的商人，到武汉为我们再购买一些。那时，如电池、变压器、电子管等重要器材，还是可以买到的。

电台虽然建立不起来，但我们还是在军委机关找了一间房子，组装了收音机，架起天线，装好各种设备，进行收集情报的工作。开始只收点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由于苏区消息闭塞，在当时那也是新鲜的，经过我们分析，就可以了解到其他苏区的红军在什么地方打了什么样的仗，再作为我们的消息在小报上登出来。

后来我们又搞了一台发报机，但试叫几次，均未叫通。直至1932年上半年，我们占领了黄安县城，活捉了师长赵冠英，才缴获了一部不完整的电台，还是缺东少西，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是建立不起来。

四、苏区的第一架飞机

未到苏区之前，我不认识张国焘。大概是到新集的第二天，我和蔡威

9、岳维俊，冯玉祥部的一个军长，被俘后为我们做了不少事，也为我们购买了不少东西，如棉花、布匹等，我们撤离鄂豫皖苏区时，被张国焘下令杀掉。

到军委的小餐厅吃饭，见一个人正站在桌旁吃饭，他没有和我们打招呼，我们也不好问他，他只是在那里闷头吃饭。我觉得此人很奇怪，表情冷漠，也不开朗。这时一个警卫员进来和他讲了几句话，我发现他是江西萍乡口音（我也是萍乡人），就估计他可能是张国焘，可我不好问他。吃晚饭的时候我采取了主动的态度。我问他是否是萍乡人， he说是，我说我也是；他说他是北路人，我说我是南路人。他马上说：“南路五陂下宋家可是大户。”我也不客气地回了一句：“北乡张姓也是个望族。”张问我：“从上海来？来了几个人？同谁一路？”我一一做了回答。张又问我：“在哪里读书？”我说：“在浙江杭州。”张说：“那是蒋介石的老窝子。”当张知道我们是搞无线电通讯工作的时候，他表示对使用无线电通讯不放心，怕敌人偷听去，我们予以解释后，他又急于想建立电台，催我们赶快搞起来。我们告诉他现在器材不全，于是他亲自把保卫局长周纯全同志找来，当面交代他要想办法到外地去购买器材，需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中央分局没有人管我们，军委参谋部也不管我们，我们由张国焘直接领导，他指定周纯全和我们联系，需要什么东西都由周负责。周还管我们的吃用，他把缴获的最好的手表也给了我们。当时正进行肃反（周也是管肃反的），由于肃反扩大化，常常是上午还在一个桌上吃饭的人，下午就不见了。那时有三大罪名：改组派、第三党、AB团。我、王子纲和蔡威由于刚到苏区，身上还有几个钱，遇到伙食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跑到新集的小饭铺炒两个菜吃吃。有一天，周纯全同志对我说：“小宋，你们要注意，想吃东西不要到馆子里去吃，可以买回家来吃。现在苏区有一个吃喝委员会，以吃吃喝喝为掩护，收集苏区的情报，如果有人说你们是吃喝委员会的，就不好办了。”从此我们就再也不敢到小饭铺去吃饭了。不过，这说明周纯全同志和我们的关系是不错的，是信任我们的。

攻克黄安以后，缴获了一些电信器材，东西不少，但不配套。最缺的是电源，有发电机没有汽油，电池也难于买到。发报机中的线圈和电容器也缺，电台还是建立不起来，特别是汽油，很难搞到。恰巧这时发生了一件事，真是“天”赐良机。

活捉岳维俊后，国民党派出一架飞机在光山一带搞侦查，由于迷航，红军从地面开枪，迫使飞机降落在新集附近，驾驶员龙文光（后改名龙赤

光)被俘。飞机是老式的单座双翼机,去了很多人才把飞机拖到过界河新修的机场。有了这架飞机,军委成立了航空局,龙文光经教育释放后当了局长,政委是中央派来的钱钧同志(曾在苏联学过航空机械),并派一个班的同志日夜守护,战斗中缴获的汽油都要送到机场,因此飞机场存有不少汽油¹⁰。

一天下午,“红场”正在开运动会,我是总指挥。突然,军委副主席蔡申熙同志跑来找我,说有紧急任务,要我立刻去飞机场。原来他得到情报,龙文光要驾机逃跑。给我的任务是: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逃跑。我思索很久,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汽油从机场运走。蔡表示同意,并说:电台需要汽油,名正言顺。还指示我把飞机上的汽油也放光运走,他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见机行事吧。吃过晚饭,我带了几个战士,连夜行军五十里,到达机场后,找到龙文光,我说:电台需要汽油,蔡副主席要我们到你们这里来借,他说可以。我又说:这里只有十几桶,不够用。他说:那怎么办?我说:连飞机上的汽油也要借给我们。这时,他脸色十分难看,半天才说:你们拿吧。我说:你们帮我们把汽油放出来,他说你们自己倒吧。我一听,这不是是有意难为我吗?我的确不知道飞机上的油箱在哪里。好在我懂得一点机械,我大胆地爬上飞机,七摸八搞,找到了油箱的出口,把飞机上所有的汽油都放了出来,这次不仅解决了汽油,连机油、润滑油都解决了。我们找了百多个民工,挑的挑,担的担,把所有的油都运了回来¹¹。

五、终于有了电台

油有了,器材也搞到不少,但仍然缺少电子管和电池,特别是发报

10、这架飞机一共飞过两次,一次是打黄安,在黄安城里甩了两颗炸弹,把城墙炸了个口子,还撒了传单,对士气鼓舞很大,老百姓都说:共产党有飞机了。另一次是在肃反时,张国焘不知从哪里得的情报,说许继慎、周淮炯(均为红军师长)要带领两个师的队伍投降国民党。许、周二师当时驻在皖西北,从新集到皖西北是四天的路程。情况紧急,决定派陈昌浩坐这架飞机赶到皖西北(商城西),调动部队,逮捕了许、周二师长,并被张国焘枪杀,这是历史上一大冤案。

机上的5瓦的大型电子管，特工在武汉也买不到，因此，电台还是迟迟建立不起来。

1932年3月间，在新集北的潢川打了一仗，缴获了一部完整的电台，真是雪中送炭，我急忙跑到前线去接收，在潢川前线我又见到了徐向前同志。

我第一次见到徐向前同志是在1931年1月下旬，他在黄安战役负伤后，在新集养伤，在军委我见到了他，但没有交谈。我是早已耳闻他是一位有名的红军将领，见面之后，给我的感觉是温文尔雅，一派儒将的风度。这次在潢川前线指挥部，徐帅亲切地接见了。指挥部设在一间大房子里，和他同住的还有政委陈昌浩同志，参谋主任舒玉璋同志¹²，他们都睡在地铺上。他们三人同我谈了很久，徐帅言辞不长，说话不多，问这问那，态度亲切，在他面前不会感到拘束。舒玉璋同志对有关电台的情况问得很详细，陈昌浩同志在一旁也不时插上几句话。徐帅叫舒玉璋同志把电台交给我带回，并简要地介绍了部队的情况，还带我到阵地上进行了参观，行前又赠送给我们两匹很好的骑兵马，一匹给了蔡威同志，另一匹我一直骑到长征路上。

有了这部电台，加上充电机，手摇马达，设备就比较完整齐全了。这时我们也离开了参谋部，在钟家畈（新集到麻城的路上）找了几间破房，修整一新，安装好设备，架设好天线，开始了工作。从此，四方面军正式建立了电台。电台由我、徐以新、蔡威、王子纲负责，还有几个训练班的学员，几个管充电机的机务人员，并派有一个班的战士进行保卫。大约在3、4月间，我们开始正式呼叫，首先呼叫的是中央苏区。

王子纲同志报务十分精通，手法极好，又快又明。好的报务员在手法上都是各有千秋，不用通话，从手法上就可以判断对方是谁打来的。与

11、现在看来，当时龙文光并没有想跑，虽然他在政治上一直动摇，但当时情况还不至于促使他逃跑。对他的怀疑，也是肃反扩大化的表现。龙文光是在我们过了平汉路，处境特别困难时跑掉的。我们到四川后，得知他跑到刘湘那里，当了航空队副队长。

12、舒玉璋同志，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精通军事参谋业务，由于反对张国焘的错误，在四川被张杀掉。

中央苏区叫通后，我们就判断出和我们通报的是我们很熟识的老康（即曾三同志），中央苏区电台的其他同志，由于他们大部分是被俘的解放战士，如王铮同志（原张辉瓒的报务队长）、刘寅同志（原张辉瓒报务队的见习报务员），过去从未接触和联系过，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

因为通报密码是我从上海带到苏区来的，译电工作一直就落在我的身上。开始通报，报文极其简单，因为张国焘还是怕敌人听到，不大放心。第一封电报是向中央苏区汇报了黄安大捷的情况。中央苏区回电也比较简单，基本上是我们祝贺，并通报了中央苏区的胜利消息。随后我们才陆续收到用电报发出的一些政策性文件，如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俘虏政策、地富政策等。紧接着与湘鄂西、赣东北苏区也相继叫通。自从苏区有了电台，尽管各个苏区被敌人分割在祖国各地，相距千里万里，但政策可以随时统一，全国苏区形成一家。

1932年在皖西北苏家埠一带打了一仗，这是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打得最漂亮的一仗。记得这一战役开始前，由于敌情有些变化，张国焘决心动摇，想撤出战斗，由于徐向前同志的正确判断和亲自指挥，坚持采取围点打援的运动战，终于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消灭敌军三万余人，活捉敌军总指挥厉世鼎及不少师长、旅长，缴获机步枪两万余支，山炮数门。原四方面军没有山炮，从此以两门山炮组建了四方面军的山炮营，营长为何再香¹³同志。这一战役的战果本还可以扩大些，但觉得战线拉得太长也不太好，所以到了淮河西的苏家埠、叶集、韩摆渡一带就收了场。

战役结束后，我和钱钧同志及兵工厂厂长（姓丁）急忙赶到前方收缴战利品。途经商城、青山寨、金家寨，到达麻埠街。在一间大房子里堆满了无线电电台的器材，我们简直是喜出望外，真是有如天上掉了馅饼。我们粗略地估计了一下，至少缴获了三部电台。我们用了四五天的时间，把所有的机器设备检查了一遍，进行了清点，准备把所有的器材拉回本部。行前，领导还交给我两个被俘人员，让我带回，一个是马文波¹⁴，他原是陈调元电台的报务主任，报务技术纯熟，比较精明，也懂一些机务。另外一个机务员。和我们一起回来的，还有几个新参军的学生，其中有

13、何再香同志，后残疾，解放后在武汉任园林局副局长。

14、马文波同志，原总参三部副部长。文革期间曾任外交部政治部军代表。

两个女生，陶方荣¹⁵同志（现名苏枫）就是其中之一。

这批器材运回以后，电台的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人手仍感缺乏，训练班的学员不能当班，那时对马文波还不敢大胆使用，只能让他收译新闻。由于需要，又建立了一部电台。一台由我和王子纲负责，跟随指挥部行动；二台由蔡威、马文波负责，跟随二十五军行动。

一台与二台的通报不很顺利，有时只好派骑兵联络，或者用电话联系，那时电话线已有两三百里长。此后，两个台又合并在一起。电台行动异常困难，比山炮营还麻烦，有些机件不能用牲口驮，要用人背。到四川后，才专门为电台成立了一个运输营，约六百多人。

六、过平汉路是中央同意的

1932年9月初，部队从皖西北回到黄麻地区。这时，蒋介石集中30余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新集的大沙河发大水，国民党的飞机开始集中轰炸新集，主力部队在七里坪附近同冯寿二打了一仗，这是一场最激烈的战斗。蒋介石集中了他的嫡系部队胡宗南、上官云相等五个主力师，武器好，火力强，装备完整优良，并配有十几个团的杂牌军。这场战斗虽然我们也消灭了敌军几千人，缴获机步枪五千余支，特别是缴获了很多蒋军主力部队的自动步枪，装配到我军每连二支，火力得到了加强。可我军的伤亡也非常惨重，付出的代价太大，仅师团级干部就死伤不少。十一师政委、一位威信很高的领导甘济时同志光荣牺牲了（后为李先念同志接任），全师指战员都为之流泪。十一师师长刘英同志，头骨被打碎，脑浆溢出，不省人事。十二师师长陈赓同志、副师长何畏同志均身负重伤，他们都是用担架从火线上抬下来的。副总指挥蔡申熙同志在河口战斗中，身负重伤，抢救无效，光荣牺牲。申熙同志是黄浦二期的学生，是我党一个非常有才干领导人，他的牺牲使我们感到十分痛心，至今我仍然十分怀念他。

干部死伤，兵员也大大减少，士气受到了影响。情况紧急，鄂豫皖

15、陶方荣同志，小学毕业，到四川后，改行到宣传队，现任大连市检察长。

的领导包括张国焘在内，面对这种情况感到为难、胆怯、害怕。对此，张国焘通过电台向中央做了报告，其中提到，我地处北为陇海路，东是津浦线，南临长江天险，西靠平汉路，红军回旋余地不大。不久，中央回电，这是一封关键性的电报，内容是：望你们避开内线作战，即不在敌人包围圈里防御打仗，无论如何要摆脱在内线作战处处设防的被动局面，跳到外线去与敌人兜圈子，寻找敌军弱点，集中几倍于敌的优势兵力，打击敌军一部，以打破敌人的围剿。

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召开了黄柴畈会议，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但从哪个方向跳到外线呢？向皖西北方向发展，经蚌埠到南京是一条出路，但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重兵盘踞，当然不行；北越陇海路则是一马平川，也不好办；南渡长江，困难更多。研究的结果，认为平汉路的敌军兵力较弱，决定跳到平汉路西进行外线作战。我们及时电告中央，中央回电同意了 this 作战方针。可见，过平汉路是中央同意的。

七、被迫西征

当时到平汉路西进行外线作战，根本没有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打算，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过路以后，情况发生变化，无法再回到鄂豫皖苏区。经中央回电同意，红四方面军被迫西征。

我们是1932年10月离开鄂豫皖苏区的。走前，敌人的飞机整天在新集的上空盘旋，新集已被炸成一片废墟，省苏维埃和军委的住地，除两间房子外，全部倒塌了。

究竟是哪一天行动，这是关键的军事机密，因为怕泄密，不仅一般不电告中央，也不会事先通知的。因此过平汉路的那一天，事前我们毫无所知，接到通知，时间非常仓促。电台那时还没有固定的运输队，而时间又非常紧迫，只好临时把军委的补充队（俘虏的一些敌兵及下级军官）和经保卫局审查有反革命嫌疑的一些同志，组成运输队，帮助电台搬运机器设备。

蔡威同志那部电台随红二十五军的七十三师行动，过铁路时，他们被敌人截住了。王树声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派徐深吉同志率部队猛追，终于把蔡威同志的电台全部追了回来。

部队到达平汉路以西后，敌情发生了变化。敌军在平汉路一侧放了几个主力师的兵力，又怕我们和湘鄂西搞到一起，在洪湖也补充了几个师的兵力，我们又处在重兵包围之中，欲回不能，只好继续向西向北行动。就是这时，我们仍没有放弃回鄂豫皖苏区的打算。

大军西行，经过随县南里，走京山直插枣阳，在枣阳的新集又打了一仗，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

我们电台白天随部队行动，夜晚宿营就开始工作，没有房子就露天干。由于战斗频繁，战况激烈，经常是炮弹呼啸而过，子弹打在我们工作的桌子上，砰砰乱响。可为了收发一些紧要的电报，也只好坚持工作。常常是总部来人催我们赶快转移时，我们还在紧张地收报、发报，待收发完电报后，再收拾机器追赶部队。

枣阳这一仗以后，再回鄂豫皖就有被全歼的危险，这才下决心不再回鄂豫皖苏区，决定向西北方向的豫西发展。去豫西必须经过枣阳、襄樊交界的地方淅川南花塘（也是鄂豫陕三省交界处），在那里又打了一仗，打垮敌人一个多旅，突破了包围圈进入豫西，在豫西又兜了一个小圈子，到达豫西重镇南阳。在南阳发现了二方面军的标语，说明二方面军已在他们之前脱离了湘鄂西苏区，远征路过这里。据当地老百姓讲：贺龙队伍的服装不如你们的整齐，破破烂烂的。这说明他们是非常艰苦的。

几个负伤的师级干部一直用担架抬着随军行动，既不方便，目标又大。到南阳后，为了减轻部队负担，领导上决定将陈赓同志、刘英同志化装送离部队，去上海治病。刘英同志因颅骨破裂，脑神经受损，失去记忆，周围的同志他均不能相认，却记得自己的马，马也认识他。他的马无人敢骑，在行军中始终跟随着他。在养伤的过程中，经红四方面军卫生部的医生苏井观的治疗护理，不但保全了他的生命，而且竟然使他恢复了一些记忆，可见当时我们的医术还是很高明的。何畏同志伤势渐轻，仍留在军中。万没想到，陈赓同志和刘英同志到达上海后，均被逮捕。据说，由于陈赓同志在广东东征时曾救过蒋介石的命，经宋庆龄、何香凝多方营救，蒋迫于舆论，才释放了陈赓同志，刘英同志则遇难。刘英曾在苏联最高军事学府学习过，很有才干，是红军中的大将。刘英同志的死，是十分可惜的，使我军失去了一个帅才，如能活到今天，也是同徐向前一样的角色。

经南阳化塘，到漫川关，此地形势险恶，两边是高山峻岭，我们在峡谷中走了两夜，粮食殆尽，无水无盐，只好吃些辣子刺激肠胃。现又地处绝境，还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为了冲过漫川关，邝继勋同志（原被张国焘撤职，此时又被任命为师长）率领先头部队要偷袭漫川关附近的一个最高的山头，如果能抢占这个制高点，大部队就可以冲过去。但由于暴露了目标，敌人抢先占领了这个制高点，突围计划落空。

冲不过去，大部队仍然收缩在谷中。等了将近一天的时间，夜晚，徐向前、陈昌浩去看阵地，寻找突围的口子，终于找到了一个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但山势陡峭，山路狭窄，只能一个一个向上爬行，过于笨重的辎重带不了，有些骡马也不能上。于是决定炸毁山炮，埋掉一部充电机。第3天夜晚，命令大家下决心爬山突围，徐向前、陈昌浩走在前面，他们向我们交代，无论如何要跟上队伍，想方设法把驮机器的牲口牵上去。这一夜，我们终于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过了关，又下山，到达关中平原的商州地带。远望八百里秦川，地势平坦，真是一个富足的地区。我们马不停蹄继续前行，走的完全是李自成潼关大战后败走的路线，又走了两天半，距离西安已经不很远了。11月初的一天下午，我们到达了子午镇（西安南几十里），在这里又打了一仗，消灭了杨虎成部的一个旅。再继续西行，又折向南，直插秦岭。秦岭海拔四千公尺，山山相连，岭岭相接，连绵不断，地形复杂。翠竹古藤，郁郁葱葱，云遮雾绕，扑朔迷离。山谷中是河，两边是小路。据说，这就是诸葛亮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小道。我们在山谷中行军，有时走山崖边的小路，人牵着人走过去；有时根本没有路，要趟出一条路来。秦岭山中，村落稀疏，人烟稀少，找一个向导都十分困难。没有宿营的房子，就睡在冰天雪地之中。到了宿营地，我们电台首先和中央通报，或与湘鄂西联络，上海则始终没有接通。

在山中大约走了5天，只行军不打仗，在汉中北城固县出了秦岭。出山以后，在广州起义纪念日（12月11日）那一天到达洋县。在洋县召开了会议，会议主要是议论在汉中建立根据地问题，并将此意图电告中央。汉中盆地，四面环山，只靠我们这两万人，一万两千支枪，占领汉中盆地的确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通过电台又得到了情报，敌人正从湖南、河

南派出两支部队，向汉中挺进。我军那时还身着单衣，破烂不堪，同志们脚，由于长途跋涉，反复过河淌水，破的破，伤的伤，身体素质大大下降。张国焘也感到在汉中难于站住脚，这时他又想以汉中南面的巴山为根据地（实际是没有放弃在汉中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于是决定南走大巴山。

形势变化迫使四方面军过铁路之后，放弃了鄂豫皖苏区。原打算在鄂西停步，后又想在豫西立脚，那时二方面军的有些零散部队曾和我们联系过，但却未能如愿。过了漫川关，关中平原当然不是立足之地，在汉中住了两天之后，也觉不是久留之处，这才决定南上巴山。但根据地总得建立在有群众的地方，这才能有饭吃，有兵源，而巴山上既无田地，又少人烟。无奈，只好下山奔向川北。

八、又有了根据地

巴山是很长的山脉，四川北部的屏障，海拔也在四千公尺左右。老百姓说：巴山是上山七十里，山上七十里，下山七十里，三七二百一十里。部队从下午三点出发，午夜十二点到达山顶。山上有些地方积雪很深，又冷又累，腿僵脚木，膝盖已不能弯曲，走到后来，只能机械地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电台的运输队，病号增多，掉队的不少，只好再从连队抽一些战士帮忙。午夜在山顶上宿营，黎明继续下山。下山时，由于雪滑坡陡，只好象滑雪一样，屁股一坐滑下山去。下山后的第一地方是通江县北的两河口，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小小的战斗，消灭了地方上的民团。先头部队继续前进，经苦草坝到达通江，我们电台则暂时在两河口宿营。

到通江后才逐步站住脚，在这里张国焘召开了会议，决定以两河口、毛裕镇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然后向南江发展。张国焘开会有时让我参加，非常重视我，优待我，而有关政治方面的会议则又不通知我，他始终是又信任我，又怀疑我。在鄂豫皖苏区的大小知识分子差不多都被他杀掉了，我们能得以幸免，是由于他离开我们不行，没有技术人员，电台无法工作，也就无法了解和掌握情况。当时周纯全同志对我们的态度，完全证明了张国焘的矛盾，既有无微不至的照顾，又在暗中监视我们。

到达川北时，部队有一万四千人左右，枪一万一千余支，四个整师

的建制，十师、十一师、十二师、七十三师。后来就以这四个师为基础，扩编为四个军。十师编为四军，周纯全、王宏坤负责（许世友开始是副师长，后提为师长、副军长）。十一师编为三十军，原师长倪天亮调任总指挥部当参谋长，余天云代理军长，李先念为政委。十二师编为九军，军长先为何畏，后为孙玉清。七十三师编为三十一军，军长孙玉清兼。

在川北苏区，一面准备打仗，一面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党、建政、建立根据地。不久，成立了川陕省委，最初罗世文同志任书记，刘瑞龙任秘书长，还有袁克服（现陕西省军区政委）、张琴秋等同志。这时，部队穿上了棉衣，有了鞋子，住上了房子，解决了毯子，饭吃得饱，觉睡得好，伤病员有医院治疗，士气大振。

川北历史上就出大烟土，漫山遍野的罌粟花，色彩鲜艳，十分好看。烟土是那里以物换物的最好“通货”，我们刚到川北时，也只好拿烟土换棉布、换盐巴，甚至可以换电池、换药品和枪支子弹。四川的军阀部队都是身带两支枪。步枪和烟枪。我们刚扩军的时候，大部分小伙子也是带着烟枪来参军的，入伍以后才能让他们慢慢戒掉。戒烟运动开展的比较顺利，老百姓的日子稍微好过一些，我们就号召动员，铲除罌粟花改种粮食，除偏僻的地区外，老百姓都能积极响应苏维埃号召。此后扩军时，就很少有带烟枪的了。

有了根据地，环境比较安定，我们电台在涪阳坝又开始了工作，并进行了扩建。在西征的途中，一直是两个电台在工作，虽然有多余的设备，但人手不够只好弃置不用。这时我们决定再扩建一个台，并成立电务处。我任处长兼三台台长，一台台长是王子纲，二台台长是蔡威。我既总管业务，也管机要、行政，电务处的人就是三台的人。此后又组建了两个台，四台台长游正刚（我们培养的学员），五台台长徐明德（现任海军副参谋长）。为了培养人才，我们在通江又办了一个训练班，前后有三四十人参加，由于学员文化水平低，而有些人张国焘又不相信，常常是搞搞停停。比如，那时王维舟同志带领三十三军从川东过来，他带来一批学生，张国焘就不相信，甚至连王维舟同志也不相信¹⁶，俘虏人员就更不相信了，只吸收两三个人参加训练班。即使这样，还是把这个班断断续续办了下去。最后，总算每个军都配备了一部电台，跟指挥部行动的军则不配电台。

九、破译

王子纲同志的报务在红军中是屈指可数的，蔡威同志在机务方面非常钻研，译电、机要我搞得比较多。为了对付敌人的围攻，我们开始建立敌人的情报工作，我和蔡威同志集中搞破译。先是敌人用英语符号通报（如长官的名字、地点等），慢慢积累摸索，就把敌人的番号、驻地、电台符号都搞清楚了，这对我们的破译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第二步，把所有的收音机都打开，收听记录敌报，然后整理破译。

要摸清敌人密码的路子，必须对敌情有所了解，对社会情况、社会知识也要知道一些，对敌人电报的形式、行文规律也要搞清楚。敌人的电报有一定的公程式，这程式非常严格，因此熟悉了就可以掌握它的规律。这样，猜出其中一个字，按其行文规律，可以把全部猜出来。当然，也要懂得敌报的番号、月日的代号，如果这些方面的知识一点都没有，是很难猜译出来的。另外，对明码本子要非常熟（那时我可以把明码本子完全背下来，有时接到密电，不用翻本子，直接在电话上念给领导听，向领导汇报）。经过我们的努力，不到两个星期，我们就把敌人的密码全部弄清楚了。虽然有时敌人也更换密码，但因有前面的基础，还是比较容易猜破的，因为敌人的老本子是始终不丢的。

张国焘很长时间不相信我们搞到的情报，当我们把敌军的兵力部署等情况向他汇报时，他总是要问：“可不可靠？”只有当他通过地面侦察得到的情报和我们的汇报的相符时，他才相信。经过几次这样的对照，才比较相信我们的情报了。一天深夜一两点，张国焘只带一个警卫人员突然来到电台，见我和王子纲还有其他同志正在埋头工作，十分认真，他很感动，这才比较信任我们了。

反田颂尧的三路围攻计划，就是根据我们提供的敌情制定的，从而

16、有一次到綏定行军的路上，突然见到我的老同学傅连章（不是那个卫生部长），在地下时我们是一个支部，后来他组织了游击队，和王维舟取得了联系，随同王到了川北。他有一次带二十多个同志（都是知识分子）来看我，又过一天，我去看他们，屋子里空无一人，全被张国焘杀掉了。

把田打垮，这证明我们的情报是准确的。后来敌人可能怀疑他们的密码被我们破译，因此频繁地改变密码，成了乱码，但我们仍然可以破译。

十、高层的矛盾

1932年陕西杨虎城部的孙蔚如军长，通过陕南党的关系，派他的参议武志平同志来我军，希望与我们取得联系。张国焘对此事又相信又怀疑，杨部是杂牌军，原是西北军，受蒋介石的排挤，因此可以相信；但又认为孙蔚如此举又可能是窥视我们的意图，即我们究竟是向陕西方向发展，还是向四川发展，这又值得怀疑。当然，在当时这样的怀疑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武带来一份详细的川北地图送给我们，同时还送给我们一些东西，如药品、电池等。张国焘和武谈过话后，决定派徐以新去陕南同孙蔚如联络，而派徐以新同志去谈判的原因之一是电台的电池紧张。徐与孙谈判的结果是：孙供给我们四川的情况，共同反蒋。徐回来后，果然带回来一些电池，更重要的是带回来孙送给我们的一本使用过的密码底本，对破译国民党使用密码的规律是有所借鉴的。另外，孙还送给他个人一百块银圆，徐竟然接受了，因而引起了同志们的不满，认为徐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身份，为此，张国焘批评了徐。

当时形势很好，对孙部的工作还可以做的更深一些，但由于张国焘思想很“左”，对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没有进一步展开和深入，这种“左”的倾向，在以后和杨森的关系中也暴露出来。

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川陕苏区后，川军的各派军阀出于共同的利害，一致对付我们。刘湘、刘文辉、潘文华、杨森、邓锡侯、李家钰、田颂尧，刘存厚等各派系的部队，由蒋介石把他们组织起来，在重庆建立蒋的行营，主任是贺国光。但不管如何，四川军阀派系的矛盾很深。在历史上有过英舰炮轰万县事件，杨森顶了一下，这在当时也是不容易的，因此我们认为杨森还是有点爱国主义思想的。这时杨也很想和我们拉关系，杨的目的十分明确，因为他在万县有一大批枪支弹药，刘湘垂涎欲滴，很想弄到手，他为了保存自己，所以急于和我们搞好关系。不久双方互派了联络员，

还赠送了我们不少东西，应该说我们和杨的关系比较深了。四方面军不少领导干部主张联杨抗刘，而张国焘却不同意，他只想暂时利用。当打垮了邓锡侯和李家钰之后，张国焘即主张攻杨。领导层内部产生了矛盾，特别是参谋主任舒玉璋同志极力反对，他为此竟在陈昌浩的屋子里给张国焘打电话，在电话中大骂张国焘军阀主义，陈昌浩在一旁制止，舒玉璋就与陈昌浩大吵，骂得不可开交。陈昌浩命令警卫员将舒玉璋捆起来，关了禁闭。据说，舒玉璋后来在涪阳坝被活活打死。我和舒玉璋同志来往很多，他生性耿直，正派，人很好，黯熟军事参谋业务，他对蒋军内部情况比较熟悉，和我谈的很多，这对我的情报工作很有参考价值。他惨死的消息传出后，我们都十分痛心。

进驻通江以前，在陕南小河口，四方面军领导内部发生了分歧，争执不下。曾中生、李春林、廖承志（那时叫何柳华）、朱光、张琴秋、徐以新、王振华等同志互相串联，对张国焘不满，对脱离鄂豫皖苏区也有意见，对发动群众的政策和干部使用方面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听说他们要派人把意见上报到中央。

廖承志同志极有文采，速记很好，经常为张国焘抄抄写写，整理张的报告文稿。后廖离开苏区去上海，到上海时被捕，经宋庆龄、何香凝营救救出狱。不久又回到通江，又被张国焘逮捕。此时被捕的还有曾中生、李春林、王振华、朱光等同志，张琴秋同志¹⁷因此时已与陈昌浩同志结婚，幸免于难。李春林、王振华同志从此下落不明，朱光同志由于在监狱中曾利用他写了反中央的口号和绘画，为此，张国焘也把他放了，廖承志同志后也被释放。

在川北苏区当时“左”的东西很多，虽然打土豪、分土地执行的比较坚决，但工商业政策也有很大偏差，知识分子政策更有问题，连小知识分子也要受到怀疑。如原在三十三军工作的大小知识分子，只有张爱萍、杨克明、魏传统等同志留了下来，大部分都被杀掉了。

自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以后，从中央的来电上看，对张国焘没有什么责备的言辞。后来，中央可能发现张国焘还没有下最大的决心建立和巩

17、张琴秋同志原为沈泽民的爱人。沈泽民同志原为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后，他仍坚持苏区工作，后牺牲。

固川北根据地时，才有些批评的语言。如电文中就曾有不要三心二意，要决心立下脚跟，发动群众，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等意见，但对张严厉的批评是没有的。当然，其中也有客观原因，即在1933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管电台的曾三同志曾来电通知我们，密码（即从我上海带进苏区的密码）是当时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黄平主持制定的，而黄已被捕叛变，这个密码已不可靠，非常机密的情况，不要用此密码。我们把这一情况向张国焘汇报后，张决定基本上不再向中央报告军事情况，只报一些战报，因而中央对川北苏区了解得很少，当然也就没有更多的批评指示。

十一、川北苏区在反围攻中壮大

蒋介石在重庆建立了行营后，就开始准备对红四方面军的围攻。首先是反田颂尧的三路围攻。由于我们对敌情了解的较详尽，很快就把田颂尧打垮了。这时主要战线又转移到苏区东线。先是给刘存厚歼灭性的打击，占领宣汉、绥定，威胁开江、万县，直指刘湘。反刘湘决定性的一仗是在万源县的青龙关，我们的队伍摆在青龙关、南天门、笔架山一线，集中杀伤力强的火力于正面必争之险要高地，王陵基的几个师进入这个地区后，准备部署兵力强攻我们的阵地。我们侦破敌人这一意图后，迅速派出一支部队从左边直插进去，同时右边也插入一支部队，两边的制高点均被我们控制，把敌人的主力师全部包围起来。敌人强攻青龙关、南天门、笔架山一线，火力很猛，我们则集中最强的炮火压制敌人，打得他们难以招架，我们从电台中都能听到敌人的呼救声。此时，我们通过电台侦知，敌人的总指挥王陵基已擅离指挥岗位，回到万县他小老婆那里过年去了。我们急忙打电话告诉总部，总部迅速通知前线指挥调整兵力，结果全歼敌人的进攻部队。我们从青龙关下来，向南猛追，直达开江、万县附近，敌五路军全线溃退。我通江一线就迅速乘胜反攻，随即恢复通、南、巴大片苏区，敌人的六路围攻至此全部结束，川陕苏区进一步得到巩固壮大。

这时形势很好，红四方面军有九万之众，到过嘉陵江时，扩编为四个军：四、五、三十、三十一军，还有王维舟同志的三十三军（人数较少）。

十二、为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提供情报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湖南时，我们从收到的情报中，深知他们的处境十分困难，但当时我们对中央红军的去向捉摸不定。为了给中央红军提供情报，我们抓住贺国光行营电台为中心，加紧破译蒋介石的密码。蒋的密码非常难猜，破译的任务主要由我和蔡威同志担任。开始我们只能猜出几个字，以后发展到一部分字，我们一个电报一个电报地猜，逐步积累，摸索规律，终于破译了蒋介石的密码。当时只有一个电台，把所有的收音机打开收听敌报，训练班学员也值班收报，每人守收一个敌台为中心，抓住其通报的电台，日夜不停，非常紧张。在菜油灯下，正襟危坐，精神高度集中，两耳认真地辨别敌台发出的滴答声，手中的笔不停地在纸上写着。由于学员的能力较差，我们还要亲自动手，有病也要坚持工作，然后将我们收录的大量敌报和掌握的中央红军周围的大量敌情，送给军委及总指挥部，经过分析、整理，再发给中央红军。中央红军的电台在约定的时间内就要向我们呼叫。几年前我和曹祥仁同志曾深谈过破译敌人的密码问题，他说，中央红军到达湘川黔地区时相当困难，他们行军中很难收听到敌台的情报，你们电告的敌情是起了重要作用的¹⁸。

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到达陕南时，我们也从敌台收到不少消息。可惜他们没有电台，我们无法与他们通报。我曾建议派一个团去联络支援他们，顺便带电讯器材和密码，张国焘不同意，由此也可以看出张国焘是不顾全大局的。

十三、西进，会师，准备建立新的根据地

当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到达四川边界，四方面军决定放弃川陕

18、在这里，侃夫同志的录音稿是这样说的：“后来，我们曾见到曾三同志，他说：‘你们提供的情报对我们是起了作用的，使中央红军避免了一些可能发生的遭遇战。’文化大革命中，我在挨批斗时，有的同志捎信给我，说毛主席说：宋侃夫过去是立了功的，不要老搞他”。

苏区，西渡嘉陵江与中央红军汇合。这就是说，我们也要长征了。因此，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应该说是从离开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就开始了。

过嘉陵江是 1935 年 3 月。

中央红军到达长江以南的四川边界后，曾与我们通报，提出与四方面军会合，至少要取得联系。为此，他们希望四方面军派出一支部队到川西吸引敌人减轻他们的压力。最初张国焘准备按此方针行动，但如只派出一支小部队到川西，又怕不解决问题，因此决定派大部分部队渡江西进，援助中央红军，只留少量部队在通南巴。但不知为什么，原计划留下战斗力较弱红四军却没有留下，也随同所有的部队渡江西进了。这样，张国焘渡江的意图就变成：一、援助中央红军，二、放弃贫瘠的通南巴苏区，准备在嘉陵江与岷江之间的富庶地区建立根据地。过江以后，阆中、江油一带，人多粮足，条件很好，但不知为什么没在这里站脚。根据回忆，从情报所知，中央红军要渡江入川，北上肯定的，因而四方面军应西进策应。后来也确曾接到中央来电，要张部配合策应，并拟定有建立川康甘根据地的计划。因此，大约是在五月，四方面军又继续向西渡过岷江，到达松（藩）理（化）茂（县）地区（现归四川藏族自治州所属），有名的夹金山（大雪山）即在此地的西南方向。

我的电台驻在黑水芦花，蔡威的电台跟随总指挥部到了前方。此时中央红军已到达西康的金沙江畔，中央决定双方各派一支先头部队在懋功附近会师。六月，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三十军、九军各一部到达夹金山，徐总指挥即派九军二十五师韩东山的两个团，先翻过夹金山与中央红军会合。当我们听到先头部队已经会师的消息时，大家异常兴奋。会师后，决定执行一个新的战略——建立川陕康甘根据地。那时还没听说到陕北，而是在甘南一带建立根据地。

会师前，四方面军进行了动员。因为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物质上的困难很大，战士体质较弱，减员不少。四方面军决定给予物质上的支援和兵员上的补充。在思想上则要做到亲切热情，亲如一家，但这只是在大面上。而张国焘在前方会见了中央领导同志回到卓尔基后，曾亲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说：会师后要调整红军总司令部的机构，朱总要过来，刘（伯承）参谋长也要过来，他当总政委。总部所属的一二三

四局也要调整，你们这一摊子归总部，变成总司令部三局。原总部三局局长王诤同志是被俘人员，把重要部门交给他管，他觉得不很放心。因此，王诤调回一方面军司令部三局任局长，要我做总部三局的局长，一方面军的伍云甫任副局长兼政委，王子纲先在三局一科当科长再说。现在一方面军减员很厉害，人员少，病号多，掉队的也不少，身体素质很差，营养不良，装备也不好，队伍已经不象样子。原总部很快就要过来，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总之，他对我们散布了一方面军很多消极的和挑拨性的东西，但在公开场合也讲几句要热情相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等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这就暴露了他对中央红军的真实思想——两面派的实质。

这个电话之后不久，张国焘又来了通知，叫总部的同志去迎接朱总和刘参谋长。在卓尔基一个小喇嘛庙附近，我、王子纲、曾传六（保卫部长）还有经理部长（即后勤部）郑义斋等人，在门外等候他们的到来。少顷，朱总骑着马带着警卫员来到我们住地，随后刘参谋长也来了，他们只带了一个搞秘书工作是刘少文，后来又来了个周子坤。可见，他们对张国焘是没有什么戒备的。

初次见面朱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未见面以前，总觉得红军统帅一定十分威武。但相见只后，感到朱总非常朴素，慈祥和蔼，平易近人，没有首长架子，在他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讲，他也能和任何人搭上腔，毫无拘束感。对刘伯承同志则感到十分精明，态度比较严肃，不象朱总那样能随便说得上话。他的眼睛不好，但总是书不离手。刘少文同志则比较活跃，一看便知他是朱刘两总的助手。

会后，张国焘跑到我房子里，并叫来郑义斋、曾传六、王子纲等人，对我们讲了很多挑拨离间性的语言。他说：朱总不会打仗，没有什么大用，是个空架子。当时我们觉得这些话讲得很奇怪，并没有感到这是他以后闹分裂反党和叛党的前奏。他又说了不少中央红军的坏话。总之，他们已是一支疲惫不堪、军容不振的队伍，是不能打仗了，今后合作中还会发生问题。当然，他也说了一些要注意搞好关系，生活上要给予帮助等冠冕堂皇的话。

十四、毛尔盖会议前后的调整、部署

会师前，红四方面军进入嘉陵江以西、岷江以东的地区后，张国焘就把在川陕苏区成立的地方部队，如独立营、独立团等改编为正规部队，这也说明他已有放弃川陕苏区的打算。部队扩编后，约有十万之众。四方面军的几个军在建制上绰绰有余。而会师后，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只剩下两三千人，张就拨了两个团归五军团建制，另抽两个团给了三十二军（一方面军九军团改编），给王维周的三十三军也补充了两个团，同时在人事上也进行了调整。原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同志调总政当副主任（实际上是主任），派黄超（张国焘的秘书）接任五军团政委，原九军团政委何长工同志也调出来，但又不安排具体工作，原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则调总政当地方部部长。这些措施完全说明了张国焘想把五、九军团拉过来，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果然，后来五、九军团就正式划归为左路军。总之，四方面军到达岷江地区同一方面军汇合后，张国焘的一系列行动和措施，都说明他已为尔后夺权分裂的阴谋做着准备。

毛尔盖会议后，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左路军由张国焘、朱总司令、刘参谋长率领，辖九军、三十一军（王树声部）、三十三军及一方面军的五军团（董振堂部）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罗炳辉部），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总部下设四个局，一局是作战局，原局长调回一方面军，周子坤任局长，过草地后换成曹礼怀，由于张对曹不满。不久，又换了没打过仗的黄超；蔡威的电台变成总部的二局，但不随总部活动，由右路军的徐向前、陈昌浩领导，以便随时和我们通报，这也可以看出张国焘的心计；四局是总部的供应管理部门，局长黄正平，不久换成杜文德；过岷山后又成立了五局，（调查局），王维舟任局长，实际上是为了把他调离三十三军；我们变成了总部的三局，我任局长，伍甫任副局长兼政委，辖下十二个台，一至五台是原四方面军的电台，六至十二台是一方面军并过来的，六台台长刘寅，七台台长荆忠昌（原五军团的）。八台台长汪名震，十台台长岳夏，九台、十一台、十二台台长的姓名忘记了。原第三局局长王铮则带一部电台随一方面军活动。由于六台熟悉一方面军情况，所以和一方面军各军的联系主要靠六台。

十台专门收发新闻，收中央社的，发新华社的消息¹⁹，呼号 CSR。十二个台一起活动，哪个军需要就派一个台随军活动。

右路军是以毛主席为首，还有周恩来同志。右路军设有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随同右路军行动。这样的人事安排也可以看出张国焘的意图。右路军内部也还设有一方面军司令部，林彪任司令员，周恩来同志任政委。结果是一个总部，一个前敌指挥部，一个一方面军司令部层次复杂。由此也可以看出，一方面张国焘要权，一方面是对张不放心。

斗争就这样开始了。

十五、摩擦、分裂的前奏

按规定我们电台应归刘参谋长直接领导，而张国焘对我们说，有事直接找他。因此，当我们有些事请示刘参谋长时，刘总是摇头，感到十分为难。

这时，我们又搞了个通讯训练班，有无线电、旗语通讯、电话队，还有个号兵连。无线电由我和王子纲负责，号兵连由徐向前的总号官徐英武和一方面军的号长刘正堂管，旗语通讯有伍云甫同志直接抓。学无线电的只有三十多人，都是从部队上有点文化的同志中抽出来的和首长的通讯员。总工程师刘光辅则教电台和机务（刘到西路军后被俘）。当时在电话队负责过的，现在还在的有邮电部副部长李玉奎同志。

左路军经甘孜、芦花到达阿坝，又走了三天到噶曲河（草地中的一条河）。此时，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已相当紧张了，经常扯皮。四方面军有一种情绪，瞧不起一方面军。这是张国焘散布一些挑拨性言论的结果。当时王树声的三十一军是个大军，有十几个团，而董振堂同志的五军团只有两千多人，确定五军团归王树声指挥，董也有点不买王的账，曾与王大吵过一通，拍桌子骂娘。每个部队都经常发生这样的事，部队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我们局里也出了点事。我同伍云甫关系较好，同刘英的关系也不错，

19、新华社的成立应在此时，而不是在延安。

这两个同志是好同志。可我有点独断专行，可能引起他们的不满，有一件事现在想起来还使我十分内疚。长征途中，我骑的是一匹很好的骡子，到宿营地后，饲养员把它栓在树上，没有多久，饲养员跑来告诉我，骡子叫一方面军的人牵跑了。我出来一看，果然不见了。打听了几天，才打听出骡子被总部的警卫人员牵走，已归刘参谋长使用，扬言说是因为这匹骡子吃了老乡的麦子，所以被总部的人牵走了。而饲养员说，他亲眼看见刘总参谋长的警卫员解强牵走的。于是我气冲冲地跑到总部找他们要骡子，他们不给，说刘参谋长要骑。我当着刘伯承同志的面就吵闹起来。我说：“参谋长要骑这匹骡子，可以下命令嘛！不要采取这种办法，犯纪律可以处分，光明正大嘛！”刘参谋长当时一句话未讲。后来我又找朱总谈，朱总非常顾全大局，耐心地劝我，叫我把骡子牵走。在延安时我见到刘帅，我向他道歉，他说：“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我早已忘了。”

十六、电报，分裂

部队到了噶曲河，分裂终于发生了。

这时，张国焘给中央发电，电文说：河水很深，不能徒涉（大意）。中央回电说：要想一切办法过河。必要时可搭浮桥。张又去电：浮桥搭不成，草地上没有木料，要找木料还得跑回阿坝，并提出南下的分裂主张。中央又回电：无论如何要过河，不要南下。可以找找其他的徒涉点，如有困难，我们可到上游策应。张这时也找了其它徒涉点，实际上张是不愿跟随中央北上，所以坚持不能过河。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坚持南下，形成了僵局，部队在葛曲河边停了下来。

不久，张又发一封电报给徐、陈，上写“指人译”（有时也写“亲译”），即让我译。此电大意如下：不要北上，要坚决南下，不仅河不能过，而且北上不利。胡宗南已到了甘南，腊子口一带被堵，敌情于我不利，希望你们力争中央和你们一起南下。徐、陈当即回电（此电也是我译的）：南下已不可能，是否还是北上为好，不要为此事内部发生分裂。接到徐、陈这封电报后，张又给他们发去一封电报²⁰，大意是：望你们劝说中央南下，如中央执意北上，你们必须把四方面军的队伍带回南下，不要随同他

们一起行动。电文语气十分坚决，由我亲自译好发出，十分机密²¹。此电报是否就是后来所说叶帅拿给主席看的那封，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此电文中没有“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如执迷不悟，坚持北上，则以武力解决之。”等字样²²，王子纲同志也不记得有此内容²³。此电是经我手发出，别人是不清楚的。

但为什么又出现了武力解决的传闻呢？事后听说，当毛主席率领一方面军的队伍走了之后，四方面军有人主张要追，当时也有人主张打（许世友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徐帅当即说：“不能打，世界上哪有红军打红军的²⁴！”

另外，当时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兼任红大教育长）已跟随中央红军走了，这时有人追了上来，告诉李不要走，并且又追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可以，我们先走一步，你们以后再来。”李特当即指着李德²⁵大骂：“赤色帝国主义！”后来，李特还是把已经跟中央走的原四方面军一些部队、学员带了回来，跟张国焘南下走了。

顺便提一下话剧《北上》的问题。左路军第一次过草地时，朱总司

20、在录音稿中，侃夫同志的原语是这样的（即在这封电报前，还发过一封电报，电文如下）：“现在是上中下三策：上策南下，建立康甘根据地，特别是以川西为根据地最好，在西康也可以进行活动；中策不北上，南下以后往西，向青海方面活动，建立川陕甘青根据地；下策是北上，把胡宗南部队吸引过来，敌情予我十分不利，而甘肃、陕北土地贫瘠，局面不易打开，等等。现在看来，张的原意是中策。此电发出后，徐、陈是否请示过中央，不得而知。但他们回电仍表示不同意南下，希望北上。看来，他们也在犹疑。事后我曾听说，他们见到毛主席，主席说：还是不分开为好。张接到徐、陈这封电报后又去电给他们，大意是……”（接上稿）。

21、有一天，我正在译电，张国焘突然跑来，把稿子急忙抽了回去，说：不发了，朱总来了。果然，不大工夫朱总来了。等朱总走后，他又把那份电稿递给我（是否就是这一封电报，我已记不清了），张还对我说：此后有电报直接交给他，不要交给刘参谋长，也不要交给朱总。还十分严厉地说：否则你宋侃夫要负全责。当时，我感到事态已十分严重。

22、引自李济照同志所写的《张国焘其人》。据侃夫同志讲：军博搞了一个军史展览，也正式引用了李书中的这封电文。

23、这里，原录音稿中有这样一句话：“徐帅也不记得有。”

24、这里，录音稿中有这样几句话：“去年我在京西宾馆见到许世友，问起此事，他却避而不谈。”

25、李德，德国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

令经常是过几天就到我们这里来看看，他知道张国焘对电台控制很严，但仍想了解点情况。他并没有想把我们拉过去，但总是从正面给我们讲道理，讲原则，讲共产党的道理，讲马列主义的原则，所以朱总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和善又讲原则的正面形象。而不是象戏上写的那样，与张国焘对骂。他也从来没有为一个战士和张国焘争吵过。朱总司令生活非常艰苦，四方面军的同志条件好，到处可以抓到东西，藏民的酥油我们也可以搞到，一方面军的同志则搞不到什么东西，因而我们比朱总司令住的房子还好。总之，《北上》的毛病较多²⁶。

十七、二过草地，两河口会议

分裂的来源已久，一切迹象说明张国焘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根本不愿意与中央在一起，于是我们第二次过草地南下。

所谓南下，实际上是准备向西。“到天全、芦山吃大米，吃腊肉！”成了动员部队的口号。由于长途奔徙，疲惫不堪，而又长期吃青稞麦子，这个口号在当时是很有吸引力的。我们到达天全、芦山、雅安、大邑一带，共走了二十多天，其中打了不少仗，虽然消灭了一些敌人，缴获也不少，但我们的损失也很大，部队大量减员，敌情还是十分严重，我们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这一年（1935年）的冬天，我们是在天全过的。

一般性的政治会议，张国焘是不叫我参加的。在天全、芦山的两河口（按：应为卓木碉，今马尔康白沙寨），开了一个干部会，对这个会议我记得比较清楚。因为当晚散会后，我回住房的路上，要过一座独木桥，我的眼睛不好，那天夜里掉到河里。这个会给我的印象十分不好，现在从当时的情况推论，这个会可能是张国焘决定建立第二中央后，为了煽动干部反对中央，并达到他建立第二中央（当时叫临时中央）的阴谋而召开的。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会上首先是李卓然、何长工、邵式平、罗炳辉

26、曾经有过谣传，说朱总的门卫被黄超下令撤掉了，是黄要谋害朱总。此事是在新疆和延安时有人揭发出来的，我在新疆曾问过黄，黄说绝对没有此事。记得当时我和朱老总住的很近，我并没有听说有此事。后来黄超和李特没有回延安，据闻黄、李在新疆是被康生杀掉，也可能是把他们搞到苏联杀掉的。黄、李有错误，但肯定不是反革命。

等同志讲话，他们的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呢？特别是何长工劲头很大，大喊口号：“打倒毛泽东！”，李卓然也细声细语讲了不少。会议由何柳华（即廖承志同志）做的记录，事后刊登在张国焘主办的《干部必读》上。会后他们都升了官，李成为第二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何当上了第二中央的组织部长。朱总、徐帅在这个会上没有讲话，但张国焘在第二中央委员的名单中，仍然写上了朱总、陈少禹等人的名字。这个会开了整整一天，在会上宣布临时中央的成立，直属共产国际。会上反中央到了顶点，气氛非常紧张，时间是1935年10月。

与此同时，成立了“波巴依德瓦”（藏语）中央政府，邵式平同志任主席，熊国炳同志任副主席。邵在会上也是慷慨激昂地讲了一通，邵还找了一个藏族人做老婆，后来带到延安。

十八、甘孜会师，取消临时中央

1936年上半年，二方面军绕了一个大圈子到达甘孜，同四方面军会师。我在司令部见到了贺老总和萧克同志，也看了看他们的电台。电台缺的器材不少，张国焘给了我一个任务，帮助二方面军把电台建立起来，缺物给物，要人给人。于是，我们送给了他们一部电台和一些器材，并制定了一种通报的密码，这样，我们才恢复了与二方面军的通讯联络。

这里必须提及的是，会师后第二次北上时，我多年的搭档和亲密的战友蔡威同志患伤寒症在岷州病逝。弥留之际我和他见了一面，死后葬在岷州附近的一个镇子上。蔡威同志是福建人，1930年在上海亚美无线电学校学习，后又在上海某大学读了两年书。开始搞无线电时也是跟我一样，边干边学。他非常刻苦，勤于钻研，作风踏实，生活朴素，在无线电的业务上有他的独到之处。1931年他与王子纲同志先我进入鄂豫皖苏区，在我军的电台建设上，在破译敌人的密码上，是起了重大的作用的。他的死使我们非常痛心，他是令我永远怀念的一个好同志。

张国焘迫于形势，于7月宣布取消临时中央，改称西南局，准备北上，并致电中央。中央立即回电表示同意和欢迎，没有正面责备，并建议

建立川康陕甘根据地，目的是为了配合陕北互相呼应。不久，中央又提出将西南局改为西北局，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任副主席（可能还有任弼时同志）。西北局则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这样，就取消了张国焘原来准备远走青海的计划。

9月，开始第二次北上（第三次过草地），出发地点在炉霍，经阿坝，过噶曲河（水的确很深），原来是想占领岷州、洮州，但岷州城未能攻下，先占领了漳州，张国焘和任弼时同志就住在一个小村子里。一天，张国焘叫我去谈话，任弼时同志也在场，由于蔡威同志的逝世，要调我到二局工作。理由是二局重要，而我对敌情工作也很熟悉，任弼时同志也劝我去，我则坚决表示不去。原因也很简单，即三局我已经搞熟了，二局的同志我不熟悉，而且又已从一方面军调了几个同志到二局去了，我感到很难相处。如罗瞬初同志已调二局当副局长（实际是代理局长），我听到同志们对他的一些意见，觉得去后各种工作将难以开展。我坚决不去，他们也没有办法，只好派伍云甫同志去当政委兼副局长。

十九、是中央决定我们渡河西征

四方面军到了陇西，二方面军到达通渭，据我所知，在漳州开了一次西北局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决定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大会师，同时接到中央电令，决定北渡黄河，执行中央先取宁夏的战略。原决定四方面军过河后先占领中卫、一条山，一方面军一部及徐海东部也要过河，配合四方面军的行动。黄河边上船少，需要渡船，漳州会议后，我们做渡河准备。原计划四方面军从靖远的渡口（黄河上重要渡口）过河，跟随一方面军走的三十一军、四军从会宁西北兴化的永清东北渡河，这样就可以夹击宁夏，占领银川。

我们在十月底从靖远渡过黄河，夜晚，先头部队占领了对岸滩头阵地以后，接着就是我们过河，水不急，没有什么枪声，十分顺利。过河后天已大亮，敌机来了，我们躲进河北的地窖。这些地窖是老百姓储藏梨子用的，很大，里面都是梨。中午无法做饭，靠吃梨充饥。梨子又大又好吃，大家饱餐一顿，走时都付了款。天将黑时，我们才出发，走了一夜又半天，

到了赵家水。赵家水地方虽小，但很重要，是甘北河西走廊的进口，通往宁夏的瓶颈，在这里我们住了10天左右。另一支部队占领了一条山北面的五佛子，也停了下来，目的是等待从兴化渡河的部队。没想到敌情发生了变化，胡宗南的部队卡住了兴化永清渡口，部队无法过河。结果渡过黄河的只有三十军、五军团、九军共两万多人。甘北河西走廊是平原地带，只有一些丘陵，地形对我们很不利，又是马步青控制的地区。马家军主要是骑兵，炮火虽不多但行动迅速，杀伤力大，再进军宁夏已感到十分困难，而我们的力量又如此单薄，恰好中央此时来电，取消宁夏战略，改为沿河西走廊西进，在甘北适当地区站住脚，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以后又来电说明在永昌建立根据地。因此，决定成立西路军，这本是中央的决定，而不是张国焘个人的电令。

二十、向西，向西，向西

11月7日，在赵家水的一个广场上，召开了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驻地的部队和机关都参加了。陈昌浩在会上做长篇讲话，他说：根据中央决定，号召打通国际路线，和共产国际联在一起，直接听取斯大林的指示。话讲得非常具有鼓动性。徐向前同志也简明地讲了话，主要表示要坚决遵从中央的决定，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

会后徐向前、陈昌浩找我和王子纲谈话，他们说：由于二局随另一路部队没有渡过河来，要兼做二局的敌情工作。我们要西进，有关敌人的情报靠中央提供是来不及的，要我们自己搞。对马家军的密码，要设法破译。我和王子纲同志很为难，很犹豫，没有接受这一任务。第二次又谈，口气十分坚决，我们才接受了任务，决心破译马家军密码。于是，三局又把所有的收音机都架起来，除与中央通报外，全部精力投入破译工作，日以继夜，异常紧张。大约用了一星期左右时间，基本上破译了马家军密码，可猜出敌报的百分之八十。我们曾破译了蒋介石给马家军的一份密电，大意是说：红军破译工作很厉害，你们要注意。这次破译工作以前，孙蔚如送来的过去西北军用过的密码底本对我们是有一点参考价值的。十几天后，我们全部掌握了甘北马家队伍的情况，包括他们行动的时间和地点，

应该说这对西路军的西进计划是非常有利的。

第一个战役，计划占领永昌。在平凉不远的古浪打了一场恶战（即古浪战役），王树声亲自指挥，九军损失惨重。马家队伍打的是麻雀战，骑兵下马后，用马刀肉搏。他们有督战队，骑兵只能向前冲，不准后退，天上还有飞机配合。我们电台离前线不远，我的手指皮也被炸掉一块。马刀砍，飞机炸，我们的伤亡很大，以至都影响了王树声和其他军队干部的情绪。王树声同志原是一个很有气魄的指挥员，在指挥中常常把衣服一脱，大喊一声：“跟我来！”队伍就冲了上去。面对骑兵的新战术，缺少办法对付，这一仗打得他都有点胆寒了。九军的伤亡使整个西路军在情绪上都受到了影响。

到永昌还有好几天的路程，我们日宿夜行，但敌人的骑兵常常在天一亮就赶到我们的宿营地，有时甚至赶到我们前面，我们还未睡觉，敌人已经包围了寨子。战斗频繁不断，人困马乏，再加上筹集粮食十分困难，只好派部队到外面去拉。结果，每天战斗的伤亡加上搞粮食的伤亡，几天来损失巨大。过去可以抢着收容伤员，现在已不可能。没有足够的野战医院，伤员大部分被敌人杀掉，对士气影响很大。

我们终于占领了永昌。在永昌住了一段时间，粮食已搜刮的差不多了，已处于无粮无援的境地。这时陈昌浩提出以永昌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主张，经军政委员会讨论后上报中央（这点，过去中央亦曾有过电示），徐向前反对这个计划。恰好此时我们截获了马步芳给马步青的一份电报，大意是：如共军不久留这里，仍然西走，可不打，如停就打。看来二马想把我们撵走，其实我们可以一直向西，在玉门以西敦煌一带，背靠嘉峪关，把屁股坐下来。但没有这样做，还是在永昌停留下来，准备建立所谓的根据地。

这时西安事变已经发生了，我们急电党中央，告急求援。中央回电说：统战工作正在进行，准备派人到西安找顾祝同谈判，停止二马（马步青、马步芳）对西路军的进攻。当然，这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这几乎是幻想或近乎是与虎谋皮。

这个地区，一片荒凉，遍地沙漠，寸草不生，颗粒无收。部队大部分又是南方人，生活十分困难。

马家部队非常残酷，凡被俘的红军战士一律杀掉，而我军对民族政

策也缺乏全面认识，因而有时对被围在据点中的马家部队，也采取相应的办法，一律砍杀。这样，双方就杀红了眼。因此不少同志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宁可留下一粒子弹自杀，也不能被俘。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红军战士的斗志仍然十分高昂。那里村寨的土寨墙很高，要架很高的梯子才能爬上去。每攻克一个村寨，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战士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也有唱马寨曲的），爬上云梯，前仆后继，十分壮烈。仗越打越恶，眼越打越红，我们抓到敌人也绝不手软，全部杀掉。记得有一次我们攻克一个敌人盘踞的土寨子，血洗了这个村寨，一个未留。严重的对立情绪，根本顾不得讲民族政策了。

12月底，五军团占领了高台、抚义（两个很小的县城）。五军团未带电台，不久，我们收到敌报，得知敌人已包围了高台，抚义我军突围，董振堂率部死守高台。我们把收到的一切情报及时送给陈昌浩，陈想派一支部队救援，可是行动不快。后来还是派了一个骑兵师去支援（师长杜义德），但马不是骑兵马，未经过训练，走到半路上遭到截击。可是，如果不派骑兵，到高台就要走几天，更容易被敌人消灭。

五军团是一支很好的队伍，在西北军是以打阵地战而出名的，起义后在一方面军也是以打硬仗而出名的。他们在高台，一无援军，二无粮草，死守二十余天。1937年1月21日高台失守，三千余人有的被杀，有的被俘，董振堂同志玉碎身亡，壮烈牺牲，这个情况我们是从敌人的通报中得到的。后来才知道，当敌人冲上来要俘获董振堂同志时，他开枪自杀了。董振堂同志的牺牲对我们都是极好的教育，每个人的手枪中都留下两颗子弹，做好牺牲是准备。

高台失守后，西路军集中在一个较大的寨子——倪家营子。这时停有停的问题，走有走的难处。当时我曾想是否应当返回去，确实也有一支部队向东走了一段路，由于受阻，只好又回到倪家营子。真是西进困难，东退不能，我们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据说，这时中央成立了援西军（军长刘伯承，政委张浩），但我们没有感到有任何具体行动。

敌人包围了倪家营子，情况十分紧急，我们必须突出去。正面突围已不可能，只好偷偷地挖地洞。天气寒冷，我从老乡那里搞到一双毡靴，夜间突围时疏忽大意，没有脱掉。骑在马上，一出寨子，队伍就乱了。马

不能骑，只好走路，毡靴又笨又重，边走边跌交，敌人的马两次从我身上踩过，幸亏同志们的帮助，连拉带拽，才追上了电台的同志。路不能走，马又丢了，恰好碰见一个骑驴的老乡，同志们把毛驴要来，让我骑上，这才跟上了队伍，否则我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了。走了几里路，看见一个有灯火的房子，进去一看，徐向前、陈昌浩等人都在那里烤火，他们又给了我一匹马，才算赶到了宿营地。

宿营地是在梨园口附近的一个寨子，这是西路军的最后一站。我们把电台架设起来，发现总工程师刘光辅不见了，后来从截获的敌报中才知道他已被俘。

从不断收到的敌报中，也可以看出我们损失的惨重。牺牲的牺牲，被俘的被俘，失踪的失踪，想到当时的处境，至今仍感痛心。部队的境遇和状况，已不允许再继续打下去了，领导决定进入祁连山。

二十一、祁连山中

进山必须经过梨园口，而敌人早在那里等着我们。

3月12日我们经过梨园口时遭到了伏击。本来十分疲惫的队伍，犹如雪上加霜，真是屋漏又逢连阴雨，损失巨大，一些军师级干部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九军政委陈海松同志是个年轻、勇敢善战的指挥员，他在山坡上指挥战斗，被敌人用马刀从马上砍下来，当即阵亡。九军军长孙玉清同志被俘后，叫敌人杀掉。我们边打边进，急忙向山上爬去，终于控制了制高点，在山坡上的土洼中，阻止敌人的冲锋，我和所有的同志都拿起步枪参加了战斗。敌人和我们距离不过几十米，在激烈的战斗中，经理部部长郑义斋同志从马上跌了下来，几个敌人猛扑过去，郑义斋同志开枪自杀，但未能结束自己的性命，他哀求警卫员再补一枪，这时敌人已冲到眼前，警卫员只好忍痛向自己的首长开了枪，自己也开枪自杀倒在首长一边，一同壮烈牺牲。我们的阻击终于使敌人未能冲上山来，我们迅速爬上山顶，用床单、毯子搭起了简易的帐篷，夜晚露宿在山上的山洼里。

3月14日，我们到达石窝，敌人也跟踪追了上来，又是一场恶战。至此，两万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两三千人，不仅大势已去，而且几乎全军

覆没。山高风烈，凄楚荒凉，夜晚露宿在荒山野岭上，真有点四面楚歌、霸王别姬的味道。

一天，在一个山洼里，军政委员会开会，中途把我喊去参加。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李先念等同志都席地而坐。会议气氛沉闷，人人情绪低落，大家虽然默默不语，但还显得十分镇定。待我坐定之后，李特向我传达了会议的决定。他说：现在情况很不好，你们的电台行动不便，除留下一部保持和中央通报外，其余全部砸掉。徐、陈目标大，要离开部队，什么时候离开，还没有确定。这时我看了徐、陈一眼，只见他们脸色深沉，面无表情。面对此情此景，一股苍凉悲怆的情绪充塞了我的心头。

会议结束后，我向电台的同志传达会议的决定。我喉头发涩，声音嘶哑。泣不成声，话不成句，万千思绪涌上心头。不执行决议，电台目标太大，要拖累整个部队，如落在敌人手中就更不好；砸掉吧，可这是多少烈士用生命换来的，是多少同志耗尽了心血建设起来的，今天却要毁在我们手中，我们怎么下得去手呢？同志们都哭了，但不砸掉是不行的，同志们挑出较好的电台后，留下足够的备件，还是含着眼泪把自己亲手建设起来的电台又亲自砸毁烧掉了。毁掉电台之后，大家不知所措。全军快要毁灭，惨败结局已定，今后怎么办？前途在哪里？……

当夜我们随部队下山，下山时传来口令，要一个人踩着一个人的脚印走，脚印不要留下太多。我们又翻了一座山，天亮时在山谷中休息，遇见了李特，他告诉我，徐、陈已走，我们要在祁连山中活动一个时期，以摆脱敌人。

剩下的这部电台，还在工作，每到一地就把电台架起来，坐在地上和中央通报。周围没有敌人，充电机嗡嗡响，我们也毫不在乎。宿营时山上风大，又无灯油，其他部队已是无灯无火，一片漆黑。只有我们所在的宿营地，以蓄电池为电源的小灯泡在闪闪发亮，带来一点光明，别有一番景色。叫通了中央电台，通报顺利，大家的情绪便为之一振。同志们说我们是过的“洋”日子，只有这时，才有一些欢声笑语。

困难重重，电台的同志，情绪极不稳定，不少同志想和部队在一起去打游击。我们想尽办法稳定大家的情绪。在极度困难的境地中，同志们一句关心的话，可以使一个同志在绝望中得到力量，在迷惘中重又清醒；

一点生活上的照顾，也可以使一个同志鼓起勇气，也可以使一个同志幸存到今天。记得解放后，我碰见一个曾在我们电台工作过的同志，当谈起在祁连山中被困的情景时，他说：“幸亏你这个局长把马让我骑了半天，要不然那一天我就见马克思了。”可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消失了。

从收到敌人的通报中，得知他们已知道有一支红军跑掉，但不知跑到哪里，这正说明我们这支队伍，在祁连山中的行动，已完全摆脱掉敌人的尾随、追击、和捕捉。虽然我们这支仅存的队伍只有一千多人，但敌人就是无可奈何。后来，我们又得知，我们派出的几支游击队，被俘的被俘，消灭的消灭。曾日三的支队全部被俘，张琴秋、魏传统的那个支队也全部被俘，跟随游击支队的电台（是由一方面军三局调来的电台），有两个人在紧急情况下，竟带着电台设备去投奔敌人。曾给朱总司令当过司号员的一个小鬼柳圣清，被马回子抢走当了娃子，解放后才回来。

在祁连山中，我们没有碰到一个敌人，没有听到任何枪声。白天翻山越岭，夜晚露宿在低洼地带。接近黄昏时，就拣拾牛粪，碰见成群的牛羊就抓。到了宿营地，杀牛宰羊，烧起牛粪，取暖做饭。所谓饭就是牛羊肉，烧着吃，烤着吃，还要用牛羊油炸牛羊肉干，做为今后几天行军路上的干粮。记得有一次搞到了两碗小米，煮了一大锅米汤，分给大家均享，这是我们在山里五十多天中唯一吃过的一点粮食。山中虽然没有敌情，但几十天都在荒山野岭、雪原冰川中游动，耳塞目闭，对外界一无所知，革命形势如何，更是无从知晓。有时想到何时才有尽头，不免感到十分渺茫。一支小部队就象失散了孤儿一样，在山中孤寂的流浪，部队的情绪怎么能安定下来呢？有少数人则想自寻出路。

快出山之前，我们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告知我们共产国际通过新疆的关系，正在设法接应我们。这无异是在黑暗中突然看见了一片光明，在死亡的边缘上又有了生机。同志们的情绪为之一振，立刻有了精神，我们决定出山，奔向希望之路——新疆。

二十二、在荒漠中我们毁掉最后一部电台

出山之后，根据我们的地图观察，去新疆有两条路：一条经敦煌，

一条要过安西。究竟走哪条路，我们犹疑不定。路上碰到老乡，据老乡讲：敦煌这条路不好走，而安西县城只驻扎八十几个警察。根据老乡提供的情况，我们决定走安西，在安西附近我们停了下来。五六十天的山中生活，部队已经拖的不像样子了。天寒地冻，衣着单薄，腹内无食，有人无枪，有枪无弹，西去新疆还有很长一段路程，为了解决部队的实际困难，决定攻占安西县城，以便得到一些补给。我们及时把这一意图电告中央，但没有得到回电。

当时我们只剩下一部电台，已无法收集敌情，只好采取火力侦察。完全出乎我们的意外，守城的敌人不是八十几个警察，而是一个团，火力很猛，我们攻不上去，只好又退回到村子里。敌人尾追不放，迅速包围了我们的村庄。真是狐狸没打着，倒惹了一身骚。在这里我们向中央发出四方面军电台的最后一封电报，向中央报告安西未能攻克，准备突围去新疆，西走星星峡。电报发出后仍然没有得到回电。突围之后，经过一天一夜的强行军，摆脱了敌人的尾追，于四月底到达白墩。吃过干粮稍事休息，又是强行军到达红柳园子。这既不是镇子，也不是寨子，根本没有老百姓，只不过是沙漠中的一个地名。在一个沙包上，敌人的一大股骑兵又追了上来，我们又被包围了。面对强敌，我们虽已弹尽粮绝，但人人抱定为革命牺牲的意志，以大无畏的气势决心与敌人拼搏。跟我好几年的警卫员张厚先同志，卧倒在我身旁，当敌人向沙包上冲的时候，他急忙喊我卧倒，我却仍然挺身站立，手持两支短枪，两眼盯视敌人。厚先同志刚喊了我一声，他却中弹牺牲了。我急忙摘下他的枪，仍然站在那里，手持双枪向敌人射击。这是荒漠中的一场血战，也是西路军的最后一次战斗。

天黑时，领导决定突围，通知我砸掉最后一部电台。我预感到全军覆灭的命运在等待着我们。张厚先同志的牺牲，使我感到我的生命也即将结束。在沙漠中突出去似不可能，电台当然不能落入敌手，于是，我们砸掉了四方面军的最后一部电台。除为了将来破译密码用的一两份不太重要的敌报外，所有的机密电报和密码本也都付之一炬。我身上还有一支枪，内装两颗子弹，在上衣口袋里还有一个火柴盒，里面有三五根火柴，以应付最后时刻的到来，烧毁留下的两份电报。

在处理完电台的事宜之后，我正在等待突围，突然有人喊我：“局

长，你看，首长们已经都走了。”我懵懵懂懂地看了一眼，只见一行马队在黑夜中正在向前赶路，同志们让我赶快跟上，我牵过骡子，同志们将我扶上骡背，急忙追上那队人马。王子纲同志没有牲口，他牵着我的骡子尾巴个跟了上来，但后来还是掉了队，跟着其他大队伍走了。

到停下来时，一看，这一队人马有八十多匹牲口，都是负责干部，没有警卫部队，大部队则由八十八师师长杨秀坤同志做后卫掩护突围。我们这一小队骑马的走不动了，大家就牵着牲口走。走到半夜，才摆脱了敌人，听不到枪声。但我的情绪仍很不好，就问身旁的一个同志：“现在是朝哪个方向走？”他看了看夜空中的北斗星回答我说：“向北偏西。”我向李先念同志发牢骚、提意见：我说：“再往北就到外蒙古的戈壁滩了，大部队在大路上，我们应该向西靠和突围出的大部队汇合。”他们不听，我还是骂骂咧咧，继续提意见，没想到我这一骂倒起了点作用，队伍终于停了下来。经过大家商量，采纳了我的意见，改向西南方向走，以便插向大路，和大家在一起。

队伍西行以后，又在沙漠中走了两天两夜，仍然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沙丘，我们能不能走出这黄沙滚滚的瀚海，真是难以预测啊！为了防备万一，我只好把密码本和留存的电报底稿也烧掉了。红四方面军的电台，最后在沙漠中结束了它的生命。

二十三、终于走完了悲壮的行程

第三天下午，大家已经筋疲力尽，口干舌燥，头昏眼花，没有一滴水，没有一粒粮，只有遍地的黄沙和晴空中焦灼的阳光，大家都仰卧在沙丘上休息。出路当然还有一条，就是继续向西南方向走，到了大路上才能找到水喝，可是我们已经寸步难移了。当时派李先念同志的小参谋简佐国同志去侦察附近是否有水，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他却有去无归。口渴肚饥，人们都迷迷糊糊地处在半休克状态。突然有人发现所有的牲口都不见了，大家顾不得昏迷疲劳，赶快去找牲口。有人在用望远镜了望，见有几匹马正在低头吃着什么，偶然的发现给了我们生的希望，我们跳起来奔跑过去，这才发现那里有一大池水。真是我们在这里渴的要命，

所有的牲口却在那里饱饮清泉。我不顾一切跑到池边，猛喝一通，我一口气喝了六大缸子水。于是人们又有了精神，继续向西南方向前进，终于来到了大路上。

在大路上走了一会，突然听到远处有汽车行驶的声音，我们正在莫名其妙，汽车已渐渐驶近，这才看清车上还有两面红旗。啊！红旗！这一定是我们自己的人。果然，是我们大队伍的人和盛世才办事处的人来接我们来了。真是柳暗花明，绝处逢生，同志们都流下激动兴奋的热泪。牲口由他们骑回，我们登上两辆汽车，直驶星星峡。在星星峡，陈云、滕代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迎候我们。第二天来了几架飞机，空投了一批枪支弹药，第三天飞机又空投了军装。我们丢下破烂不堪的衣服，换上崭新的军装，原来这些物资都是共产国际的支援²⁷。1937年5月5日正是马克思诞辰的那一天，西路军幸存的八百余人²⁸坐上几十辆汽车离开了星星峡，三天之后到达乌鲁木齐，我们被安排在东门外新兵营，从此结束了西路军悲壮的行程。

后 记

1981年11月12月之间宋侃夫同志分六次向我讲述了他在红四方面军的经历，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电台从建立到消失的过程，但必然涉及到四方面军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说我党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和一些少为人知的情况。因此，我觉得这个回忆录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回忆录的标题和文中的小标题都是我加的，特此说明。

齐特 2000/8/12

1982年年初整理一稿

2000年8月12日二稿

27、共产国际把200余辆汽车的支援物资运到祁连山，到达后发现我们已经不在了，只好又返回乌鲁木齐。

28、攻打安西时，我们还有一千余人。

访朱蕴山同志笔录

被访问人：朱蕴山（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

访问人：周进、顾旭、廖竑、孙子年、姚维山、赵理珊、鲍劲夫

时间：1979年3月7、10、15、17日各半天

地点：朱老家客厅

在场人：朱老长子朱明（世昌）、三子世同以及夏秘书

记录：鲍劲夫

录入：黄文治

校订：蒋二明

问：六安地区响应“五·四”运动最早的时间，霍邱是五月七日，六安是5月8日，当时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么快？

答：“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带领北大学生亲自散发传单、游行而发动起来的。安徽是首批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地方。安徽为什么会这么快行动呢？这是因为“五·四”运动是有它基础的。安徽早期就有反清、反北洋系的政治活动，更早可追溯到有洪军太平天国反清的民族运动的活动基础。安徽是陈独秀的家乡，他是怀宁人，早期在安徽进行过不少活动。他反对桐城派的斗争有很大的影响。当时桐（城）怀（宁）关系密切。在此不得不谈起一个人，名叫李光炯，又名李德膏，桐城人（现属枞阳县），是当时反清、反北洋军阀的头面人物，在安徽有很大政治影响。他早年参加同盟会，根据他的资历可做大官的，但他不干，只在保定协助吴挚圃先生创办莲池书院，后回安徽办桐城中学，宣传新学。陈独秀与李光炯交往密切，受李的影响甚深。李在发展当时安徽教育事业，推广文化，宣传进步思想是有功绩的。如今此人已不为世人所知了。

安徽早期政治活动，除同盟会外，陈独秀还组织了一个秘密组织叫“岳王会”。这个组织在其它省会也有。这个会的宗旨是反清，宣传共产主义。当时会址设在安庆。记得参加者有柏文蔚、常藩候……，我也是发起参加者之一。岳王会也是具有军事武装性质的秘密组织，不少会员参加过广州暴动，有的已成为黄花岗烈士。其次，陈独秀在芜湖长街还创办了一个科学社，提倡科学，他认为“没有科学就没有共产主义”。芜湖当时是推动文化的中心。各地常派人去芜湖议事，推广文化、科学。建立第三甲种农校也是这时形成的。当时由我和桂月峰负责，于一九二八年冬筹备告竣，推沈子修为校长，我任修身课（等于现在政治课），月峰任学监。还成立教职员联合会，一九一九年春正式开学。谈了上面一席话，主要目的是说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在安徽已进行过大量活动。安徽响应“五·四”运动这么快是有它基础的，有它的内在联系。记得我的家乡一九一九年三月六安学生会成立，“五四”运动一开始，六安学生会立即响应，发表宣言，游行示威。皖西响应这么快，主要是陈独秀有个组织叫“岳王会”的关系，他事先都打过招呼。关于“岳王会”上面已谈过一些，总会在安庆，参加的人很多的。陈独秀搞“岳王会”有区别于李光炯的，在反清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岳王会”将来是搞共产主义的。但是陈独秀是尊重李光炯的。曾记得孙中山曾三次找陈独秀，要陈参加孙的国民党，陈两次见孙中山，说明他不能参加孙中山的国民党，其原因认为国民党的干部都是土豪劣绅，不能和他们开会。最后孙中山找陈独秀，陈派李大钊去搞联络。没有李大钊国共两党是合作不起来的。“岳王会”的人员也是很复杂的，开始都是单独活动，后来才逐渐明白，不团结起来干事不行的。后来陈独秀提出要科学，最后共产主义成功是科学的成功，前面所述要搞“科学社”，原因也在于此。

问：六安进化书店是何人何时开办的？发行哪些进步书刊？

答：六安进化书店是胡苏明、朱瑾怀搞的，表面上是由施亚申（音译）当书店经理。这个书店是进步的，秘密发行党的刊物。当时就有《向导》（这事可找朱传钧，党员，现在在合肥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工作）。

问：毛坦厂市民百人集合游行声援大会的组织者、经过及结局情况，是否了解？

答：我不记得，我不了解。

问：金寨燕溪小学是否 1920 年成立马列主义学习小组？

答：这个问题我不了解。

问：六安三农何时有党员、党组织？多少党员？负责人是谁？

答：在“三农”时我就是党员。我是陈延年批准正式入党的。学生中自称为共产党的也不少，十几个人，学生中党员会议召集人是个大汉子（名字不记得了），还有个姓翟的，我同他父亲熟（朱老于 1920 年初在“三农”建立“中国革命小组”，是马克思主义学习组织而非党组织；朱老是 1925 年冬在广州由高语罕介绍、陈延年批准加入中共——编者注）。

问：皖西各地到广州农讲所、武汉农讲所、黄埔军校、武汉军政大学、长沙政治三分校、安徽省党务政治干校学习有哪些人？各人来去时间？

答：我记得在广州农讲所学习的有薛卓汉（寿县），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有许继慎（六安）、曹渊（寿县）。

问：六安、麻埠、苏家埠烟工各多少？参加罢工的各多少？

答：六安黄烟工人七八个人。在工人中没有党员。

问：驱骆的时间是否 1922 年 6、7 月间，驱骆原因一说是因骆通公审一离婚案不公，引起学生公愤，一说是因改选县财政局长和组织骆通的财政预算。骆封闭学生会，学生起而驱，哪种原因起主导作用？

答：当时北洋军阀要贿选曹锟当总统。要保证贿选总统“胜利”，就要安插亲信。倪嗣冲、倪道烺叔侄，就是曹的亲信。让二倪到安徽当省长，就是曹锟为当贿选总统而作的一个部署。骆通去六安又是为二倪当贿选省长做准备的，他们的手段就是通过第三届省议会贿选一个省长后，把持全省的行政、议会大权，以“合法”的身份去贿选曹锟当总统。我、李光炯、刘希平、沈子修都不赞成，便发动李克农（当时还没入共产党，是省学联领导人）一道反对。骆通去六安任县知事，我得知后便叫沈子修来省城（安庆）一趟，告诉沈，骆通很坏，组织驱骆，便由《评议报》和六安学联发起驱骆。实际原因是反贿选，其他所传原因都是借口，我、李光炯、刘希平是驱骆运动负责人。

驱骆运动在全国是很大的运动，一连赶走了骆通等四个县知事。

问：大刀会在太平集起义的时间和攻占六安城的时间。攻城的时间一说公历1924年的6月26日，27日或29日，一说农历五月三日或二十五日，确定时间是哪天？这次大刀会暴动的首领是夏云峰、梅广恩。进城后自称自治第一军，推选谢应龙担任总司令，谢是何许人？

答：谢应龙，我不记得，我不晓得。我只晓得夏云峰。夏是大刀会头（首）脑。王绍虞是真的，是为革命牺牲的。还有个王一峰还在{朱明（世昌）插话，王一峰是否参加过共产党，我不清楚。但他倾向进步，抗战时参加过动委会工作。以后在张淦第七军当秘书混饭吃。据说现在独山说大鼓书。这个人了解许多情况}。胡允恭在南京大学当教授，允恭即胡萍舟，七十多岁了，他面前还有许多材料。

问：蒋光慈的入党时间，一说是1922年在芜湖赭山中学入党，一说是1920年入党，到底何时？他在1923年受哪个党组织派遣回家乡（今金寨县白塔畈）建党的？他的革命活动及后期表现？

答：蒋光慈是在芜湖五中入党的，时间在1922年差不多，反正他入党地点没出芜湖圈子。芜湖五中的校长是刘希平，刘是六安施家桥人，其叔是刘跃西。刘跃西死后，葬于赭山。当时光慈与一个叫苏曼殊的和尚关系很好，苏是党员，此人是光慈的前辈。李云鹤1925年入党是蒋光慈介绍的。（蒋光慈1922年在苏联由团转入中共——编校者注）。

蒋光慈后期表现不顶好，也不顶坏，他名字连“赤”字都不敢用了，改用“慈”字了嘛！

问：在上海的六安籍党员王绍虞、王立权、王亦良、蔡蕴山、刘大蒙回六安建党。他们中哪些是党员？哪些是团员？何时入党入团？派回的时间是1925年春还是1925年秋？上海党的什么组织派他们回来的？在上海是读书还是工作？他们回来以开办“青年实业社”为掩护，本身建立什么党组织？是小组还是支部？是否在1925年就建立了六安特支？

答：刘大蒙是团员，我晓得。其他记不得了。

王绍虞、刘大蒙在上海大学是读书的，不是在那工作的。外地人到上海总是找上海大学，上大是国共合作办的。校长是于右任。

中共六安特支是1925年秋建立的。六安原有中共支部，但不大完备。在支部前就有个党小组。“五·四”后就干起来了，负责人是刘希平。王

绍虞、王立权、王亦良、蔡蕴山、刘大蒙等他们回六安后，就建立了六安特支，接受中央的领导，王绍虞是特支书记。

特支成立前，六安一带党的活动都是舒传贤领导的。

谢五在六安西南乡（离凤凰台很近），了解党的特支成立情况。

问：1926年春，中央重新登记，舒传贤在安庆才正式入党，以前，舒传贤是自封党员。没在北京当过党的支部书记。

问：桂月峰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后来担任兴中县长。兴中县何时成立？属何省？他何时何地怎牺牲的？

答：桂月峰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当过“三农”的学监，当过中兴县的县长，是共产党员，他入党时间1926年。

中兴县是许继慎同志去后划出的，时间在1930年3、4月间，在立煌县以前，许继慎一到大别山，就将立煌县（即旧金寨那一带）划为中兴县。{朱明（世昌）、世同插话：许继慎从上海去大别山，临走时，朱蕴山老还给他筹措红军经费一万元以及电台等}。桂月峰的弟弟叫桂月池，是国民党军队一个很大的军官。桂月峰与其长子桂尊夏是在红军主力西征时，在金家寨一起被国民党还乡团杀害的。

桂月峰之次子尊秋还在。

（记录者注：原问题是兴中县，经查朱老当年悼念许继慎等同志诗后自注，发现是中兴县，并非兴中县，特注于此。）

问：皖西旅外学生、工人中，早期入党的姓名、革命事迹。

答：我不清楚。

问：大革命失败后，被党派回六安的刘大梦、王亦良、蔡邦瑜、徐为睿（女）等同志的下落。

答：不清楚。

问：舒传贤是被张国焘杀害的，还是被国民党杀害的？地点在何处？

答：舒传贤是被张国焘杀害的。地点在立煌（即今上码头）至麻埠之间一座石山下面的一条水沟边，用石头砸死的。这个地点距立煌（即金家寨原址）60华里左右，现在已成水区。同时遇害的还有薛卓汉。

问：请谈谈舒传贤、薛卓汉的具体情况。

答：舒传贤是舒家庙人，家里较穷，他入安庆工业学校（即安徽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录者注）读书是在“五·四”运动后，我把舒介绍给该校校长史磊永（史是桐城人，以后叛变了）的。舒很能干，当学生会会长，搞工运，主持会议多，起作用大。学习上是第一名啦。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派他从安庆回皖西到大别山搞武装斗争。他当时信心很足，说孙中山十次暴动没有成功，共产党一定要搞成功。

舒传贤个子跟我差不多，瘦，黄白脸，没胡子。

舒没参加南昌起义，我和童汉璋（合肥人，安徽省动委会委员）参加了。

舒有个病痛事：他在安庆结婚的爱人，以后叛变了。这个人不知叫什么名字。

薛卓汉，我在广州陪他去见毛主席，毛主席给薛卓汉一套农讲所讲义。我又提名薛卓汉当国民党“二大”代表。薛卓汉开会的路费是我给的（薛卓汉当时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的会务工作；安徽省的中共组织打算由安庆推选他为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但他在安庆名声不大而落选——编校者注）。

问：关于许继慎被杀害情况？

答：许继慎被派往大别山，临走时，我筹集了一万元，其中七千元给许继慎做军费，三千元做工农运动经费，而我自己家里当时连饭都没得吃。

出师北伐行军路上，蒋介石一次硬要向江西方向冲，许继慎把蒋抱回来了，许自己带头冲，保护了蒋的性命，因此，蒋很喜欢她，提拔了他，蒋介石派许当十三军军长（此事不准确——编校者注）。但蒋不知他已加入共产党。后来许到皖西起义，蒋曾派曾扩情、钟梅桥送信给许。许把曾、钟二人和信一并交给了上级党组织，张国焘却以此硬诬他是什么“改组派”，将他杀害了，这是一个大冤案。

徐向前与许继慎关系较好，许继慎去发动起义时，徐向前是许的部下。许继慎去皖西起义的基础是肖方、周维炯创的，这部分人以后发展到近十万人。后来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进行肃反，造成皖西大惨案，使红军和党员受巨大损失。

回想起在杀害许继慎问题上，有一个国民党投降的旧军官起很坏作用，他当时在红军任机要秘书，张国焘信任他，以后在红军西征时被国民党乱军打死了。就是这个人去就把许继慎军长权搞了，让许当师长。这个人就是旷继勋。

问：关于周范文政历情况？

答：周范文曾任过我手下的秘书，他以后被捕过三次，第一次在哈尔滨被捕，第二次在沈阳被捕，第三次在上海被捕。第三次被捕后就脱党了。但他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停了一会，朱老说）他和我说他害过两个青年。我这里没有周范文的档案，可找一下统战部。

问：关于上海寿阳宫问题？

答：开办寿阳宫是我出面提议的，目的是联络上海与武汉之间的革命同志。“四·一二”政变后，一些失掉组织联系的同志到上海找党组织接联系，无处落脚，没有个接头地点，搞个旅馆，便于掩护，旅馆里人来人往，出出进进，不容易被人注目。上海的寿阳宫名义上是王亚樵主办的，实际上主要是寿县人办的。王亚樵是合肥人，无政府主义者，后在广西梧州被人打死。郑抱真对王亚樵很熟悉，是他的助手。郑是我们共产党员，寿县人，解放后当过皖北行署主任。

在安庆还有寿阳宫。武汉失败后，周总理还到过安庆寿阳宫。

问：鄂豫皖特委时期对皖西工作的指示情况？

答：不了解。

问：1928年1月，在六安南岳庙召开的活动分子会为几天？（一说3天，一说7天）

答：不了解。

问：1929年4月1日的一次党的联席会议，是哪几个县参加的？在何地？

答：不了解。

问：1930年1月，六安中心县委在六安县横旦岗九里冲召开第二次执委会，会议内容是什么？

答：不晓得。

问：动委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何人倡议？是否受到我党的指

示？指导思想、具体任务是什么？

答：抗战初起，“七七”卢沟桥事变时，我正好在北平协和医院动了手术。不久，就从天津搭船到青岛，过济南，到南京。当时国民党政府已下令退却，迁都武汉。当即去中共办事处会见了董必武、叶剑英，他们告诉我现在团结抗日救国要紧，赞成我赶快回到安徽地方发动抗日工作。和董、叶两老匆匆分手后，会见了李济深，李邀我同赴衡山大本营，我没有同意去。同时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他也邀我去安徽，他说：“你去安徽，群众会跟着你起来的。”我说：“要我去，我有个条件，即是第五路军要和八路军合作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我才能去。”李后来答应这个条件，我就此才决定去安徽，我建议、希望在五战区发起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他接受了这个建议，李还未去徐州就职，和我同到六安县城，筹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当时国民党 C.C.派特务方治、邵华等由安庆退到六安，仍挂着这国民党皖省党部。李宗仁在就职安徽省主席时就公开发表谈话，他对方治、邵华等严厉批评说：“国民党对不起安徽人民，党内不良分子一向把持地方谋个人利益，脱离群众，当前抗日第一，没有民众起来帮助是抗不成的，所以我要求安徽方面前辈先生们大家出来发起一个安徽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不分党派，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如方、邵两位委员能留在江北，和大家合作，很好，但要尊重动委会前辈们的意见，不要妨害他们，要虚心团结他们，不久，我就去徐州抗战，动委会由老先生出来主持。”这一番话说完后，方治、邵华就出会场，回到一品斋夏悦斋的住宅（即他们的办公处），对夏说，李宗仁来六安就职，朱蕴山同时回来了，我们就让他们罢。不久，就把夏宅让与动委会。他们就一齐转移到皖南靠第三战区，成立党部特务机关。

动委会主任委员由李宗仁担任，我任总务部长，沈子修为组织部长（后由周新民担任），光升为宣传部长（后由狄超白担任），朱子帆为后勤部长，以大别山为抗日根据地。李不久离六安去徐州抗战，留我对动委会负一切实际责任。

董老当时为解决皖西游击队高敬亭问题，秘密路过六安，并要我利用动委会，为党秘密地培养党的干部，并出示毛主席《论持久战》，对指导我们工作，帮助很大。董老来之前，就已先派周新民（党员）来我处。

这次来又介绍詹运生和李相符（党员）给我来五战区工作。

董老来六安时，还召开过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不过二十人。当时有我，许杰（现任地质总局顾问、人大常委），彭康、孙以瑾、狄超白等。主要讲推动抗日的问题。

李宗仁到徐州后，我和省动委会在六安驻不到半年，就搬到立煌（金寨）县去了，共计坚持了一年多。徐州失守后，李宗仁败退襄樊一带。不久，又败退老河口。李宗仁退走时还交个电话给省政府，要我全权领导动委会。我当时不好答应，也不好不答应，把事情摆下来。后来，敌人来大别山搜山，省府后来由廖磊担任了（世同插话：动委会时的人还很多，不少人在北京，陈国栋现在商业部旁边的那个部当部长）。

问：桂系对动委会的态度，如何统一组织？

桂系对动委会的态度，李宗仁是个态度，始终支持，廖磊的态度不一样，他不支持。廖磊的秘书朱佛定与我关系好，有私交，一次他亲自对我说：廖磊说在皖西就要防着我。所以廖接任后，就反对动委会，廖第一是防我，说动委会不是为桂系服务的。第二防着青年党，第三防着没有把握完全控制的军队里的那些人。

就桂系来说，军队在白崇禧手里，李宗仁是空的。廖磊是白崇禧的人，廖到安徽来就是防共（产党）的。廖这个人一般人都说他很好，说他艰苦，其实他艰苦是为桂系。一次他在英山召开会议，白崇禧到会上讲话，说你（指廖--记录者注）在安徽就要防着朱蕴山。廖就言听计从。

问：动委会内有多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担任什么职务？

答：动委会内共产党是有周新民{世同插话朱老（蕴山）是周新民的入党介绍人}，张劲夫、狄超白、朱子帆是非党员，他们是以后才入党的。妇干孙以瑾、蒋岱燕也都是共产党员、进步青年。

问：动委会与我党的关系如何？

答：动委会表面上领导是桂系。在前期，共产党员和不少进步分子都到下面去参加实际工作。公开提出要组织动委会的是李宗仁和白崇禧。后来，白、廖（磊）等人提出要防共、防着我，我党根据董老讲话精神，利用动委会这一形式，为我党秘密地培养干部。

问：动委会、工作团的成绩、作用及缺点应如何评价？存在不存在

两条路线斗争？

答：动委会成立后一年，一共搞了三十几个工作团。大部分是经李宗仁手成立的。一部分是在廖磊手成立的。工作团的主要工作是宣传抗日、搞民众武装。这是符合党的抗日路线精神的，来壮大自己的队伍的影响。当时六安三农（此时已无三农——编校者注）就成立了五个工作团。

动委会内部的路线斗争还是很激烈的。白崇禧、廖磊来搞防共，我们对它是你防共我就防国（国民党）。当我知道廖是来防共的消息后，我就称病，不参加他们的会议，不出省府一步，光明甫也不参加他们的会议了。廖没办法，就同他的民政厅长一起到我家去“解释”，我当面对他们讲：你带广西人来排挤我们不行，我的那些周新民、朱子帆、光明甫、狄白超到你广西都能做个厅长，你带的这些人最多只能当个县长、科长。你把周新民派走当个什么安徽省驻渝办事处主任，你把他们挤了，不行。我到安徽来，与李主席有个条件，五路军与八路军要合作，不然我不干，我不是做官的人。廖听后说，不要相信挑拨。那次，我与廖谈翻后，愤而辞去动委会所任职务。当时原决定先赴襄樊，见李宗仁商谈，希望恢复他在皖时的团结抗战的局面，掩护动委会民众的力量。支持章乃器继续担任省财政厅厅长，以便集中力量反对 C.C.方治等人。这样对抗日有利（当时方治和章乃器摩擦厉害），然后转重庆会周恩来、董必武等请示方针，再回大别山。

我离开不久，廖磊病逝，反共老手李品仙继主皖省，他仍继续执行白崇禧反共政策，局势更为恶化。这也使我留在西南搞民主运动，不再作回皖的打算了。

问：国民党何时解散动员委员会的？解散之前国民党如何制造摩擦的？党又是如何洞察敌人的阴谋及早安排在动委会、工作团工作的党员与进步人士撤退以免损失的？

答：我和廖谈翻了，又遇桂系把抗日的余亚农军长的械缴了，把余绑票了，就决定到重庆去。我走前告诉彭康、孙以瑾等人。彭康、狄超白等就率工作团总部全都到新四军去了。1941年2月，彭康等发了一解散动委会宣言，仅仅花了3天时间，连准备工作和撤退工作全部完成了。这次撤退工作很好，没有损失一个干部。张劲夫他们也到新四军去了。我们

走进步的力量已作有准备的撤退，动委会就剩下一些中间派和反动派了，动委会也就无形中失去了号召力量。解散时，孙以瑾、蒋燕（现任湖南省文化局副局长）想以妇女民先队名义发一个宣言，被我制止了，那时桂系正找借口抓人，我说，你们不要发，一发就走不掉了。他们才没法，安全撤退。

我走后，朱佛定、童汉璋、朱子帆等写信叫我还回来干，后来情况已发生了变化，我已决定不再回大别山了。

后来，我到重庆红岩村13号八路军办事处找周恩来，周恩来不在，在那见到了现在的叶副主席，他叫我不走，就在那管长江的事情，说让谭平山管两广的事情。后来见了报纸上发表的周总理的四句诗（指“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记录者注），我才知道周总理到皖南去了。谷正纲在皖南事变前还同情共产党。以后，他投向CC，就反动了。现在此人在台湾。

后来在广西会见了王明，先是李克农来会我们。接着王明来会我。为给许继慎平反事，我跟王明拍桌子说：“你不平反，你还当什么领袖！你就不能领导我！”我跟王明搞翻了，我不愿跟王明干，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就服从周总理领导。从此以后，我就管统一战线，负责上海、南京、安徽、江西等地。我赏识周恩来，连陈独秀也佩服他。当陈独秀听说“二大”（指国民党“二大”——记录者注）后周恩来为我钱行时说：这个人了不起，将来共产党是要靠他了。

问：魏文伯在抗战时期可任过中共六安县委书记？抗战时期六安有过几任县委书记？

答：不知道。

1979年3月31日整理

于北京解放军总政招待所三号楼并经朱老及世同过目、修改

1979年4月12日誊清。

《铜钟丛书》出版者的话

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筹备和努力，我们将《铜钟丛书》贡献给读者。

《铜钟丛书》搜辑能够反映时代与社会真相之一斑的个人自述历史，或曰回忆录，出版发行，以冀有益读者，传诸后世。

中国以其疆域之广大、历史之悠久、人口之众多、文化之昌盛，立于世界大国古国之林，千年不堕。我们知道，文明的传承、历史的延续、智慧成果的积累，主要依藉民族的集体记忆，而这种记忆，唯有通过无数代，无数人，分别而认真的文字记载，才得以薪火相传。

人类进入二十世纪末期至于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全球化浪潮的滚滚蔓延，一些国家的民族传统和固有文化渐趋式微，人文科学和社会思想也随之衰落。年轻的一代由于生活内容变化太大，科技产品更新太快，适应和追赶新潮犹恐不及，便日甚一日地离开对历史的关注和对往昔的反思。

于是，便出现了所谓的历史与文化的断层。

在以往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曾经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发生的一系列反常与荒谬事件是无法遮掩和不能讳言的。否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须得经受难以想像的苦难历程；否则为什么后来会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政治转舵和“改革开放”的政策突围。经过十多年的转型，中国社会的面貌有了重大改变，于是那刚刚过去的、许许多多前人的命运遗痕，忽然成为今天的青少年们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陈年旧事。

中国，正面临着比世上任何国家更严峻的历史断层，文化断层。

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还没有过去。历史没有明确的划分法则。每一个昨天都可算作历史，每一个今天转眼就变成昨天。年老的人还活在世上，一生的经历对当事者来说永远记忆犹新。他们的命运变化，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得失成败，他们的情感波动，他们的生活细节，实录下来就是最生动最鲜活的历史，不仅对他们的亲属后辈有“前事不忘”的意义，对下一代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振聋发聩的价值。这类文字记载一旦大量涌现，那个时代的完整面貌就不仅呈现在今人面前，还将永远留存在我们民族的记忆库里，成为我们用之不尽的财富和时刻高悬的可鉴之镜。

巴金在《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卷首语中说：“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他又说，“往事不会消散。那些回忆聚在一起，将成为一口铜铸的警钟。”

鉴此，我们将这部丛书定名为《铜钟丛书》。

《铜钟丛书》并不专注于往日的苦难。如果这样，就有偏颇。偏颇是情绪的产物，难免有悖于理性。在今天，我们特别需要真正的理性，因为只有充满科学精神的理性才能导引我们离开歧途，推动所有跟人民幸福有关的事业的发展。而，一个社会的超过半个世纪的寿龄，必有许多其它领域的状况、多种多样的命运形态可以记述和值得留存。因此，《铜钟丛书》将致力于主题和内容的多样化，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和更高的立足点，源源不断地出版下去。

柯捷出版社在成立之初，就由创始人陈文乔先生（已故）定下“替普通人出书，为平凡者立传”的宗旨，以及“搜寻史料，保护史实，研究史学，宣传史训”的选题重点。今天《铜钟丛书》的问世，也正是对这一辛苦从事文化事业的拳拳初衷的贯彻。

【铜钟丛书】编辑部

2008年1月